

# 學術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社會科學類國際交流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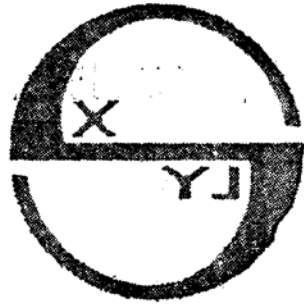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曲江縣城新貌



● 從廣東實踐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征文專輯 ●



# 学术研究

主 编：梁 钊  
副主编：张硕城  
刘斯翰  
范汉英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电话：3345916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399信箱

代 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1.5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3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粤工商广字01044号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

· 从广东实践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农村基层的好路子 .....谢 非(6)
- 推进农村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尝试 .....中共南海县委员会(12)
- 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主要特点和普遍意义  
.....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调查组(16)
- 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辩证思考 .....范 英(21)
- 广东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及特点  
..... 关则文 魏建飞 陈祖煌 杜重年(25)
-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崛起的原因和条件 .....于幼军(29)
- “自然失业”问题初探  
——广东90年代就业政策调整的若干思考.....黄德鸿 邓伟根(34)
- 改革开放为中山市敞开了繁荣兴旺之门 .....谢明仁(39)
- 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乡镇企业的发展及主要特色 .....黄柱良(46)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启迪  
——中山、东莞、顺德、南海调查  
.....顾作义 何文光 洪楚仪(52)

· 哲 学 ·

发扬实事求是精神, 搞好广东工作

- 纪念叶剑英诞辰95周年 .....张江明(56)
- 改革开放中的姓“社”姓“资”问题 .....马中柱(63)
- 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特色 .....曹云华(67)

· 经 济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先驱者——卓炯

- 纪念卓炯教授逝世五周年.....梁钊 李鸿生(73)
- 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刘鸿儒(78)
- 发展山区保险业, 促进山区经济腾飞  
——梅州市的实践与思考 .....卓春先(80)

- 关于股份制度的所有制性质问题 ..... 姚 迈 (83)
-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劳动力也是商品 ..... 白雪海 关筱琳 (87)
- 实物计划调节的信息限制与商品型计划管理的信息系统建构  
..... 刘志彪 (90)

· 历 史 ·

- 从学术源流论饶宗颐先生的治学风格 ..... 姜伯勤 (94)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线索和分期 ..... 周 军 (102)
- 中国古代文化人心态探析 ..... 刘汉东 (107)
- 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唐代政治 ..... 谢元鲁 (113)

· 文学 · 语言 · 教育 ·

- 文学史哲学：性质、对象与意义 ..... 陶东风 (118)
- 劳承万的审美中介学研究  
——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视向 ..... 刘伟林 (125)
- 论我国古代诗歌意境观念对戏曲理论的影响 ..... 阮国华 (129)
- 车王府曲本子弟书评述 ..... 刘烈茂 郭精锐 (136)
- 广东东莞莞城话的“起” ..... 陈晓锦 (142)
- 试论幽默的教学功能 ..... 周国雄 (144)

· 企业研究 ·

- 浅谈市场经济与国营物资企业的改革 ..... 袁中越 (150)
- 以集团化推进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化  
——广东明珠球阀集团公司的实践及启示 ..... 李桂崇 (154)
- 依靠科技进步是振兴企业的必由之路  
——佛山市变压器厂发展的启示 ..... 齐建中 (158)

· 学术信息 ·

- “广东省社科联系统学术理论刊物首次工作座谈会”纪要  
..... 谭湛明 (160)
- 梅州举办《研究梅州 建设梅州》征文 ..... (15)

# ACADEMIC RESEARCH

No.4,1992

## CONTENTS

- An Effective Way to Establish a New Ethic System in the Rural Organizations at Basic Level.....Xie Fei ( 6 )
- A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Ethic System at the Basic Level of Countryside  
..... Nanhai County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12 )
- The Main Peculiarities and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Nanhai County's Building Civilizational Villages and Families  
.....by an investigation group from Guangdo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 16 )
- A Dialectic Meditation up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al Villages and Families in Nanhai County .....Fan Ying ( 21 )
- The Present Ownership Reform in Guangdong, Particulars of the Practice.....Guan Zewen, Wei Jianfei, Chen Zuhuang and Du Zhonglian ( 25 )
- Certain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the Rise of the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y in Share.....Yu Youjun ( 29 )
- "Natural Unemployment": A Primary Approach to the Adjustment of Guangdong's Employment Policies in 1990s  
.....Huang Dehong and Deng Weigen ( 34 )
- The Reform and Open Situation Knocked out a Door Leading to Zhongshan City's Prosperity.....Xie Mingren ( 39 )
- Town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its peculiarities of the town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Huang Zhuliang ( 46 )
- An Enlightenment for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Features—from an investigation of Zhongshan, Dongguan, Shunde and Nanhai  
.....Gu Zuoyi, He Wenguang and Hong Chuyi ( 52 )
- Developing th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Spirit to Settle the Affairs of Guangdong Well—written for Ye Jianying's 95th birthday  
..... Zhang Jiangming ( 56 )
- Some Questions of Social Attribute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 "Socialist" or "Capitalist"?.....Ma Zhongzhu ( 63 )
- Characteristics Showing in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Singapore  
..... Cao Yunhua ( 67 )
- Mr. Zuo Jiong, a Pioneer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written for the 5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 Liang Zhao and Li Hongsheng ( 73 )
- A Talk about Reforming Chines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 Liu Hongru ( 78 )

Developing the Insurance Business of the Mountain Area to Promote the Rise of Its Economy---A Ponderation over the Practice of Meizhou City.....	Zuo Chunxian ( 80 )
The Nature of Share Ownership System.....	Yao Mai ( 83 )
Labour as a Commodity under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 .....	Bai Xuehai and Guan Xiaolin ( 87 )
Constructing a Management System Involving the Informational Restriction of Adjustment Planned with Material Objects and the Part of Planning in Commodity Type.....	Liu Zhibiao ( 90 )
A Look into Mr. Rao Zongyi's Scholarly Research Style in Light of the Academic Source and Course.....	Jiang Boqin ( 94 )
An Outline and Stage Division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PRC .....	Zhou Jun ( 102 )
An Approach to the Mental Appearan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Lui Handong ( 107 )
Machiavellism and the Polity of the Tang Dynasty .....	Xie Yuannu ( 113 )
A Philosophy of Literary History; Nature, Object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Study .....	Tao Dongfeng ( 118 )
Professor Lao Chengwan's Research on Aesthetic Intermediary .....	Liu Weilin ( 125 )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rtistic Concept of Its Classical poetry upo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Theory .....	Yuan Guohua ( 129 )
A Comment on the Juniors' Sections of the Chinese Opera Versions Stored in the King Che's Mansion .....	Liu Liemao and Guo Jingrui ( 136 )
The Distribution of a Morpheme 'Qi' in Guangcheng Dialect Located in Dongguan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Chen Xiaojin ( 142 )
On the Function of the Humorous Way Used in Teaching .....	Zhou Guoxiong ( 144 )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eform of State Material Enterprises .....	Yuan Zhongyue ( 150 )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nterprises Comprehensively by Grouping Enterprises---An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ractice of Guangdong Mingzhu Group Company of Ball Valves .....	Li Guichong ( 154 )
Depending on the Adv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nly Way to Vitalize an Enterprise---An insper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Foshan Transformer Factory .....	Qi Jianzong ( 158 )
Viewpoints from "The 1st Forum on the Work of the Academic Journals Run by the Federations of Social Sociences at the Local City Level in Guangdong".....	Tan Zhanming ( 160 )
A Notice Soliciting Contributions for "Researching and Constructing Meizhou City" Organized by Meizhou City.....	( 15 )

## 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农村基层的好路子·

谢 非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的谈话对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近我下去跑了一段时间，基层的情况充分说明，小平同志谈话的威力是很大的，说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心里去了，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这种积极性不光是搞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也包括了搞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南海县创建文明村、户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里，我着重讲一讲如何看待南海县的经验以及如何学习推广南海县经验的问题。

南海县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为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农村基层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这条路子的核心，概括来讲，就是形成一种群众性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这个机制的内涵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标准适当，虚实结合，村户结合，有吸引力，有号召力。标准适当，就是他们制定的创建文明村、户的标准既不太高，也不太低，是现阶段农村和农户应该做到的一些起码要求。如创建文明户的十条标准，我反复看了以后，只有一条有疑问，就是第六条“自觉移风易俗，没有搞封建迷信活动”。这里没有搞迷信怎么掌握？我问了南海县委一位副书记。他说这里有条界线，就是群众在家里搞点什么烧烧香、拜拜神之类的不在此列。但不能参加群众性的迷信活动，不能参与搞建神庙、联宗祭祖活动等等。我看能这样掌握也就行了。其他我看都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完全应该做到的。要讲难的话，最难的可能就是计划生育这一条，其他的应该讲是不难的。家庭的这“十条”，只要你认真去引导和组织，都可以做到。至于文明村的“七化”，这里面的质量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吃水自来水化”，自来水的质量就有高低不同。“厕所卫生化”，也有高档、中档和比较

低档的区别。“道路沟渠硬底化”，这个要求就更有区别，有钱你搞水泥，没有钱你搞石头，再没有钱你倒沙子，这也是硬底，这些都可由低到高逐步发展。“村前村后绿化、美化”、“保洁经常化”，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村头标志化”更可以做到。要形成一个真正起作用的机制，就必须有切合实际的内容和要求，太高了做不到，太低了不叫文明，达不到创建文明的目的。

虚实结合，就是能够具体就具体，能够量化的就量化，把那些虚的东西，尽量具体化。比方家庭和睦，邻里团结，没有虐待老人、夫妻打架、邻里纠纷的问题，一般来讲，是属于社会公德、伦理道德的问题，好象是虚的，但是把它列入到文明户的标准进行评比就具体了。本来是虚的东西，把它作为一种要求和条件提出来评比，就变得具体实在了。

村户结合，就是把创建文明村、户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以村带户，以户促村，共创文明。

标准适当，虚实结合，村户结合，这三条都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利益。所以，就有吸引力，有号召力。几年前我去高要，有一个村的农民反映：穿了皮鞋就不能出门，门口都是泥浆路。这个村子根据农民的要求，搞道路硬底化。据说三水有个村子也是这样，这个村子是出皮鞋的，许多人可以穿到皮鞋，但是一出门就是泥路，人们想穿皮鞋也不行。可是三水又是出水泥的地方，水泥很多。前些年市场疲软的时候，水泥卖不出去，三水就搞水泥路，大街小巷都搞上水泥，这下子“皮鞋村”就解决了问题，青年人高兴了。又比如南海县的两个典型，一个是讲与妻子不和长达10年之久的，一个是讲染有赌瘾的，经过创建文明户活动都得到了解决。这样的事对大家都有好处，大家都拥护。为群众办好事，不是采取简单的办法，而是诱导大家，组织大家，共同努力去做，这当然就有吸引力，有号召力了。再如完成各项任务，包括计划生育在内，本来是应尽的义务，事关国家大局，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道理讲清之后，群众也就拥护了。办什么事情，首先要看出发点，是不是反映了群众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群众的利益。这个利益包括眼前的和长远的，包括局部的和全局的。其他问题则是方法问题。出发点搞对了，群众就拥护，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组织大家去干。

二是形成了群众自觉要求上进的大气候。这个问题，我曾专门请教了南海县的同志，我说为什么创建文明户威力那么大？有的群众也可以不理睬你，你搞你的文明户，我干我的，你管得着我？县委的同志说，我们抓住了群众的上进心理和从众心理。他讲的一个例子可帮助我们深刻理解这“两心”的作用。他讲，农村结婚，有的人摆十几二十台酒席，要花几千甚至上万元，这里就有一种从众心。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自愿这么干的。但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谁结婚都不敢违背这种气候。再没有钱，也不敢不办酒席，不办酒席就丢脸，感到脸上无光。现在我们把这种从众心改过来，把它引导到争当文明户的轨道上来，使群众感到挂不上文明户的牌子，比不摆酒席的压力更大。我听了，觉得回答了我的问题。这就叫做大气候。我们的党组织和政府通过引导群众创建文明户，



使消极的气候转化为积极的气候。没有达到文明户，头就有点抬不起来，觉得在村子里低人一等，这种大气候的形成，正是创建文明户活动的威力所在。

当然，要形成这样一种气候，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有一个过程。南海县创建文明户，从发表格到挂牌子大概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做大量的思想转化工作，包括发挥家庭里家长的作用等等。当绝大多数都能够达到标准的要求来参加评比时，大气候就形成了。这种威力不是强迫命令的力量，而是一种促使人上进和从众的无形的社会力量在推动。

三是动态管理，解决了经常化、制度化的问题。我们办许多事情，搞一阵子不难，难就难在坚持，难在经常化、制度化。南海县创建文明户坚持每季度检查，半年复评，年终总评。已评上的不搞“终身制”，未评上的一达到标准就及时挂牌。通过这样一种办法做到坚持不懈，防止刮一阵风。这个机制非常重要，没有这一个也就谈不上什么制度化。

## 二

南海县的这些做法，这种机制，在全省能不能推广呢？我认为能够推广，也应该推广。他们的这些经验，已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坚持了两年多。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还要再看看。但两年多的实践表明，群众对此比较拥护，普遍可以做到，效果的确不错。这个经验应该在全省推广。南海县的经验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了提高农民文化道德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在精神文明方面要超过亚洲“四小龙”。我们应当把搞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项重要工作，当然不是南海县才要做，全省都应该这样做。学习推广南海县的经验，大家是一致赞成的。问题是怎么推广？我认为，总的来说应该采取既积极又因地制宜的方针。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次来掌握。

一是创建文明户和实现文明村的一些基本要求，全省都应该做到。创建文明户的十条标准，全省农村，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还比较困难的地方，也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区，都应该做到。哪里可以特殊、可以例外呢？你可以赌博吗？可以偷窃吗？可以嫖娼卖淫、吸毒吗？不可以。你可以不尽服役义务吗？可以违反土地管理法吗？可以违反计划生育吗？可以不完成国家任务吗？可以虐待老人吗？夫妻可以打架吗？可以违反婚姻法吗？可以不给予子女上学吗？你可以不搞卫生吗？都是不允许、不可以的。这十条不存在做不做的问題，不存在有钱没有钱的问题。你不想做，甘愿落后，那是另外一回事。文明村的一些基本要求也一样，各地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到。

但是，创建文明户活动一定要扎扎实实，不能刮风，不能搞形式主义，更不能搞强迫命令。南海县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扎扎实实地搞，搞一批巩固一批。开展创建文明户的活动，是一种启发农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激励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管理自

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拿一块红牌子去吓唬人，去变相地搞强迫命令。过去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搞“拔白旗、插红旗”，哪里不行就插一支白旗在那里，搞的是一种强迫命令的手段。我们现在搞创建文明户，千万不能搞强迫命令。如果那样就糟糕了，就走样了。我讲的“自我教育、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是很重要的。离开了这个，开展文明户的活动就变样了。所以，开展文明户活动，我们应该学习南海县的做法，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加强领导，由点到面，先做示范，逐步推广。农民是需要示范的。现在南海县做了，群众一看好处很多，没有搞的村子都要求搞。所以，各地应先搞试点和示范点。南海县的做法，还有一条就是先易后难，先进的地方先搞，干部力量强的地方先搞，然后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开。

二是创建文明村的“七化”应因地制宜，由低到高，逐步推进。搞文明村的“七化”，确实有一个有钱没有钱的问题。钱多的就多办一点，办的标准高一点；钱少的，标准低一点。这完全可以嘛。但是有一条，一定要搞卫生，这个不能例外，不搞卫生，怎么叫文明村？禽畜专栏化，这个恐怕也有差别，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但是禽畜总得基本上关起来，不能到田里咬这个咬那个，巷头巷尾乱拉屎、乱撒尿。这是个起码要求。总之，“七化”都应该做，就是要求不同，标准的高低不同，不能千篇一律，一个模子照套。

三是珠江三角洲应当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广东省来讲，基本上是三种类型的地区：一种是三角洲，一种是东西两翼平原、沿海地带，还有一种是山区。如果讲经济条件的话，也是离不开这三种类型的地区。三角洲首先应该积极推广南海县的经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摆在议事日程上来。在三角洲这个地区应按高一点的标准来搞。不光社会风气、民风、村风是好的，而且农村的建设也是很漂亮的。将来的农村，分不出到底是农村还是城市。你说我是城市，但是我是田园化的城市；你说我是农村，我是城市化的农村。我的房子是有规划的，很漂亮；我的道路是很宽敞、漂亮的；我的通讯、交通、文化设施也不差。但我又不会象你城市那么拥挤。这样一来三角洲就缩小了城乡的差距，甚至没有城乡的差距，甚至比一般的城市还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工业化了的、城市化了的、现代化的新农村。如果能按这个思路来搞，我们的农村就会超过“四小龙”。到时候拿出来跟它比一比，到底是你好还是我好，你强还是我强。我看可能超过他们。现在三角洲这个地方就有条件这样来建设。现在农民有钱，集体有钱。这个钱第一位的还是扩大再生产，然后就要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要把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我们要引导群众把钱用到应该用的地方，不要让他找那些不正当的刺激。所以三角洲要积极地推广南海县的经验，开展建设文明户、文明村的活动。其他地方呢，也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因地制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现在有些地方建房子是放任不管的。你要在哪里建都可以，在田的中间建一幢冒出来也可以，无规划，无控制，这怎么行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顺便说一下，就是死人霸山头、霸地方的问题。移风易俗，丧事

筒办,人过世了,应提倡火葬。一时搞不了火葬而搞土葬的也得划定地方。这个可以通过大家讨论,开村民大会,制定乡规民约,定出规章制度,大家共同遵守。入土之后,在周围种些树、搞一些美化,在山上搞一些通道,让人感到放在那里也挺好的。现在,有的地方死人占地方的现象相当厉害,有的才50岁就怕死后没有地方可以葬身,抢着买一块地方,说这块地将来我用。人没有死就争地方,生人霸死地,这个更不行。所以,我走到哪里都提倡要搞规划。希望通过建设文明村活动把这个问题也管起来。土地管理不管不行。

总而言之,我觉得南海县的经验有普遍意义,应该在全省推广。推广的方针是既要积极,又要因地制宜,要分步实施,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精神文明的标准不能随便降低,但在硬件建设方面,经济条件好的地方要求要高一点,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可以降低标准,建设标准不强求划一,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前几年,我们推广广州市南华西街的经验就是这样。你不要看到南华西街有花坛,你就搞花坛,还可以用别的手段去美化嘛。广州每年一批一批推广南华西街的经验,现在街道建设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有了两个典型,城市街道的文明建设学南华西街,农村的文明建设学南海县。当然每个地方都可以有自己的典型。如果这两个典型能够逐步覆盖全省,那么我们全省的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基层就很有希望。

### 三

为了搞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推广南海县的经验,还有三点要特别强调一下。

一是坚决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扫除“七害”,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抓好这方面的工作,文明村、文明户的活动,也好开展。文明村、文明户活动开展好了,反过来也为抓好这方面的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个问题,我在全省的十八次公安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希望各地重视这个问题,认真抓落实。对于目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一讲到“七害”的问题,认识就不那么一致了。省内某地有位领导,就是通过经营那黄色的场所来搞他的所谓“经济效益”。有人问那位领导,这不是省里明文规定不能搞的吗?他竟然这样说:现在不是强调改革开放吗?你看,这不是搞混了吗?改革开放难道是你提供黄色场所的吗?现在有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看不顺眼,对改革开放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讲这方面的消极现象,说搞开放搞出了这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拿这个来作为不支持改革开放的口实。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重视抓好这个问题。我们要想改革开放顺利、健康地开展,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要把这个方面的事情干好,管好,维护改革开放的声誉。

二是基层组织、基层领导班子的建设一定要抓好。没有这一条,开展文明村、文明户的活动就很困难。县、镇的领导要下去帮助指导,但要靠党支部、管委会、村长这些基层组织、基层干部来进行,这样,文明村、文明户活动才能真正搞起来。当然,开展

这项活动，也可以促进班子的建设，南海县不是提供了这方面经验吗？有了这个大气候，干部都会感到自己落后不得。就是作为一个普通农民，都不能落后嘛。有了这个大气候，就会促进干部进步，促进班子建设。但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班子，很难开展这些活动，也很难形成很好的大气候。

三是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共同为文明村、文明户的创建活动作贡献。有关部门包括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计划生育部门、公安部门，还有工商管理等部门，都要密切配合，协同动作，都为了一个目的，把我们广东的农村建成富裕的又是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了上述三条，互相配合起来，我看南海县经验的推广就很有希望，全省城乡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会真正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 本文是作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广东省创建文明户、文明村镇经验交流会上讲话记录。本次发表时略有删改。题目是编者所加。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

责任编辑：范英

（上接第160页）

会议期间，〈学术研究〉负责人和来自广东各地9个市级社科联的刊物负责人，各自就办刊方针、刊物质量、地方特色、办刊经费以及如何加强各地社科联刊物的横向联系等问题作了发言，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学术理论刊物的办刊方针问题。大家认为：学术理论刊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办刊方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繁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提供园地。当前，在办刊的指导思想上特别要提倡解放思想和联系实际。

二、关于提高刊物质量问题：与会者认为：编审工作要力求政治上把稳，思想上放活，

内容上求新，文字上求精。学术性刊物学术理论探索的自由度可以大一些。探讨性的、争议性的、新提出的观点，都可以从学术研究角度予以放开，从理论上去总结新经验、新思想、新观点、新问题、新方法等。综合性刊物要反映各个学科的最新成果，在有限的版面上应尽可能多容纳一些信息量。

三、关于如何体现刊物特色问题。与会者认为，特色可以归纳为：学术理论特色、地方性特色、文风特色等，特色就是个性，就是自己的鲜明的长处。有特色的刊物才有读者，也才有生命力。

四、进一步加强社科联刊物间的横向联系。

（谭湛明）

# 推进农村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尝试

中共南海县委员会

1990年4月以来,我们根据广东省委提出在全省范围内树立“好学进取,团结友爱,诚实礼貌,健康文娱,卫生美化,勤俭办事,遵纪守法”的社会文明新风尚的要求,认真分析我县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思想状况,总结近几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确定从基层抓起,从千家万户抓起,从解决农村当前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抓起,在全县农村广泛、深入地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工作思路。通过实践,找到了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新途径,走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条路子。

## 一、广泛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活动,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济发展迅速,群众生活显著改善,部分群众还逐步富裕起来了。但也出现了一些亟须解决的新问题。如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日益严重,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部分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法制观念和集体观念有所下降;嫖娼卖淫、赌博和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滋生蔓延等。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个状况,渴望有一个健康、安定、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发展经济创造更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根据省、市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县的具体实际,决定在农村广泛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以此全面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为了探索经验,1990年4月,我们选择了群众思想基础较好、党支部战斗力较强的大沥镇联滔管理区作为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试点。试点工作的基本做法是:以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依据,以省委提出的要求为

主要内容,以搞好村风民风,改变村容村貌为重点,以进一步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为目的,结合实际,制订标准,自我教育,以多促少,简便易行,动态管理。整个实施步骤具体分六步进行:一是加强指导;二是制订标准;三是广泛发动;四是自报公议;五是张榜挂牌;六是定期复评。经过5个月的努力,试点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联滔管理区评出“文明户”508户,占全区参评总户数的84.2%,村风民风和村容村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为了充分发挥联滔试点的典型示范作用,同年9月,县委召开全县“文明村、户”建设工作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联滔的经验,要求各镇抓好一二三个先行点。会后各镇先后在48条自然村开展创建活动。到1991年3月,这批先行点的工作告一段落,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联滔试点的经验。

1991年5月,县委系统地总结了各地先行点的经验,并作出在全县农村分期分批地推开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部署。截至1992年3月底止,全县18个镇共有198个管理区,556条自然村开展了这一活动,完成了“文明户”评选工作的村有329条,33801户挂上了“文明户”的牌子,占这些村总户数的86.15%。此外,在全县各镇城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已评上7552户为“文明户”,占参评总数的94%。与此同时,创建“文明村镇”的活动也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据556条自然村统计,近两年来,仅投入村庄环境建设的资金达1.02亿元,修筑村中水泥道路258.7公里,铺设水泥街巷239.2公里,建桥117座,建无害化公厕314间,建造大小公园27个等一大批基础设施,使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大为改观,并且出现了一批标准较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里水村、江头村、上滔村和孔溪村还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全市“十佳文明村标兵”称号。

创建“文明村、户”活动收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第一，促进了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落实。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公民履行义务服兵役、完成国家各项任务，曾一度成为农村工作的三大难点。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开展，较好地促进了这些难点的解决。许多地方出现了公公劝媳妇、丈夫动员妻子落实计划生育措施，适龄青年争先报名服兵役，以及自觉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有关任务的动人情景。

第二，促进了农村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前段时间，有些村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不够好，小偷小摸、赌博、打架等现象时有发生。创建“文明村、户”活动开展以后，这些不良现象大为减少，农民的遵纪守法观念和防范意识显著增强。

第三，促进了社会文明新风尚发扬光大。现在许多村庄家庭和和睦睦，邻里团结，尊老爱幼，新事新办蔚然成风；讲公德，树新风，讲文明，重礼貌，讲卫生，爱清洁，已逐步成为农民群众新的行为准则。

第四，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1991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3.53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其中农业总产值12.88亿元，比上年增长6.5%；工业总产值100.64亿元，比上年增长34%。全年外贸收购总值11.05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外贸出口总值2.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3%。全年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4.49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全年职工人平工资收入4486元，比上年增加832元，增长22.8%；农民人平收入1976元，比上年增加275元，增长16.2%。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6.27亿元，比上年增长38.3%，城乡居民人平储蓄存款余额5923元，比上年增长35.9%。

第五，促进了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这一活动中，广大农村党员、干部不仅要起带头作用，率先使自己的家庭成为“文明户”，还要帮助其他村民创建“文明户”，从而改进了工作作风。里水村评选“文明户”进入“自报公议”阶段时，评议组从收回的《文明户申报表》中发现有些农户存在着计划生育措施未落实、拖欠集体承包款项、家庭不和睦、屋内外卫生未搞好等问题，即组织村干部分头落

户，与村民促膝谈心，启发引导，激发他们争当“文明户”的热情。他们先后深入19户农户做思想工作，使原来未达到标准的12户克服存在困难，挂上“文明户”的牌子。

## 二、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活动，把两个文明建设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千家万户，是各级党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历史使命

实践使我们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使我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首先实现了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此带来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兴旺。这几年，又出现了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出现的这种新的形势，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通过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总结这几年的实践经验，使我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等于文明，作为党的各级基层组织，既要带领群众同贫穷作斗争，发展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又要引导群众同愚昧落后作斗争，提高人的素质，走向文明，进一步实现“两个高度文明”。基于这种认识，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80年代初，我们组织县领导班子，深入基层，到先富起来的乡村和农户访富问甜，祝富贺富，大张旗鼓地宣传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商品经济的先进典型，大造谁富谁光荣的舆论，使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想富、敢富、会富。这对促进我县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支持作用。1992年春节前，我们按照创建“文明村”的“六好”（爱国爱乡好、遵纪守法好、移风易俗好、团结互助好、计划生育好、创建“文明户”活动效果好），和“七化”（村头标志化、道路沟渠硬底化、吃水自来水化、厕所卫生化、禽畜专栏化、保洁经常化、村前村后绿化美化）的标准，组织检查验收，全县15个镇评选出了23条文明村。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创建“文明村、户”的积极性，造成重视“文明村、户”建设的强大社会舆论，我们组织县领导班子，深入基层，开展隆重、热烈、简朴的“贺文明、树新风”活动。由县五套班子领导、县文明建设委成员和有关部

门负责人组成6个祝贺团，分赴各文明村进行祝贺活动。各祝贺团所到之处，像过盛大节日一样，锣鼓喧天，醒狮起舞，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祝贺活动的程序是实行“七个一”，即：召开一个村民大会，宣读一个县委、县政府关于授予“文明村”称号的决定，致一贺词，给村长戴上一朵大红花，给村里挂上一块“文明村”铜匾，燃放一串大鞭炮，祝贺团全体成员与当地干部、“文明户”群众代表合影一张留念照片。这一做法，在全县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少干部、群众高兴地说，文明村真光荣，有搞头。此外，为了更好地调动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性，推动我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确保我县“八五”规划的实现，县委、县政府决定，“八五”期间，在全县农村各镇之间，开展以两个文明建设为内容的竞赛，设立五个竞赛项目：（1）丰收杯（农业方面），（2）致富杯（发展农村经济方面），（3）振兴杯（发展镇村工业方面），（4）创汇杯（出口创汇方面），（5）新风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在“八五”期间，每年评奖一次。以镇为单位，每个竞赛项目评出获奖镇6名，其中金杯奖1名，银杯奖2名，铜杯奖3名。金、银、铜杯均为流动杯（三次蝉联为固定）。以此来推动“文明村、户”活动的深入发展。

### 三、搞好创建“文明村、户”活动，要注意抓好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注意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创建活动中，我们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从众、向上的心理，采取不限比例和以多数促少数的办法，把绝大多数群众吸引到关心、支持和参与“文明户”的创建活动上来。坚持把评比标准交给群众，实行评选标准、评比方法、预选名单和评选结果四公开，让群众自我对照，自己申报，互相比较，使群众人人成为参与者，个个自觉将自己摆进去，从而形成了一个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互相监督的良好气氛。

二是注意把思想教育贯穿于创建活动的全过程，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出发点。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从试点到面上铺开，我们都反复强调要把思想教育与农村的各项中心任务紧密结合，与农村社教工作相结合，紧紧扣住十条标准，向村民进行经常的、具体生动的思想教育，把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全过程，作为弘扬正气，培

养“四有”新人的全过程。对那些评上了“文明户”的村民，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珍惜荣誉，经常用十条标准来要求自己；对未评上“文明户”的家庭，在政治上不歧视，采取党员联系或村干部包户的形式，进行帮教，使他们努力克服缺点，早日成为“文明户”。通过思想教育，使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普遍得到了提高。里水镇里水管理区朝阳村有一村民，过去一直不愿承担对老父亲的赡养义务。在“文明户”评选活动中，经过自我教育和村干部的引导，使他认识到，不赡养老父亲是不道德的行为，便主动与兄长一起承担起赡养老父亲的义务。

三是注意制订符合实际的标准和要求。过去，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我们采取过多种方式和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往往是一般性的号召较多，难以落到实处。在这次评选“文明村、户”活动中，我们尽量把“软”任务量化成“硬”指标。我们把党和国家有关农村方针、政策的精神和省委对加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出自觉完成国家和集体的各项任务，没有丢荒耕地，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没有滥用土地，没有逃避兵役，没有赌博，没有搞封建迷信活动，没有虐待、遗弃老人，没有不卫生习惯和脏、乱、差等“十个自觉、十个没有”的评选“文明户”的基本标准，并做到条文简，内容实，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性强。

四是注意引入竞争机制，搞好动态管理。为使创建“文明村、户”活动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注意坚持动态管理。各管理区、村都建立了“文明户”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经常了解、考核“文明户”标准的执行情况；坚持每季度检查一次，每半年评选一次，年终总评的做法。对已评上“文明户”的，一旦发现有违反标准的现象，经帮助教育限期改正无效，则撤销其“文明户”称号；对未评上的，在规定的考察期内改正了错误，就及时给其挂上“文明户”的牌子。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对“文明村、户”的标准充实新的内容，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落实门前“三包”（包清洁卫生，包绿化美化，包治安管理），建立治安队、绿化队和保洁队，并每月进行检查。通过多种形式的动态管理，增强了创建“文明村、户”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五是注意“硬件”、“软件”同时并举，大力抓好村镇基础设施和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在创建活

动过程中，我们坚持把整治村容村貌，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作为突破口来抓，努力建设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不断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并以此为依托，坚持向广大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想教育，组织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水平。

六是注意加强领导，保证创建活动的顺利进行。我们通过试点单位的实践和探索，进一步认识到，创建“文明村、户”活动是在农村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好办法，是加强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为了切实抓好这项工作，我们一方面先后召开过县五套班子会议、镇委书记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专门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对各级干部进行思想大发动，并组织大家到“文明村”、“文明户”参观，使大家进一步提高对开展创建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了组织机构，县、镇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加强了领导，配备和充实了专职人员，从而形成了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政工书记专门抓，职能机构协调指导，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使全县农村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由点到面，稳步发展。

**四、坚持不懈，在全县范围内把创建“文明村、户”活动抓到底**

经过近两年来的实践，创建“文明村、户”活动已在我县由点到面分批推开，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为巩固、提高、发展这个活动，当前我们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在分期分批继续抓好农村创建“文明村、户”活动的同时，运用农村的经验，在城镇居民、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中，普遍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户”的活动，做到家庭、企业、机关、社会一起搞，农村、城镇一齐上，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创建文明的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二是坚持从高、从严，循序渐进的原则，讲求创建活动的实效。计划在“八五”期间，把全县1412条自然村、19万户农户，分期分批，逐步建立起评比“文明户”的制度；到1992年底，结合“社教”，全县预计有800多条村庄、11万农户开展这一活动。我们设想从1991年起，大体用三年时间，在全县城乡普及这项活动。

三是在创建活动中，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文明户”是对群众的最基本要求，我们要求所有党员、干部一定要带头执行，首先做到并要教育好家属、子女，不搞特殊照顾，真正做到时时处处做群众的表率。

责任编辑：范英

---

## 梅州举办《研究梅州 建设梅州》征文

为振兴梅州经济，中共梅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梅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梅州社会科学》编辑部，决定从1992年4月起至1993年3月31日举办《研究梅州、建设梅州》征文活动。应征文章选题可涉及梅州的历史、现状的研究和发展构想；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针对梅州山区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实际，从全局性、区域性或工业、农业、商业、三资企业等行业、部门、单位的特点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提出发展战略、构想、思路以及对策和建议。征文体裁包括论文、调查报告、工作研究等。征文评选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纪念奖若干名。

来稿请寄：梅州市机关路7号市社科联《梅州社会科学》编辑部，并注明“研究梅州、建设梅州”征文字样。邮编：514021。



# 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主要特点和普遍意义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调查组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南海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扎扎实实地建设两个文明，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并上升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该县做了一些调查研究。现就该县建设文明村、户的主要特点及其普遍意义，试作粗略的阐释。

## 一、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均有其规律与特点，找到它的主要特点，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该事物，是个关键性的环节。南海县文明村、户的建设，最主要的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抓住文明村、户建设这个重要载体，作为由面向点上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一种战略决策与部署。

近10多年来，南海县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展快、效果好。在成绩面前，县委、县政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马不停蹄地发展该县的大好形势，不仅继续抓好面上的各项工作，而且紧紧地抓住村与户这两个重要的载体，作为由面向点上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广阔阵地。也就是说，有意识地、自觉地把文明村、户建设的问题，放进一种新的战略决策与部署的重要地位上认真对待。这是以南海县10多年来的长足发展为基础、为条件、为后盾的，也是在纵深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近10多年来该县两个文明建设成果的必然走向。这一战略决策与部署表明，南海县的千村万户，将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带领下，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逐步与不文明的现象告别，拉开了向文明进军的序幕。因此，该县建设文明村、户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这项工作提高到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和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高度上，紧抓不放，常抓不懈，抓到实处，抓出成效。克服了一阵风、随意性和形式主义。

（二）抓住村、户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这一主要内容，做到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两个文明的成果一起要。

南海县建设文明村、户的主要内容，包括村与户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大的方面，并把它们有机地结成一体。该县文明村的“七化标准”——村头标志化、道

路沟渠硬底化、食水自来水化、厕所卫生化、禽畜专栏化、保洁经常化和村前村后绿化美化等，讲的主要是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东西；而“六好要求”——爱国爱乡好、遵纪守法好、移风易俗好、团结互助好、计划生育好和创建文明户活动效果好等，则主要是讲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把文明村的“七化标准”与“六好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马上变得浅明易懂，具体可行；而且，只要做到了“七化标准”和“六好要求”，两个文明的成果也就要到了。上述文明村建设的基本原则与要求，也同样表现在文明户的建设之中。这就是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在具体方面的明显特点。所以，把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仅仅理解为精神文明或物质文明单方面的建设，是不全面的看法。脱离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建设或脱离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建设不好文明村、户。

（三）抓住村、户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和群众可能做到的事情，吸引大多数人热情投入，并形成以多促少的生动局面。

要把文明村、户建设的主要内容落实下去，就必须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决心，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两个方面上，南海县委、县政府是身体力行的。他们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从办实事入手，把文明村、户建设的主要内容，具体化为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和群众可能做到的事情。可以说，前述文明村的“七化标准”，几乎都是改变村容村貌非常实际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条件也是群众经过努力能够逐步具备的，解决的结果更能够给群众以切身的利益和实惠。而文明村的“六好要求”以及农村文明户的具体标准，大体均与家庭邻里和睦、遵守党纪国法、勤俭工作劳动、移旧俗树新风、诚实好学进取之类的要求相关，这也是大多数农民群众能够理解并愿意去做的起码要求。所以，文明村、户的标准与要求没有空话、套话、废话或过头话，非常具体切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操作量化十分方便，因而“符合群众的觉悟和愿望”，“成为大家自觉参与的群众性事业”。（李瑞环语）正因为这样，符合文明户要求的家庭便占了大多数。上滘村试点结果，文明户为该村总户数的88%，是多数，是优势，是正气，没有评上的便产生了从众心理，改进行为，从而形成以多促少的生动局面。这些，也是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在突破口上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

（四）抓住文明村、户试点的经验，向全县铺开的同时，不断完善管理体制，使之逐步走向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南海县共有18个镇，242个管理区，263000户。其中已有198个管理区、556条村开展了文明村、户的建设活动，共评出文明村23个，文明户33801家。如何把这些文明村、户建设的经验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全县较为统一而又切实可行的标准，是县委、县政府正在思考的问题；同时，计划于1994年之前，在全县普及文明村、户的建设活动，也是县委、县政府的既定方案。这两方面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文明村、户的管理体制怎样才能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有待试点提供的经验和今后铺开过程的实践来逐步敲定。很清楚，实施文明村、户建设的战略决策与部署，既要有明确的中心内容和突

破口，又要有文明村、户建设管理体制的保证。南海县委、县政府通过县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统辖下属镇级和村级的相应机构，因而有了从上到下的管理层次。这些管理层次具有领导、组织、布置、检查、监督、评审、沟通和协调的多种功能，对该县文明村、户建设工作的正常运转和效益的发挥，正在起着主心骨的作用和关键性的作用。此外，南海县文明村、户的活动已经形成了动态管理的方法，即评选的过程是以动态的方法加以管理的：在管理者方面，采取一听（当地领导的介绍）、二看（实地的具体情况）、三评定的步骤；在受评者方面，则采取“对号入座”的自报并接受公议的办法。同时，年中初评与年底定评之间也存在着升或降的双向变动态势。这种动态的管理方法，群众感到公正平等，心服口服，既可克服“一劳永逸”的心理，也可给落选者以上进的机会。有利于文明村、户的建设在管理体系方面，朝着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方面逐步地完善。

（五）抓好文明村、户的建设工作，不仅使村与户相互促进，而且取得了许多方面的巨大成功。

南海县的干部、群众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文明村与文明户建设相互促进的生动事例。归结起来，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家庭是组成集体和社会的细胞，它的良好道德和精神面貌，“能够帮助人类升到更高的水平”。（列宁语）重视了文明户的建设，家庭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有了提高和改变，从而关心集体，关心社会，促进了文明村的整体建设。同时，作为集体或社会，它的文明状态对于家庭，在一定程度上讲，有决定性的影响。文明村的兴起与发展，因而促进家庭的文明，则是文明村这种决定影响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文明村、户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必然会产生出许多效应。正如该县的同志所总结的那样，开展文明村、户活动以来，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一是有效地促进了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落实。如计划生育、义务服兵役、完成国家各项任务等，这是过去一度被认为农村工作的三大难点，现在迎刃而解。二是促进了农村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过去农村中的赌博、打架、小偷小摸等现象，现在已大为减少。三是促进了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发扬光大。四是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五是促进了村容村貌和室内外环境卫生的改观。六是促进了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因此，应该说这是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效益性特点。

## 二、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普遍意义

任何一般都离不开个别，任何个别都包含着一般的因素，人们要认识一般，必须从认识个别开始，这是辩证唯物论的重要原理。我们考察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这一丰富的实践经验及其特点，带有普遍性的意义。

（一）南海县的经验告诉我们，物质文明的发展，同重视思想动力的作用密不可分。

所谓思想动力，指包括理想、道德、情操、纪律等方面的动力。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强调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从严治党，切实搞好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努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然，这种“凝聚力”和“战斗力”要靠思想动力。增强这种思想动力是物质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在广大农村，加强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它担负着如何把上级领导所引发出来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广大农民群众所激发出来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重要任务。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工作开展得之所以扎实有效，同那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密不可分。因此能够更好地把这两种力变为强大的思想动力。相比其他一些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比较薄弱，凝聚力和战斗力比较涣散，甚至有的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不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思想动力的作用既不可能充分发挥，甚至还会被抵消。南海县文明村、户的建设，由于重视了这方面的工作，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精神面貌就很不一样。像南海县建设文明村、户那样来抓思想动力的作用及其充分的发挥，因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二）南海县的经验告诉我们，物质文明的发展同重视文化动力的作用密不可分。

文化的动力包括教育、科技、卫生和体育等方面的动力。抓紧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战略，逐步地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教育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广大农村脱贫致富、富上加富的关键措施。农村教育是一项基础性工程，没有农村教育的发展与完善，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推广普及，先进的思想，包括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都困难重重。没有农村教育的基础，农村的各项事业如科技、卫生和体育等项也同样受其制肘。我国2亿多文盲、半文盲，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如果不从农村教育这个基础环节入手，不断地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整个文化动力的作用便难于发挥，物质文明要上去是很难的。从1988年以来，南海县在文化方面的总投资接近7亿元，其中用在教育事业方面就占了5亿元。文化方面得到大量的投资，教育事业又成为投资的重点，因而，南海县的各项教育品类齐全，村、镇学校漂亮讲究，教师待遇改善较大，学生入学与否，也有文明村、户的具体条款加以约束。文化动力的形成及其效应，正在南海农村开花结果。

（三）南海县的经验告诉我们，物质文明的发展同重视法制动力的作用密不可分。

法制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之一。但是，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长期滞后，法规尚不健全；许多农村干部不懂法、乱用法；不少农民自身也存在着缺乏法律知识和守法行为淡薄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但相应的法制还一时难于跟上。农村的法制动力要进一步发挥作用，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南海县在文明村、户建设中，十分重视法制的动力作用。在文明户的十条标准中，有六条涉及法制的内容，包括《义务教育法》、《婚姻法》、《兵役法》、《土地管理法》、《水法》和计划生育方面的法规要求等。南海县的文明村、户建设能够高度重视有关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的有意识的自觉行动，这是一个创造。随着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形势的需要，逐步地转入以法治理的轨道虽然是个艰巨的过程，但这是一定要走的方向。只有用法制的力量作

保证，才能使农村的思想动力、文化动力变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农民自身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以法治理决不意味着排斥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包括法制宣传教育，本身就是很好的一种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和内容，具有普遍性意义。

（四）南海县的经验告诉我们，物质文明的发展同重视审美动力的作用密不可分。

审美动力的内容比较广泛，又往往存在于思想动力、文化动力和法制动力之中，因而容易被人们忽略。我国广大农民有爱美的优良传统。近10多年来，我国农村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农村经济不断繁荣发展，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部分农村已进入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农民潜在的审美追求开始焕发出来了。人的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人情美和环境美，以及现代的技术美学、建筑美学、音乐美学、摄影美学、环境美学、信息美学等等，已经悄然地进入了广大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对审美的追求已变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南海县文明村、户的建设不仅突出美化人们的心灵，也把美化千村万户的环境作为具体的要求，使人们形成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即社会主义的农村，应该是美的农村；社会主义的家庭，应该是美的家庭。南海县带头走了这一步，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总而言之，南海县在文明村、户建设过程中，重视思想动力、文化动力、法制动力和审美动力的综合运用，是以物质文明和物质动力为基础并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服务的。把相对于物质动力的思想动力、文化动力、法制动力和审美动力统称为精神动力，是指积极向上的、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发展前进的精神力量。我们进行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不仅要有物质动力和物质力量，而且要有精神动力和精神力量。这就是南海县留给人们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石 成

# 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 的辩证思考

范 英

南海县文明村、户的建设不仅有其鲜明的特点和普遍的意义，而且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实践之树是常青的。唯物辩证法来自活生生的实践，又为活生生的实践服务。在建设文明村、户的具体实践中，南海县在取得文明村、户建设经验的同时，也尝到了认识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甜头。因此，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分析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一些矛盾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其主要的状况及其理性的价值。

## 一、贫穷与富裕

贫穷与富裕，这是我国广大农村中存在着的——对重要矛盾。如何全面地认识这对矛盾的层次和解决的途径，南海县文明村、户的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

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望。新中国的诞生为这个美好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一穷二白的底子要根本改变需假以时日；加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的诸多失误，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和贫穷状态，仍然改变不大。就是地处珠江三角洲、号称“鱼米之乡”的南海县，总的说来还是“贫穷”二字，因而成了南海县不断前进的沉重包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海县委、县政府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整个县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方面，1988年就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1991年的各项指标又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其中全县工农业总值达到113.53亿元，比1990年增长30.2%；财政收入突破4亿元大关，达到4.49亿元，比1990年增长21.9%；农民的年收入人均达到1976元，比上年增长

16.2%。农民手中的钱多了，首先是用来改善居住条件等。因此，别墅式的小洋房随处可见；家中的现代化陈设一应俱全；吃用穿行也逐步讲究；银行的存款数额逐年上升；年收入万元的农户已不新鲜，十几、几十万家产的农民正在成批涌现；而且，近6成农民已洗脚上田，从工从商；大多数农村的集体事业和公益事业兴旺发达，农村城镇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南海县，其物质生活繁华富裕的景象，正是珠江三角洲和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缩影与写照。这个事实证明，我国广大农民千百年来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愿望，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已逐步变为现实。

然而，物质生活上的脱贫致富，并不等于精神生活上也已经脱贫致富。就南海县的情况来说，在物质生活逐步富裕起来的一些农村，有的人把大量的钱财用在连宗祭祖、兴修祠堂庙宇、构筑坟墓以及其它封建迷信活动之上；婚嫁迎娶时大摆酒席，动辄上万元；更有甚者，赌博成风，倾家荡产在所不顾；少数农民腰缠万贯之后，出现了嫖妓纳妾的丑恶现象；至于偷税漏税，坑人行骗，盗窃打劫等屡见不鲜；此外，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分散劳作，这对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巨大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增加了有效管理的难度，如完成国家各项任务、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等等，不仅是贫困地区的老大难，也是发达地区的老大难……上述种种现象，说明物质生活逐步富裕之后，若不注意解决那些丑恶的东西和不良的倾向，便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生活也会受到破坏。

马克思主义认为，批判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解决。同样地，武器的批判也是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的，精神的力量还要借助精神的力量来克服。

这里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是精神的東西，“武器的批判”则是指物质上的東西。广大农村物质的贫困，只能用发展农村物质生产力、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为手段，才能脱贫致富，这是精神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另一方面，物质上富裕起来的那些地方的精神病毒又告诉人们，物质条件改善后，固然能为精神条件的改善提供物质基础，但也代替不了精神上的脱贫致富。精神上的脱贫致富远比物质上的脱贫致富困难得多，艰巨得多，因而是更深层次的、更为长期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的农村，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脱贫致富，还要在精神生活上脱贫致富。我们通常所说的广大农村中贫穷与富裕这对重要矛盾，应该包括两个层次，即物质层次与精神层次。因为物质上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上的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这两个层次都做到了，才是对这一对重要矛盾的真正解决。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最为紧迫的是面临这对矛盾的第一层次，同时也要逐步解决第二层次的问题；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在继续解决第一层次问题的基础上，已经逐步具备了解决第二层次的条件，因而要把第二层次的脱贫致富摆在比较突出的位置上来抓。不然，就有可能让精神上的贫穷拖住物质上的富裕，甚至使物质上的富裕倒退到相对贫穷的状态。所谓相对贫穷，是指物质上比较富裕的地方，由于不注意精神上的脱贫致富，而被后来者赶上或超越而相对地落后那样一种境况。

基于对贫穷与富裕这对重要矛盾层次的全面认识，南海县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继续抓好物质上的由穷变富的工作，大力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社会物质生产力，紧紧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不放，因而取得了几个主要经济指标翻两番之后的重大突破，把物质上的贫穷状态甩得更远，城乡发达繁荣的景象更加诱人。与此同时，他们对贫穷与富裕这对矛盾的第二层次的解决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南海县最近10多年来，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改变精神上的贫穷状态，他们借助于物质上脱贫致富所生发出来的力量，继而转化到该县的思想、文化等方面，使精神文明范围内的硬件设施有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热情，由此又逐步形成文明村、户建设的大气候。就该县精神文明建设的投资而论，从1980年以来，用在教

育、卫生、体育、文化生活上的，分别为5亿多元、0.38亿多元、0.48亿多元和1.35亿多元。可见南海县在精神上的脱贫致富所下的决心和行动。为了把这项工作落实到农村基层，他们于1990年初便开始了文明村、户的试点建设。顾名思义，文明村、户中所讲的文明，就是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建设文明村、户，就是建设村与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是说，把村与户物质上的脱贫致富与精神上的脱贫致富结合起来同时抓，并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这既逐步地解决了农村中贫穷与富裕这对重要矛盾的两个层次的统一问题，也找到了一种农民群众喜闻乐见、行之有效的途径。南海县近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凡是开展了文明村、户建设的地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较落后的有了大的转机，较发达的则有了新的进展。其中，过去“七害”严重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家家户户团结和睦，就连最头痛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变成了文明村、户的自觉行动。这些变化，为农民群众的精神追求、精神面貌和精神素质开始的飞跃，提供了具体而实际的客观条件，因而为他们在精神上的脱贫致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 二、愚昧与文明

在我国广大农村，贫穷与富裕的矛盾，说到底愚昧与文明的矛盾。这里有个怎样认识贫穷与愚昧、富裕与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个怎样认识愚昧与文明和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的情况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丰富内容。

应当明确的是，物质上摆脱了贫穷并不等于摆脱了愚昧；只有从精神上也摆脱了贫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愚昧。在贫穷与愚昧之间，存在着颇为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看成是一回事。但从一般说来，物质的贫穷是导致精神贫穷的物质因素和物质条件，也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穷而形成愚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贫穷与愚昧是一致的，也即贫穷与愚昧互为因果，两相等同。从总体上讲，在旧中国或解放初期，广大农村由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处于贫穷之中，因而与愚昧状态毫无二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那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虽然基本上摆脱了物质的贫穷，但并没有真正摆脱愚昧的状态，这是由精神贫穷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所

造成的。如果不能在精神上同时或先后摆脱贫穷，便谈不上从根本上与愚昧告别。南海县正是看到了物质上刚刚摆脱贫穷但精神上远没有解决，因此从总体上说还与愚昧有着可怕的亲缘关系，而致力于文明村、户的建设工作的。

同时还应当明确，物质上的富裕并不等于完全的文明；只有从精神上也富裕起来了，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更加文明的境界。几千年来，我国广大农村没有物质上的富裕，便没有农村的文明可言。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物质上富裕起来的农村，也因精神上还没有富裕起来，所形成的文明是残缺不全的。早些年，南海县的领导上门给那些万元户“贺致富”；这些年，则给许多农村、家庭“贺文明”。从“贺致富”到“贺文明”，既是实践的巨大变化，也是认识的巨大飞跃。想当年，生活贫穷的农村，一旦有了劳动发家致富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贺致富”是党心与民心之所向，也是推动农村物质生活改观的有效形式，更是“贺文明”的一种必要准备。然而，“贺致富”的主要内容是物质上的东西。物质上的富裕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富裕。完整意义上的富裕必须有精神上的内容。这样的富裕才是人们追求的更加美好的愿望。因此，“贺文明”的出现，有着比“贺致富”更加全面的内容，更加充实的要求，更接近于完整意义上的富裕即文明。可以说，“贺文明”是层次更高的实践与认识，也是“贺致富”的地基上开出来的鲜花，结出来的硕果。这说明，南海县的同志并没有停留在“贺致富”的原有水平上，裹足不前，踌躇满志，而是善于从实践中认识富裕与文明的关系，并及时地通过文明村、户建设这样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加以引导、落实，因而从更深刻的内涵上拓展了农村的经济工作，促进了农民精神素质的逐步提高。

从前述可见我国广大农村中，愚昧与文明这对矛盾和贫穷与富裕这对矛盾之间的关系。所谓愚昧，主要包括物质的或精神的贫穷或二者合一的状态。摆脱愚昧只能从物质的和精神的这两个主要方面入手。如果仅以物质的一手代替精神的一手，或者倒过来，都不能战胜愚昧。所谓文明，则主要包括物质的或精神的富裕以及二者的合一状态。达到文明必须从物质的、精神的这两个主要方面做起。若用物质的一方面来取代精神的东西，或者倒过来，都不是完全的文明。也就是说，只有完整意义上的贫穷与富裕这对矛盾，

才能和愚昧与文明这对矛盾相提并论。

再从愚昧与文明和贫穷与富裕这两对矛盾产生的根源上看。愚昧与贫穷，是旧中国广大农村的普遍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奴隶制、封建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广大农民处于最底层，没有受文化教育的经济条件，自身素质的改善和提高是无从谈起的，因而长期与贫穷和愚昧为伍。同时，广大农民世代代被剥削，被统治，被奴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成了捆绑他们手脚的绳索，麻痹他们头脑的鸦片。上述社会经济与阶级根源所造成的极其落后的生产力状态，使广大农民既不可能在物质上，也不可能精神上摆脱贫穷与愚昧，走向富裕与文明。就是近10多年来，我国已经摆脱了物质贫穷而走上富裕道路的一些农村，由于受几千年旧传统、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要在精神生活中与贫穷根本决裂，从愚昧中彻底解放出来，也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个过程。更何况，我国广大农村大多数地区的经济文化还处贫穷愚昧状态，要做到物质与精神这两个主要方面的同时富裕与文明，要比发达地区的过程更长、更困难。

再次，从愚昧与文明和贫穷与富裕这两对矛盾的转化情况看。从总体上说，由愚昧转化为文明，必须解决贫穷与富裕的二重矛盾转化，即物质上的以及精神上的贫穷都要转化为富裕。这二重矛盾解决的结果，就是愚昧一方的逐步克服，文明一方的逐步完善。人类的历史，是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历史，中间虽有许多曲折与倒退，但是，这个必然趋势不可逆转。所以，由这个历史趋势决定的由贫穷走向富裕的美好追求，才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南海县的经验证明：经济起步快的农村，往往先在物质上由贫穷转化为富裕，使精神上的贫穷转化为富裕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继而在物质上、精神上逐步由愚昧转化为文明。如果没有物质上的由贫化富，精神上的由贫化富便失去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很难转化得了；如果停留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上来进行精神方面的转化，就不能完全转化愚昧与文明的矛盾，因为现有的物质条件虽然有所改进，但提供给精神方面发生根本变革的“度”还很有限。在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之所以要坚定地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是要改变物质贫穷落后的状况，并为精神上的由贫化富创造条件，与此同



时，又重视改变精神方面的贫穷落后面貌，以促进物质方面的深入变革，便是这种历史必然性即由愚昧走向文明的根本要求。自觉地认识这种要求，加快由贫穷向富裕这对矛盾的两个层次的转化，也就加快了由愚昧向文明进军脚步。

当然，我们把由愚昧转化为文明看成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不是说，所有具体的时、地、人、事都如此。在特定条件下，愚昧与文明，贫穷与富裕是相互转化的。南海县碧华村有位农民阿昌，前些年与人合伙承包了村里的一间塑料厂，每年获利近4万元，因此过上了富日子。但好景不长，他很快染上了赌瘾，频频涉足于地下赌场，不仅把钱输光，塑料厂也因无心管理而接近“死火”，富日子又变穷了。后来，该村开展了文明村、户的活动，他认识到赌博是愚昧的行为，终于戒了赌，评上了文明户，人变好，厂变旺，经济收入更多，穷日子终于又变富了。阿昌由穷变富，由富变穷，又由穷变富的情况说明，具体的条件不同，变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定条件下的时、地、人、事，并不是只有由愚昧变文明的顺向转化过程，也有由文明变愚昧的逆向转化过程。如果只看到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趋势是由愚昧转化为文明，而看不到具体

（上接第28页）

“一刀切”，不强求搞统一模式，而是放手让各地自己去闯，鼓励各地按照自己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来决定其企业所有制结构，从而使各地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所有制结构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东莞等市县。顺德模式以镇办企业为主；中山市以发展市属工业为主；南海县采取“镇办、管理区办、村办、联户、个体企业”5个轮子一起转的模式；东莞则是以“三来一补”等外向型企业为主。虽然它们的企业所有制模式和发展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较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也都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这些地方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成为广东最具经济发展实力的“四小虎”。

（三）在发展壮大公有经济中，重点发展集体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主要以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来壮大公有制经济。在总体上保持了公有经济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实践证明，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有许多好处，它在生产、购销、分配等方面，较之国营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经营管理更灵活一些，而又没有国营企业那么多的

的时、地、人、事愚昧与文明之间转化的复杂情况，就无法做好转化工作。阿昌的情况还说明，具体的时、地、人、事由穷变富的转化结果，并非一劳永逸，也决非仅仅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一个方面的转化，就能完成其愚昧走向文明的历程，因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长期不懈的奋斗精神，也要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再就是愚昧与文明之间双向转化的条件和结果都是相对的，具体的时、地、人、事所关的标准和要求，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逐步地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但我们不能因为现实条件所决定的由愚昧走向文明的标准与要求还简单、还低级，便否定其转化的效果和作用。

概而言之，南海县文明村、户建设中所折射出来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必须认真探索的现实问题。而从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这两对重要矛盾来说，由比较表层的物质性向比较深层的精神性运动、发展和变化，因而显示出该县文明村、户建设与我国广大农村具有共性之外的个性，这正是中国农村文明的先声。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责任编辑：冯生

“婆婆、条条框框”和“大锅饭”、“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企业自我发展的动力和竞争力较强。同时，集体企业又保留着公有制经济的许多优点。由此可见，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公有制企业中一种很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将来可能成为广东公有经济中的主要形式。

（四）打破所有制界限，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各所有制企业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广东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中，逐渐淡化所有制概念，打破所有制界限，采取措施鼓励各种所有制之间企业实行外引内联，相互渗透、结合，形成新型的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使现阶段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目前广东混合所有制企业已有：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各种跨所有制的内联合作经营企业；一厂数制型；打破所有制界限组建的企业集团等多种类型。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较好地吸收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优点，实现优势互补，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有利于实现平等竞争。可以预见其将是广东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所有制形式。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 广东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及特点

关则文 魏建飞 陈祖煌 杜重年

改革传统的所有制，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子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拟以广东工商业为主要对象，从所有制结构关系、不同所有制内部结构及实现形式、宏观管理和政策对所有制的影响等基本方面考察研究所有制改革问题。

## 一、广东所有制结构的现状与变化特点

(一) 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形成多元化格局，但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没有动摇。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所有制改革，逐步改变过去基本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经济的单一结构状况，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199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1902.24亿元（当年价），全民、集体、联营、“三资”企业、个体私营分别占40.24%、34.68%、12.1%、6.63%、4.79%；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净值667.68亿多元，全民、集体、其它类型经济企业分别占53.83%、24.8%和21.37%；全社会商品零售额为732.23亿元，全民、集体、个体、合营分别占39.81%、20.92%、25.62%、2.72%；商业批发销售额（1991年1—10月）为825.65亿元，其中全民占64.71%，集体占31.69%，合营和个体分别为0.53%和3.07%。

(二) 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特点。

1. 不同所有制之间，全民经济中工业比重降幅较大，商业有一定的下降；集体经济中工业比重有一定上升，商业零售比重大幅度下降；其它类型经济在工商业中的比重均大幅度上升。1990年与1980年相比，从工业产值看，全省平均增长18.58%。其中全民、集体、其它经济类型分别增长12.91%、19.5%和51.72%，由此引起全民工业所占比重下降22.9个百分点，集体上升

7.1个百分点，其它经济类型上升15.8个百分点。从商业看，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8.25%，其中全民、集体、合营和个体私营分别增长15.89%、9.4%、65.32%和65.73%。由此引起全民商业所占比重下降8.8个百分点，集体下降24.7个百分点，合营和个体分别上升了2.63个百分点和24.74个百分点。

2. 各种所有制内部结构中，都有新兴发展的生力军，也有发展相对较慢的部分。1990年与1980年相比，全民工业中，预算外企业产值年均增长26.91%，占全民工业产值的比重由9.61%上升为34.28%；预算内企业产值年均增长8.24%，占全民工业产值的比重由90.4%下降到65.72%，占全省工业产值的比重由60.03%下降为23.47%。集体工业中，乡镇企业产值年均增长24.05%，在集体工业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26.85%上升为38.29%；二轻集体企业产值年均增长15.65%，占集体工业产值比重由59.21%下降为41.82%。其它经济类型工业有很大发展，其中“三资”企业产值年均增长63.85%，占其它经济类型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5.33%（1981年数）上升到35.27%。城乡个体工商户的发展集中在流通领域，其商品零售额去年已占全省零售额的25.62%；而其工业则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79%。

3.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所有制构成变化存在明显差异。我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山区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次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前所有制构成大体相同。但是到了199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净产值的所有制结构已演变为：全民、集体和其它经济类型的比重分别为44.17%、32.15%和23.68%；山区为69.84%、22.23%和7.93%；次发达地区为54.08%、35.63%和10.29%。分析结果表明：次发达地区的结构与全国基本一致。而与山区各种所有制的产值比重

相比，珠江三角洲全民工业净产值比重低25.67个百分点，集体工业和其它类型工业的净产值比重分别高9.92个百分点和15.75个百分点。显然，珠江三角洲的所有制结构更适合当前的生产力水平。

4. 以生产领域为主的混合所有制迅速发展，比重不断上升。1980年，全省混合所有制工业企业仅70家，1990年达3814家（其中：工业1863家，商业1347家）。1990年工业产值和社会商品零售额分别达到230.7亿元和20亿元，10年平均增长45.44%和63.4%。混合所有制以其机制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充分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 二、所有制改革变化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变化迅速，一些改革政策措施不配套，管理不落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不少未及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1. 宏观调控体系改革滞后，不适应所有制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调控管理的范围目前仍主要局限于日益缩小的“计划内”、“预算内”的全民部分，而不是覆盖全社会的各种所有制，造成“全民经济管得死，放不开；其它所有制经济放得开，管不住”。二是所有制的部门分割。目前，经委统管全民和二轻工业企业，下面又分主管局管理；商业厅和供销社分别管国营和供销社集体商业；农口管各类乡镇企业；外经贸委管“三资”企业。各部门作为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代言人，互争资金，争项目，争优惠政策，争扩大管理权。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所有制结构很难协调。部门所有制还容易造成各所有制内部封闭发展，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阻碍生产要素跨所有制流动，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宏观调控手段落后，仍以行政手段和直接管理为主。

2. 不同所有制企业竞争条件不平等。

我国至今仍按全民、集体、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进行立法、制定政策、收税和管理，彼此之间的“优惠政策”差异大，在执行中一般对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偏紧偏严，对其他企业偏松，导致事实上不利于全民企业的不平等竞争。

(1) 实际税负高低悬殊。流转税方面，税法规定各所有制企业收税标准一样，但1990年扣除减免税后的实际执行结果，我省全民大中型企业、集体、其它类型企业百元销售收入的流转税率分别为11.1%、6.37%、3.3%。所得税方面，税法规定，国营大中型企业所得税率为55%，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为10—55%（八级超额累进税），“三资”企业为33%，私营企业为35%，个体户为7—60%（十级超额累进税）。但是，1989年、1990年两年实际执行结果，我省全民企业的实际税负为28.12%和81.12%（利润下降，但承包上交基数不变）；集体企业为20.27%和18.83%（其中乡镇企业为17.29%和16.38%）；“三资”企业为4.8%和6.29%。个体户由于普遍没有建帐，一般实行流转税和所得税合在一起，“双定”（定时、定额）征收。据征管工作较好的广州市和南海县调查，1989年两地个体户每百元营业销售收入综合税负率只有5.15%和6.03%。可见，国营企业的税负远高于其它企业，而且国营企业税后利润还要上交25%的“两金”，实际负担更重。

(2) 制度管理约束宽严不一。国营企业“婆婆”多，行政干预多，自主权不能落实，在资金使用、技改、定价、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分配等方面受到诸多不合理的限制。其它类型企业则限制很少。国营企业技改一万元以上要严格报批，而乡镇企业600万元可自行审批。国营企业对口设置的机构达20个以上，管理人员占20—30%左右。而拥有1200人的私人企业——汕头民生塑料制品公司连厂级管理人员只有11人，占1%；包括车间管理人员在内也一共只有23人，占2%。国营企业征收奖金税实际上是分配封顶，其它企业则自主分配。在财务管理上，国家严格规定国营企业只能提取很低的折旧率（工业企业为6.75%，商业企业为5.3%）、新产品开发费和业务费，实际上是限制企业更新发展，而其它类型企业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3) 社会负担畸重畸轻。“三资”、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多数是新办企业，社会负担轻，经营目标只有一个——追求利润。而国营和集体老企业则被赋予双重目标——除了追求商业利润目标外，还要承担社会目标。后者包括对职工住房、医疗福利、退休养老、死亡后事、子女安置负责；要办幼儿园、学校等教育事业；要承担社会就业、控制物价、治安等方面的责任；要作为

社会集资、摊派、购买国债的主要承担者。为此，国营和大集体企业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负担沉重。

3. 老国营和老集体企业缺乏活力，相当一部分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新形势。

预算内国营工商企业以及二轻工业和供销社集体企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经济效益低下，缺乏活力。近几年来，全省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大幅度下降，其中资金利率和销售利税率分别从1985年的30.52%和21.49%，下降至1990年的10.58%和8.86%。去年有36.45%的企业亏损，亏损额为10.8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实现利润下降64.36%。据省委排队，全省预算内国营工业活力较强的企业占30%；活力一般，但不够稳定，应变能力差的占40%；长期亏损难以继的占30%。1990年全省独立核算国营工业企业留利只占实现利税总额的8.99%，自有流动资金只占流动资金总额的8%左右，根本谈不上自我发展。我省国合商业的效益也较差。其中国营商业系统利润1988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百元流动资金提供的利润由1988年的8.68元降至去年的2.11元。供销社系统前年和去年连续两年全行业亏损。二是离退休工人负担重。全省预算内国营工业离退休人员相当于在职职工的20%，1990年支付费用4亿元，但去年利润基层单位几乎是1人养1人。三是历史包袱重。到1990年止全省预算内国营工业历年亏损挂帐为9.3亿元。国合商业的历史亏损挂帐为29.8亿元，每年利息支出就要几亿元。

4. 对非公有经济在放开发展的同时缺乏必要有效的管理。

目前我省“三资”企业已发展到1万多家，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只顾发展，不注重管理的问题，以至出现了不少漏洞。1990年上报财务报表的3634户“三资”企业中，亏损面积达48.1%，其中不少是外商为了逃避我国税收，侵占我方利益，通过在进口设备技术和出口产品价格上做手脚转移利润，以及虚列成本费用支出等手法挖走一块以后造成的人为亏损。有的外商不按合同出资，增加我方配套资金；有的钻减免税的政策空子，在免税期将结束时，抛下老厂不断易地办新厂；有的随意侵犯职工的正当权益。对此，我们尚无切实的对策。

全省的工商个体私营企业，注册领证的已达

90多万家，管理监督工作远没有跟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税收征管工作薄弱。由于征管人员少，素质不高，个体户基本没有建帐，绝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少交或偷漏税收。二是违法违章经营。有的超越经营范围，有的批发国家不准个体户搞的重要商品和生产资料，有的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和不合卫生标准的产品。三是无证经营，粤东地区反映，无牌照摊贩相当于有证户的三分之一。四是乱摆乱卖，占据街道和交通道路为市，搭棚摆摊，挤堵国营商店和供销社门店的过道和门口。

### 三、进一步完善所有制改革

所有制的改革方向是要以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根本出发点的，在坚持和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继续鼓励其它经济成份的发展，逐步形成能使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更为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关系和公有制实现形式。近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搞活国营企业，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等几个方面。

1. 在国家授权范围内，逐步建立覆盖社会各种所有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逐步把按所有制立法、设税和管理企业的办法改为按产业、行业和企业规模管理企业；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价、劳动工资等政府综合经济部门，应面向全社会各所有制企业进行宏观管理，增加宏观调控的覆盖面和到位率；建立健全各种行业协会，通过它们对企业进行指导和协调，重点是管好产业政策的实施、企业的布点、产品的开发，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质量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服务和监督；今后的政策取向，应由所有制倾斜逐步改为向重点产业、行业倾斜；等等。

2. 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为国营和大集体企业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一是要帮助一些老国营和集体企业卸掉历史包袱。对于政策性亏损而财政又未弥补的，应予尽快拨补或停息挂帐；对于历史性经济包袱，也应准予企业在一定年限内用企业的税前利润弥补。二是要改革目前国营企业产品经济模式的财务成本制度，解决国营企业设备折旧率过低，新产品开发基金和业务费用支出限制过死，固定资产贷款利息和职工奖励补贴不能计入成本等问题，使企业的成本和利润真实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三是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把企业统包职工住房改

为社会、企业、职工个人共同解决。四是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全省要统一制定有关法规，通盘考虑包括职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的社会保险制度。五是要根据合理负担、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的原则，进行税制改革，首先要降低国营企业所得税率，取消税后利润征收“两金”的做法。逐步统一国内全民、集体、个体、私营企业的所得税率，进而将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在流转税方面，实行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一套税。对各类企业的税收征管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

3. 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重点抓好下面几项工作。一是坚持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按《企业法》的规定切实落实企业各项自主权；企业内部要像首钢、广州味精食品厂那样，把对国家的承包向企业内部伸延，层层建立经济责任制；要选择一批原材料基础工业企业进行十年左右的长期承包。二是积极稳妥地试点推行股份制。这方面工作要认真总结借鉴深圳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要注意规范化，做到兴利除弊。三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从健全机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界定、产权登记等基础工作做起，逐步在企业法人、经营资产的中介机构、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三个层次上建立起产权制度，实现权利和职能分解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营运体系，以保证国有资产不受侵害，提高资产的经济效益。四是调整、优化企业组织。从实现经营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引导生产要素向需要发展的重要行业、产业和生产优势产品的企业流动。以国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势产品为龙头，有计划地组建一批跨部门、跨地区、有竞争力、外向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各地建设一批有影响的大型国营批发零售商场。

4. 实行分类指导，优化地区所有制布局。我省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在所有制结构上不能试图用一个所谓的“标准”去套，搞“一刀切”，应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最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目前广东工商业公有制比例低于全国而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于全国，珠江三角洲公有制比例低于山区而生产力水平远高于山区的现实情况看，我省今后一段时间内，通过继续鼓励各类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办法，适当降低一点工商业公有制的比重是可取的。我们认为，全省各地都应放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种与当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制形式，尤其要注意发展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合作经济，努力提高集体经济的比重。山区要在办好地方国营骨干项目，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让“三资”、“三来一补”、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更快些，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所有制结构总体上宜相对稳定，要下功夫提高全民和集体经济的质量。

5. 切实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将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但是，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对它们的管理。针对“三资”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要重点加强产业管理、税收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合同管理、商品服务的质量卫生管理、市场交易秩序管理等。要在这类企业中进行遵纪守法教育，提倡社会公德，多办公益事业。

#### 四、广东所有制改革的经验及启示

(一) 坚持以生产力标准来推进所有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采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的方针，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鼓励集体、个体、外资等多种经济形式一起上，突破了过去那种纯而又纯的所有制模式。在处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属性问题上，并不是简单用“姓资姓社”来轻易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也不做那些抽象的争论，而是采取冷静观察一段时间的办法，由实践来证明这些改革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则加以肯定，进一步推广；否则加以改进。改革13年来，多种经济形式发展对广东经济发展作用是明显的，一是推动工业化进程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了市场发育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三是增加了新的财源和节省了国家投资，四是解决了就业问题。广东的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说明，我们判断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是否符合社会主义，不能简单从国营企业比重的多少来判断，而更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舍此没有第二条标准。

(二) 从实际出发，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所有制结构。广东在实行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搞

(下转第24页)

#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崛起的原因和条件

于幼军

中国改革的序幕最早从农村拉开。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从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勇敢地突破了“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传统观念，率先把改革的锋芒指向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社合一”、“统一经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党中央及时总结了农村干部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在全国农村推广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一个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和特征的农村改革洪流，迅速成为全国农村普遍实行的新经济形式。这种新的合作经济内部的责任制形式，有效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热情和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大步发展。

但随着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一些局限性也逐步地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受到了资金、人力、物力的制约，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难以从事农田和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也难以从事各种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的建设发展，从而使农村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制约。此外，在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农村没有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好党中央提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要求，在强调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忽视了社区性集体经济的发展，有的还把原来集体经济组织所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财产全部分给了个人，集体经济瓦解了，不少农村成为集体经济的“空壳村”。有些地区的农村虽然注意了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继续发展集体经济，但基本上仍然沿用过去人

民公社的体制和路子去搞集体经济，结果也使集体经济停滞、萎缩或发展缓慢。这两种偏向，前者由于忽视了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化、协作越来越紧密的特征，客观上要求经济有某种程度和形式的联合，要求分散经营要与集中经营相结合；而后者则没有认识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必须要适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原则和要求。要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方向相一致，企图把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形成并凝固起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拿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时期套用，当然行不通。如果只有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而没有一种合适的方式把分散的农户联系或组织起来，将会影响我国农业向现代化进军步伐和速度，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农村经济的联合和统一经营，决不能回到过去人民公社的老路上去，不能再采取“归大堆”“大呼隆”的政策和做法。因此，农村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孕育和呼唤与之相适应的、能够适应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和集体经济同步发展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

历史的呼唤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人民群众创造、进取精神的源泉。80年代以来，在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福建沿海地区、浙江温州地区、安徽阜阳地区、山东淄博地区以及四川、河南一些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自发地办起了一批股份制的乡镇企业。在这批股份制乡镇企业中，有把股份制机制引入原有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转化而来的，也有新创办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的乡镇企业；有单纯以资金入股的，也有以劳动力、技术、资源、场地入股的；有集体经济组织占主体，吸收农民和社会上资金入股组成的，也有几户农民集资合股办起来的。在广州市天河

区和深圳市宝安县，还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以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性股份合作社。这种股份合作社，实行劳动联合与资金联合的统一，资金共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积累共有，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财产不可分割的原则下，把长期积累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财产，经过清产核资，折股量化，全部或部分分配给社区内的全体社员，作为每年集体经济分配的凭证，并吸引社员现金入股。新筹集的资金和每年股份合作社收入分配的大部分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集体公益福利事业。股份合作社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有一定比例的股金分红的分配方式，既有按劳分配机制，又有股金分红、股份增殖的利益机制。社区内全体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因而农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和积极参与集体经济活动。

这些由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自发创造的新的经济形式，虽然刚出现几年，尚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已表现出它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极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首先，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以股份形式界定了产权，明确了产权的归属，使产权关系比较清楚，责任、利益也较明确，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出劳动者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当家作主的地位。克服了过去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关系不清、责任不明、个人利益难以体现等弊端。因此，比较有效地调动起广大农民关心和参与发展集体经济的当家作主的精神和积极性。

其次，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可以调动、强化人们的投资意识，有效地快速聚集社会的闲散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改变了过去产品经济模式下，农村生产只有国家和集体投资这种投资渠道单一、数量十分有限、发展资金缺乏的状况，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大办乡镇企业增辟了筹集资金的渠道，十分有利于加快资金的积累，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

第三，在股份制的乡镇企业里，按照股份制的要求，实行民主管理的原则，股东民主选举产生董事会，民主制定章程，企业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企业的财务管理要

接受股东的监督，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样一种经营管理体制，有利于企业形成严格的内部和外部的约束机制，有效地解决过去集体办的乡镇企业存在的政企不分、行政干预过多和少数人个人说了算等问题，使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商品经济生产者。

第四，股份制的乡镇企业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把生产者、经营者、所有者三方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动力体系，比过去的集体企业更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此外，社区性的股份合作组织还承担社会经济活动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在完善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管理的同时，为分散经营的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社区性的股份经济组织和股份制的乡镇企业都突破了小农经济和小生产的局限，按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规律，要求重新组合农村各生产要素，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为组织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和兴办较大规模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的乡镇企业，提供了资金、劳动力资源、场地等条件，把各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起来，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可以预期，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对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化和完善，符合农村深化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如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和推广，必将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步向前发展。很有可能成为我国90年代农村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成为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农村兴办的社区性股份合作社和股份制的乡镇企业，既具有股份制的某些因素，又带有合作制的成分，是股份制和合作社的统一体，它既区别于典型的、或工业、商业、金融业的股份经济组织形态，也有别于我国农村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形态，是一种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它既继承了我国农村30多年来合作化运动和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赋予了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适应家庭与集体双层经营的新内容，是对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又适应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孕育、呼唤这种新型合作经济形式产生并推动其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条件是什么？

首先是农村生产力、农业现代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把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按农业劳动者所掌握的生产技能和生产工具、经营管理水平这三个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古代农业，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以前的农业，它的基本特征是靠单纯由经验积累起来的生产技能，用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简单生产工具，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其经营规模小，没有什么分工。

二是近代农业，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出现到19世纪末的农业。其主要特征是自然科学开始应用于农业，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畜力农具，经营规模与商品性生产逐渐扩大。

三是现代农业，指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农业。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科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新技术已经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各种以机电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已几乎代替了人畜力机具，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的经营规模与商品性生产日益扩大，分工越来越细，协作范围越来越广泛，现代大农业领域的扩展，已超越了传统农业的范围，除农、林、牧、渔、菜、果外，还包括以农副产品贮藏、加工与销售关联的加工业和商贸服务业，形成了农、工、商一体化的社会化大农业企业。

从上述划分农业生产历史阶段的主要标志来看，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科学化、机械化和社会化三方面。根据这些特征和标准来衡量，我国80年代农业发展的水平，从总体上来说处于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发展的阶段，但在一些农业发展比较快，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则已经进入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阶段。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包括生产技术现代化、经济结构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现代化三大方面。生产技术现代化指现代生物学、现代工程技术和现代生产手段在农业上的应用，包括改善动植物生长和生产的环境条件，以更利于生物生长和发育；改善生物体本身，以更能适应和充分利用环境条件；改变劳动条件，减轻农业劳动强度。这些内容可概括为科学化和机械化两个方面。经济结构现代化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按生态平衡和

农、林、牧、渔结合的要求，因地制宜搞相对集中的专业化农业生产，以充分发挥农业自然资源的潜力，也可以称之为农业区域化；二是按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区域化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供、销结合或农、工、商结合的农业企业，实现社会化的大农业生产。当然，农业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它的社会化不可能完全象大工业那样搞大集中。现代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都表明，家庭的小生产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经济联系或协作构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如家庭农场可以通过诸如种籽、肥料、机耕、运输、供销等专业公司的协作和服务，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农业的现代化并不排除小企业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分散劳动，它应该是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的结合，专业化生产与协作联合的结合。前苏联、东欧和我国过去长期以来把农业的社会化生产与大规模的集中统一经营等同起来，而且把工业经营的模式生搬硬套在农业上，片面搞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是对农业社会化生产认识的偏误。列宁后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农业社会化应该是指农业生产社会联系的强化，要通过各种形式，强化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把分工和协作紧密结合起来。经营管理现代化则指用现代管理科学来经营管理大农业生产，加强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益。因此农业现代化提出了要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要求。它要求农村经济不能仅停留在土地的耕作上，也不能够局限在传统农业的范围内，而要在搞好科学种田的基础上，向大规模的开发性农业进军，要兴办二、三产业的乡镇企业，要开展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科技和供销服务。而这些要求，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是难以承受的，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农村经济要重新联合起来的要求，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如前所述，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业总体上处于由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阶段，但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地区，则率先开始步入农业现代化阶段。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两股合力推动下，农村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一些专业户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大办养鸡场、养猪场，发展养殖业或承包大片山林、开荒种果林等；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且规模日益增大。面对商品



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已远远不够，村镇集体要发展开发性农业和乡镇企业受到资金缺乏的制约，而分散经营的一家一户也难以承担较大规模项目筹资的压力和风险，农村内部和社会上各种生产要素需要优化组合以求最佳经济效益，在此形势下，以投资主体多元化、风险分散化，可以快速集聚生产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为主要特征的股份制便应运而生，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又由于我国农村已有30多年合作经济的习惯和积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以及合作制自身的优势，股份制很自然就与合作制联姻，派生出新型的合作经济形式——股份合作经济。因此，股份合作经济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率先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

其次，是我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任何生产关系都不能离开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而凭空出现，而必须要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某一时期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这一时期生产关系的性质，并决定了生产关系变革的发生与发展的方向。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经实现，新的生产关系确立起来，就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只有当原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条件已经消失，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候，才会提出变革它的要求，并经过社会革命或者是改革来实现变革。绝不能离开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和发展的要求去任意变革生产关系。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建国初期的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其性质和形式，与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基本相适应，因而就解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本<sup>①</sup>种方式由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和状况所决定，应该持续稳定发展一段时期。但是从1956年以后，我们党在工作指导思想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以为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热衷于对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在初级社这一方式刚刚组建起来，尚未稳定和完美，就匆匆忙忙地过渡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脱离了生产力的状

况，片面地追求所有制关系的“一大二公”。结果，非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严重挫伤、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状况规律的惩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普遍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这一生产关系的变革，纠正和克服了过去高级社、人民公社所存在的一些弊端，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因而就大大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向农业现代化的进军，农业生产的领域和经营规模越来越扩大，农村集约经营的程度日益提高，这就要求在一定规模上和范围内统一管理集中使用生产的各要素。另一方面，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已经由过去单一的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生产要素也向多极化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与此相联系的不同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关系，决定了不能在不同所有者之间无偿地调配和集中使用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资源的支配使用的分散化，不利于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与农村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发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生产要素多极化分散化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是集体经济迅速扩张与集体财产产权关系不明晰、经营组织方式滞后的矛盾；二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与农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及小生产方式的矛盾；三是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与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限制的矛盾；四是农村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与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的矛盾。这些矛盾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是要寻找和建立能够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由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自发探索创造的、集股份制与合作制优势、特点于一身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应运而生，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是对我国农村目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化，是对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这种新型合作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

料为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辅以其它方式的分配，等等。因此，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不是对过去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的简单回复，而是继承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合理成份，又赋予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内容和新形式，这种继承与创新，符合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和要求，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它不是退回到改革前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形式上去，也不是要离开家庭承包责任制去另搞一套，而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同时逐步壮大发展集体经济。它既能发挥家庭经营的优势，又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长处；既能进行小生产，又便于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非农业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村经济形成统分有机结合、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合作经济。

其次，农村股份合作经济还有利于理顺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关系。我国过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名义上是归全体村民所有，但实际上由于产权关系的不明确，集体所有成了一种抽象的、虚化的状态，村民们是集体经济组织主人的地位和作用也难以真正体现出来。因此，那种集体经济组织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而股份合作经济则能够比较好地解决原有集体财产产权关系虚化这个弊端，使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关系明朗化，农民既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又是股东，因而就能更好地调动起村民当家作主的精神

和关心、参加集体经济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此外，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与我国农村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相比，还具有质的差异性：过去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都是单一的所有制，而股份合作制包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可以在坚持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私人经济并存，不排斥个人对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过去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实行统一经营的模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合二为一的，而股份合作经济则体现出经营上的多层次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过去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形式单一，取向平均，而股份合作经济则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基础上，同时并存着多种分配方式，如按股分红。

从以上对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是适应我国农村的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建立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要求，适应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状况和要求，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有可能成为90年代我国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新的突破口。

本文原稿15000字，发表时作了删节。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上接第79页）

待业保险费也要从由用工单位交纳，逐步过渡到由单位和个人共同交纳。

要加快医疗制度的改革，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疾病谱变化的趋势，在医疗制度方面要逐步建立起保险制，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按一定比例合理负担，个人在看病时要适当负担医药费。

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社会保险制度的有益做法，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保险改革的经验，深化我们的认识，开阔我们的思路，推进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注：本文是刘鸿儒同志在1991年4月5日“社会保险国际培训研讨班”开幕式上的讲话，岳宝妍根据讲话录音整理出来，并提供给本刊。未经本人审阅。

**作者单位：国家体改委  
责任编辑：郑英隆**

# “自然失业”问题初探

——广东90年代就业政策调整的若干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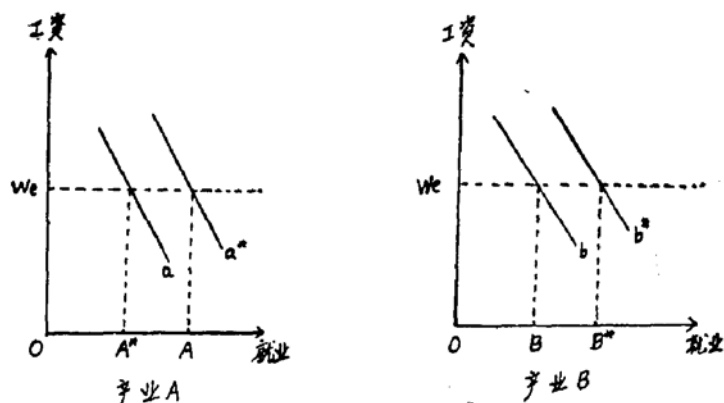
黄德鸿 邓伟根

## 一、“自然失业”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高潮。广东省经济增长可能比起全国还要快些，经济将转入结构迅速变动的新时期，加上劳动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劳动就业将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失业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究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有没有“失业”现象？这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寻求新的突破，以对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冲击。

从现实上看，在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动中，我们确实发生“停工待工”或“不在业”等经济现象。从劳动就业的经济性质来看，相当一部分“停工待工”人员或“不在业”人员是一种所谓的“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它是劳动就业的变动性与相对稳定性相互作用的客观自然表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者变换不同就业岗位的现象就会越来越频繁。“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时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第533～534页。）随着经济结构的变换，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者需要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岗位转向另一个岗位，这种变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和不同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劳动就业岗位，对劳动者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有着不同的要求，要提高两者结合的效益，就需要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并尽可能地经常稳定在一个就业岗位上，这就要求就业本身要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两种特性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矛盾激化时，就自然会产生所谓“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在西方，这些统称为“自然失业”，我们则称之为停工待工。1988年底至1991年底的三年治理整顿，就出现过大量企业停产半停产，停工待工人员剧增的严重状况。尽管这种状况目前已有所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我们认为，不管概念上有不同的称法，但实质上它们均属于不在业之列，都表现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同生产资料结合，都是劳动力相对过剩的表现，都是劳动力资源被浪费的社会经济现

象。概括地说，都是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的自然产物。如图示：



图示：在总需求水平不变，需求构成发生变化后结构调整与结构转换后的就业效应。

从图示中可以看出，在商品经济前提下，当总需求水平不变，而总需求构成发生变化时，如何引致“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的，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定某一经济系统由产业 A 与产业 B 组成，二者均使用相同的劳动投入，以便使两种产业有相同的均衡工资。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 A 的劳动需求下降，导致它的就业减少至  $A^*$ 。由于假定总需求水平不变，产业 B 劳动需求增长补偿了产业 A 的减少，于是产生了  $BB^*$  的就业空缺，产业 A 中失去原有工作的人员可填补产业 B 的空缺，这里有两种可能出现：一种可能是，产业 A 中可能会有部分人员是适合于产业 B 的工作技能，但在他们寻找产业 B 存在的工作空缺期间，由于所获信息的不完全或得到信息特别昂贵，便出现了所谓的“摩擦性失业”；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两个产业部门使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产业 A 的失业人员不能在产业 B 中找到完全相同的工作岗位，这种劳动力之间不完全相互替代，造成“结构性失业”。由此可见，产业结构调整与转换必然会导致“自然失业”。这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经济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二、“自然失业论”对全面就业理论的冲击及其局限性

由于需求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因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这样，即使总需求水平能完全吸纳全部社会劳动力，社会上仍然存在“自然失业”现象，尤其是在世界性科技革命的冲击与影响下，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变化日益加剧，使就业的不充分问题日趋尖锐，这无疑是对全面就业理论的巨大冲击。

应该承认，就业率是直接反映出劳动资源利用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的高低主要由人口的年龄结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技术结构以及就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决定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片面强调全面就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因而，全面就业理论成为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劳动就业模式的理论基石。诚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只是从理论上揭示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直接结合的可能，而在实践上能否实现全面就业，就不是制度本身就可

以决定了的。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片面追求全面就业的背后，掩盖着大量的“隐蔽性失业”或“伪装失业”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隐蔽性失业”或“伪装失业”是多年来“自然失业”问题的沉积，这些问题往往在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便充分暴露出来。很明显，“全面就业”是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其结果严重地阻碍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劳动力素质的迅速提高。

“自然失业论”对全面就业理论的最大冲击在于：它清楚地告诉人们，在当代商品经济中，完全的充分就业是不存在的或说不现实的，“失业”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只要发展商品经济，一定的“失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失业的范围、程度及其本质有所不同而已。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回避不了这种现实，就用“待业”来同资本主义的失业区别开来，在否认商品经济，产业结构刚性有余，弹性不够的情况下，尚可说得过去。然而，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结构调整变化日趋加剧的情形下，已有就业岗位的人员失去其原有的工作机会或工作可能，这种情形就很难说他们是“待业”人员了。因为，它们终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不在业。对于待业人员，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一时难以有根本转变，因而，这种“待业”是持续期较长、发生率较低的不在业；对于结构调整后出现的“自然失业”，它是一种持续期较短、发生率较高的不在业。这两类不在业人员无论从性质、范围、起因等多方面都有着许多不同点。即使未来的经济社会中已经完全解决待业问题，但后一种的“失业”现象依然存在，这就是“自然失业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可见，“自然失业论”的观点是颇吸引人的，但须正确理解与谨慎使用，“自然失业论”无疑否定了全面就业的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失业”从经济意义上说是适宜的，从社会意义上说是合理的。追求比较充分的就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总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相等的情形界定为充分就业，无疑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定失业现象看成是合理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即资本主义失业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所有权分离和资本积累规律的必然结果。所以，“自然失业论”有其不可否认的理论局限性。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把握“自然失业论”中的合理成份，借此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

### 三、广东90年代就业政策重点的调整

随着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进一步深入贯彻，我国经济结构将出现较大的调整，加上原有的就业压力，90年代初的就业问题比较严峻。预测今后几年内，待业率仍将维持在4%左右，并略有上升，它预示着90年代初我国包括我省将全面地进入就业高峰时期。与此同时，根据广东省今后产业发展趋势及产业结构变化情况，我省产业结构将面临着朝地区产业国际化方向发展的大调整，它意味着结构调整的“自然失业”现象仍会不断出现，待业压力与“失业”冲击，将构成广东90年代就业问题的难点。一方面，在待业率高持不下的情况下，需要扩大就业机会，尽可能地安置大批待业人员，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在结构急剧调整中，又要尽可能减低“就业不适应者”的出现，努力降

低“自然失业率”。为此，广东就业政策重点须作适当调整。

1. 应从靠高投入的就业政策逐步转到努力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政策上来。

80年代，广东凭藉特殊的优惠政策及地理优势，主要靠高投入（资金、劳动力等）来缓解就业矛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它不仅抑制了经济的活力，而且会导致经济走向高速低效的恶性循环。（1）就业人员增长主要是在技术进步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的，容易引起劳动者技术设备水平和就业人口群体素质的相对下降；（2）就业人口的增长往往同人口、劳动力相对过剩等社会问题压力相联系，通常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效益下降；（3）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大量增加就业人口（包括部分素质过低的劳动力，甚至是童工、青少年及年轻女工）来实现的。

90年代同高速度增长的80年代不同，在经济增长制约条件复杂化的发展进程中，高增值价值领域内的增长比重将会增加（即倍增发展而非原有基础上的加速增长），这就意味着产业间、行业间与企业间的增长差距会日益明显，围绕有限的名牌产品的竞争将会激化，企业间、行业间的兼并加剧，结构急剧调整，引起“自然失业”现象加剧。因而，90年代的广东就业政策重点应逐步转到如何努力降低“自然失业率”政策上来。

2. 应从追求劳动就业数量政策逐步转向注意劳动就业质量政策上来。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转化，经济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长，总人口就业率有上升趋势，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就业率则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劳动就业的充分与否主要取决于待业者或生产者的劳动技术技能是否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是否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竞争的加剧，劳动者本身也认识到提高生产技术与技能是巩固自己的劳动权力和获得更多报酬的手段。因而，对劳动者数量的要求逐渐转为对质量的追求，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广东省必须加快从追求就业数量向注重就业质量转变的战略调整，而实现这一战略调整的根本性措施是：一是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完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的过渡。根据预测，如果2000年广东人口控制在7000万人的水平（低方案），则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57%提高到65%。总人口就业率须随之提高，为此要继续使生育率有所降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完成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二是要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使这部分人占经济生产年龄人口的比例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样可以适当降低经济生产年龄人口就业率，有利于向提高就业效益的战略转移，从而，减低“自然失业率”。可以预料，劳动者的技术培训及人才竞争等问题，将成为广东90年代劳动就业理论及实际工作的重要内容。

3. 应从以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的就业政策转向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的就业政策上来。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人类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劳动力大转移。第一次由畜牧业转向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第二次是由农业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第三

次是由工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优化,劳动力转移的重点从以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为主向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的变化是一种世界性趋势。考虑今后10年内广东经济生产年龄人口还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以及广东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需要,就业政策重点应加快由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转移到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的轨道上来。据统计,每百万元固定资产吸纳的劳动力,重工业为94个,轻纺工业为2572个,发展工艺美术、服装、日用五金等行业则要安排近8000个。因此,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商业、饮食业等社会服务行业,不仅能解决今后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需要,而且能大幅度地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率,这是发展广东经济,步入现代化的客观趋势。

4. 应从以行政干预调节为主的就业政策逐渐转向以劳动力市场调节为主的就业政策上来。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客观存在的,而劳动力市场的完全开放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我完善,假如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其运动不受市场规律的调节,那么,市场规律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就成为不可能,因为社会生产是人、财、物各方面资源的综合作用过程,如果其中任何一次不受市场规律的调节,社会生产就不可能成为完整的市场作用下的商品生产。因此,从以行政干预调节为主的就业政策向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就业政策转变,不仅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就业的发展趋势,而且还是广东产业国际化及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它还有利于减低“自然失业”。这是由于总需求构成变化造成的劳动力转移所必须的,投资越多,结构性失业持续的时间就越长。假定两个不同行业均处于同一地区的劳务市场上,某一行业调整后的“失业”工人可能用较小的投资获得新的工作技能,从而较快地重新就业。但如果两个不同行业处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充分或发育不全,消除“自然失业”所必须的调整过程就较长,或获取信息不充分,会加剧“摩擦性失业”。

5. 应从国家保障、保险福利制度逐步转向相对灵活的社会保障保险制度上来。

(1) 以国家保障职工基本生活为前提,改革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国营企业保险福利制度,建立起企业补充和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

(2) 适当调高待业或不在业职工的保障水平,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创造企业劳动者能进能出的外部条件;

(3) 进一步加快保险福利制度的改革进程,逐步扩大保险社会化程度。

为此,广东有关主管部门应统筹兼顾,正确认识90年代广东的就业趋势及就业重点,有针对性地调整就业政策,促进劳动就业模式的转换,有计划地解决广东劳动就业问题。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 改革开放为中山市敞开了繁荣兴旺之门

谢明仁

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不断巩固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这一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使全市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的成就。1980年至1991年，是中山市在建国以来社会、政治最稳定，经济发展最蓬勃，城乡面貌改变最显著，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改革开放不但解放了生产力，而且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山市敞开了繁荣兴旺之门。

—

建国后以至1978年，中山市的经济格局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经过13年的改革开放，中山市初步实现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体，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新的经济格局。

——1991年，全市社会总产值（当年价，下同）为139.62亿元，比1990年增长21.51%，比1980年增长8.1倍；年均递增22.2%。

——199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为50.7亿元，比1990年增长16.42%，比1980年增长4.1倍；年均递增16%。

——1991年，全市国民收入为47.1亿元，比1990年增长17.93%，比1980年增长4.5倍；年均递增16.7%。

——1991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下同）为120.2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90年增长25.81%，比1980年增长9.3倍；年均递增23.7%。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02.52亿元（含村及村以下工业），比1990年增长29.1%，比1980年增长13.1倍；年均递增27.2%。

改革开放后的中山市，经济发展呈现如下四

方面特点：

（一）工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形成牢固的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

建国后前30年，我市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农业之比约为2:8。直到1979年，在全市5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总值就占了55%以上，第二产业总值仅占38%。全市工业的产业结构，也以支农型产业为主，总产值仅5.1亿元（80年不变价），其中糖蔗工业的产值就占了大头。改革开放13年，我市工业每年以接近30%的增幅飞速发展，到198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首次突破80%的大关，1990年更上升到92.4%，从而确立了作为全市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

（二）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农业也稳步增长。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业在我市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为20%左右，但从农业产量、产值的绝对数和经济效益来说，我市农业并没有萎缩，反而逐年稳步发展。1982年至1991年全市农业连续9年获得大丰收。1990年全市纯农业产值5.7亿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1980年增长将近1倍，每年平均递增幅度为3%。我市农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农业内部的粮（食）、作（经济作物）生产比例的变化。1978年，全市水稻的种植面积为89万亩，占全市总耕地面积120.4万亩的73%，稻谷总产量为41万吨。当年糖蔗面积仅12.9万亩，鱼塘9.3万亩，水果面积更少，仅有1.6万亩，全年纯农业产值只有2.73亿元。经过1981年和1984年两次大幅度调整，水稻的种植面积与高质高值的经济作物面积比例基本实现对半开。1990年，全市水稻种植面积下降到64万亩，糖蔗增至18万亩，鱼塘扩大到15万亩，水果达20万亩。由于农村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产值达3.78亿元，占纯农业产值的66.3%。水稻种植面积虽



然减少了25万亩，但由于对农业投入的增加，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单位产量大幅增长。1990年稻谷总产为54.5万吨，仍然比1978年增产13.5万吨。

二是农村工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农村工业在改革开放前基本空白。随着农业改革的深入发展，农村工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支柱。1991年，农村中镇（区）、村、联体和个体四个层次的工业企业已发展到3.5万家，从业人员28万人，固定资产原值超过21亿元，实现产值52.27亿元（90年不变价），比1980年的30.38亿元增长了1.72倍。工业经济在全市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年提高，1991年农村工业总产值（含村办工业）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43.5%，占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75%。

（三）外向型经济大步发展，已成为工农业的经济导向。

我市一直以来都是省内重要的外贸出口基地，但直到1980年，外贸收购总额只有1亿元多点，出口创汇仅0.54亿美元，自有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很低，当年工业产品出口产值0.83亿元，出口创汇仅为1673万美元。1984年以后，我市注重引进和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外向经济的发展带动全市经济的腾飞。1986年外贸收购总额从去年的2.7亿元上升到6.53亿元，出口创汇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72亿美元。更为可贵的是，当年全市工业产品的出口产值从去年的1.46亿元猛增至3.34亿元，占当年市、镇（区）两级工业总产值的20.1%。到1991年，工业出口产值继续攀升，实绩达29.1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3.9%。目前，在市属工业中，能提供出口产品的企业超过50%，镇（区）、村、联体以至个体的工业企业出口产品生产比例也逐步扩大。全市工业出口产品已成为出口创汇的主体部分。

（四）充分发挥外向型产品和拳头产品的优势，提高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注意按照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推动工农业生产上规模、上水平、增效益。在农业方面，建立各种商品生产基地，大力发展名、优、特种农产品的生产，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1991年，全市农口系统提供的出口总值达7940万美元，比1980年增长1.14倍。在工业方面，全市已建立工

业出口商品基地（厂、车间）50个，年提供产品出口超亿美元。市属工业中已形成10多个年产值超亿元的支柱型拳头产品，该批产品在1991年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6%。全市外向型工业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5%。去年全市出口创汇能力又上新台阶，出口创汇达5.18亿美元，1980年至1991年年均递增率为19.6%。

##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实事求是地、扎扎实实地开展各项工作。具体抓了如下六项措施：

（一）坚持政策引导，积极开展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我们结合本市实际，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实力这个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积极开展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进一步推广落实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政策；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集体经济的政策；支持经济后进镇村发展工企业的政策；搞活国营工业、市属集体工业的政策；鼓励和推进科技进步政策；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规定以及贯彻落实党的侨务、统战和知识分子政策等等。

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市属工业先后经过了撤局设司（行政性公司），再由行政性公司向经济实体过渡以至组建企业集团（公司）的过程，全市工业初步形成了以骨干企业为龙头的群体结构，使各生产要素实现了有效的优化组合。到目前为止，市属工业已组成12个企业集团，共联结企业39家。1991年实现产值24.87亿元，占市属工业总产值的54.8%；税利合计1.77亿元，占市属工业总税利的49%。

在产业结构方面。市属工业已成功地实现了战略性的调整，从原来产品运行机制转向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从封闭型的经济结构转向开放型的经济结构；从单一“支农型”的生产结构向以日用轻工业型为主的多元化结构转变。现在市属工业日用轻工业品的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而且朝着基础工业和新兴的原材料工业迈进。

在产品结构方面。坚持把企业推向市场，引导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至1991年统计，全市工业开发的新产品有109项，新

的花色品种738种，平均每年有近100种试制成功或投产。现在工业产品中获省优以上称号的产品共360个（其中中国优金质奖1个，国优银质奖5个，部优88个），优质产品产值占市属工业总产值的38.7%。

两大结构的成功调整，提高了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平，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经济效益和出口创汇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工业经济的良性循环。1991年市属工业产值对比上年的增幅为25.4%，但实现税利是历史最高水平，增幅为42.9%，高于总产值的增幅。

（二）切实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提高工农业生产水平。

随着我市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经济与科技两者紧密联系，互相促进，形成了改革开放13年来我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①在全市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不断增加。到1991年，科技进步在全市经济增长诸因素中所占的比重已提高到40%，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②科学技术主导了我市工业两个结构的调整，使全市工业更加适应当前商品经济竞争的需要。开放改革以来，我市投放了23亿元人民币和4.3亿美元，引进工业生产设备，增强工业生产实力，提高工业的科技水平。③促进乡镇工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市乡镇工业的生产设备，具有70年代后期技术水平的占36%，达到90年代技术水平的占7%。1991年，镇（区）、村两级工业总产值52.3亿元（1990年不变价），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1%，上缴国家税金超过1.5亿元。④保证了农业持续丰收，巩固了国民经济基础，稳定了全市政局。

为了鼓励科技进步，我市早于1984年就制定了关于推广、应用科技新成果，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奖励政策。1990年，我市召开全市性的科技大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发挥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暂行规定》，增加对科技的资金投入，重奖科技进步的项目和科研人员等。去年又召开大规模科技大会，市委、市政府作出《决议》，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决心把发展经济的重点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0年，我市在国家科委和省科委的支持下，建成了“中山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去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市又成为全国8个“科技兴市”的

试点市，为我市高、新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我市还大力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精心培育和扩大开放科技市场，支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鼓励有偿使用科研成果，重奖科技新成果和有功人员，搞活科研体制。有力地促进全市科技进步，提高工农业生产水平。

（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在上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华侨、港澳台同胞的热心帮助下，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努力，筹集了超过7亿元资金用于全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中山的投资环境日臻完善。

交通方面：到1991年止，全市建成和改造主干公路468公里，其中350多公里为水泥公路。继去年9月建成通车的全长24公里的岐（石岐）江（江门）线二级公路之后，又一主干公路、即广珠东线番中公路中山路段和4条支线也正在动工兴建，可望1992年底通车。现在，市与各镇区以及各镇区之间都开通了水泥公路，90%以上的村庄都通了汽车，400条村的村路普遍铺设了水泥路面。全市已初步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水上运输也有很大发展。1984年建成了中山——香港的客运港，新建了1000—5000吨级货运码头3座，集装箱码头一座。还开通了石岐、小榄、坦洲等地的外运货港，客货运输可通达港澳及国内沿海城市。

邮电通讯方面。邮电通讯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迅猛。1989年前全市城乡已全面实现电话交换自动化。1991年11月全面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和传输数字化，成为国内少数几个拥有这种现代化通讯手段的城市之一。目前，我市已拥有程控电话11万门，可直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开通了无线电传真、电脑传呼、移动通讯、自动寻呼等多项现代化通讯服务。随着通讯设备的进步，全市城乡电话普及率也逐步提高。城区每一百人中拥有21部电话，农村的人均电话普及率也达到4.1%。

电力供应方面。目前，已建成3.5万伏的变电站12座，11万伏的变电站8座，22万伏的1座。同时，新建中山发电厂、黄圃发电厂等地方电厂5家，总装机容量为12.1万千瓦。供电能力不断提高，日供电量达11亿千瓦时，其中地方发电量4.12亿千瓦时，年均增长速度为18.9%。

全市农村新建118个工业开发区,新建厂房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全市建有大型供水厂3座,日供水能力为16万吨。农村人口自来水的普及率达93.2%。

此外,全市大气和水质等环境质量严格控制在国家二级标准范围内,排洪、处废、粉尘控制等方面的设施和能力不断提高,城区“美化、绿化、净化”工作成效显著。去年中山市被国家评为保持清洁的城市,并争取尽快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渠道发展生产力的方针。除了大力发展国营、市属工业,镇(区)、村集体企业之外,还采取政策扶持、资金帮助、提供优惠等方法,支持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股份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全市城乡以集体控股、私人参股、共同管理、共负盈亏形式组成的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农村工业的股份制企业就超过110家。出现了闻名全国的小榄“乐百氏”食品厂、东风同安泡塑厂等一批年产值超千万元的股份制企业。对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我们始终视作为国营、集体经济这一主体的有益的补充,一方面积极鼓励,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和管理,严格法规,保证其沿着正确的方向适当地发展。1991年,我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已经发展到3.8万家,从业人员11万人,上缴国家税金4800万元。产值只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5.1%。实践证明,这批个体企业对繁荣城乡市场、活跃流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扶持后进地区,促进全市平衡发展。

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因基础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经济相对后进的地区,尤其是过去长期受“以粮唯—”影响的大沙田地区和一些边远地区。不把这些地区的经济搞上去,全市经济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地发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无从实现。因此,从1985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把扶贫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先是从1985年起连续3年每年从地方财政拿出100万元作为发展乡镇工企业的贴息贷款,每年拨出200万元支持后进地区搞好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从

1987年以后又组织市属经济部门对15个镇区进行为期三年的挂钩扶持;随后又对全市30个工业空白村(管理区)进行挂钩扶持,帮助发展村办工业。经过连续多年的努力,到去年底,15个镇区中有7个镇区已经跃入亿元镇的行列,其他镇区也基本摆脱了贫困状态,在工农业生产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显著的变化;受扶持的30个管理区,有17个已建立了较可观的经济基础,集体经济比扶贫前增长了2.23倍,已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我市改革开放13年成功经验中最根本的一条。我市在加强党的领导过程中,着重抓了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全党目标这项工作,使全党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共同奋斗目标而开拓前进。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各级党政机关都建立了明确而严格的干部岗位责任制,如党建工作责任制、完成经济指标任务的岗位责任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责任制等。1990年和1991年,我们又针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党组织书记自身的革命化建设,先后制定了《镇区党委书记工作守则》和《市直属机关党组织书记工作守则》,明确提出党委书记要“在位一任,为富一方”。同时提出5项具体要求:一是要大力促进所在地区、单位的生产力包括科技水平的发展;二是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促使当地面貌有深刻变化;四是治安、社会风气有良好转变;五是教育事业有显著发展。

对市属职能部门,市委严格要求按照“全市一盘棋”的工作部署,结合本部门职能来开展工作。正确处理好国家与集体、条条与块块、管与放、全局与局部、取与予的关系,强调要掌握以下4项原则:一是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要大力支持,积极引导;二是要有不离政策的灵活性;三是要树立“欲取先予”、“蓄水养鱼”的思想;四是要做到对党和国家利益负责与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负责的一致性。

### 三

中山市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一定的成就,社会和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是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有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全市人民

紧密团结在市委、市政府周围，结合中山市的实际情况，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全市两个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回顾13年的经历，我们有如下四方面体会：

（一）坚持把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与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围绕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对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注重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面下功夫。改革开放以来，我市解放思想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在1978年底通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党员、干部初步树立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从思考问题到工作实践都贯穿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激发了党员干部努力投身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决心和干劲。第二次是在1984年开展的“关于生产力标准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讨论，使全市党员干部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从思想上确立通过改革开放，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观念。各级党组织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从思想上、工作上冲破长期以来实行的旧的产品经济模式，彻底摆脱妨碍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束缚，从而建立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通过讨论，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实践中逐步摸索，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转变旧的思想观念，逐步摆脱了在农业问题上“以粮为纲”思想的禁锢，大胆开展农村和农业方面的改革。比较突出的行动有：冲破了兴办镇村工业必须要“三为四就地”（为外贸出口服务，为城市服务，为大工业配套；就地生产，就地加工，就地找原材料，就地销售）的束缚，敢于发展多层次、多行业，适应国内外两大市场需要的乡镇工业。同时，还克服了非统购包销下能干，“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小农经济思想，敢于举债办实业，并把企业推向国内外市场，让其在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中优胜劣汰，接受考验。

据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我们在具体工作上抓了四个“敢于”：一是从1978年起，敢于在农村中率先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市已有97%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从此得以逐步深化。

二是敢于从实际出发，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和农业的生产布局。经过1981年和1984年两次大调整，全市水稻种植面积和高质高值的经济作物的面积比例，从原来的7：3变成了5：5，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也相应增加。到去年连续9年，全市粮食总产不仅没有降下来，而且还逐年递增，农业整体效益也大幅度增长。三是敢于支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早在1987年，我市就大力树立劳动致富的种养专业户黄新民、东风镇个体工业户何建光两个典型，为以后的多个层次经济成份的同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四是敢于建立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几年，我市除了首先在农村开展农业体制的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培育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沃土之外，还努力实行工、商、贸、旅游等各个部门和行业的改革，其中在工业企业中建立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组织工业集团公司，推行股份制等等，这一系列措施都旨在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后劲，有效地巩固和发展了工业这一经济主体的地位。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各方面改革，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是适应国情，符合党心民意的，因而得到了全党全民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把着眼点放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目标上。我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来抓，并以此作为检验党员干部的政绩标准之一。

1. 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优势，以开放发展生产力。我市原来是一个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底子差，解放30年来虽然兴建了一些工业企业，但要在一无国家投资，二无地方财力，三无技术人才和项目的情况下大规模发展经济，谈何容易？在党的开放政策鼓励下，我们首先想到中山市的人缘地缘优势；中山市是全国重点侨乡，华侨港澳台同胞众多，而且一直以来同中山保持密切的关系；中山毗邻港澳，人民的商品经济意识比较浓厚，商贸活动比较活跃；中山是孙中山的

故乡，拥有翠亨村等革命历史圣地，对外对内都有着较强的吸引力。这些有利条件在以前并没有得到发挥，相反由于生产落后，经济不发达，在60、70年代偷渡港澳成风，海外的中山乡亲也不敢回乡探亲访友，优势变成了劣势。

1979年以后，我市乘开放的东风，首先发展中山的旅游业，在香港著名人士霍英东先生的帮助下，兴办了国内首家中外合作企业——中山温泉宾馆等一系列旅游设施，以此吸引国外和港澳乡亲回乡观光，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强化全市人民改革开放的意识。接着，通过制订政策，内外发动，大力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发展市、镇、村三级工业。到目前为止，全市累计利用外资超过5亿美元，投入人民币23亿元，引进近10万台(套)先进设备和300多条生产线，建立了国营、集体和镇区等公有制骨干企业800多家，形成家电、电子、印刷、制糖、食品、纺织、化工、建材等20多个骨干行业和4000多种工业产品，工业实力大大增强。中山市的地缘人缘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我们也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山特点的、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新路子。

2. 大力开展经济结构调整，以改革解放生产力。开放和改革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要扩大开放，必须要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有效地优化各种生产要素，解放生产力。一是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在落实承包经营责任制，优化企业结构的基础上，重点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使企业建立适应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技改挖潜，改造老企业，提高生产能力。近年，我市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对全市工业85%以上的企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提高了生产能力。去年开始，部分企业已转入第二次技改，向高新科技进军。三是开展外引内联，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通过企业的优化调整和发挥拳头、支柱产品的优势，大力鼓励外向型生产，支持工业产品外销，提高创汇能力和经济效益，有效地增强了全市经济的应变能力和发展后劲。在治理整顿期间，虽然遇到资金紧缺、市场疲软等困难，但全市工业仍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产值、速度、效益基本上同步增长，带动了全市经济迅速发展。

3. 立足于科技兴市，走出一条适合中山特点的、依靠科技进步的新路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商品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经济竞争实力，提高生产能力，成为各级领导的主动要求。近几年来，我市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科技进步的政策和措施，同时确定了一条适合我市实际的、依靠科技进步的道路——在坚持自主研究、自主开发的同时，努力吸引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做到引进与消化、吸收并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采用中(中山市的优势)——中(内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及成果)——外(国外和港澳的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发展中山的高新科技产业。去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山市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把这条发展路子列入全党工作的重点，决心把中山市的经济建设重点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面来。

(三) 必须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促进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由于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一经广大人民所掌握，并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马上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事实证明，群众的积极性来源于政策的正确性，正确的政策措施要实现其预期效果，并对社会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关键在于稳定并连续。开放改革以来，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好、用好党的各项政策，坚持把稳定经济的立足点放在稳定人心、稳定政策上来。如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国家经济出现暂时性的困难，部份干部群众和外商产生怕政策变的忧虑。对此，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在反复宣传党的改革开放不会倒退、方针政策不会变的同时，重申我市过去在不离党的总政策前提下所制订的各项政策措施也维持不变。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消除顾虑，提高了贯彻执行政策的自觉性，稳定外商在中山投资的信心。全市近三年“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业务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大踏步发展。三年来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近3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四) 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市改革开放登上新台阶提供可靠保证和强大动力。

党的领导是我们一切事业必胜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组织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指挥部，这不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而且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可靠保证。

13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把加强党的建设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强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其中重点抓好各级党组织的班子建设和“班长”的自身建设，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团结、坚强、富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我市还十分注重加强对党员进行以廉政为主要内容的作风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党建、廉政责任制。如针对当前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党政干部涉外活动日益增多的情况，在1978年起陆续制订、实施了10多个关于在经济工作和涉外交往中要严格遵守的规章制度，明确了一些是非界限。这样做，既严肃了法纪又保护了干部改革的积极性。开放改革13年来，每年都有近3万名（次）党员干部因公务或旅游探亲而出国、赴港澳，但没有一名党员干部逾期不归或叛逃。1990年以来，我市进一步加强了党员联系群众和党政干部下基层，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活动，同时通过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工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由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改革开放中真正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使我市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不断发展有了牢固的组织保证。

与此同时，我市还花大气力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各级领导都注重结合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从而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为经济建设开创良好的政治环境。13年来，我市各级领导越来越重视

智力投资，积极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广播、电视、体育事业和举办各种公益福利事业，显著改变了全市城乡的面貌。1990年，我市上下发动，广泛开展关于社会公德的大讨论，树立了“团结、爱国、求实、创新”的中山人精神和中山市精神文明新风（市风），对于促进全市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起到很好的作用。去年，全市创建文明管理区（村）和文明家庭的达标率分别达到49.2%和54.2%。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我市改革开放事业在90年代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

中山市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没有失误和挫折，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我们无论在执行上级政策或开展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有许多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但是，改革开放给中山市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无可争辩的，中山市13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去年，我市在上级的关怀和指导下，已经绘制出“八五”计划和10年经济发展规划的蓝图。今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又吹响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号角，激励着中山人民继续奋发向前。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按照中央提出的“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政策上更宽一些”的要求，再接再厉，就一定能够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大潮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中山市委

责任编辑：石成

# 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乡镇企业的发展及主要特色

黄柱良

## 乡镇企业是新兴的多层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综合性产业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万象更新。根植于农村而又脱胎于农业的乡镇企业，在众多的新生事物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广大农民以前无古人的创业精神，开拓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富裕的新农村之路。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在解放后几十年中探索着致富之路，但始终没有解脱依附于土地和传统单一的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因而也没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首先在农村实践。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农村中成千上万的富余劳动力在寻找出路，冲出单一经济的“门槛”，向非农产业延伸，走出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经商不离农”发展乡镇企业的致富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广东各地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差异较大，这就决定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形式的多层次性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性。

首先，企业组织结构形成了乡（镇）办的企业、村办企业、联户包括股份（合作）企业、个体企业等四个层次。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总收入1008.22亿元的构成是：镇或乡级办企业收入410.37亿元，占40.70%；村办企业收入269.26亿元，占25.81%；联户企业收入67.54亿元，占6.7%；个体和私营企业收入270.05亿元，占26.79%。

其次，企业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包括乡（镇）、村、联户和股份合作企业等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体和私营企业为补充（包括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新格局。

再次，企业的产业结构也形成了一、二、三产业并举新兴的综合性产业。在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第一产业占1.49%，第二产业占82.27%，第三产业占16.24%；在工业产值中，重工业占25.93%，轻工业占74.07%。

乡镇企业这种多层性和以集体为主、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性，比较适合广东农村生

产力状况，所以她的作用是多维的，效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其一，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乡镇企业总收入从1980年（下同）的43.24亿元，增至1991年的1008亿多元，增长28倍；农村人均占有从925元增至2143元，增长1.19倍；总产值从43.24亿元增至928.48亿元，增长27倍，占全省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从9.75%上升到25.7%，占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从23.26%提高到62.27%。正如日本《经济新闻》在“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一文中所谈的“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可以看成是在中国各地出现的一次平静的产业革命，它使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迅速变化。”其二，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的产业革命，使广东农村经济结构起了质的变化。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变为以农业为基础、乡镇企业为主体、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农村一、二、三产业比例从1980年68.14：21.60：10.26，到1991年变成了42.12：48.10：9.78。其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调整、优化。广东原来有89.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现在已有700多万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方面，占农村劳力29.3%。上述的变革，大大地提高农村经济素质，较好地经受住自然灾害的袭击和市场变化的冲击，使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呈直线上升的态势。

#### 独特的农村工业之路

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村经济格局，而且改变了全国工业布局。广东发展乡镇工业，不是沿着西方一些国家所走过的路，即通过资本竞争、农村破产、农民赤贫化为代价来实现工业化；也不是模仿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二元经济模式。而是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闲散资金和各种资源，就地办工业，甚至办高新科技工业，走的是以农业为基础，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亦工亦农”之路。正如英国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在乡镇工厂利用过剩劳动力办法，在发展中国家是独树一帜”；日本《经济新闻》也说：“中国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这意味着中国正进行使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新尝试”。“乡镇企业的成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通过发展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开创了城乡结合发展工业的新路子。历史的经验表明，要实现工业化，光靠城市工业的发展是办不到的。必须把八亿农民也“化”进去，必须通过发展乡镇工业才能加快整个工业化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实现农村工业化之日就是实现全国工业化之时。广东在“以发展集体企业为主，以工业为主，以外向型为主”的方针指导下，乡镇工业已有长足的发展。工业产值已从1980年的31.21亿元，发展到1991年的679.28亿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73.16%，年递增30.1%。更可贵的是已形成了近400亿元的固定资产，引进了120多万台（套）的先进设备，拥有省级以上的先进工业企业410家，并逐步向规模经营方向发展。并拥有1000万元产值以上的企业767家，超亿元产值29家，创汇100万美元以上外向型企业500多家，初步建立了一批出口基地。

第二，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两者有机地统一于发展农村经济中。发展乡镇企业既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必由之路，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



从广东省省情看,农业要上新台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搞大量基础设施和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靠国家大量投入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大部分投入只能靠农村和农民自己的积累来解决,也就是要靠发展乡镇企业来积累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凡是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以工补农”,“以工建农”都搞得较好。“七五”期间,全省乡(镇)、村集体企业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的资金就有23亿多元,平均每年4.6亿多。1991年乡镇企业上交当地政府包括用于支农、农村各项公共福利的经费共16.2亿多元。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投入将逐步增长,这是一条立足于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反过来又实行“以工建农”的成功之路。

第三,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办工业。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出路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难题,在农村办工业,则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缓解对城市的压力。广东农村人口占75.3%,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因而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成为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单靠国家大量投资,扩大城市建设,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是国情、省情力所不能及的。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将会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也将愈高。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正如恩格斯在一百年前所作的科学预言:“要妥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使他们不致没有工作,或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在农村从事工业劳动”。广东实践证明,发展乡镇企业是开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独特形式,让农民在农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经商不离农”。到1991年不仅解决了广东农村29.3%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部分省外劳动力。

第四,通过办工业小区发展乡镇工业企业,建设新兴小城镇,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别。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能提前达到小康水平,其根本的经验就在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把发展乡镇企业放在振兴农村经济、致富农民的战略位置上来实施。每个乡(镇)都划出一定的土地集中兴办乡村工业小区,坚持办下去。工业小区的崛起,使为乡村工业服务的第三产业又得到相应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星罗棋布的集农工贸一体化的农村新兴小城镇,与大小中城市相映生辉,到1990年,全省已有1455个建制镇,比1980年增长了9.47倍。在珠江三角洲,每7.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小城镇,一幅幅“百里长街,车水马龙,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跃然于人们眼前。这些新兴小城镇既是乡村工业群体所在地,又是连接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桥梁,也是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中心,成为城乡一体化的雏型,农民世代梦寐以求的,消除城乡差别的理想,将成为现实。

#### 乡镇企业运行机制的独特性

乡镇企业逐步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较适合目前农村生产力状况的运行机制。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

市场机制、分配机制、风险机制等，使其充满生机活力。

乡镇企业全靠自己已在竞争中求生存，只有盈利，才能生存和发展；产品必须价廉物美，才能在竞争中获胜；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就要倒闭，职工就要“解甲归田”，盈亏自己负责，风险自己承担，管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亦工亦农，能进能出。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一种把按劳分配与奉献精神、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统一起来的机制。也是一种把人的创造精神和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精神充分调动起来，通过竞争和拼搏，创造出一番事业的机制。据笔者调查，中山市西区长洲村集体经济能够长足发展，有两条经验：一是从1986年开始建立风险基金制度，每年从企业总利润中提取10%作为风险基金，由村经济发展总公司直接掌握，至今已积累800多万元，大大增强了企业应付风险、灾害、市场疲软和渡过其他困难的能力；二是建立资金融通制度，村内各企业的库存资金，由村经济发展总公司统筹掌握使用，资金所有权仍归各个企业。企业之间融通资金，实行内部计息的办法，调剂余缺，保证了企业生产不断正常运作，基本上不存在资金紧缺的问题。

乡镇企业从其“出生”之日起不仅没有被列入国家计划，更没有定量的原材料供应和资金的投入，而且在某个时期还受到种种非议和“卡、压”。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发展起来，其动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经济运行和活动都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与市场连为一体，从市场上购买原材料，再通过市场竞争来推销产品。这样，乡镇企业就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法则，进行经济运转和活动。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围绕提高产品的质量、价格和科技含量上狠下功夫。因为只有价廉物美、款式新颖的产品才能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才能不断发展。况且，产品竞争，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之争。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走“高科技、高效益、高创汇”之路，大量投入、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一步到位，跳过了常规工业化初始阶段——“小、散、低”（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档次低，效益低）的阶段，使产品上档次，企业上规模。据1991年统计，三角洲工业产值432.29亿元，占全省工业产值679.29亿元的63.64%，总收入587.88亿元，占全省1008.21亿元的58.31%，出口产品总额134.64亿元，占全省187.16亿元的74.32%。如珠江冰箱厂原来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农机厂，通过转换经营机制，迅速转产，依靠高新技术，以其高质量、功能好的产品和相对较低的价格，迅速占领了国内外市场，年生产能力达40万台，1991年产值达7.27亿元。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国家一级企业。1991年底又完成第四期工程，预计1992年产值将突破十亿元大关。

乡镇企业从来就没有铁饭碗、铁工资。乡镇企业的干部职工必须靠企业的兴旺发达、靠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获取收入。这种分配形式和利益关系，把企业同干部职工捆在一起，荣衰同舟，同生死、共命运。企业存在我存在，企业发展我光彩，企业获利我增收，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如当企业面临资金困难时，职工宁愿暂时不领或少领工资，也要保证企业正常生产。在乡镇企业中，一人操作管理三四

台机器，直至五六台机器的比比皆是，其创造的价值同工资收入成正比，管三四台机器的人收入当然比管一台机器或“铁工资”高得多。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纯利润72.58亿元，比1990年增长32.61%，平均每人创利润1025元，而工资总额也相应增加到173.56亿元，比1990年增长24.63%，平均每人一年收入2452元。实践证明，这种运行机制是激励乡镇企业干部职工顽强拼搏、谋求生存和发展，脱贫致富，步入小康的强大动力。

### 乡镇企业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广东乡镇企业同全国乡镇企业一样，其基本生产资料，是以公有制的集体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存的结构。全省1991年固定资产原值已达398.72亿元，乡（镇）、村两级工业企业占279.16亿元，占70.01%，再加上联户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大了。此外，乡镇企业的干部职工，大部分在农村都有一份承包的土地，和其他村民一样，共同占有有一定数量的集体生产资料，并且承担一定义务。可见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实力，带动了联户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乡镇企业的崛起，向非农产业的生产领域开拓、延伸，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得到逐步合理的调整，经济素质得到了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不仅可以经受得起自然灾害的袭击，也经得起市场波动的冲击。1991年，广东遭受到罕见的自然灾害，前期干旱，后期几次强台风袭击，直接损失达48.8亿元。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如发生在过去单一经济年代，其后果不堪设想，但灾区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则恢复了生产，而且农业生产还获得了丰收，其他各业均创历史最好水平，乡镇企业仍然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大灾之年，农民收入不减。全年纯收入已达到1143元，比1990年增加192元，初步克服了农村经济的脆弱性。特别在发展乡镇企业的伟大实践中，造就了新一代的农民，使他们不仅懂得农业生产，还懂得搞工业、商业服务业。今天进过乡镇企业的农民已不是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了，而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拥有一技之长的新型农民了，并培养出一批企业家。随着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涌现。

以集体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带动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现行的分配原则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辅。由于多种经济共存性，多种分配形式，以及乡镇企业发展不平衡性，虽然共同都富了，但富的程度不同，富的快慢也不同。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农民的收入结构也产生根本的变化。据调查较富裕的宝安县，农民的家庭收入结构由四个方面组成：一是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工资收入；二是资金入股分红；三是集体收入按人头平均再分配；四是责任田和副业收入。被调查的沙井镇万丰村最穷的一户有五口人，其中三个小孩读书，一年其家庭收入：（1）夫妻两人在工厂务工每月工资收入900元，全年10800元。（2）集体收入按人头平均的再分配，每人每年1500元，五口人共7500元。（3）一年的责任田和家庭副业收入约21300元，这一家全年能收入39600元，平均每人收入7920元。此外，由于他们家较“穷”，在发展股份制时，村里借给他25000

元入股，现在还将股份分红的钱用于还本付息期间，没有收入，到1993年还清后，每年则可分得红利5000元左右。该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了，个人富裕了又推动了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近几年村里投资150万元新建了两所学校，已普及初中教育，免费为每户提供《参考消息》《深圳特区报》，还为全村农民每人买了5000元人寿保险；花了1500万元架设了高压电网，花费300万元修了三条水泥马路，用了400万元建设一个“万丰公园”，供群众游乐；花了6000万元建了“万丰酒店”，花了700万元建造一间影剧院；花了700万元建了自来水厂，村里还自办了一支消防队和治安队，配了消防车和警车，还为各户农民安装了程控电话。55岁以上的老人，每年每人发给150元水果费。现在的万丰村，实现了家庭电气化，户户建了小洋房，平均每人住房面积47.5平方米，有的村民还买了小汽车、面包车和货车，昔日边陲的农村小镇已成了现代生活的“小乐园”。

综上所述，广东乡镇企业今天的成就，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它对全国许多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探索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广东乡镇企业管理局**

**责任编辑：谭湛明**

---

（上接第55页）

个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相结合的大农业体系。1990年，农副产品出口创汇4486万美元。

（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栽桐引凤。“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是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上述四市县投资环境的形象描写。改革开放以后，四市县为适应发展迅猛的乡村工业的需要，把价值规律引入投资领域，突破了过去依靠国家拨款的单一渠道，实行有偿投入，有偿使用，“以桥养桥、以路养路、以电养电、以电讯养电讯”，争取市镇政府、集体企业各凑一点，贷款，发行建设债券，用工业积累投入基础设施等办法，使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如今，这里公路四通八达，口岸星罗棋布，通讯网络纵横交错，被外商誉为“投资者的天堂”。东莞市从1979年以

来，集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达60.7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六成以上，新建和扩建公路桥梁111座、新筑公路1600公里，新建口岸9个，新办电厂2个，新装电话机容量10.6万门，平均3户人家12个人有1部电话，大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目前，全市通车里程1445公里，基本上实现了镇镇村村通车、通电、通水、通电话。此外，还兴建了一批文化、教育、商业、饮食、旅游等设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软、硬投资环境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郑英隆**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的启迪

——中山、东莞、顺德、南海调查

顾作义 何文光 洪楚仪

被称为广东“四小虎”的中山、东莞、顺德、南海四市县，率先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探索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路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昌盛，社会文明安定，人民幸福富裕的新景象。他们的实践与探索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坚持发展新型的集体经济，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坚持发展外向型经济。

## 一、历史性的变化与集体经济的重建

改革开放13年，中山、东莞、顺德和南海四市县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变：1. 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从1978—1991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等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年增长率都达到或超过20%，他们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目标，提前10—12年实现了小康水平。这个经济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广东同期发展水平，而且超过了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期的速度。2. 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四小虎”原来都是以农为主，工农业产值的比重是“三七开”，而第三产业则处于萎缩状况。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乡镇工业的迅速崛起，形成了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乡镇工业为主体，以第三产业为纽带的新产业结构。1990年，在社会总产值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已居主导地位。中山市占93%，东莞市占88.8%，顺德占93.31%，南海占92%。3. 形成较为合理的社会就业结构。四市县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过去七成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局面，目前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已达60%以上。1990年东莞市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已由1978年的71：

17：12变为36：41：23。4. 打破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初步实现城乡一体化。10多年前，这里城乡差别悬殊。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地区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都市化，走“进厂不进城”的路子，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传统格局。目前，一个每70平方公里一个小城镇的，集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信息中心于一身的现代化农村小城镇群已经连成一体。5. 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南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990年比1978年增长5.75倍，城镇职工人均货币收入增长5倍，城乡人民收入同步发展。东莞市的抽样调查表明，城乡居民拥有的家用电器不相上下。从总体水平来说，城乡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差不多，在住和行方面农村甚至优于城镇，一些更为高档的商品如录像机、空调机，以及电话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问渠那能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四小虎”社会经济腾飞的基础是创新集体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四市县人民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去的集体经济之所以缺乏活力，根源在“一大二公”，在于“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弊端在于机制，而并非公有制的过错。因此，他们坚持在改革开放中重建集体经济，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其做法主要有如下两条：

一是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新的成长点，把社会主义的原则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则结合起来，建立新的经营机制。

实践证明，过去那种“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窒息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没有生命力。而私人经济的分散性、小规模以及生产的盲目

性，往往又会与社会需求相矛盾，并且会带来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因此，“四小虎”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引入商品经济的产权规则、自主经营规则、公平竞争规则、契约自由规则，从而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新的经营机制。（1）引进承包制和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责权利相统一，建立自主经营机制。“四小虎”在发展集体经济中，引进了承包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使经营者既承担经营的责任，又拥有经营管理的权利，享有经营效果的利益。这就从根本上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首先，厂长（经理）自主权大，没有扯皮，决策迅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次，责任明确，厂长（经理）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再次，作为经营者，除了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外，还有一展抱负，显露才华，开拓进取，投入竞争，争当强者成为企业家的动力。（2）实行按劳取酬，建立利益激励机制。集体经济，在分配上实行“全浮动工资制”，职工的收入与产量、质量、消耗等指标挂钩，实行的是多劳多得，多贡献多收入的分配原则，打破了“大锅饭”，发挥了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从根本上调动了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焕发了企业的活力。（3）参与市场角逐，建立竞争机制。这里的企业员工捧的是泥饭碗，国家对集体经济不投资，不包产供销，企业完全是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搏击，企业有危机感和压力。为了在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面向市场，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质量。（4）改革用工制度，建立竞争机制。在这种集体经济中，对经营管理者的选择是平等竞争；五湖四海选贤能，能者上，庸者下，没有“铁交椅”可坐。对职工，则是双向选择，两厢情愿。用工主要是合同工和临时工，没有“铁饭碗”可端。这种危机感促使人们勤奋工作，在竞争中求发展。

二是在集体经济内部引进多种经济成份，增强集体经济的实力和合力。

“四小虎”集体经济的活力源于改革开放。“四小虎”发展集体经济，打破了过去的自我封闭，实行开放式的经营。（1）通过外引内联，积极地吸纳外来的生产要素，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主动把握国际国内的机遇，灵活地把自己拥有的劳力、土地等生产要

素投放到商品经济运行体系中去，引进境外的资金、设备、技术，引进外地的人才、技术，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引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焕发了集体经济的活力。（2）在集体经济内部引进多种成份，形成“一厂多制”的混合经营机制。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需要，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这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走开放经营之路，主动地发展横向联合，在集体经济内部引进全民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境外的资本主义经济，打破了过去集体经济内部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单一的产品结构，形成了不少一厂多制，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杂交”经济。

这种“杂交”经济，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通过股份制形成紧密的联合。这种联合突破所有制、行业和地域的界限，合作的范围有投资、开发产品、开发资源等等，形成了在一个企业内部既有集体经济成份，也有外资和个体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格局。二是集体企业与个体企业的挂钩。这是一种比较松散的联合，这种形式有集体与私人共同投资，按投资比例分成的私人与集体联营企业，也有集体提供场地或厂房，租赁给私人经营的企业。如南海县这类私人与集体的挂钩企业已逾2千多家，从业人数6万多人。

实践证明，这种“杂交”经济实行生产要素的互补，产生了“杂交”优势，增强了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增强了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二、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如果说新型的集体经济是“四小虎”得以腾飞的基础的话，那么，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发挥价值规律对市场的主导作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则是强大的推动力。“四小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可以用“大市场”、“大流通”来概括。

（一）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以市场为导向配置资源，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1978年以前，农副产品基本上实行计划收购价格，由县以上物价部门统一管理，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制度。结果派购到那种产品，那种产品的生产便萎缩。1978年底，他们首先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然后，取消了塘鱼、三鸟、蛋品、生猪的派购任务，并先后把杂粮、油料、塘鱼、海鲜、生猪、三鸟、蛋品、蔬菜、水果、中药材等232个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全部放开。今年，又放开了

粮食、糖蔗的收购价格。至此，农副产品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他们按照市场需求和自然优势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结果使各地的经济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山的水果、水产，东莞的水果、蔬菜，顺德的水产，南海的畜产发展迅速。

(二)以小城镇为依托，以骨干产品为中心，培育商品交换的大市场。改革开放后，“四小虎”通过逐步放开价格，加强市场建设，逐步形成了以小城镇为依托，以骨干产品为中心，各具特色的集市贸易市场、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多成份，相互交融，纵横交错的农村商品市场体系。他们培育“大市场”的做法是：(1)培育集贸市场。南海县近几年投资4500万元，建成总面积7.2万平方米的19座集市贸易市场。如今，已形成了一个中、小型结合，高、中、低档并举，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集市贸易网络，成为农副产品和一些工业品的集散地和区域交换中心。(2)培育专业市场。“四小虎”以当地的骨干产品为龙头，以小城镇为依托，培育出一系列专业市场。如南海县的西樵布匹市场、大沥农产品批发市场、黄岐家私市场、九江服装市场、顺德乐从钢材市场，东莞虎门的服装市场等等，销售量大，辐射面广。“建一处市场，兴一串产业，富一方群众”。专业批发市场的发达，带动了工业、农业、旅业、运输业。南海县的西樵镇形成了“千家店、千家厂、万台机，年产超亿米布”的化纤生产批发基地。(3)开拓埠际市场和远洋市场。区域性农产品集散中心的形成，这是农村市场发育的初始阶段；专业市场、批发市场的出现，这是农村市场发育的成长阶段；而远距离、大批量、高质量的商品交换的埠际市场，则是农村市场发育的成熟阶段。近几年来，“四小虎”通过发展横向联合，组织集团经营，开拓埠际市场，把市场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同时积极开拓远洋市场，把商品从过去主要依靠港澳的转口贸易发展到直接向欧美等国家出口。目前，顺德市在出口创汇的3亿美元中，1/3靠外贸，1/3靠自营出口，1/3靠其它渠道。

(三)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成份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商品大流通。“四小虎”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大胆地改革过去单一渠道、单一成份的流通体制，充分发挥农民参与流通的巨大作用，形成了一个以供销社为龙头，以农民

联户、个体为主力的多层次、多渠道、多成份的开放型的商品流通。具体的特点是：(1)国营、集体、联合体、个人一齐上，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立体式流通格局。市、县的商贸部门，从单纯行政管理型转变为经营服务型，兴办实体，参与流通；镇、管理区建立各种销售服务站，为农民提供产后服务；联合体、个体从事商品贩运，从而形成国营、集体、联合体、个体一齐搞流通的好势头。东莞市1990年，农副产品流通服务点有4348个，其中中国营供销单位64个，集体组织233个，联合体719个，个体3330个。(2)围绕当地大宗产品，发展流通中的联合组织。顺德市水产局、商业水产公司、食品公司等单位牵头，组织集团经营，发展南鱼北运，运销量逐步上升，产品运销13个省、市、自治区。(3)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合作，组成流通实体。如南海县生产单位和流通组织合作兴办水产冷库11间，年加工塘鱼3千多吨，年北运塘鱼8千多吨。(4)开拓多样化的购销形式。为了方便生产者，在收购方面既有设点收购，也有回头收购；既有合同收购，也有现货收购；在地域上，有以收本地货为主，也有以收外地货为主。灵活多样的购销形式，推动了商品的流通，同时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完善。

### 三、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四小虎”经济腾飞的外部推动力，也是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改革开放后，他们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把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从发展“三来一补”起步，到发展合资、合作、独资企业；从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到吸收、消化、创新，发展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从引进外资发展旅业、工业到发展创汇农业、交通、能源，逐步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出口创汇为目标，以发展乡镇企业和生产基地为依托的外向型经济的新格局。其具体措施有三：一是充分利用外资。从1978—1990年，南海县利用外资达2.4亿美元；东莞通过引进“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达13亿美元，引进外资的领域已从商业旅游业扩展到工业、农业以及能源、通讯、交通等行业。利用外资的形式已从初期的“三来一补”发展到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引进外资的对象

已从以港台商为主，扩大到日本、美国、法国、泰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客商的投资规模已从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千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二是引进了大批先进的技术设备。12年来，东莞引进先进技术设备34.4万台（套）。顺德市自1980年以来，用2.5亿美元引进先进设备2万多台（套），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8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三是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1990年，在外贸出口总值中，中山为1.9亿美元，东莞为1.58亿美元，南海为1.35亿美元，顺德为1.04亿美元。

“四小虎”走发展外向型经济路子的特点主要有四：

（一）以发展“三来一补”为跳板，以吸收创新为目的，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由于“三来一补”具有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的特点，加上毗邻港澳和劳力充裕的优势，“四小虎”一开始就选择“三来一补”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的突破口，大力地兴办“三来一补”企业。用比较廉价的劳力、土地和有限的资金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目前，“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成为出口创汇的一支力量。如东莞市13年来，对外签订了“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协议10586宗，已投产的5700多家，10多年累计创汇10多亿美元。“四小虎”在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注意消化、创新。他们看到“三来一补”企业有对外依赖性强，耗能大，占地多，用工多，社会负担重，中外双方利益分配不合理等局限性便注重利用“三来一补”的形式了解国际市场信息，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疏通对外联系的渠道，以此作为自我发展的基础，逐步派生或转化为具有自我产品开发和市场竞争能力的自营和合资、合作企业。他们还注意引导高档次的“三来一补”向合资合作方向转变，实现为我所用。对于那些技术档次较高，市场前景较好，双方合作愉快的“三来一补”企业，他们通过消化吸收，掌握生产技术和方法后，积极动员外商转为合资合作。坚持以内联为依据，把内联与外引结合起来，发展自己的拳头产品，建立“多元”化的合营企业，逐渐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二）着力开发高、名、大、新产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高，即是高技术、高起点，创造条件引进当代先进的设备；名，就是要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创名牌优质产品；大，就是适销对

路的产品要搞好配套，实现规模生产，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新，就是要不断创新产品，做到“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制一代”，促使技术结构和商品结构发生转变。目前“四小虎”已初步实现了经营方式由单一形式到多元化的转变，出口产品由低到高档次的转变，技术构成从初期的劳动密集型逐渐变为劳动技术密集型，加工出口产品由低附加值转变为高附加值。在不断的调整中，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明显的改进。

（三）组建一批出口生产基地，大力发展出口创汇产业，形成贸工农的创汇产业体系。“四小虎”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实行以外贸为导向，按照出口贸易的需要，实行生产、流通、科技、信息的有机联合，向贸工农一条龙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形式有：（1）实行基地农业与庭院农业相结合，形成了以商品基地为中心的跨地域、跨部门的出口生产体系。顺德市坚持基地农业与庭院农业的结合，形成了一批出口生产体系：如兴建了鱼苗场、颗粒饲料厂、水产冷冻库、塘鱼养殖、冷冻、运输及出口成龙配套的塘鱼生产体系，兴建了从猪、鸡苗繁殖培育、肉猪、鸡饲养，饲料供应，防疫及技术服务到收购出口配套成龙的瘦肉型猪、优质鸡生产体系；建立了养兔——毛纺、出口的毛兔生产和兔毛纺织体系，建立了引进、栽培、出口的花卉生产体系，建立了包括栽培试验、专门培养、供应种苗以及收购、保鲜、运输的蔬菜、水果生产体系。这些商品生产体系批量大，获得了规模效益。如南海里水宝鲜有限公司，是一间从事荷兰豆等蔬菜急冻保鲜深加工的企业，年生产能力逾万吨，这个企业把周围千家万户的分散小生产纳入专业化、外向型的大生产中，仅荷兰豆一项，全镇的种植面积扩大到7000多亩。目前，这种基地农业与庭院农业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的商品基地发展迅速，仅东莞市就已建立了粮食、甘蔗、香蕉、橙柑、荔枝、花卉、水产、生猪、禽蛋等十几项商品基地，1991年，农业商品率达73.5%。（2）实行开发性农业与创汇农业相结合，增强创汇能力。“四小虎”在发展商品农业中，坚持“山、水、田、林、园”立体开发，发展生态农业和创汇农业。东莞市从1985年以后选择了一条注重利用自然资源，大搞开发农业的新路子，充分利用荒山、荒坡、滩涂、河渠，大力发展林、副、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形成了一

（下转第51页）



## 发扬实事求是精神，搞好广东工作

——纪念叶剑英诞辰95周年

张江明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几十年如一日，一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行动。在他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重视发扬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涵，而且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化作为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特别在广东工作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我们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楷模。现通过几个典型事例加以说明。

（一）叶剑英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是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取得了很大成绩的。

叶剑英回到广东前后，都很重视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了解广东的省情和特点，以便结合实际开展工作和土地改革。他在赣州会议上，全面地分析了广东的历史和现状，广东的人民和华侨，广东的地下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广东的敌人和帝国主义势力，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研究和提出方针政策。为了深入了解广东农村情况，他专门派刚从山东分局经中南局回到广东工作的李坚真，到兴梅地区作调查，并同地委商量和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一致认为兴梅地区土改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于当年冬天开始进行。经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研究，终于制订了“全省着眼，三县（兴宁、揭阳、龙川）着手”的方针，先由点的试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发展推广到面，同时，又用面的经验指导点，使点和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以期共同提高。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报告都明确指出，建国后和建国前的土改不同，在政策上有发展和区别，例如，“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对地主兼营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着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来处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以及对特殊土地的处理和土改执行机关等都作了明文规定。根据上述精神，华南分局结合广东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成立广

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和省土改工作团来贯彻执行。叶剑英挑选具有“对党的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李坚真担任主任和团长（后来由方方担任省土改委主任）。（陈丕显：《李坚真回忆录》“序言”）李坚真精明干练、刚毅果敢，有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她是中央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长征中32位女红军之一。她在中央苏区直接领导长汀县等的土地革命，而且有些土改政策和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采纳和赞扬。在解放战争时期，她曾任华中分局民运部副部长，由邓子恢决定她带工作队到淮安县鹅钱乡进行土改，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华中分局给以高度评价，邓子恢亲自总结经验，认为对华中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有指导作用。因此，大家知道了让富有实事求是精神和作风的李坚真具体指导广东三县土改，深感慧眼识贤才，充满信心。

叶剑英统观全局，把党中央、国（政）务院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将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切合广东实际的具体政策。据统计：当时制定依靠贫雇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有60多条，保护和照顾华侨的政策有40多条，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40多条，等等。这些具体政策是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挥，它使广东的土改工作得以健康地展开。

当李坚真带省土改工作团下乡前，叶剑英又再三嘱咐她：“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团结大多数，结成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要注意斗争策略，掌握政策，对地主的斗争，侧重点放在依靠群众，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的罪恶，除少数罪大恶极及公开和我们对抗的恶霸要坚决镇压外，一般不要在肉体上消灭，而要采取说理说法的斗争”。（见《李坚真回忆录》第198页）叶剑英明确指出：“全省土改，……我们的乡村将展开整整三年的阶级斗争，要从历史上消灭一个封建地主阶级，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叶剑英《在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1月）但是，“土地改革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这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满足贫雇农方面，《关于土改工作计划步骤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分配土地首先要“尽量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方针是在满足贫雇农的前提下兼顾其他阶级”；“分配果实时，要首先分给贫雇农，适当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在典当关系上规定“贫农典给地主土地，可将地权无代价的收回，交与农民”等等。在农民协会中规定“要有三分之二的贫雇农来作委员”。这些说明，在土改中叶剑英的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是极其鲜明而正确的。

广东是侨乡，华侨家属及外籍华人家属众多；广东又是沿海省份，工商业比较发达，这都是广东土改中需要正确处理的突出问题和特殊问题。据土改时的统计，当时居住在国外的粤籍华侨约有640万人，占全国华侨总数80%强，占全省总人口20%。侨眷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侨汇，抗战前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80%，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侨汇除维持侨眷生活外，相当部分用来买田地、盖房子、置产业、投资工商业和兴办公益事业等，作为长久生活之计以及支援祖国建设。因此，土改中的华侨政策关系重

大，它关系到广大华侨的爱国、爱乡感情，对新中国建设的支持，以及对华侨的爱国统一战线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无论对国内和国外都产生不良影响。叶剑英生长在广东著名侨乡梅县，20岁时曾随父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对华侨的苦难史、在国外的处境和爱国热情，有很深的感受和了解。所以他对土改中的华侨政策，经过慎重考虑，<sup>4</sup>反复研究，从广东实际情况出发予以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执行。其中包括划分华侨地主的政策（出国前已经是地主和出国后其家庭上升为地主者区别对待），以及侨眷政策、侨汇政策和华侨房屋政策等，使95%以上的华侨在土改中得到保护，团结了广大华侨。

由于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华南分局尤其是叶剑英把党中央的方政策和广东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各级领导干部、土改工作团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先期进行的三县土改工作胜利完成，达到预期目的。对此，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均给予充分肯定。方方代表分局对三县土改作了总结，认为三县土改的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阶级敌人基本上被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已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土改中没有侵犯工商业，没有侵犯中农，没有乱打乱杀，照顾了华侨，照顾了其他劳动人民，解决了房界地界的矛盾。三县的经验值得向全省推广。

根据李坚真的回忆和不完全的统计，三县土改在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发展生产方面，主要是：三县土改共没收土地588320亩，以及耕牛、房屋、粮食、农具一大批。地主占有的土地，三县分别从土改前占有34%、40%、45%下降到1.6%、3%、4.4%。土改后人均占有土地，以揭阳县为例，人均占有土地1.005亩，其中地主为0.865亩，贫农为0.966亩，雇农为1.050亩。总之，三县土改后，地主人均占有土地均低于全县人均占有土地数，更低于贫雇农人均占有的土地。这样，就废除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剥削，改变了长期束缚农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土改后在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库和农田基本建设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三县粮食比1950年分别增产1070万斤（兴宁），2213万斤（揭阳），龙川则增产20%。三县土改中对华侨和工商业的政策得到贯彻，他们的正当权益得到合理保护。《南方日报》曾以《揭阳土地改革中侨属得到保护和照顾》为题（1951年3月14日），报道了揭阳县在土改中“适当地保护和照顾了华侨家属的利益。……中立了0.5%的华侨富农家属和分别对待照顾的华侨家属，衷心感谢人民政府的正确措施”，还出现了很多农民群众自觉地执行华侨政策的动人事例。这体现了叶剑英的高超领导艺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作风。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作风，曾几何时却得不到肯定，反而受到批评。有人从根本上否定三县土改，指责它取消阶级斗争，犯了“和平土改”的右倾错误。还认为三县土改，“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不够，缺乏阶级分析”，“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杀人太少”；“广东基层不纯，不能依靠”等等。以至后来在土改复查和其他县的土改中，将许多华侨的房屋都没收了；还把一些人重新划为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当时华南分局的领导同志不同意这些看法和做法。多杀人乱杀人表面上轰轰

烈烈，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党的政策，反而会失去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广东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是纯的，可以依靠的。但在上下的压力下，叶剑英、方方、李坚真等都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方方从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为第五书记，不久，又被撤销分局第五书记常委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只任分局交通部长，下放锻炼。李坚真的省土委会副主任职务，虽未明确撤销，但也是名存实无，她被下放到惠阳搞土改，分局的领导明确向惠阳地委说：李大姐“在土改中犯了错误，是来锻炼的”（后来调回省里工作）。还有不少同志受了处分，“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长期受到压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直到1986年叶剑英同志逝世，党中央在致叶剑英的悼词中写道：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他领导广东土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历史问题，经过30多年的实践检验后，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使当年参加三县土改的广大干部，放下了长期背着的‘和平土改’的沉重包袱，积极投入祖国四化建设的事业中去。”（《李坚真回忆录》第21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有错必纠”的方针，坚决克服过去“左”的错误。近几年来，国家和地方支付巨额资金来落实广东的侨房政策。据统计，广东需要落实侨房的资金约占全国落实侨房所需要资金的四分之三。从1984至1989年，我省用于落实农村侨房资金共4.9亿元，还有97万平方米未清退；城镇中则有数百万平方米未清退，需要继续落实。

（二）叶剑英提出广东应重视墟镇工作，具有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

在广东工作期间，叶剑英很重视加强墟镇工作，这是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又是考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步骤和国家的全局提出来的，包含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加强墟镇工作是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根据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形势，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开始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而城市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其他工作都要围绕并为此中心服务。叶剑英一方面考虑到广东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从商人员较多，经商范围较广，促进了墟镇的发展，解放初期，除广州市外，还有6个省属市，222个镇和数百个墟，搞墟镇工作对恢复和发展城乡生产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重点转移，会有一个过程和步骤。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达到。而墟镇则是联结城市和农村的桥梁与中介环节。加强墟镇工作，可以兼顾做好城乡两个方面的工作，更加顺畅地实现战略的转移，过渡到以城市为重心来领导农村的新时期。

加强墟镇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理论的具体应用，把集中与分散、生产与流通、头发与辫子结合起来。无论城市或农村，都要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中心位置。至于如何发展生产，必须从实际出发来决定。为了发展生产，就要搞好流通、交换，以及有关的分配和消费。这里讲的分配，包

括有个人所得的分配（按劳分配）和社会分配（生产分配）；消费同样有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生产消费）之别。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流通。而墟镇则在城市和乡村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中起着纽带作用，它通过集散和交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叶剑英认为：“墟镇一方面是紧贴着农村，掌握着农村；另一方面又联结着城市。从农村方面看来，它是周围乡村的上层建筑（按：又叫集中点）；从城市系统看来，它是城市的基层组织；从城乡关系看来，它是城乡的纽带。”“要把城市工业产品供给农村，又把农村的原料与粮食供给城市，这里面就发生一个集散问题、交流问题。”而墟镇则成为“农产品向那里集，工业品由那里散”的“集中点”。叶剑英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阐明：“如果说墟镇周围的农村等于我们的头发，那墟镇就是头发集中起来的辫子，我们抓紧了墟镇，形同抓住了辫子。”把头发和辫子聚集和散开、生产和交流辩证地统一起来，就能搞活流通、搞活经济，使城乡生产共同前进。

加强墟镇工作是增进城乡互助、巩固工农联盟的具体途径。叶剑英认为墟镇问题是个“关系到工农联盟与城乡互助问题”。过去，城乡是对立的；现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它改变为城乡互助的关系。如何进行城乡互助和交流，“都必须经过商业形式来实现”，必须重视交通、运输、商业、合作社、贸易和港口建设，既要城乡互助，又要“发展出入口贸易”，“内外交流”。只有“做好了墟镇工作和城乡产品交流工作，工农政治联盟才有物质的基础，城乡互助才有真实的内容。”

加强墟镇工作也是为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具体渠道。1950年9月叶剑英在墟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墟镇工作，是使它有意识地为农村服务的。“怎样服务呢？象学校的建立是为农村的子弟服务，合作社贸易公司也是为了使农民减除中间剥削而服务，手工业也是为促进农业生产而服务的，墟镇与农村的关系就是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关系。”

有的同志认为：叶剑英这样重视墟镇工作，却不重视土地改革，是脱离实际，犯了方向性错误。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叶剑英的指导思想和广东实际情况的。前面说过，叶剑英到了广东便重视土地改革，他提出加强墟镇工作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为土改服务的，绝不能把墟镇工作和土改割裂开来。他是从贯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精神，加强城乡交流互助、巩固工农联盟和为农村土改服务而提出来的。应该说，叶剑英提出加强墟镇工作的观点，是从实际出发、富有实事求是创造精神的体现，是逐步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伟大战略转移的具体步骤和良好方法，不仅对当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仍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叶剑英提出南北干部团结会师和领导干部的标准，是实事求是思想在组织路线中的表现。

由于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到广东工作，难免会在团结上出现一些问题。党中央早就预见到此，再三指示，要“团结会师”。叶剑英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赣州会议上，强调要重视干部团结。他指出，在干部关系上要“首先肯定人家的长处，看到人家的本

领，尊重别人，向人家学习。”不要只看别人的缺点、错误，把别人说成一无是处，到处批评指责；也不要割断历史，把以前的工作全盘否定。对待干部应该有两点论，不要一点论，既要看到干部的缺点，又要看到优点，要善于帮助干部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不能无限上纲，不能一棍子打死。在赣州会议上他就指出，必须“团结出发，用与人为善的态度，作善意的批评建议，帮助同志，帮助改进工作，达到团结”。这就是说，叶剑英比较早就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治病救人的方针。习仲勋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时，叶剑英很关心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以及培养地方干部问题。他说：“外省的同志来广东，做了很多工作，是有很大贡献的，广东人民会称赞你们，不会忘记你们。同时叶剑英同志也很强调培养和使用地方干部。1979年6月，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他接见大家时要县委书记中的广东人举手，一看占多数，他很高兴，认为是可喜的现象，并要我和杨尚昆同志继续注意培养地方干部。他说，这不是地方主义，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他谆谆鼓励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尊重，搞好团结，互相学习，同心同德，把工作搞好。”（《痛悼敬爱的叶剑英》1986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对广东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必须掌握政策，区别对待，看清主流。叶剑英认为，对基层组织必须整顿。但“应把思想作风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错误的大小轻重亦应有所区别。”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涌现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他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所犯错误多属于幼稚和缺乏经验，主要是教育问题。有个别严重贪污浪费的，应给以恰当处分；属于钻入基层组织的地主、恶霸、流氓、匪特，必须坚决清洗，其中罪大恶极的必须坚决镇压。不能认为地方干部都不可靠，经过多次土改整队，即使整去10%，那就证明有90%还是可靠的。有的把广东基层干部看作是国民党的旧基层，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和对干部工作的总结，叶剑英提出领导干部的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起来，叶剑英在广东工作期间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实事求是地选拔干部的。他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严格要求自己，广泛团结同志，反对任用私人、反对“五同”（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在土改中，他强调要依靠当地干部，他们地熟人熟，起到向导作用，南下大军和外来干部经验丰富，彼此要互相依靠，搞好团结。”他教育干部要搞五湖四海，“本地干部要团结外来干部”，“大家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李坚真：《沉痛悼念叶剑英同志》）能够挂帅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坚决贯彻党的正确路线的忠诚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分东西南北，不能以地域观念来决定是否能够挂帅。应该说，叶剑英在广东工作期间是坚持“任人唯贤”，他的干部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曾几何时，不但有人否定叶剑英的实事求是的干部政策，“有的甚至认为剑英同志是带头搞地方主义的。”（见薄一波《经得艰难考验时——忆叶剑英同志》1989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他在重压之下也曾不得不作了违心的检讨。那时，正好薄一波受党中央和毛泽东派遣到广州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薄一波说：“有人向我反映，华南分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包括方方在内，有地方主义的倾向。叶剑英同志同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似觉有难言之隐。回到北京后，我如实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谈了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叶剑英、方方等同志回到广东本地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很难说这就是搞地方主义，而且他们是坚决反对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的。但是不久，在华南分局还是开展了一场对地方主义的批评和斗争，叶剑英、方方、冯白驹同志等在会上都作了检查。……在今天看来，就某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正常地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当时简单化地上那么高的纲，尤其是后来广东省委结合反右斗争，批评、处分了一大批干部，则更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同意，广东省委对当时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复查、平反。此事虽早已时过境迁，但我总觉得有必要为当时受委屈的方方同志说句公道话。”（见同上，以及薄一波《方方文集》“序言”）我对薄老的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公道话，还历史本来面目的精神，深感敬佩，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这是完全符合叶剑英在广东工作期间正确地把实事求是应用到实际工作和干部工作中来，也是为叶剑英讲公道话的。我认为叶剑英、方方和当时广东是不存在地方主义的。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才能正确认识广东的历史发展，加强干部团结，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责任编辑：冯 生

# 改革开放中的姓“社”姓“资”问题

马 中 柱

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开拓、创新性质，故必须在看准以后敢闯、敢试，才能获得成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人不敢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们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路。因此，正确对待姓“社”姓“资”问题，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一个重大问题。

坚持具体分析，把不是姓“资”的东西，从资本主义概念中分离出来。

由于1937年以后近20年“左”的错误，使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混淆了敌我界限，而且混淆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界限，把许多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斥之为资本主义，使人处处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虞。只有把这些东西从资本主义概念中分离出来，才能减轻给改革开放造成的压力。

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并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制度。资本主义概念的这一内涵同它的外延是彼此对应、互相制约的。按照形式逻辑关于概念内涵和外延成反比规律，概念的内涵越少，其外延愈大；概念的内涵愈多，其外延愈小。所以，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没有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过去“左”的错误在逻辑上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任意缩小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以致使资本主义的外延不断扩大，把资本主义泛化。“文化大革命”以前，批判资本主义，往往把私有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外延扩大到个体小生产者、小私有者，扩大到社会主义改造后仅存的少量个体户。其实，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个体劳动者的私有制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

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sup>①</sup>而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私有制，是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被工业发展所加以逐步消灭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怎么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呢？正是由于把资本主义泛化，在60年代初期虽然出现了“包产到户”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只是形式上和个体经济有些类似，也和个体经济一起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疑我们农村的改革是“变相单干”，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源。也有人因拿不准它是姓“社”还是姓“资”，因此而忐忑不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把资本主义内涵减少到承认富裕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平等观上面，把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制都当成和资本主义差不多的东西，这就完全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了。社会主义只能消灭阶级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但不能消除由于劳动能力不同而产生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正如列宁所说：“……这个社会最初只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sup>②</sup>由于把社会主义平等观当成资本主义的内涵，自然又把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内涵，如是“大锅饭”、“铁工资”、“铁交椅”这些平均主义以至封建主义的东西，就被当成社会主义的金科玉律了。这种偷换概念的结果，至今还阻碍我们的改革，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是在利用资本主义“材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经济手段以及管理的方式方法，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把它加以利用。这些东西的属性随着它所属的社会系统的变化也会同时发生变化。正如人在地球系统中具有重量的属性，而到了太空以后，则失去了这一属性一样，商品、市场、跨国公司、股份制等等一旦被社会



主义采用，就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了。但是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有些人把这些东西当成资本主义的专利，谁使用这些东西，谁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使资本主义泛化，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淆起来的又一个突出表现。一直到现在不是还有人把计划经济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把市场经济当成是资本主义的，谁在改革中坚持市场取向，谁就是在经济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只要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发展市场，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要到什么程度。因为市场是商品交换的总和，没有不进行交换的商品。社会主义既是商品经济，也是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这等于倒退到高度集中的旧体制中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可见，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围绕商品经济运行所使用的经济手段、管理方式，许多是可以通用的；但又由于这些手段、办法分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商品生产体系，因而自然具有自身所属的这个商品体系的性质，再去问它姓“社”还是姓“资”，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商品运行中采取的经济手段和管理方式，凝结了他们的实践经验，有些是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规律的。所以，列宁说：“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东西结合的好坏。”<sup>④</sup>今天，我们能否加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把社会主义的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所采用的那些最新的进步的经济手段和管理方式结合起来。

## 二

坚持改革开放，就要加紧利用资本主义。

今天的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不发达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和压力下存在下去，自己不抓住时机使经济发达起来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经营管理

方式和方法，就不能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外国商人发生双边或多边的复杂的联系，大胆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使我国国民经济走上一条与国际紧密联系的新的道路。这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情况有些相似。那时由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我们党如果不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不能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打开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sup>④</sup>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于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把这个联系割断行不行呢？不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sup>⑤</sup>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阶段，随后在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于农业，实现初级工业化阶段，其速度明显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明显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西方学者如托夫勒、布热津斯基也不能不承认的。但是，到了第三阶段，即实现高级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城市化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停滞，效益不高，日用消费品匮乏，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不过西方发达国家等问题。这不仅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由于这种经济体制的封闭性，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实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最佳组合，而且也不能得到世界市场竞争的推动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出来。1989年以来，西方学者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适应于“信息时代”、“后工业社会”，必然“大失败”等澜言，正是由此而来的。其实，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于“信息时代”，而是在“信息时代”不应把自己封闭起来。在这个时代，各国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应通过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闭关自守，只能使自己越来越落后。所以，坚持改

改革开放，用资本主义之长，补社会主义之短，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项坚定政策，决不是什么搞资本主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失败后，为了振兴社会主义经济，也提出对外开放，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让出一定的经营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sup>⑥</sup>“通过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sup>⑦</sup>在国内，列宁主张容许私人贸易和准许私营工厂主开设小企业。列宁的这些主张，完全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这些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俄国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但是，在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很快被取消了。我国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也未主动打开国门，以致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状态，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同世界各国建立广泛联系，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引进外资，开办“三资”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国内，允许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扩大了劳动就业，发展了生产，活跃了市场。这些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使那些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性。

有的人总怕改革开放搞了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对改革开放的每一件事情都问姓“社”姓“资”，认为只有这样才合乎工农的“革命本能”，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事实上如果每项改革开放的事情都要问姓“社”姓“资”，那就只能使我们遇事迟疑不决或卷入无聊的空洞争论之中，什么事也不能去干，什么事也不敢去干。相反，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事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利用，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改正，这又有什么危险呢？列宁刚刚提出租让制时，有的工农群众由于对这个新事物不了解，担心它会给苏维埃共和国带来威胁和危险，列宁在给以解释时，称

赞过他们的“革命本能”和“真正的爱国主义”，<sup>⑧</sup>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当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行10多年，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徘徊不前的人，是否还属于工农群众的那种“革命本能”和“真正的爱国主义”，而不是一种“新的思想僵滞”呢？

### 三

坚持判断姓“社”姓“资”的主要标准，正确对待姓“资”的东西。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针对一些人在改革开放中，不敢闯，不敢试，害怕走了资本主义的路来说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只有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使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以巩固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所以，三个“有利于”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根本要求和主要价值取向。如果是三个“不利于”的东西，即使姓“社”，也要加以改革，以克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部分；如果是三个“有利于”的东西，即使姓“资”，也要加以利用，使其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才能不纠缠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而大胆在改革开放中抉择取舍。这里的关键是要坚持以三个“是否有利于”作标准来判断姓“资”的东西。例如，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有的人认为这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就离开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判断姓“资”的主要标准。“三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当然包含资本主义成分，外商独资企业和我们国内的私营企业也无疑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属性，但它们当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有利于吸收城乡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装备，促进经营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成长；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加快资源开发和利用，增加出口，扩大国家税源；同时，这些企业的发展，加强了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势必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样，它们确实

能起到三个“有利于”的作用，也就是起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作用。这里就有了一个矛盾：在现象上发展了某种姓“资”的东西，而在实质上却又发展了社会主义。但这个矛盾是辩证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相反相成。”在相反的东西中有了同一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是支配着其它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①“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条件制约下，它们的特点也是变了样的。它们同国外那些排斥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不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得力助手和有益补充。现在沿海地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他们“筑巢引凤”、“借鸡下蛋”、“借船出海”，这些“凤”、“鸡”、“船”，虽然不姓“社”，但却能为社会主义所用，那个地方引来的“凤”多、“鸡”多，“船”多，那个地方的现代化建设就搞得快，人民的生活就富裕得快，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坚定不移。

当然，这些外资企业的资本家和国内的私营企业总是想赚钱的，我们的工人要给他们提供剩余价值，我国社会主义企业要给他们让出一部分市场。有的人见了，就害怕这样是搞了资本主义。其实，有所得就必然有所失。这正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让他们获得廉价劳动力，获得良好投资环境，……借着这些经济上的让步来吸收资本，这是落后国家加速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列宁也说：“我们完全公开地承认，我

们并不掩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就是向资本主义缴纳贡税。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了时间就是赢得了一切。”②“缴纳贡税”、付出代价，这是无产阶级国家为了取得发展经济的时间和条件，而采取的主动行动，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而采取的灵活策略。这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对旧中国进行资本输出，肆意掠夺我国资源，使我们完全处于任其宰割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不能重蹈急于求纯的覆辙，企图在一个早晨消灭任何剥削以及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

有的人担心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发展“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就方便了他们把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这种担心也是没有看到发展“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所起的三个“有利于”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抓住时机把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改善加速了，不是更有利于反对“和平演变”吗？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把经济搞好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就能表现出自己的巨大影响力，使一切“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何况在我们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社会主义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它就会发挥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当然，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也会给社会主义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不开办这些企业，不能加快我国的经济的发展，那就更易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的影响。相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是受国家监督 and 控制的，它的一些消极的影响，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③ 同②第31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8页。

⑤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

⑥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页。

⑦ 《列宁选集》第4卷第501页。

⑧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93、12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⑩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8—479页。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范英

# 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特色

曹云华

几十年来，新加坡不单制造出一个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奇迹，而且也同时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精神文明。

## 一、新加坡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内容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按地区的特征来划分，可以有“东方文明”、“地中海文明”和“欧洲文明”等类型，以某种精神因素来划分，有“基督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类型，马克思主义者以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的标准，则有“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西方一些未来学家打破阶级、种族、地域等界限，用技术发展水平来划分文明的类型又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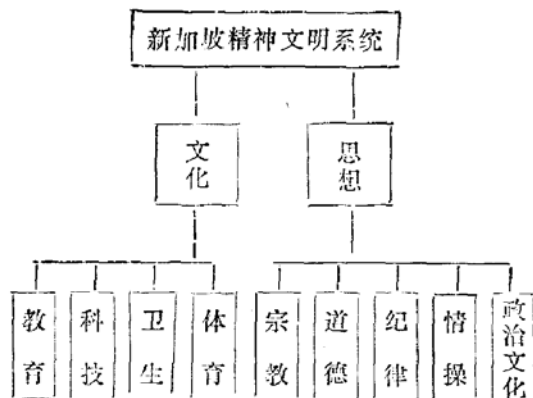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拿上述方法来对新加坡精神文明进行归类的话，就会发现其特殊的个性。从宗教的角度看，新加坡精神文明既不是纯基督教文明，也不是纯穆斯林文明或佛教文明，而是集三种宗教文明于一身；从地域的角度看，它既不是纯西方的文明，也不是纯东方的文明，而是将古老的东方文明与西方现代科技融于一炉，换一句话说，就是在技术上依附于西方，其精神则固守东方；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新加坡的精神文明与西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反映，然而，两者之间又有重大区别，新加坡领导人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信奉儒家价值观，因此，虽然在经济生活中坚持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又强调集体主义，反对过分的贫富悬殊，这种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二元性，在精神生活中也有突出表现。总之，新加坡精神文明是各种类型的精神文明的综合体，集各类精神文明之大成，这就是新加坡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第一，包容性。新加坡以宽阔的胸怀和高度的宽容接纳与消化各种文明，使各种文明在新加坡相安无事、长期共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世界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相互接触而产生文化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在近代，西方文明向非西方社会不断扩张，并且给非西方社会带来巨变。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明的扩张往往产生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热情的、宽容的接受；二是谨慎的、有保留的接受；三是愤怒的、有抵触的接受。新加坡则是持第一种态度，其精神文明的包容性有如下几个层次的内涵：（1）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和平共处；（2）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亚洲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并行不悖；（3）英语、华语（即汉语）、马来语和谈米尔语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互相补充；（4）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西方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但又各自保留本民族的习惯、语言和价值观，谁也不吃掉谁，谁也不融化谁。

第二，开放性和世界性。新加坡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岛屿，其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开放的港口，1955年独立后又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海岛城市国家。所谓开放，就是不排斥、敞开大门。当今世界主要种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当今世界主要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当今世界主要语言——华语、英语、马来语、谈米尔语（即印度语）都汇集在这个岛国，并且彼此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难怪人们称新加坡为世界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大观园。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新加坡精神文明定义为世界性的精神文明、多元性的精神文明、复合型的精神文明。

与人类社会其他类型的精神文明一样，新加坡的精神文明由文化和思想两大系统组成，而在这两大系统下面又有若干子系统。



在文化方面，新加坡的教育比较发达，识字率达99.1%（1990年）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为170人（1987年）；新加坡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高技术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新加坡的卫生事业也遥遥领先于其他亚洲国家，每张病床负担的人口为295人（1937年），每个医生负担的人口为747人（1937年）。

在思想方面，多元宗教在新加坡精神文明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三大宗教均在新加坡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对各种族人民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一直在发挥，而且将继续发挥重大影响。新加坡的社会道德水平比较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加坡政府的廉洁；二是良好的社会风尚；三是新加坡人具有较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新加坡人民还培养形成了守法和守纪的良好习惯。新加坡还塑造了独特的政治文化。此外，新加坡人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各种族人民在建国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旧的国家认同，培养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树立了做新加坡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据新加坡政策研究院1989年的问卷调查，有84%的人对身为新加坡人而感到自豪。总之，新加坡精神文明在思想方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特色也主要表现在思想方面，尤其是表现在多元宗教、政府廉洁、良好的社会风尚、守法和守纪等上面。

##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与精神文明

人们常说，新加坡的经济奇迹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及其政府伸得长长的“有形的手”捏成的，其实，现代新加坡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绝对离不开这只伸得长长的“有形的手”。行动党及其政府有两只伸得长长的

的“有形的手”，一只手捏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另一只手则捏出了现代新加坡精神文明。这双手不存在那一只手长、那一只手短，那一只手强、那一只手弱的问题，它们相互配合，同时操作。

### （一）新加坡领导人的精神文明观。

新加坡领导人有时候也使用“精神文明”一词，例如，李光耀在1988年10月23日举行的“环球策略研讨会”上就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人民必须有一定的精神文明，以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前进”。<sup>①</sup>但是，新加坡领导人使用得最多的是“文化”或“精神生活”的提法，例如，吴作栋在1990年11月28日就任总理时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提到，他将在继续强调经济成长的同时，“也重视价值观和文化”；外交部长兼社会发展部长黄根成在1990年5月举行的“国民意识周”活动中说，我们要塑造一个全体新加坡人共同拥有的“新加坡文化”，但是，“新加坡文化不是一朝一夕或短时期内可以形成的，我们或许要等到100年或200年后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新加坡文化”。<sup>②</sup>一些领导人在许多场合也使用“精神生活”一词，并且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李显龙在“1990年世界华文书展”开幕式上的致词中说，“今天的新加坡人已丰衣足食，在满足物质需求之后，就应当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以‘品管时代’进入‘品味时代’——意即能对文化艺术详细欣赏。”<sup>③</sup>

新加坡领导人在新加坡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进入80年代后，比较自觉地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象抓经济起飞那样花大力气抓精神文明建设，新加坡前总统薛尔斯曾这样指出：“卓越的经济成就，并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条件，如果我们被世界性的诱惑所屈服，就是伟大的文明也会崩溃。因此，我们必须强化社会的道德结构，才能明智地去处理我们的物质遗产”。<sup>④</sup>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在新加坡加强精神文明方面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由以下几个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是为了保证新加坡的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一般而言，现代化指的是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以及教育、文化和科技的发展。然而，对于象新加坡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又包含着一些特殊的含义。从目的方面看，类似新加坡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现

代化具有“适者生存”的特殊内涵，即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非西方国家不迅速实现现代化便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这种现代化是一国适应其四周环境变化，为求生存而作出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由于西方国家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如果自己仍然不变，便有受威胁甚至灭亡的可能，因此，便酌量采取西方国家的长处，尤其是采用其先进的科技来巩固本身的地位，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持本身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换一句话说，现代化的目的，并非放弃自身的独立地位及传统，完全去吸收另一个系统的一切或被该系统彻底吸收过去。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上述特殊内涵正是新加坡领导人关于新加坡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他们反复强调，新加坡的现代化决不是“西化”，新加坡决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是很危险的，它会导致新加坡失去民族的根，失去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变成一群失魂落魄的仿西方人，最终给新加坡带来灾难。为了避免上述危险，新加坡领导人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引进最大范畴的西方工艺及制度的同时，对本国的文化传统作最小限度的修改或扬弃，使新加坡不致沦落为一个邯郸学步的“仿西方社会”。新加坡领导人的结论是加强以东方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塑造具有自己特色的精神文明，以此来抵制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和腐蚀。吴作栋早在1985年在美国一所大学主办的“新加坡会议”上的讲话中便提出，“保留东方社会特色，能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需要东方价值观，不只因为它给予我们一种历史和未来的观念，让我们知道从何处来，也因为这些价值观在今日仍旧适用。它将协助我们，共同渡过这个改变迅速、经常令人混乱的世界”。<sup>⑤</sup>因此，吴作栋表示，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都会变，但东方价值观——关系到新加坡生存和发展方向这个东西决不会改变和绝不会腐化，为了保证东方价值观不受西方价值观的腐蚀，新加坡领导人一再表示，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和公民教育上，尤其是要使新加坡儿童在健全的价值观念的熏陶下成长，通过这些方式“保存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并维护代表新加坡精神的某些共同价值观，这样才不会迷失我们的方向。”<sup>⑥</sup>

其次，是建设一个“卓越国家”和“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早在行动党执政之初，该党和政

府便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该党1959年制定的施政方针指出，“我们发动的政治和经济革命，必须由文化革命来支持和加强”。<sup>⑦</sup>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完成，行动党及其政府更加意识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且把塑造具有自己特色的精神文明作为建设“卓越国家”和“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黄金辉总统在1989年的施政演说中把改善国人的生活、制定国家意识、巩固政治稳定、协助低收入同胞和加强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社会的和谐等作为建设卓越国家的基本内容。黄金辉认为，改善国人的生活不单意味着新加坡人应该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即有一份能发挥个人专长，而又有良好的待遇的工作，每一个家庭有一所舒适的住宅，每一个儿童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他们也应该过着有意义而又充实的精神生活，“在解决了基本生活的需要之后，我国人民今后应该可以多从事文化和艺术的活动。这样，我们不单是有知识、有用的公民，同时也是有文化、有修养、身心平衡发展的人民。”<sup>⑧</sup>在这个施政演说中，黄金辉向新加坡人民提出了“创造精神与物质并重的美好生活，使新加坡成为卓越国家”的长远目标。

再次，塑造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精神文明也是由新加坡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新加坡具有移民社会，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社会，开放社会、高度都市化和工商业社会等特点，这些特殊国情的优点很多，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在移民社会下，人民与土地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很难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缺少深厚的爱国主义热情，人民如同浮萍，存在着“东家不打打西家”，“人生处处有青山”和“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等移民意识和流动习惯，这些意识和习惯就象一种腐蚀剂，侵蚀国家的凝聚力。由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社会因为远离其文化中心，所以较少受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这固然是其优点，但是，也正是从这个优点中产生出一个缺点来，即它新一代既没有自己的祖辈那样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又未形成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从而形成严重的道德与价值真空，正如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是一个新社会，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人民不需要消耗太多的时间去废除旧的框框，但是，由于新加坡缺少传统的模式，人民各有所为，要大家都同意某种新的模式，一时不容

易收到成效，这也是树立新风气一定会遇到的难题。”<sup>⑩</sup>又如，高度开放、高度的都市化和工商业化的，固然使人民富有进取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有利于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但是也由此而产生一系列弊端，诸如崇尚物质和金钱，重利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冷漠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各种社会问题丛生，犯罪率上升，西方各种腐朽萎靡的东西很容易通过开放的渠道渗透进来等等。针对上述特殊国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塑造具有自己特色的精神文明是与实现经济起飞同等重要的任务，是克服特殊国情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的唯一途径。

此外，它也是由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的特殊进程所决定的。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的特殊性表现为时间短和“三个拿来”（指资金、技术和人才三个方面均主要从西方引进），第一个特点所带来的弊端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变化，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未做好准备，一下子适应不了，人们刚刚摆脱贫困和进入现代化，因此很容易产生那种过分强调物质生活、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等弊端；第二个特点所带来的弊端是国门洞开，西方社会中许多消极的东西乘虚而入，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则不加鉴别地统统接受，从而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对上述两个特殊性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新加坡领导人承认，在开始时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一段时间过分强调物质生产和经济增长，道德问题常被忽视，认为不必通过特别的行为指导，就可以使年轻一代成长为诚实、苦干及奉公守法的公民，能够象他们的祖辈那样具有献身精神和以国家、社会为重。但事实并非如此。李光耀承认，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我的现代化政策给新加坡带来了繁荣，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家庭分裂。”为了克服这些消极现象，李光耀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充实和丰富国民的精神生活是摆在新加坡政府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最后，新加坡领导人还把塑造独特的精神文明提到人类的福祉和相处的立场这个高度来认识。他们认为，<sup>⑪</sup>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要有它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不能单凭法律的制裁。同时，道德建设应与科技、文化教育同步发展，

然后才能促使社会的迅速进步。如果单纯片面地把科技和文化教育发展上去了，而道德建设跟不上，人类就不免要蜕化为弱肉强食、野蛮粗暴的原始社会。

（二）行动党及其政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担当。

行动党自新加坡1959年自治以来至今，一直是执政党，行动党在李光耀等人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极为稳定有力的政治领导层，这个政治领导层不单对经济起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是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领导者、策划者和参与者。

长期以来，行动党及其政府始终紧紧地掌握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权。行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十个工作委员会中，与精神文明建设直接有关的有四个，它们是：教育委员会、社交与康乐委员会、奖赏委员会和出版兼宣传委员会。在政府内阁，与精神文明建设直接有关的部有教育部、社会发展部、交通与新闻部。1990年底，新加坡政府为了促进文化、艺术和人民的其他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新设立了新闻与艺术部，该部部长杨荣文表示，设立该部的目的就是加强了政府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今后，新闻与艺术部将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建设卓越的新加坡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行动党还通过其他一些途径实现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例如，牢牢控制各种社区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等社会成员机构；制定各种方针与政策，如语言政策、教育政策、宗教政策、文化政策等等，为精神文明建设确定方向。

由于行动党及其政府的领导极其稳定有力，所以，其领导人便形成了一种策划心态，即指任何工作的开展都要经过事先的周密策划，然后付诸实施。各种策划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政治领导层必须由精英人物组成，从而保证策划的可行性、预见性和指导性。新加坡领导人这种策划心态，不单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规划运作，而且也表现在精神文明的塑造上面，如制定教育计划、文化发展计划等。例如，成立不久的新闻与艺术部在1991年初推出了一个文化发展计划，该计划书说，发展文化、艺术与体育是新加坡现代化建设的另一个领域，制定计划的目的是为新加坡人今后的精神生活的发展订立目标和进行正确的导向，这个目标和导向就是要在不久的将来

来,通过各种途径,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活力十足、文化气息浓厚和刚强勇猛的理想社会”,“一个有特色,又宽容尔雅的国家,一个人人互敬互重,生活充实而又有同舟共济精神的国家”。该计划书规定,要在近期内实现以下几个具体目标:(1)普及艺术;(2)培养民众的读书习惯;(3)大力发展电影业;(4)加强政府对艺术工作的领导;(5)发展大众体育等等。

行动党及其政府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新加坡领导人号召和要求人民要做的,他们首先自己身体力行,如带头参加文明礼貌运动,带头参加植树运动,带头廉洁奉公,带头守法。

(三)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方法与途径。

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塑造具有自己特色的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与经济建设的目标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生存。但是,这种生存是更高层次上的生存,即为了使新加坡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亚洲社会和亚洲价值观,使新加坡永远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而屹立在东方,确保新加坡继续茁壮繁荣。为此,新加坡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塑造新加坡精神文明的任务,这种精神文明从实质上看应该是卓越的,具有竞争精神的,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从形式上看,它又是包容性的,即融合世界各类文明的精华的新加坡文明。建设卓越的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方法与途径包括:

1. 保持和弘扬亚洲价值观(或叫东方价值观);
2. 推行多元宗教政策,充分发挥和利用多元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功能,限制其政治功能;
3. 建设一个高度廉洁的政府,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奉公和守法的道德形象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并且带动道德重塑运动;
4. 通过社会控制与动员,综合治理社会问题,进行道德重塑运动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5. 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在全体国人中树立与培养做新加坡人的光荣感与责任感;
6. 塑造独特的政治文化;
7. 努力发展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

### 三、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国精神文明是该国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影响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般来

说,当代人类各种类型的精神文明的形成、演变和发展都离不开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三是各国文明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四是一国统治阶级和人民的进取精神。对于新加坡来说,上述四个条件都是十分充分和完备的,前两个条件为新加坡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第三个条件赋予新加坡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以充足的营养,使新加坡精神文明能够突破时空和国界的限制,从各类精神文明中吸收营养和精华。第四个条件也是塑造新加坡精神文明所不可缺少的。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在以下几种状态下最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1)建国初期。一个国家刚刚取得民族独立时,从统治阶级到人民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这种状态下最能激发人们的斗志,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因此而为之一新;(2)当一国处于重大的历史转变关头或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时刻,如法国的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在这些时期,最容易激发人们的斗志,全社会最容易达成对某个问题的共识;(3)当一个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例如,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看,17世纪以后的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后一段时间内就曾经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奋发向上的阶级,它以充满人间激情和兴奋的姿态去整理全部历史遗产,继承先前一切文明的成果,把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1959年实现自治至今30多年的时期内,正是新加坡统治阶级和人民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历史时期,他们正处于上述三种最佳状态之中。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资产阶级已处于没落阶段,但对于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家来说,资产阶级仍然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

新加坡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依赖以上四个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所共同依赖的条件之外,新加坡本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对独特的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首先是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是一个岛国,是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地带,是国际大洋航线的枢纽。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新加坡精神文明是一种与内陆完



全不同的海洋文明，它为各类精神文明在新加坡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地理环境。事实上，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谁也不可能阻挡外来文明的进入，而只能采取顺其自然和消化、吸收、改造的积极态度。

其次是特殊的历史。新加坡从16世纪开始至1959年自治，一直处于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长期的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对新加坡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两重性的：一方面，殖民主义者对亚洲各种族实行种族分化和残酷的剥削、压迫，阻拦亚洲各种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文化与教育；另一方面，它又不自觉地把西方文明中的各种进步因素带进新加坡，促使亚洲各种族改造自身的文明。正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长期统治，客观上使东西方文明、三大宗教文明在新加坡才有可能进行正面的、直接的碰撞、渗透和结合，从而为一种新型的精神文明——新加坡精神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前提。

最后是特殊的社会。新加坡社会具有移民社会、多元种族社会、高度城市化社会、工商业社会、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等五个特质，这些特质为新加坡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例如，新加坡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社会赋予其人民许多特殊的性格，主要有冒险精神、开拓与创业精神、乐观进取精神、讲求实际的精神、节俭勤奋精神等，这些移民社会特有的移民精神是塑造独特的新加坡精神文明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构成了新加坡精神文明的许多重要内容，目前，新加坡领导人倡导的“新加坡精神”和“共同价值观”，实质上就是上述移民精神的再造和发扬光大。又如，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这是新加坡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塑造新加坡精神文明的特独环境。在新加坡这样的社会，没有封建传统的束缚，没有森严的社会等级和门第，没有世袭特权，也没有使人窒息的封建精

神枷锁，人们日子过得好坏不取决于一个人的门第和等级，而是看他是否会干和肯不肯干。这个特点又决定了新加坡是一个各阶级之间互相开放的社会，新加坡虽然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可是这些阶级并非是门户封锁、世代相传的，每一个人不论其出身贫富贵贱，均可通过公平的竞争，根据各人不同的成就，取得其所应得的社会阶级地位。这种阶级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对渴望改善自身环境的人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在这种环境下，谁还不拼命往上去奔呢？比较一些国家封建主义对个人的长期禁锢和束缚，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加坡早期移民奋发图强、努力进取的拼搏精神与干劲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之间公平竞争，重视个人的成就，成功者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奖赏，因此，这是一个比较公平且合理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下，有利于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培养和树立健康的、向上的精神面貌，有利于该社会整个道德水平的提高。

- 
- ① [新]《联合早报》1988年10月26日
  - ② 同①，1990年5月20日
  - ③ 同①，1990年5月26日
  - ④ [新]《新加坡》1981年4月号第43页
  - ⑤ 同④1985年总第227期第12页
  - ⑥ 同①1989年1月10日
  - ⑦ [新]《行动周刊》1980年1月9日号第10页
  - ⑧ 同①1989年1月10日
  - ⑨ 同④1981年总第172期第43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范英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先驱者——卓炯

——纪念卓炯教授逝世五周年

梁 钊 李鸿生

卓炯教授是我们尊敬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离开我们已整整五年了。然而，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以及他坚持真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们为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再上新台阶而不断开拓、奋勇前进。

## 一

卓炯1908年出生于湘西山区慈利县一户贫苦的矿工之家。1924年，16岁的卓炯考进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初师毕业后，投奔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到湖南常德三中读高中。期间，由于思想进步，被反动当局视为“异党分子”而逮捕入狱，经同学家长担保才获释放。

1931年，卓炯考进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毕业后，又考进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研究生。此间，抗战爆发，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参加了进步团体“救亡呼声”社，后被吸收进中共外围组织——“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1939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党组织安排在第四战区（后改为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新建设》、《阵中文艺》等杂志任编辑，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抗战胜利后，卓炯又积极支持和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告密，面临被捕的危险。党组织通知他离开广州，取道香港到泰国。

1946年，卓炯出任泰国华侨中学——南洋中学校长。当时，国民党在泰国的反动势力视华侨和华侨中学的民主运动为肉中刺，眼中钉，进行一系列的迫害和破坏，导致了卓炯和南洋中学近30名教师于1948年6月15日被泰国当局逮捕，并以“不受欢迎”等莫须有的罪名，判为“自由出境”。9月，卓炯和一批进步师生一起离泰返国。在云南省思普地区与当地的地下党的同志一起，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3月，任云南省人民反蒋自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卓炯奉命调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5月起，先后在南方大学、华南分局宣传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宣传和教学研究工作的。

## 二

卓炯不仅在政治上为追求真理而奋斗，在学术上也为追求真理而不断探索，成为我

国最早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早在30年代读大学期间，卓炯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和《资本论》等。与政治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40年代，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在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启发、影响下，钻研《资本论》，倾心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写了不少关于劳动价值学说的思考笔记。

基于长期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50年代中期，当全国开始学习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卓炯就感到，能够贯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仍然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开始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思想。1959年，他针对“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取消商品的错误思潮，勇敢地研究宣传“商品万岁论”，他认为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产生和存在的普遍性，商品经济将会长期存在。他运用价值规律的普遍性和不可逾越性，对当时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作了独到的阐述，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1961年在《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一文中，提出“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下，不管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主义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见厦门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5—6期）。在我国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

卓炯的商品经济论，着重研究社会化的“扩大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进行广泛交换，取得规模经济效益的商品生产。他的“社会分工论”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突破对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生产原因的传统解释所遇到的难题，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禁区，并给予合理的说明；二是以社会分工说明商品一般性质，以所有制说明商品的社会性质，这就把商品生产的一般与特殊统一起来；三是摆脱所有制对商品生产原因的束缚，消除了把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赋予商品经济普遍性的地位；四是社会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形式，以社会分工说明商品生产原因，这就把商品经济学建立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

卓炯是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敢于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某些框框，表现出勇敢、严肃的科学精神。然而，卓炯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点，在当时却视为异端邪说，“搞修正主义”，受到不公正的舆论谴责和强词夺理的批判，答辩的权利被剥夺，著作的出版计划也被取消了。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卓炯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列为专政对象，受到野蛮的批斗，遭受种种的折磨和凌辱，几乎被迫上绝境。但面对逆境，卓炯并没有气馁，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坚持以党的事业为重，实事求是、无私无畏、不怕挫折、不怕攻击，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深入探索，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高风亮节。正如卓炯自己所说的：探索真理，寻求正确的观点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要使自己

的观点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探索真理是不能计较个人成败的。他的这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无私无畏，不随风转的精神，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赞扬。

粉碎“四人帮”以后，年近古稀的卓炯，更加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专著。他从“社会分工论”出发，一再阐明商品经济的普遍性和不可逾越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他于1979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他指出：“长期以来，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当前一个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其实，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当前，当我们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时候，重温卓炯以上论述，无不为他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真知灼识所折服。我省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的一种社会经济运行的形式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推动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特别重要的杠杆。

卓炯在深入探讨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同时，还深入探讨商品生产内在本质——价值规律。发表了“价值规律论”、“对价值规律的再认识”、“试论价值规律的二重性”、“价值规律与四个现代化”、“经济效果与价值规律”、“论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从经济实践看价值规律的作用”、“从广东物价回降看价值规律的作用”等20多篇论文，对价值规律的内涵与功能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见解。他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就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因此，怎样认识价值规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正确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卓炯反复阐明的价值规律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一、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一般与特殊两重性质；二、价值规律既是单一性规律，又是综合性规律；三、价值规律具有多种涵义的功能。他特别强调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国民经济必须按比例进行，正确遵循和运用价值规律就包含了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客观上并不单独存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斯大林提出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把它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是他的产品经济理论的产物。卓炯同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再阐明：计划是主观的，市场是客观的，对市场的调节搞好了，计划也在其中了，自觉地保持平衡，就是计划性。

早在80年代初期卓炯就提出：“我的看法，根本问题不在于中央管得过多过死，而在于这个体制是根据产品经济的要求，而不是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见《把产品经济体制改造为商品经济体制》，《学术论坛》1981年第4期）。他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即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问题应该

是破除产品经济体制。因为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端是，在财政体制方面是无偿拨款；在物资体制方面是产品调拨而不是商品流通；在企业体制方面是财政统收统支，企业无权无责；在工资体制方面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计划体制方面是自上而下，集中统制过死和主观主义；在流通体制方面统购包销；等等。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完整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半商品经济半产品经济的体制。

至于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四个转化”，即由行政管理向经营管理转化；由吃“大锅饭”向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转化；由财政拨款向银行贷款转化，要特别重视银行的作用与功能；由死板价格向灵活价格转化。全民所有制与商品经济体制并不矛盾，全民所有制必须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

实践证明，卓炯一生孜孜不倦致力研究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发挥了理论先导作用。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发达商品经济的普遍性高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殊性之中，把改革开放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市场导向，高度重视市场，面向市场，自觉遵守和运用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整个经济运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同志提出：“在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首先是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先行，并且贯彻始终。卓炯同志和广东的一部分经济理论研究人员，从60年代初就不屈不挠地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广东的党政领导一直强调价值规律这个商品经济的核心。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中，他们都旗帜鲜明，并且努力贯彻到实践中去。”今年3月19日，广东理论界举行纪念卓炯诞辰85周年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同志，因出席全国人大，未能到会，特致信会议，高度赞扬卓炯的高风亮节和对我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作的卓越贡献。卓炯同志无愧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先驱，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早在6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与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阐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许多有创见的理论观点，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明，为党政领导的决策所采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鉴于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突出贡献，1985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省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在1987年6月中国共产党广东省代表会议上，卓炯当选为广东省出席党的十三大代表。

### 三

卓炯不仅在学术理论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文品和人品的统一上为广大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

面对党和人民的肯定和赞扬，卓炯从没有沾沾自喜，居功自傲。当他不惜承受20余年批判压力所坚持的商品经济理论终于被采纳时，他也只是谦虚地说：“我的研究工作终于跟上了党的步伐了。”他对于过去和现在与他不同观点的同志，从不抱任何偏见。无论

任何人对他的观点提出商榷，他都坚持以理服人，做到有学术之争，无门户之见，更无恃理傲人。

卓炯向来热爱青年，关心青年的成长。早在泰国南洋中学任校长期间，尽管当时学校经费不很充裕，但为了鼓励华侨青少年入学读书，卓炯一直主张实行低学费和灵活的学制，使许多贫苦华侨子女得以就读。

卓老晚年有一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生的价值可以增殖。”他在勤于钻研的同时，竭力于培养青年，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在年轻一代中延长，使人生的价值不断增殖。他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和研究员期间，和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授们一起，招收数批研究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经济理论研究人才。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他热情关心青年自学者，千方百计挤出时间为他们阅改习作。1986年，年近八旬的卓老在参加“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粤港关系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期间，尽管研讨会议程安排得很紧，白天开了一天会，十分疲劳，但他仍利用晚上时间，为湖北鄂城钢铁厂一位叫余世光的自学青年阅改习作。类似余世光这样向卓炯求教的学生，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学生们绝大多数没有见过卓老。他们象余世光一样，把自己的习作寄给卓老。卓老对每篇习作都认真审阅，有的提出意见，有的精心修改，然后向报刊杂志推荐。仅1986年第一季度，近80高龄的卓老，阅改全国各地青年自学者的习作就达五六十万字。人们高度赞扬卓老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称赞他在广东办了一所“业余财经学院”。并对他以此来使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断增殖的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

不幸的是，1987年6月24日下午，他因肺心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未能出席党的十三大，但他那一代宗师的崇高品德和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发扬和学习他勤奋严谨、一丝不苟的自学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学习他一心扑在事业上，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同志、关心青年的民主、宽厚、团结的精神，为繁荣社会科学事业，为繁荣经济理论研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郑英隆

# 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刘 鸿 儒

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三项改革要在今后十年内放在重要位置，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二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三是医疗制度改革。这三项改革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积极推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对于安定社会，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引导消费方向，调整消费结构，减轻国家财政压力，深化劳动制度改革和企业改革，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在战争年代供给制的基础上，参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1951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后几经修订补充，初步建立了养老、医疗、工伤、待业等保险制度，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保险制度已不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1984年，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全民企业和县以上大集体企业的养老保险费用实行以市、县为单位的社会统筹。到目前为止，全民企业职工养老费实行社会统筹的市县已达2270多个，占全国市、县总数的93%，参加统筹的职工5000多万人，退休职工1000万人。其中福建、江西、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实行了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的统筹。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养老费用以市、县为单位实行社会统筹的也达1400多个市县，占市、县总数的58%。对职工养老费用实行社会统筹，缓解了企业间负担畸重畸轻的问题。

第二，对于新招合同制工人，实行了个人交纳一部分养老费用的制度。自1983年以来，对新招收的合同制工人，开始按照本人标准工资3%的比例交纳养老保险费，职工所在单位按照工资总额的15%交纳。

第三，初步建立了国营企业职工的待业保险制度。国营企业按职工标准工资的1%交纳保费，使职工在待业期间可以获得待业救济金和医疗补助费。

第四，在社会保险方面开展了一些改革试点。如在福建、上海、大连、安徽等地进行了以个人交纳一部分保费为主要内容的集体、个体、私营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试点；在全国102个县进行了把救灾和社会保险结合在一起的农村救灾保险试点；在四平市开展了国家机关干部公费医疗保险试点；此外，全国还有8000多个村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等。

几年来，我们虽然在社会保险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只是初步的，深层

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迫近，有些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一是保险费用完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长此以往，难以为继。在现行的保险制度下，职工在职期间，不承担交纳保费的义务，这种由国家完全包下来的办法，随着退休人数的不断增加，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如1978年以前，全民企业和县以上大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费仅17.3亿元，到1989年增加为375亿元，增长21.7倍，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到2000年这部分费用将达1100亿元。

二是没有建立长期积累的养老储备金，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没有建立养老储备基金，而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极为迅速。1978年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大集体所有制企业退休人员314万人，只相当于在职职工的3.3%，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之比是30：1。1989年退休职工达2200万人，相当于在职职工的16.9%，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之比为5.9：1。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之比将为2：1，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将遇到严峻的挑战。

三是社会保险覆盖面窄。我国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只对全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大集体企业职工实行，待业保险制度也只是对全民企业职工实行。区县以下的小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者以及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都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而国家并没有对他们建立养老、医疗和待业保险制度。农民的养老问题，今后走什么路子，现在也不够明确。

四是在管理体制上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部门之间争办保险、扯皮现象比较严重，缺少监督机制，往往是部门自己制订办法、自己执行，在资金管理上存在占用、挪用、浪费等问题。

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就算是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保险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北欧福利国家，也在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困扰。在今后五至十年中，我们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面，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力度，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主要是区别不同情况，逐步建立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国营企业职工，在完善现行社会统筹的同时，引入个人缴纳的投保机制，逐步建立按人帐户储存制，由单位和职工按一定法定比例交纳；对城镇集体职工，逐步建立社会统筹和按人储存积累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对“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和私营企业主、城镇个体劳动者，建立费用由个人交纳、按人帐户储存积累和互济基金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在富裕农村，建立费用由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养老保险制度。

待业保险改革，要从全民企业职工扩大到集体企业和其它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职工。

（下转第33页）



# 发展山区保险业，促进山区经济腾飞

——梅州市的实践与思考

卓春先

梅州市自1936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特别是1934年保险机构分设以来，山区保险服务领域不断扩大，保险业务迅猛发展。国内外保险业务险种，由开始时的几个发展到现在的60多个。全市保险业务发生数在“七五”期间翻了三番，年平均递增52%，高于全省平均增长速度13个百分点。1991年又比上年增长39.9%，比省平均增幅高8.3个百分点。现全市共有2100余家企业、31万户家庭、2.5万辆机动车和20万公顷山林参加了财产保险，170余万人参加了各种人身保险，全市受到保险保障的人民生命财产总额已达128亿元。保险业务发生数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1.52%，在全省居第三位。1992年，梅州保险业迅猛发展的势头丝毫未减，1至5月，保险业务发生数已达42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8%，全年业务总量可望突破亿元大关。

保险业的迅猛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八年来，市县保险公司办理各种保险赔付案件近8万宗，为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的保户提供经济补偿1.1亿元。特别是1986年，仅一次7号台风灾害，保险赔付就达610万元，是当年企业财产保险费收入的3倍半。1991年，我市又给遭7号台风暴雨袭击的梅县胶合板厂、丰顺木器厂等以及兴宁东岳宫市场、柴油发电厂等21起企业火灾案等赔款给付2928万元，比上年增长51%。通过及时组织经济补偿，使受灾企业和家庭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全市保险系统还通过储蓄性的寿险业务，集闲散资金1亿多元，通过业务经营，给国家上交税款500多万元，为防灾救灾和社会福利捐款100余万元，给县或乡镇企业投资1000多万元，为山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91年梅州市保险公司夺得省某险系统劳动竞赛综合评比第一名和多个单项竞赛的名次，并被省授予“广东省百家企业

劳动竞赛先进单位”称号。

梅州山区保险业的迅猛发展，消除了近年来人们对贫穷山区能否迅速发展保险业的疑虑，证明了山区保险业不但应当发展，而且能够发展。目前，我国进入了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今后发展山区保险业的路子该怎么走，怎样充分发挥保险在山区经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排忧解难、增氧鼓劲的作用？笔者认为，必须着重解决好如下三个问题：

## 一、解放思想，进一步提高对发展山区保险业的认识。

经过近年来的争论和实践，“越是贫穷的地方越需要保险”已成为越来越多领导和群众的共识。但在别的问题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有的认为保险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怀疑能不能长期办下去；有的认为保险公司是赚钱的，担心“保险越发展，群众越吃亏”；有的部门或领导总觉得把钱攥在自己手里用起来方便，害怕投给保险公司失去了自己的权威。对林木火灾保险、家财两全保险等，一些单位或部门也不重视、不支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对保险意义和作用的认识，统一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思想。应着重从三个方面统一认识：一是认识保险业是人类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完善、有利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完全可以借鉴、吸收和运用世界各国先进、科学的手段去强化和促进经济加快发展。二是认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险公司也是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它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完全受平均利润规律制约的行业，而是国家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发展国民经济和安定社会生活、增进人民

福利所设置的调节、互助的服务机构,这是社会主义保险业与资本主义保险业的本质区别。我们要充分认识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明确保险事业越发展,企业和群众得到的保障服务越多,得益越大。三是弄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在经济工作中必须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的职能是政策管理,要摆脱具体的事务。国家既然已经设立了办理保险的专门机构,就应该把危险和责任转嫁给它。这样更有利于党政机关精简机构,集中精力管全局抓大事。各级保险公司也要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理直气壮拓展业务,责无旁贷开办符合山区实际的新险种,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务。

## 二、把握机遇,着眼山区实际拓展业务。

山区特点是人口多,农林业生产比重大,今后随着扩大开放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三资企业将大幅度增加,劳力密集型产业也将逐步从沿海特区向内地山区转移。可以预料,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山区保险业都必须坚持以发展业务为中心。目前,要特别着重抓好人身保险、农业保险和涉外保险三个重点:

人身险业务是我市保险业的大头。近年来,我市人身险业务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数。1991年全市人身险保费储金收入4185万元,占全省人身险业务收入的6.4%(产险业务收入只占全省的2%)。在一些富裕地区遭到冷遇的简易人身保险,继续受到我市城乡群众的欢迎,投保简易险的群众达70万人,占全省投保人数的十分之一;学生平安保险承保率已接近100%,附加住院医疗险正由城市企事业单位向农村辐射,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各种养老保险等,都呈大步发展势头。当前人身保险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拓展业务。通过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层次多样化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保险需求也随之增大了。因此,山区农村的保险必须从过去以简易险为主过渡到简易险、养老险、医疗险并重,并不失时机地拓展子女教育婚嫁保险、老人长寿保险等业务,简易险本身也可以增加份数,提高保额。这样,便于不同经济层次、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选择自己需要的险种,使山区群众一生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相应的保险

保障,解除对生老病死的后顾之忧。二是增设网点,增加保险从业人员,要特别注意配备专业人材,三是要加强人身险的管理,特别是对各种养老险等长期业务的管理。群众投保养老险最大的顾虑就是怕时过境迁、保险失效,怕几十年后不知到哪里去找保险公司。因此,要多作宣传,打消这种顾虑,并可采取三五年公布一次投保养老险人员名单或检查一次养老险证的办法,取得群众的信赖。同时,人身险的赔付要进一步简化手续、缩短时间,使群众在最急需钱的时候能得到保险赔付。

与人身险业务相反,农业种植养殖保险,目前在梅州却是一个弱项。从本身的业务发展看,1991年农险业务发生数只有93万元,还不到全市业务总量的1%,与我市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7%不相称;同全省农险业务相比较,我市农险业务量只占全省的1/83,与我市山林土地面积占全省的1/13不相称。因此,必须加快农险发展。发展山区农业保险的关键,是要根据山区实际设计、开办新的险种。现在我市农业种养殖险种,主要是林木、烟叶、鳃鱼保险及少量的耕牛、生猪保险。而山区种植最多的水稻、花生、黄豆等农作物和沙田柚、柑桔等果树保险,都几乎是空白。去年12月下旬的严寒,使我市果树(特别是香蕉、龙眼、荔枝、青榄)遭受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霜冻,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市受灾面积达6.5万公顷,经济损失1.39亿元。这次严寒也给我市农业保险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思路。过去我市农险主要保水灾、风灾、火灾、冰雹等责任,没有保霜冻的。今后,有必要开办保霜冻责任的险种,以利水果生产的稳定经营和发展。另一方面,山区农业保险在经营管理上,必须走“同舟共济”的路子。农业生产一旦受灾,往往面积很大,赔付率很高。国家对农业保险虽然给了一些优惠政策(如农险业务不征营业税),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补贴。因此山区农险往往出现“两难”现象,费率订高了,农民群众交不起保险费,业务难以发展;费率低了,赔付率过高,保险公司难以经营。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走“同舟共济”的路子,即采取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两家甚至加上农民三家合作共保的形式,将保险公司、当地政府和农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既可减少保险公司的压力,又可适应政府转变职能搞好服务的

新形势，还可克服农民的依赖心理，更好协调矛盾，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一体，使农业保险健康向前发展。

随着梅州侨乡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三资”企业逐年增多，外贸出口大幅增长，山区的涉外保险越来越显得重要。当前我市涉外保险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出口货物的承保率还不高（不到50%），用GIF价格成交的比例不够大，开办的险种还不够多。另外，由于山区通讯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影响了涉外保险赔案的快速理赔。今年以来，涉外保险的发展有所加快，一至五月保险业务发生数已达37万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5倍。今后，涉外保险必须着重抓好三件事：一是加强对各县涉外业务的指导，通过下去带、上来学等形式，培训各支公司的涉外业务骨干，为今后涉外业务的更大发展打下基础。二是多做工作拓展业务，提高承保率。要特别注意争取外经贸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培训、提高外销员的业务素质，争取更多的出口货物在国内以GIF价格承保。三是加快涉外保险索赔案的审理工作，象春节前后嘉美洋参公司仓库火灾案和粤东龙江包装制品公司暴雨受浸案那样，主动及时理赔，以扩大保险宣传，提高信誉，加快涉外保险业务发展，为改善山区投资环境尽心出力。

### 三、同心协力，为山区保险业再上新台阶真抓实干。

当前，中央作出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决策，我们山区保险业也应当有新的目标。初步设想，今后以年业务量递增2000万元左右的幅度向前发展，到1993年达到1.6亿，是1990年业务量的3倍。要实现一年一个新台阶的目标，必须着重加强三方面的工作：

1. 党政与企业同心携手，为促进山区经济协力办保险。我市保险业的迅猛发展，是与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分不开的。但由于保险宣传还不够深入等种种原因，也有一些单位和部门，对保险公司存在某种误会或偏见，对鼓励农民和集体投保不积极、不热情。要疏通这些关系，各级保险公司必须重视加强公关活动，经常、主动找党政领导汇报工作，不断提高保险服务质量，真正为各级党委政府分忧解难、排险救急。我们相信，各级领导都能在观察思考中得出

“保险利国利民”的正确结论，在工作实践中选择保险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给保险业予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2. 上下级公司同心同德，一齐向发展山区保险业倾斜。山区条件艰苦，分散业务比重大，干部职工人均保费收入低，各种经费紧缺，这是各级有目共睹的。近年来，对山区分公司有一些优惠和照顾，但与省委、省政府及金融系统各行对贫困地区和山区的倾斜政策比较起来，又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呼吁在日前这个关系山区保险业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进一步扩大对山区的优惠政策，包括适当下浮保险费率、提高包干费用比例、增拨防灾宣传经费、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帮助培训业务人员、加强工作具体指导等，使山区真正得到实惠，逐渐缩小与发达地区客观条件上的差距。

3. 干部职工拧成一股绳，继续为山区保险艰苦创业。我们保险系统的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2号文件精神，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当前要特别着重抓好三件事：一是走出山门，打开眼界，组织各级领导和业务骨干到发达地区学习，看看人家是怎样用活用足政策，怎样拼搏创业的（当然不能盲目与别人攀比收入与待遇），以解放我们的思想，增强我们的信心，启迪我们的智慧。二是深化内部改革，完善激励机制。要给敢闯敢干的人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要敢于打破“越是穷地方越要一拉平”的弊端，结合队伍整顿搞好建章立制，结合破“三铁”把干部职工的工作实绩和经济收入挂起钩来，适当拉开档次，奖勤罚懒。三是抓好班子建设，加强思想工作。要敢于选拔思想开拓、有实干精神的同志担任领导职务，支持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大胆工作。要加强保险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和实践，注意解决干部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使干部职工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思想一致，心情舒畅，增强团结，减少内耗，同为加快发展山区保险事业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梅州分公司

责任编辑：石成

# 关于股份制度的所有制性质问题

姚 迈

自从有人提出在我国推行股份制以来，股份制的所有制性质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股份制度仅仅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其本身并无所有制问题。也有人认为股份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而且也是一种财产关系，代表着某种所有制。最流行的观点是：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于入股股份本身的所有制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第一，从入股的股份来看，股份公司不会改变入股股份原有的所有制性质。原来是国有的，入股后仍然归国家所有；原来是集体的，入股后仍然归集体所有；原来是个人的，入股后仍然归个人所有。第二，从一个股份公司来看，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于入股股份的所有制性质。如果入股的股份都是国家的，或者都是国营企业的投资，那么，这个股份公司就是一家国营企业，有人称之为“股份制国营企业”。<sup>①</sup>如果入股的股份都是集体经济的投资或都是私人的投资，那么，这个股份公司当然就是一家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但是，如果入股的股份既有国家的投资，也有集体和私人的投资，那么这个股份公司该定为什么性质？有人把这种股份公司叫“混合所有制”。然而，在人们的头脑里，所有制是个具有排他性的范畴，不是公有制就是私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就是集体所有。“混合所有制”显然同这种排他性相悖。于是有人认为这种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应该由占主导地位的股份的所有制性质来决定。如果公有股（国家和集体）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股份公司就属于公有性质；如果私人股占主导地位，那么，这家股份公司就归入私营企业的行列了。<sup>②</sup>

乍一看来，上述观点似乎无懈可击，其实，细想起来，也颇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于或等同于入股股份原来的所有制性质这一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

关于股份资本的性质，马克思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sup>③</sup>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资本和股份企业，入股的股份当然都是私人的投资。按照上述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于入股股份的所有制性质的理论，这种股份资本肯定应该是私人资本，这种股份公司也肯定应该是私营企业无疑。但马克思却认为这种通过股份制而“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已不等同于私人资本，而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

资本。据马克思在括号里的注明，所谓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显然，这里讲的社会资本并不是相对于单个资本而言的社会总资本，而是相对于私人资本而言的社会资本。它是由一个个的个人资本直接联合而成的。但是，一旦联合起来之后，就不同于原来的私人资本，因此，马克思才把股份制的出现看成是对“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是“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④

马克思还把股份公司与合作工厂相提并论。对于合作工厂，马克思认为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新的联合生产方式。他说：“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⑤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全部由私人投资入股的股份公司，也不是私有制企业；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与入股股份原来的所有制性质并不是等同的。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社会中的制度并未完全摆脱私有制。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都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不过，合作工厂是积极的扬弃，而股份制度只是消极的扬弃。原因就是在股份制度中，私人股东还凭籍对股份的所有权而从股份公司取得股息，而股息就是“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⑥这就是说，股份制既保持了资本的私有性质，同时又形成了社会资本，完成了资本和劳动的社会集中，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马克思关于有价证券（股票就是一种有价证券）的论述给我们启示：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公司股本，是一种真实资本，而股东在投资后取得的股票则是虚拟资本。作为真实资本的公司股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作为虚拟资本的股票，则仍然归私人所有，属于私人资本。

同一个资本，既是真实资本，又是虚拟资本，既是社会资本，又是私人资本。它的所有权主体应该如何解释？资本的所有权，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这笔资本归谁所有，但是，资本的所有权在经济上的意义就要复杂得多。资本是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只有进入循环周转才会增殖，否则，剩余价值既不会产生，也不能实现。因此，对于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就必须包含这笔资本由谁占有，由谁使用，谁有权对其进行处分，实现了的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等内涵，即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资本所有权的这四个权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割的。比如在信用条件下，甲将资本贷放给乙，这就意味着甲在一定的时间里，在保留部分收益权（收取利息，但利息并不是资本权益的全部）的前提下，将这笔资本所有权的部分收益权、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转让给乙。到期后，乙将本金归还给甲的同时支付一定的利息，这就意味着甲将这笔资本所有权的全部权能收回了。

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⑦股份资本也是在资本所有权权能分割的前提下形成的。但是，股份投资不同于

信用借贷、股东入股，而意味着股东个人在保留部分收益权（取得股息，但股息也不是资本收益的全部）的前提下，将部分收益权以及其余三个权能集中起来，归股东共同所有，而不是象信用借贷那样，转让给他人。所以，股份制度的所有权主体结构是：股份资本的部分收益权归股东个人所有，部分收益权和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则归股东共同所有。这种“共同所有”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并不是全部所有权的权能共同所有，而只是部分收益权和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的共同所有。

第二，直接联合起来的股份资本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这种整体不可分割性集中表现在“不得退股”这一点上。如果可以自由退股，那就说明资本并未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说明资本所有权诸权能并未真正分割，也未真正集中，更不能说“共同所有”。因为可以自由退股就等于股东对其所投入的那部分资本仍然可以自由支配，仍然享有全部各种权能。这样的资本并未成为社会资本，充其量只能算是私人合伙经营，这就丧失了股份制度产生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社会集中，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私人资本才通过股份制直接联合起来成为社会资本。“自由退股”就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试想：铁路修了一半，人们要退股，那该怎么办？谁敢用这种资本去修筑铁路？所以，凡是规范化的股份制，都必定不得退股。不得退股是对所有权诸权能分割的保证，是股份资本作为社会资本而存在的保证。

第三，作为股份资本所有者的股东，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股份资本从整体上当然不属于任何一个股东个人；它的任何部分，即使是该股东自己投入的那一部分，也不属于这个股东个人。作为股东个人，对股份资本整体毫无权力，对这个股份资本的任何一个部分，也毫无权力。只能是全体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对股份资本整体共同所有，这个股东整体在成员上可能会因股票转让而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对“股东整体”，对股份资本的“共同所有”，丝毫没有影响。事实上，不但“股东整体”的内部成员可能变动，“资本整体”的构成、形态，也在不断变动，如由商品变成货币，由货币变成生产要素，等等。

这种股东整体对股份资本整体的“共同所有”，可以称之为“共有制”。<sup>⑥</sup>这种“共有制”的股份资本的所有权，只包括部分收益权和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因此也可以这样说：资本的部分收益权归股东所有，其余部分收益权和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集中起来，归股东整体共同所有。这就是股份制度的所有制性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性质的所有制呢？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资本和劳动必须作社会集中，但资本和劳动却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有，既不能“一平二调”，也不能完全依靠信用借贷的方式进行。股份制就正好既维持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又实现了社会集中。所以，股份共有制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1）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2）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本和劳动进行社会集中，凡是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共有制就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所

有制，以及同一所有制内的不同所有者，总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因此，股份共有制是一种能够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可以设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股份共有制将会在我国城乡广泛地存在和发展。

在我们的观念里，原先只有两种所有制，不是公有制就是私有制。现在看来，股份共有制也是一种具有历史阶段性质的所有制形式，而不是一种临时措施。股份共有制是在所有权能分割的前提下，不同利益主体共同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它既不是完全的私有制，也不是我们原来观念中的那种公有制。但由于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的，它虽然产生于私有制社会，并在资本主义中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它天然地更适合于社会主义，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

①见《晨光刚刚升起》第三章，新华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②见《股份有限公司原理与实务》序，时代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

③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93页。

④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93页。

⑤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98页。

⑥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93—494页。

⑧这里说的“共有制”不是有的人说的“全村人都是股东”那种含义的“共有制”。

作者单位：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金融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

（上接第93页）

根据各种可能性的概率选择次优方案。（2）多样性，即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各种资源投入计划或各种产出计划不应过分集中于某一种方案，或某一种生产方法，或某一领域，而应该根据稳定性原则获取有保证的收益。（3）适应性，即分阶段或分步骤作出计划决策，用“搜寻法”或“爬山法”，根据逐步掌握的信息作出逐步的决策，以逐步逼近计划目标，而不是一下子作出所有阶段的决策，冒过大的风险。（4）情报的尽可能取得。在不确定情况下，如果不尽可能掌握有关决策对象的情报，难免发生盲目决策。尽可能取得更多的决策所需的有价值的情报本身，虽然不可能实现用确定性代替不确定性，但是至少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很明显，贯彻上述几个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原则，都需要我们努力建立较为完善的计

划信息系统。

① 这种方法哈耶克认为是不可能的。他强调说，在市场机制被取代之后，中央想计算数以百万计的方程式和收集所有的信息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参见：〔美〕马丁·保罗等：《关于计划可能性问题的争论》，载《经济学译丛》1982年第12期第37—38页。

② 下述情况在投资领域和宏观平衡领域也同样严重存在，但为节省篇幅，在此不拟展开。

③ 〔印度〕斯·查克拉瓦蒂《关于发展计划理论的评价》，《经济学译丛》1982年第6期第69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劳动力也是商品

白雪海 关筱琳

承认社会主义劳动力是商品，一方面是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要求，因为它关系到商品经  
济的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的需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打破  
“铁饭碗”，需要对劳动工资制度进行改革。  
但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劳动力仍然是商品的原因  
还没有令人信服地结论；另一方面劳动力商品性  
与按劳分配是否相容，更是众说纷纭。本文试图  
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 (一)

从马克思时期到社会主义现阶段，人们经过  
一百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认识到商品经济的  
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这个结论无疑  
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可是，我们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同  
时，又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劳动力不是商品。我认  
为这种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与商品  
经济关系的原理的，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虽然马克思常常把劳动力商品和资本主义联  
系在一起，但不难看出，他认为劳动力商品与商  
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正如他所说，只  
有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时候起，“商品生产才普遍  
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  
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  
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  
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  
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  
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  
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sup>①</sup>这就是  
说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必然要求劳动力的商品  
化；劳动力的商品化，又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曾经否认社会主义劳动力是商品，  
那么这与他的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  
观点是一致的，而这又正好与他的关于劳动力

商品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是相吻合的。而  
我们现在正好相反，我们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要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又否定劳动力是商  
品，这显然与马克思的论述相背离。这样一来，  
就使得我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了。

首先，从生产要素的构成看，我们历来承认  
生产要素包括人（劳动力）和物（生产资料）。  
在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的情况下，劳动力自然  
可以看作是非商品。而在我们已经明确社会主义  
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从而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  
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劳动力不是商品，那实际上  
就是说，在生产两大要素中，一方面生产资料  
是商品，而另一方面劳动力却可以不是商品；生  
产资料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生产生  
产资料的劳动能形成价值。而劳动力则只有使用  
价值而没有价值（尽管花费了劳动），生产劳动  
力所耗费的劳动尽管生产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使  
用价值，也只能是浪费了，不能形成价值；作为  
生产单位的企业，在计算生产成本时，只算生产  
资料的价值就够了，劳动力的价值是不用计算的，  
因为劳动力本身没有价值，如果硬要算，只能  
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了。可是这样一来，社  
会主义经济究竟是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呢？

其次，从商品价值的构成看，我们会发现正  
如卓炯同志所说的，如果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  
也有价值，那么商品的价值就缺少了一个组成部  
分。不仅如此，劳动力的使用还可以创造出大于  
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不承认劳动力有  
价值，就会连带不承认剩余价值，那么商品的价  
值就缺少了两个部分。<sup>②</sup>作为仍然是商品经济的  
社会主义经济，商品的价值只有C这部分，商品  
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相交换，就仅仅  
是按各自所包含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交换，无论  
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

再次，从商品流通过程看，商品流通一般包



括卖W—G和买G—W两个过程，整个运动过程应该是W—G—W。没有卖W—G，就不可能有买G—W。如果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流通的结果必然是：对企业来说只有卖（把商品卖给劳动者个人），而没有买（向劳动者个人购买劳动力）；而对劳动者个人来说，只有买（购买个人消费品），而没有卖（把劳动力卖给企业）。这种流通只能是半截子流通，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真正的商品流通了。

所以，正如我们过去只承认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一样，只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劳动力也是商品，同样是不对的。

## （二）

人们长期以来否认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性的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劳动者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如果说劳动力是商品，那就是说，劳动者是在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自己的企业，也就是“自己卖自己”。因而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可是人们应该不会忘记，过去我们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是商品时，也是把公有制作为立论前提的，认为全民企业都是公有的，因而都是“自己”的，承认它们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是商品，那就等于承认可以“自己卖给自己”。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些生产资料并非“自己卖给自己”，而是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在市场上流通。我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力交换同样不是自己卖给自己。

其实，人们所以认为劳动力的交换是“自己卖给自己”，主要原因就在于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整体和劳动者个人等同起来了。例如，蓝振海同志说，社会集体与劳动者双方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存在两个不同利益的所有者互相交换其产品，因而劳动力就不是当作商品被买卖的。<sup>③</sup>可是，即使撇开其它方面不说，仅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所有权看，二者也并非“完全一致”。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公有制指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劳动者共同占有，因而只有整体才能行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作为劳动者个人，谁也没有直接占有和动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权利。所以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者显然是指劳动者整体。但就劳动力的所有权来看则正好相反。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还不能按需分配，劳

动者及其个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主要还是用自己的工资购买。因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费用还主要由个人所有，而不能直接归劳动者集体公有。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必须“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sup>④</sup>可见，虽然劳动者整体由劳动者个人组成，因而二者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不同一性。

劳动者整体和劳动者个人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权方面存在不同一性，使得劳动者具有了两种不同身份：作为劳动者整体，他们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作为劳动者个人，他们又是各自劳动力的所有者。正因为这样，如果是从经济组织形式而不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作为劳动者整体，劳动力实现了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但作为劳动者个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还只能是一种间接结合，因为每个人还必须被作为劳动者整体的企业录用后才能进行劳动，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真正结合。而在这种间接结合过程中，劳动者整体要获得直接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就必须向劳动者支付生活资料的价值——工资；反之，劳动者个人要得到生活资料的价值，就要向整体让渡自己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而“劳动”（劳动力）所以成为商品，是由于它被买卖。可见，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劳动者个人和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者整体之间存在的不同一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经济组织形式上的间接结合，是社会主义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性的主要原因。当然劳动者个人与劳动者整体存在的这种不同一性，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它是由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所以社会主义劳动力具有商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社会主义劳动力具有商品性不仅具有上面所说的必然性，而且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首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不仅消除了封建的枷锁，也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的束缚，而社会主义本身又必须“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虽然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只有劳动者集体才能直接行使所有权，劳动者个人并不能直接动用这

些生产资料及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他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

### (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当然也得承认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可是这就与我们的传统理论发生了矛盾，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工资是按劳分配的基本形式。正因为这样，使得劳动力商品问题的讨论，正如一些同志所说的，进入两难境地：要坚持按劳分配，就得否定劳动力的商品性；要肯定劳动力的商品性，就得放弃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此肯定了劳动力的商品性，就不能保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要保证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就得否定劳动力的商品性。真可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怎么走出这两难境地？持传统观点的同志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没有劳动力商品”。可是，正如我上面所说，这有悖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而持相反观点的同志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按劳分配，只有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不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显然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因为以上两种观点都不能令人满意，又有同志认为“按劳分配等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这可谓鱼和熊掌兼得，似乎既坚持了按劳分配，又肯定了社会主义劳动力的商品性，两难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偷换概念之嫌。因为马克思在谈到按劳分配时是这样说的：“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的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sup>①</sup>显然马克思讲的按劳分配是指按“劳动”分配，而不是指“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而且把“劳动”偷换成“劳动力价值”，不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资本主义工人得到的工资也是劳动力价值，是否也可以叫做按劳分配？

既然上述三种观点均不能很好地解决“两难”问题，是否还有第四种选择？我认为存在的。

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sup>②</sup>这就是说生产条件归谁所有，消费资料就应该分配给谁。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作为生产条件之一的劳动力是属于劳动者的，因而他们可以据此取得这一部分价值，但因为作为生产条件另一方面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家所有的，而不是工人所有的，因此工人也就无权参与 $m$ 这一部分价值的分配， $m$ 只能由各资本家按资分配。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劳动者作为个人，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作为整体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因此，他们除了要取得 $V$ 这一部分价值外，还要参与 $m$ 的分配。不过，生产资料是属于劳动者整体的，所以 $m$ 和 $V$ 不同，它不能直接归劳动者个人，而只能直接归劳动者整体。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一分子的劳动者个人，要从 $m$ 中取得自己相应的份额，还得经过一个分配程序。但这种分配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中 $m$ 的分配，在那里生产资料归各个资本家，因而可以按他们各自占有的资本大小进行分配。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劳动者整体，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因而不可能再按各自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分配 $m$ 。那么，应该按什么来分配呢？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能够提供给社会的只是劳动，因而在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按各自为社会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和一定比例来参与 $m$ 的分配。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以按劳分配的方式参与 $m$ 的分配的。

可见，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和按劳分配是并存的。这里不会存在所谓要么承认劳动力商品，否定按劳分配；要么肯定按劳分配，否定劳动力商品问题。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4页。

②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年第4期卓炯文。

③见《福建论坛》1986年第5期蓝振海文。

④⑤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第11页，第13页。

作者单位：广东农业银行学校  
责任编辑：郑英隆

# 实物计划调节的信息限制与商品型 计划管理的信息系统建构

刘志彪

计划调节存在的必要假定在于：计划者能够对计划对象的未来的运动信息有精确的了解和计算，并能及时迅速地传递和处理计划信息，依据事先掌握的足够量的、准确的、及时的信息进行资源分配，使经济活动依照人的自觉性高效率地进行，避免自发市场调节的事后调整和强制平衡。显然，计划调节的效率首先取决于计划者对真实、及时的计划信息的足够量的掌握和处理能力。信息的数量度、完整度、真实度、及时度等分别从量、质、动态的角度构成了对处于特定活动空间的计划者的信息约束。计划者受制于信息限制是永恒性的问题，任何计划管理都只可能是有限理性的管理。那种认为只要实行计划经济，就可以充分地掌握经济运行中的需求和生产信息，就可以充分了解每一个人的和每一个单位的与利益调节有关的信息的看法，无疑是美丽的经济童话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

## 一、实物计划调节中的信息限制问题分析

实物计划调节体制的设计思想是，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动作的经济机体。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也能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找到它的某些基本痕迹。实物计划调节中的信息限制分两种情况。

1. 生产者与计划者利益目标一致前提下的信息限制问题。利益目标一致是指生产者完全赞同计划者的计划目标，在经济行为上与计划者进行合作并保持一致，生产者毫无保留地向计划者提供必要的真实的计划信息，并按投入标准定额进行生产。在此前提下，如果计划者掌握了供需方面和投入产出方面的全部信息，主要包括消费者偏好信息、要素投入信息、资源限制信息等，那么由既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决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与由需求决定的某一条等效用曲线的切

点，便是计划者所应安排的最佳生产计划目标。从实证分析看，这里所受到的信息限制，主要是由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信息限制以及信息技术相对落后所决定的信息限制这两种。这两种信息限制一般可以通过完善电子通讯技术和运用现代数学方法来适当解决<sup>①</sup>，也可以在经济信息量与中央计划信息处理能力不平衡时，通过改良中央实物平衡体制，引进兰格的“竞争解决”方法来进行。但兰格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已经修正了实物平衡体制的，含有市场机制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兰格模式由于把一些横向协调的职能交给了市场决定过程去解决，因此与实物计划调节模式相比，调节过程对信息处理的要求被大大降低了。而且由于假设利益目标一致，调节效率较高。

2. 生产者与计划者利益目标有冲突条件下的信息限制问题。利益目标不一致是指生产者从个别或局部利益出发，突出自己的经济目标，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置计划者所设目标于不顾；在微观行为上与计划者发生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向计划者提供各种不真实的计划信息。在中间需求流量的信息交流领域主要表现为：<sup>②</sup>

(1) 隐瞒真实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能力利用率，夸大完成计划生产任务指标的困难。在实物计划调节体制中，计划者在确定计划年度增长控制指标时，总是倾向于要求企业完成较高的增长指标任务；在动态的管理过程中，总是凭借以往的增长率情况去推断未来的产量指标，把前些年的增长率和生产效率的平均数作为规划今后该企业的基准点。这种管理方法加上政府的评价和奖惩办法的刺激，必然会产生鞭打快牛的“棘轮效应”，即生产任务完成越好的企业下一年将面临更难完成的增长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在报送给政府的统计报表中一般都留有“充分的余地”，以防止承担过重的生产计划任务并影响到政府对企业的的评价。这样，实际产出可能性水平

必然会降低。

(2) 夸大投入需求。在实物平衡经济中,投入标准矩阵是不断变化的,也即它要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需求替代发生变化。在决定投入定额时,计划部门只能依赖企业所提供的信息和一定的历史资料,而各企业为完成松弛的计划,必把各种定额信息确定在有利于自己的水平上。在这种低质量的信息情况下,技术进步因素、生产方法的革新、管理潜力的发挥等等都被排斥在标准投入定额之外,中间投入需求必然会被人为地夸大。

(3) 上述夸大投入,缩小产出的消极行为严重地削弱了计划的真实性。这种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信息虚假和计划虚假,表现为企业的投入产出行为的非对称化:在向上争取投入量时,他们尽量夸大;在上报自己的产出量时,他们则尽量减少。这样,处于中间流量传递链中的各企业,就一定会在供需双方出现不平衡。而计划者的行为不外乎是一方面削减企业的需求量,一方面设法给企业的产出加码。

因此,在生产者与计划者的利益目标有抵触或矛盾时,政府计划者为了使生产者服从自己的目标函数,必须在给企业下达计划指标指令的同时,要求下达执行和完成计划的各种纪律,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审查和考核,据此进行正反面刺激性奖励或惩罚。我们把这种纪律、审查、考核以及奖罚称之为计划规则。计划规则的运用,要求政府计划者必须掌握企业经营中的一系列细节性的信息,这与制定、下达计划所要求的信息工作加在一起,势必形成信息在计划机关的高度膨胀现象。实际上,计划规则的运用也不能消除企业追求宽松计划的行为,从而使加强监督的要求在软性预算约束中化为泡影。

换一个角度,从现代控制理论的角度来看,实物计划体制的根本性的信息限制在于行政性的信息通道,即信息传输和接受的通道均为行政机关或行政化了的企业单位(在实物经济中,企业是政府机构在生产领域中的延伸,企业也有行政级别)。行政控制系统实际上既发挥着经济信息输出、转换和接受的功能,又发挥经济信息传输和接受的中介体的功能即信息通道的功能,通过行政等级制的形式进行纵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以达到控制企业和整个经济系统的目的。以行政控制系统作为传输经济信息的唯一通道,在实际

的经济运行中,极难胜任控制复杂的国民经济运动的任务,表现在:

(1) 在我国这么一个大国里,仅仅工交企业就达40多万个,信息量极其庞大,如果把其全部纳入行政控制系统中,那么结果必然是要么行政控制系统臃肿庞杂,人浮于事;要么由于信息通道挤压或信息混乱而使企业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同理,当构成经济系统的地域跨度较大时,各地区自然、经济和社会风俗差异较大,如果不发挥各地区的自控能力,势必也会出现上述同样的结果。

(2) 从经济系统中各种状态变化频度来看,行政控制系统中的信道容量显然也是过分狭窄的,不足以构成对各种变化状态的有效控制。设若产品的供应(S)与需求(D)之间的变化完全由计划部门(P)调控,那么该产品能否平衡,关键要看P对S与D之间的频繁变化关系能否快速反应。然而,事实上D是快变量,S是慢变量。当S与D脱节时,其信息要通过等级制逐级统计上报P才能知晓。当P作出反应时,供求严重失衡状态早已发生。显然,把这种情况扩大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纯粹的行政系统就会显得信息通道更小,控制能力更弱。

(3) 从构成经济系统的复杂程度来看,现代社会的生产过程随着消费形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日趋复杂,其技术经济过程耦合关系极为严密。这就要求控制指令在众多的状态中进行识别,需要识别的联系状态越多,控制指令就越需要精确,所包含的信息量就要越大,对控制系统中控制者和受控对象之间的信息通道要求就越高,否则非但控制会失灵,经济系统的平衡也会遭到人为的破坏。

(4) 在集中的行政控制体制下,一方面自上而下的经济信息传输会丧失过多的信息量,或者使信息失真,或者使信息传输失误;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信息也会因地方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作祟而使信息畸变和信息量衰减;更会因为上下传输过程中的官僚作风和主观主义以及变幻莫测的心理状态使信息停滞和歪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计划者集中处理信息的能力与现代经济信息膨胀及信息传输方式之间是有极大的矛盾的,如果说,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较小、经济关系单一的低级经济发展阶段,政府集中最优秀的管理人员集中处理经济

信息的方式还具有合理性的一面的话,那么在现代经济的发展格局下,由政府成员集中处理计划信息就会遇到种种因素约束而显示出非合理性的一面:(1)政府成员处理计划信息只具有有限的理性,而并不具有绝对的理性,因为组成政府的组织是由人员担任的,而人总是要受知识水平、技术、习惯、能力、价值观以及影响其决策的目标等的限制。(2)政府计划者包揽处理计划信息的能力总受所要处理的信息的数量以及所能利用的信息处理技术制约。(3)计划信息中所包含的利益关系使集中代理的计划信息发生各种扭曲和失真,从而危及计划代理的效率。政府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公有制企业,就要要求企业向政府提供各种有关企业活动的内部信息,而这些内部信息恰恰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在公有制内部局部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作用下,企业计划代理者即经理厂长们往往倾向于向政府传递有利于己的信息,而掩盖甚至歪曲不利于己的信息,如隐瞒实际生产能力、虚报产值、夸大生产要素的短缺等等。由这种隐含利益关系的信息传递方式所决定,政府集中处理计划信息的方式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克服实物计划调节的信息限制,解决政府计划者信息能力不平衡,有效地加速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重塑经济调控模式和信息通道。

## 二、商品经济条件下信息通道与计划管理信息系统构想

商品经济计划管理的信息通道有三类,第一类是横向的市场体系,其核心机制是广义的价格体系,包括商品价格体系、工资、利率、汇率等;第二类是纵向的计划指导和计划控制体系,其机制是政府和社会所能掌握的各种手段,如行政监督、经济杠杆、司法监控、新闻监督、社会义务和伦理道德等;第三类是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中间性经济组织,如现代股份经济组织、银企集团、民间经济性的行业协会等,它们也承担着一些重要的组织和计划的功能,特别是能通过与政府的对话和协商,把政府计划的信息传输到下层企业或通过其经济行为影响和辐射周围的“卫星式”企业,这种信道在现代经济中组织协调经济的功能绝对不能低估。

商品经济计划管理的信息通道的建立,同样需要我们在企业制度、市场体系与宏观管理三方

面进行协同改革,塑造以市场为主体及本位的横向自动协调的信息通道。在这一通道中,广义的价格体系起着极为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1. 在一个企业追求经济效率和充分竞争的经济中,广义的价格体系直接联系着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间的关系,价格变动对供需双方都会产生调节效应,从而平衡供求,传递有关供求结构的信息。2. 由竞争形成的合理的价格体系,能使计划者运用综合性的货币化指标体系观察、评价经济运行的状况,从而采用正确的经济政策进行调节,避免价格体系紊乱所造成的政策偏差。同样,合理的价格体系也能使计划者正确地运用利润等综合经济指标评价企业的经济贡献,并给企业管理者以相应的正刺激,减少实物计划考核和评价的信息处理量。3. 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非价格竞争形式,使大量的实物计划体制中原需由计划规则处理的信息事务,转归为市场承担。如产品的质量、品种、规格、花色、交货期、售后服务、购销联系等等,均可以在非价格竞争中自动解决。4. 价格体系的起伏涨落变动,向计划者灵敏地提供有关供求失衡的信息,还为中央对金融杠杆、财政杠杆等的操作提供调节依据,在客观上起到减少中央计划调节所需处理的经济信息数量的作用,因而便于提高中央计划者的信息处理能力,降低调节成本,超脱微观事务,而集中关注有关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经济事务的决策问题,使决策更为科学和具有权威性。

由此看来,要逐步形成商品型的计划管理的信息结构,必定要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用市场型的信息通道逐步代替行政性的信息通道。这个艰巨的改革任务除了要求逐步形成以市场利益为导向和约束的微观机制外,还要求设法通过价格体系的改革来逐步完善市场体系。

用价格体系和市场体系取代行政体系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信息协调功能之后,宏观计划工作的信息限制问题仍然没有全部消失,而是在某些方面换了一种形式。在此,限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不确定:

1. 计划系统中的外生变量信息所引起的不确定情况。这里外生变量信息是指不受国内计划行为直接影响的变量信息,如气候、世界经济与世界贸易状况、世界政治形势等等。

2. 计划系统中的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引起的不确定信息。在生产、投资、就业、消费、进

出口、分配、流通等各方面都会存在分散的经济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从而使计划系统面临不确定的信息。

由于在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制中，信息的确定与不确定是与经济主体在体制中的地位有关的，体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它特定的一些信息，因此信息的不确定性将取决于计划工作者与市场之间的实际关系。例如，在政府计划者同时参与市场盈利性交易的现行体制下，计划者面临的信息不确定不仅是企业行为不确定造成的，而且也是计划者的市场行为不确定以及宏观管理行为不确定造成的；在政府计划者适当超脱市场运行的体制中，计划者处于市场运行的较高层次，因此它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交易者行为造成的，因而就可能集中精力处理宏观管理面临的不确定信息，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市场研究，并根据市场运行状况作出如A·西蒙所说的各种非程序化的决策。

显然，为了使计划调节市场的目标真正实现，针对价格信息在协调横向经济关系方面的缺陷，有必要构建新型的计划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计划机关之间的情报沟通，以及为企业市场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建立该系统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1. 计划信息系统中的机器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要与计划者处理信息的能力相适应。在信息处理过程主要由“人——人对话”的落后的技术状态下，计划信息的传输效率主要受制于作为接受和处理信息的人在接受与处理两方面的能力限制，大量的报表、资料、情报使计划者无暇顾及；而在现代计算机联网基础上形成的计划信息系统，信息处理过程体现为“机器——人之间的对话”，因而问题转变为：不是机器（计算机、电传机等）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效率低，而是人的头脑对信息读不过来，信息流通的瓶颈发生在人的头脑的接受能力方面。解决人机对话中这一难题是要有选择地限定计划事务以及有选择地采用计划指标信息，坚决删去那些与宏观计划事务无关的干扰性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地提高计划信息系统的效率，否则，再现代化的信息系统也会出现低效率。

2. 使计划管理更多地关注其组织外部的信息，而不能仅限于组织内部的信息。现代管理科学证明，一个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越往上层，

管理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就越不是产生于该组织内部，而是产生于组织外部。就一个大型企业来说，组织内部所提供的信息，无论是有关销售量的，还是有关产品产量的，对中层管理人员都非常有用；可是对高级管理人员来说，他所需要的信息往往是组织外部的，如国内外有关企业的广泛的经济情报、市场走势、原材料供给等等。因此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他作出决策就不能仅依靠组织内部的情报，而更应关切组织外部的信息。这种原理对于计划管理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计划人员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缺少信息，而是信息量过度，以致于他没有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到最重要的决策问题上来。仅此一点，也要求我们的计划者摆脱日常的企业的琐碎情况。在计划信息系统的设计上，应附加一个体制性质的过滤系统，对情报进行过滤，只让它提供那些对计划决策事务有关系的、有用的信息。

3. 向企业提供各企业组织层次无法获取或无法准确获取的各种信息的非盈利性服务，并积极组织民间信息机构进行有偿化信息服务。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价格机制在引导经济走向均衡的道路上运转较慢或者波动较大，甚至在根据当时的价格和利润信息能够证明投资有利可图的时候也是如此。罗森斯坦——罗丹在1943年就指出，一种“补充性的体制减少了销售不出去的风险，由于风险可以解释为成本，它就减少了成本。”<sup>③</sup>这种补充性的体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和民间机构给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减少竞争性市场中的信息保密的副作用，以及企业因受购买信息的预算限制而造成的市场行为失当。

4. 建立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相适应的计划信息和控制体系。计划管理应从仅限于国内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组织国内经济代理人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换，并使计划信息系统更多地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经济信息，在计划决策上更多地采用世界市场与本国市场相互衔接的观点，以积极主动地适应国际市场。

5. 建立与信息不确定条件相适应的计划决策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1）折衷性，即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计划决策因依据的信息有限，所以必须在“冒险”与“安全”的两个极端中，

（下转第86页）

## 从学术源流论饶宗颐先生的治学风格

姜伯勤

### 一 引 言

饶宗颐先生，字选堂，又号固庵，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16岁时，以一首优昙花诗震惊四座，成为名闻遐迩的才人。

今天，作为一位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古典文学家、书画家，选堂先生已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宗颐先生早年受到法国汉学界领袖人物戴密微先生的推重。1991年香港国际唐史讨论会上，其时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池田温先生说：“饶宗颐先生是国际汉学最高权威之一”。当今日本书道界领袖人物青山杉雨先生亦表示，在华南，有了饶先生，在容庚、商承祚两先生谢世后没有出现空白。

饶宗颐先生是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87年起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现任香港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

饶先生长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并于1980年被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先是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63年任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及永久会员。1965—66年任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院研究员。1968—73年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70—71年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73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1974年任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78—79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80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及人文科学研究所讲学。

在内地，早在30年代，选堂先生即已与中山大学结下胜缘。先生18—20岁时，即1935—37年，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近十年来多次到中山大学讲演。饶先生对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汕头大学、澳门大学的学术研究，一直十

分关注。

国内学术界的一些名家，也高度评价了饶宗颐先生的学术成就。

著名东方学权威、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在《谈饶宗颐史学论著》<sup>①</sup>一文中指出：“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季先生说，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因而限制了大陆学人对饶先生学术造诣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季羨林先生是一位比较文学专家，在论及饶先生学术研究中涉及的“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时说：“我这里讲的外来观念是指比较文学，固有材料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饶宗颐教授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启发。”季先生还引用了陈寅恪先生以佛家“预流果”比喻跟上时代学术潮流的胜意，盛赞“饶宗颐先生是能预流的，我们首先应该学习他这一点”。季先生不止一次提出“我们应该向饶先生学习”。

著名中国古典文学史专家钱仲联教授，近撰《固庵文录序》。<sup>②</sup>钱先生首先慨叹近世学问与文章兼美者几希，“此可知文质并茂之难也”。从而盛赞饶先生文质兼美。他指出：“余今读选堂饶先生固庵文录，乃喟然叹曰：此并世之容甫与观堂也。”“九州百世以观之，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钱仲联先生又撰《选堂诗词集序》，<sup>③</sup>高度评价宗颐先生的诗、词造诣，指出：“学与诗合，随所触发，莫非灵境，而又锻思冥茫，径路绝而风云通。选堂于此，掉臂游行，得大自在……”。“就诗言诗，选堂先生之所承，亦至博矣。盖尝上溯典午，下逮天水，一法不舍，二法不取，而又上自嗣宗、康乐，下及昌黎、玉局，历历次其韵，借其体，澜翻不穷，愈出愈奇”。

雅人深致的饶宗颐先生，实在是一位在国内  
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博大精深的学者。冷静地  
观察，在当今岭南学术史上，在今日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的粤籍学人中，选堂先生已经处于不爭的  
地位。因此，广东学术界中人没有理由不对固庵  
先生的学术成就的来龙去脉，进行科学的分析与  
认真的研究。

## 二、饶宗颐先生与晚清学术巨子沈曾植

研究晚清朴学向现代学术转变时，人们经常  
提起的是王国维。

王国维于1915年初次见到沈曾植。从新近披  
露的《王国维书信集》<sup>①</sup>中得见，在王国维生命的  
最后十来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中，沈曾植有过重  
要的影响。因此，王国维在为沈曾植所作的七十  
寿序<sup>②</sup>中，高度评价了沈曾植的学术地位。

沈曾植（1831—1922）在清末，以西北史地  
学派名家的身份跻身于外交界。1889年40岁时任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1913年，研究  
中国儒家及印度学的俄国卡依萨林伯爵曾与沈  
曾植论学，并在国外介绍沈氏的学术见解。1916  
年，沈曾植曾与法国学者伯希和讨论摩尼教问  
题。<sup>③</sup>沈氏是清末民初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对话  
的少数先驱人物。

沈曾植不仅是晚清西北及南洋史地研究的中  
坚，亦是清末民初佛学研究新潮流的预流者，也  
是古典诗坛上的“同光派”的魁桀。沈曾植是一  
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涉猎的部门有经学、音  
训、舆地、佛学、道藏、诗学、乐律、帖学与书  
法等，<sup>④</sup>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大的  
影响力。

饶宗颐先生尝云：我的学问首先是受了沈寐  
叟先生的影响，我们循着这一线索来搜读饶先生  
的专著、论文、诗词，初步的理解是：

同光派诗人沈曾植在诗学上的一大发明是所  
谓“三元说”或“三关说”，认为作诗要通过三关。  
“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元嘉关  
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谢灵运）山  
水诗，打并一气读”。“须知以来书‘意、笔、色’  
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  
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sup>⑤</sup>

沈曾植揭示了谢灵运与庄老的关系。他说：  
“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支道林开其先。”此  
说订正了《文心雕龙》中“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

成说。

饶宗颐先生曾与法国戴密微教授讨论谢灵运  
诗。戴氏从研究佛学而开始认识中国文化。及至  
读了谢灵运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上了一个境  
界。饶先生在与戴氏论诗过程中写了《大谢诗跋》  
，略云：

“刘彦和云：‘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明  
诗篇》），至沈寐叟遂有三元之论，以为元嘉  
以来，盛山水诗，谢客乃其不祧之祖。然支  
遁高唱，何不模山范水，非在谢之前乎……  
乃谓庄老告退，非实情也”。<sup>⑥</sup>

饶先生认为谢灵运诗并非止于山水，其中当有深  
刻的文化精神，“谢既湛玄言，又耽内典，情之与  
理，每交战于胸，虽借山水慰情，以理自适……  
见道者深，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耶？”

沈氏的“三元说”对饶先生的诗歌创作也有一  
定影响。饶先生对元嘉之谢灵运，元和之韩愈、  
柳宗元，元祐之苏东坡、黄庭坚，均再三致意。  
《选堂诗词集》中之“大千居士六十寿诗用昌黎南  
山韵、哥多瓦歌次陆浑山火韵、阿舍伯勒歌用昌黎  
岳阳楼韵、楚缙书歌次东坡石鼓歌韵诸篇，在近  
世，惟沈寐叟审言今年六十余欲为寿言无缘以发  
审言忽以西城员外丞请如其意为之、隘庵先生五  
十寿言用昌黎送侯参军韵二篇乃能为之”。<sup>⑦</sup>

沈曾植对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开拓，到了饶  
先生手中，更是结成硕果。以1982年结集之《选  
堂集林·史林》一书为例，其中有《论释氏昆仑  
说》、《达喇国考》、《穆护歌考——兼论火袄教入  
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  
《〈大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苏  
门答腊岛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记》及梵学有关多篇，  
均为西域南海史地新研究的丰厚成绩。

饶宗颐先生一方面十分重视沈曾植关于西域  
南海以及梵学的论断，如《邹衍书别考》一文引据  
沈氏《海口楼札丛》卷五《梨俱吠陀无有之歌》。<sup>⑧</sup>  
另一方面也对沈氏的若干新语根据新知而加以订  
正。如《蒲甘国史事零拾》一文中，指出《海口楼  
札丛》卷三《蒲甘国》条，“惟沈氏误谓蒲甘即曼  
谷，不可不订正”。饶先生订正说，缅甸宋初建  
国于蒲甘（Pagan），其地与大理毗邻。<sup>⑨</sup>

晚清西北史地之学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近  
代学术史上有不容抹煞的地位。陈寅恪先生《朱  
延丰突厥通考序》云：光绪朝，“其时学术风气，  
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



地。”“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sup>⑭</sup>晚清西北史地学作为一种思潮，是上世纪末中国边疆危机在中国爱国知识界心中所激起的波澜，并启迪了其后的面向世界的新学的诞生。在学术风气上，则打破了经学的一统天下，并促进了朴学向近现代学术的转变。沈曾植在这方面的提倡之功不可没。饶先生则更加发扬光大。

大凡一个民族在学术史上的转折时期，都会出现一些带有启蒙学者气象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曾植正是以这种转折时期的博大气象，影响了从王国维直至饶宗颐先生等不止一代的学者。

王国维与饶先生虽然都受到沈曾植的影响，但有一点则大不相同。

沈曾植晚年的一大成就是精于佛学。<sup>⑮</sup>清末一些学人东游日本，得见若干佚经，又受异国重视佛学研究的刺激，回国后遂发奋研究释典。沈曾植、杨仁山等，均是如此。晚清的佛学研究潮流在中国学术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例如，正是杨仁山、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对新儒家熊十力的学术思想起了催生作用。王国维多少也受到沈曾植研究佛学的影响，1919年7月29、<sup>30</sup>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有云：“敦煌碑金，乙老（沈曾植）闻之即日取去。渠谓《大云经疏》内黑河女主之事，似见大积经中，而伪大云经中取之。黑河女主西域自有此事，但一时不易考耳”。<sup>⑯</sup>在沈氏影响下，王国维撰《大云经跋》。<sup>⑰</sup>但是，由于王国维早逝，因而还来不及在佛学上多用功夫。

饶先生则不同，他对梵学下了大功夫。钱仲联先生在比较王、饶二家之学时，中肯地看到了这一点。钱先生说：“然观堂之学，究不能谓其为广大教主……如释藏道笈，即非其所措意矣”。<sup>⑱</sup>钱先生认为，选堂先生既有王国维融贯欧亚之长，而其亲履天竺以深究佛学，则不同于观堂先生，在这方面达到了王氏未及做出的成就。

由此，我们又追寻到理解饶宗颐先生学术的另一个重要线索，即饶先生学术与梵学的关系。

### 三、他山之石：饶宗颐先生与印度学术的因缘

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又与印度学、梵学、悉

县学有不解之缘。

1993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饶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县学绪论》。是书分甲、乙二篇，甲篇为语文篇（梵语影响下之中国语言与文学），附悉县学年表。乙篇为史地及佛教篇。共收论文40篇，年表一篇。

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出版饶著《梵学集》，共收录论文24篇，凡29万8千字，是作者佛学研究论文的结果。

先是1933年，饶宗颐先生任印度蒲那（Poona）班达伽（Bhandaskar）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及永久会员，先后从Paranjpe父子攻读婆罗门经典。

饶先生在印度期间得读Kane所著多卷本History of Dharmasastrar. Kane氏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名望很高的大学者。该书涉及到印度的法、诗学、术数等多方面的学术历史，该书讲问题每从吠陀开始，讲“法”的演变极精采，对佛教为何不能流传于印度的分析，令人折服。而其书横的结构则涉及到众多的部门及其在制度上的源起。

宗颐先生从Kane氏的这部著作中受到一种启示：研究问题要穷其源，而溯源要追溯到最远处。“本文”的原始亦即“源”清楚了，也就能清楚“流”的脉络。从而阐明：一种发展中总是有多个层次。

穷其源的研究方法，贯彻在饶宗颐先生近年的许多重要研究中。

研究中国文化，要穷追到古礼的流变。最近发表的《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一文，<sup>⑲</sup>着重指出：“西亚以占卜术影响各地，人神交往，但巫的观念则绝迹”。“魔法决不等于宗教，殷周有他们立国的礼制。巫卜只是其庞大典礼机构中负责神事的官吏。巫，从殷以来成为官名，复演变为神名”。“巫咸是殷的名臣……在屈原心目中，巫咸应是一位代表真理的古圣人，和巫术毫不相干”。

饶先生批评时下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昧于“巫”字在古代中国的真相，使用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陈迹比附古代历史，以所谓萨满主义比附文明高度发展的古代中国历史，“而把古人记录下来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支柱”。饶先生不同意这种观念，他说：“我认为

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

饶先生认为：目前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实证，说明了古代“礼制”的可靠性。饶先生主张从“礼”和有关的制度细心探索，代替时下那种以“巫”来解释古史的看法。认为“从制度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

饶先生近年来正着手据甲骨文研讨殷礼，这是一件具有“正本清源”意义的重要工作。

研究印度文化，则穷追到四种吠陀的流变。例如，饶先生在《中国文化》第五期发表《阿闍婆吠陀第一章三七释义》。阿闍婆吠陀为四吠陀中较重要的一部，而国人中介绍者鲜少，此文追溯到该书中“三”与“七”的概念的起源，讨论阿闍婆吠陀与近东文明的关连。其中证明，该书中“七”的观念来自四方加上、中、下的观念。

《论印度河谷图形文字》，①研究了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以前久已被人遗忘的古文化，并与我国半坡、乐都二里头陶文符号相比较。饶先生认为，印度河谷图形文字，跟印欧系统的语言结构完全相违背。在《说卍(Svastika)——从青海陶文试谈远古羌人文化——》②一文中，联想到古代雅利安人的卍符号，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同类符号。《丝绸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③《“羊”的联想——青海彩陶、阴山岩画的卍号与西亚原始计数工具》④等文都反映了作者探讨近东、中亚及中国远古图形文字、陶文符号的起源的新努力。

饶先生还研究了鸠摩罗什以后印度“悉曇”即语言音韵之学对中国文学的长达数百年的影响，如《印度波伽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评议》、《梵文四流音R̄ Ṝ L̄ Ṭ̄ 及其对汉文学的影响》、《鸠摩罗什通韵小笺》、《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通韵》、《禅门悉曇章作者辨》，都是讨论印度语言音韵之学对中国音韵学及文学的影响的作品。

前述Kane氏的著作在纵的研究方面追溯到吠陀，在横的方面则涵盖文化史的众多科目：法、宗教、天文、术数、诗学以及制度史的许多层面。饶宗颐先生的治学格局，也跨越了文、史、哲的多个学科部门，从中可以看到Kane的影响。

承郑炜明先生见告：饶宗颐先生迄今已发表专著40余部，论文300余篇。据前引季羨林先生专论，曾将饶先生专著分为八类，此种分类似亦契

合适堂先生之原义，今试斟酌综析如下：

## 1. 敦煌学

1980年前后，日本敦煌学界协力出版十多卷本的《敦煌讲座》（大东出版社）。出书初，出版社约请国际敦煌学界六位名宿向读者推荐此书。日本学者有榎一丈先生、山本达郎先生等四人，国外学者则有饶宗颐先生及法国谢和耐先生等二人，由此可见饶先生在国际敦煌学界备受尊崇的地位。

先是1956年饶先生首次在香港出版《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该书曾由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道教史研究班列为教材。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校订增订本《老子想尔注校证》。

1971年，饶宗颐先生与戴密微教授合作出版《敦煌曲》一书，是书内容有中文及法文对照。该书不仅在敦煌文献学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中国音乐史和音乐文学史上，清理了汉宋之间，从梵呗、法乐的源头、以及由声曲折、民谣的源头，如何演变为杂曲、曲子，又如何影响到后来之文人词。对于俗文学，研究了长行与短偈相间的文体。又据巴黎及俄国藏卷研究了佛教赞文，这是一部对国际敦煌文学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巨著。

1978年作为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丛刊，出版了《敦煌白画》，不仅首创性地公布了若干白画，更在文字部分对中国画史研究贡献良多。1983年又在日本二玄社出版《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该书不仅在书法史上提供了大批文献，又因分类编辑，亦提供了一般敦煌学研究文献。如《书仪》分册即足资书仪研究参考。各卷有饶先生所撰解说，其考释十分珍贵。

饶先生对敦煌学的研究涉及到佛教史、道教史、袄教史、文学史、天文史、书法史、画史、经学史、文学史、中外关系史、音乐史等多个领域。以音乐史为例，1990年在台湾出版《敦煌琵琶谱》，1991年则于台湾出版所编《敦煌琵琶谱论文集》，都是体现当前学科前沿水平的著作。

## 2. 甲骨学

饶宗颐先生目前正在主编由沈子瑜先生及其女公子沈建华协力研究的多卷本《甲骨文通检》，1989年已于香港出版第一册，是书亦按地名、天文等分类编辑，此为一浩繁巨大之工程。

早在1959年，饶先生出版《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该书以贞人为纲，卜事为纬，凸出殷史全貌，出版之时，使人耳目一新。

饶先生又对散在欧、美、亚的甲骨资料，辛勤搜集，并先后出版《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香港）及《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1970，新加坡）诸书，都是对我国甲骨学的新贡献。

### 3. 词学

先是1939年，饶宗颐先生佐叶恭绰先生选辑《清词钞》，是为留心清词之始。

1963年又于香港出版《词籍考》一书，对明以前词书，包括总集、别集及有关资料，罗列具备。其后，值欧洲学者以巴黎大学及高等研究院为中心，以国际协作方式制定《宋史研究计划》，遂邀请饶先生参与其列，任词籍工作，因有《宋词书录解题》<sup>②</sup>之作。

饶先生又发凡起例，辑《全明词》初稿，得九百人，此事颇得李一氓先生重视。

1969年，饶先生又刊布《清词年表（稿）》排比词人生卒及词集刊行年月。其间词人之交往，及词籍之发现与刊布，按年条列，有清二百余年间，词学演变之梗概，于焉可窥。<sup>②</sup>

### 4. 史学

《选堂集林·史林》（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是饶先生的史学作品的结集。又，上海亦将出版饶先生自己编选之《饶宗颐史学论著选》。

饶先生之史学研究，涉及宗教史、中外关系史、金石史、地方史、断代史（先秦史、新莽史等）、版本史、文学史、音乐史及若干专史。

以地方史为例，饶先生撰《九龙与宋季史料》（香港，1959年），编纂《潮州志汇编》（香港，1965年），均赋有盛名。

以专史为例，1977年于香港出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集中历代有关文献，极便读者。史学著作在饶先生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 5. 目录学

1935年刊布之《潮州艺文志》（见《岭南学报专号》4卷4期，1935；6卷2—3期，1937），为饶先生成名之作。

1970年出版《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其中如《欧阳文忠集考异跋》略云：此洪武十九年欧集考辨，向来著录有三误，其一误为宋、元刊，其一误与蔡本相混，又一误为明正统刊。饶先生重加订正，其考证之精若此。

而后引之《楚辞书录》及前引之《词籍考》等，亦为目录学之要籍，目录学为饶先生少年时喜好之学。

### 6. 楚辞学

选堂先生青年时撰《楚辞地理考》，与钱穆先生论辩，1946年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在香港出版之《楚辞书录》，为第一部楚辞书目。1958年复于香港出版《楚辞与词曲音乐》一书，不断扩展楚辞与相关学科的研究。

1978年在题为《楚辞学及其相关问题》的讲演中，进一步阐发了“楚辞学”建立的意义。略谓：“中国文学重要总集，如诗经与文选，都已有人著书成为专门之学，像诗经学、文选学之类，楚辞尚属阙如。本人认为今日治学方法的进步，如果配合新材料和新观念，楚辞的研究，比较诗经更有它的重要性”。力主“楚辞应该成为一专门之学”。

### 7. 考古学、金石学

固庵先生早年即已关注乡邦金石、考古。1950年在香港印行《韩江流域史前遗址与文化》。后又对海外金石之学开展研究，1972年在新加坡出版《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81年又主持出版法国远东学院藏拓本《唐宋墓志》。

饶先生对战国楚文化考古尤其关注。1957、1958年在香港出版研究战国楚简及长沙出土战国缙书的专著。近年来，与曾宪通先生合著专书二部，一为《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3），另一为《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1985）。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

### 8. 书画

宗颐先生是著名的艺术史家。1977年在香港出版《黄公望及其富春山居图》。1983年于日本东京二玄社，出版《虚白斋书画录》。

最近，选堂先生已编定美术史论文集《画颀》一书，收入论文四十余篇，其中有论八大山人绘画与禅宗关系者。近年来选堂先生以艺术史学闻名于国际学界。

以上是从八个独立学科门类，来论述选堂先生的治学特色。然而，综观饶先生的全部学术，却应是一种分割不开的整体。其中贯穿着对中华文化精神的探求，而正是在《选堂诗词集》中，我们可以追寻到此种精神之探求。如饶先生诗集《西海集》中《哥多瓦歌》云：“蒙庄博依等鹏鲲，长春亦复逾昆仑。莫思西狩战尘昏，木司塔辛玉石焚”。此诗为饶先生1976年游西班牙哥多瓦（Cordoba）城所作。哥多瓦与报达（巴格达）及亚历山大为中古伊斯兰三大中心。饶先生在哥

多瓦城的残壁废垒之前，想起1285年蒙古之旭列兀（Hulagu Khan）西征，破报达，由是阻止了伊斯兰势力之东进。从而使13世纪之中国与印度在保持旧有文化上有了不同命运。<sup>②</sup>饶先生的世界历史眼界，其实就是要追踪及确定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

1991年，饶宗颐先生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文辙》（文学史论集）上下二册，集中反映了先生追寻中华文化精神的努力。该书小引标明此论集为“中国精神史探究之一”，略云：

“1979年，余编次史学论文，命名曰《选堂集林·史林》。其它有关文学、书画、音乐、宗教等论著，亦吾国精神史之重要对象，将次第整理，继为文林、艺林等之辑，而卒卒未暇。本书所收长短论文，统六十余篇，皆文林一类之旧稿也。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沈探颐，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即文学方面，赏鉴评鹭之余，亦以治史之法处理之”。

这一段文字对了解饶先生的学术十分重要。这里把近年的研究工作概括为《中国精神史探究》，此中又可分类为：

文林：《文辙》上下册，1991年，台北。

史林：《选堂集林·史林》上、中、下三册，1982年，香港。

艺林（书画）：《画颯》，台北待出。

艺林（音乐）：《敦煌琵琶谱》，1990年，台北，等等。

宗教：《选堂选集》，《现代佛学大系》第53册，台北，弥勒出版社，1984年。《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选堂先生从历史、文学、书画、音乐、宗教等五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精神史的轨辙。其所采用的方法是文化史方法或制度史的方法。如在文学史研究中，既从审美的视角（赏鉴）和文学批评（评鹭）的视角立论，更从治史的方法（文化史视角与制度史视角）立论。而所谓“钩沈探颐，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贯通”，则是在借鉴印度Kane氏之《法史》一书的博大气象之余，更上一层楼。

#### 四、继承、开拓与首创精神

宗颐先生幼承家学，然其治学襟怀，自少年

时即未局促于南天一地。

宗颐先生尊翁饶锜（1891—1932年）先生，尤长于考据之学，建天啸楼藏书五六万卷，著有《潮州艺文志》多卷，并《天啸楼集》五卷（参见《广东文徵续编·饶锜小传》）。其学颇受孙诒让影响。宗颐先生早岁整理饶锜先生潮州艺文志，以此知名。

宗颐先生入中山大学通志馆修纂地志，利用馆藏方志撰古地辨，成《楚辞地理考》一书。其时学术，颇受顾颉刚先生及禹贡学派的影响。后曾应顾颉刚先生之约，为齐大国学研究所编纂新莽史。抗战爆发后，因病留居香港，为王云五氏《中山大辞典》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又佐叶恭绰先生编定《全清词钞》初稿，故有《词籍考》之作。

宗颐先生青年时期的这段治学经历，有两个鲜明的特色：

一是饶先生有很强的自审精神。例如，饶先生青年时有一个时期功夫在两汉，曾致力于《新莽史》。今日《选堂集林·史林》中收录之《新莽职官考》及《西汉反抗王氏者列传》即这一段工作的留痕。四川《至善半月刊》曾登载其用汉书体裁作新莽史之序言。后因再读《通鉴》，遂改变主张，并研究中国历史上之正统问题。一方面，把新莽史旧稿压下来不发表；另外，则于日后撰成《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论》一书。

又如，饶先生早期亦应邀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地理部分（在留居香港期间），后亦未成。因不断自省，亦改变观点，认为疑古辨伪的工作往往做得太过容易，盖因大家喜新奇，而新的考古发现，往往证明古时记载的可靠和某些辨伪之并不存在。近年，在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饶先生请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代为宣读了《古史地名学发凡——以〈夏本纪〉禹后以国分封诸姓为例》，指出《史记》只有河渠书而没有地理志。饶先生通过甲骨文通检的编著，计得地名总数1100个。又运用史籍文物对勘方法，对《夏本纪》禹后以国分封诸姓之地名作了具体研究，并发现了复原其地名构成的规律。

另一点是，饶先生早在青年时期，其治学风格即已打破了南学、北学的疆界。

这里不妨先说一下三、四十年代几位名家对所谓“南学”、“北学”的一些论述。

1933年12月27日，陈寅恪先生致陈垣先生函有云：“岑君文谈论，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

意)。此君想是粵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②细审此信，得知陈先生所云南学，乃指江淮以南之学。此信虽不可泥解，但从中可以看出30年代陈寅恪先生对南方学术兴盛的乐观估计。而此信也足以说明如饶宗颐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于30年代成长于南粤，决非偶然之事。

但是，粤籍大家陈垣先生对于所谓南学、北学，却采取了一种超乎其上的豁达态度。陈垣先生1936年致陈述先生信中云：“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③东塾为广东学者陈澧，东壁为河北学者崔述。陈垣先生在本诗中表现出一种会通南北之学的博大气象。

1942年，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一书中写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④在会通南方北方之学外，更提出会通东海、西海。

宗颐先生尊翁饶锺先生，心仪顾亭林、孙诒让、沈曾植，又曾拟为佛国记疏，其治学眼界已经十分阔大。宗颐先生习画师傅杨先生，亦与任伯年颇有涉。因而饶先生的治学襟怀自幼时已不局促于南粤一地。青年时见重于顾颉刚、叶恭绰、王云五诸先生。如曾随王氏编制查甲骨文、金文的八角号码。叶、王二氏虽为粵人，然其治学亦打破南北疆界。因此，饶先生的治学风格中，有一种跨越南学北学、跨越东海西海的宏大规模。

总的来说，饶宗颐先生治学特点，在能不断创新，极具开拓本领。喜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在数十年的研究中，饶先生在多个课题上率先研究，处处表现了一种首创精神。如：

——目录学上，率先编词的目录，青年时著有《词籍考》。

——率先编写《楚辞书录》。

——楚画研究方面，为先行者。

——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之第一人。

——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

——在中国学人中，是第一位翻译、介绍、研究《近东开辟史事》的学者。

——第一个研究《日书》。

——是率先研究楚辞新资料唐勒所作赋的学者，1980年首次发表于日本京都。

——率先编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治楚帛书先人著鞭。

——首次辑《全明词》。

——首次编录星马华文碑刻，开海外金石学之先河。

——敦煌白画为前人未接触之题目。

——在东京出版《敦煌书法丛刊》廿九册，亦为首创。

——首论南诏禅灯系统。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提出“发问文学”概念。

——率先以半坡等地陶符与中近东图形符号比较。

——在汉字与诗学关系中研究形声字美学作用。

——在日本书道史中发见受隶书影响的一个特别的阶段。

饶宗颐先生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不倦地从事前无古人的研究事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990年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近东开辟史诗》一书。先是1976年在法京，假日从J. Bottéro习楔形文字及西亚文献。近东开辟史诗，是阿克得人的天地开辟神话。全文用楔形文字刻于七大泥板之上。上半部记述天地开辟之初，诸神间之互相战斗，由于两大势力的争夺，后来才产生出太阳神马独克(Marduk)。下半部叙述马独克安处宇宙间，三位最高神明Anu, En-lil及Ea，兴建巴比伦神庙的经过，以及它如何从反叛者身上沥取血液来创造人类。

近东开辟史诗宣扬了近东宇宙论之二元论。饶先生第一次把它译为中文，并以其宇宙论与《淮南子》、彝族宇宙论、古代楚人说加以比较，从而讨论近东与远东两个地区的开辟神话与造人神话的异同。⑤

环顾国内学术界，时下不少新俊热心于神话学、神话哲学、比较神话学研究。宗颐先生是一位高龄的名宿，也参与这一胜流。这说明，饶先生虽然是一位资深的前辈学者，却又酷好新事物，在学术上总是保持一颗“童心”，一种敏锐的感觉，从而不断焕发着学术生命的青春。

近世以来吾国许多著名学者和诗人，都有一种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强烈使命感。但由于历史和个性的原因，一些近世大学问家的人生及其学术作品中，也时而笼罩着一层悲凉之雾。我们回顾饶宗颐先生近数十年来追寻中华文化精神的轨迹，除了同样赋有弘扬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外，

还有一种清明豁达的气象。饶先生诗云：“万古不磨业，中流自在心”。在这两句诗的多层涵意中，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宗颐先生以多年的探求找到了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因而得“大自在”。最近的又一个例子是，选堂先生近来提倡礼——夏礼、殷礼等等——的研究，正在法国汉

学家中引起反响，而前引大作曾批评以萨满主义解释中国古史，认为对此风气应予反省，且应提倡礼的研究，该论文正由美国中年汉学家组织翻译中。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饶宗颐先生为在国际汉学界及海内外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季羨林：《谈饶宗颐史学论著》（《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

②⑦钱仲联：《固庵文录序》。

③⑩钱仲联：《选堂诗词集序》。

④⑮《王国维书信集》。

⑤王国维：《沈乙龠先生七十寿序》，见《观堂集林》卷十九。

⑥王遽常：《沈寐叟年谱》，台湾《人人文库》版。

⑦参见王遽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同上书附；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外一种）》中华书局，上海，1962年，参见钱仲联先生为该书所写《前言》。

⑧沈曾植：《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参见：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第121页，齐鲁书社，1983年。

⑨饶宗颐：《白山集·附大谢诗跋》，《选堂诗词集》第40—41页，香港，1978年。

⑩⑫⑬饶宗颐：《选堂集林·史林》上册、中册、下册，香港中华，1982年。

⑭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44页。

⑮王遽常：《沈乙龠先生学案小识》，谓沈曾植学有三变，“壮岁由理学转而治考据，此一变也”，“又由考据而求世用，此又一变也。晚年潜心儒、玄、道、释之学，此又一变也”。

⑯参见《沙州文录》。

⑰《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1992年。

⑱收入《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参见：《明报月刊》，香港，1990年10月号。

⑲⑳《明报月刊》，香港，1990年9月号、11月号。

㉑㉒㉓饶宗颐：《文徽》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

㉔《选堂诗词集·西海集》第22—23页。

㉕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7、622页，上海，1990年。

㉗钱钟书：《谈艺录》。

㉘饶宗颐编译：《近东开辟史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线索和分期

周 军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来说,历史资料的积累和运用固然重要,其自身的理论建设,亦不应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线索和分期,便是值得重视的两个理论问题。正确地认识基本线索,有助于把握经济发展的主要脉络和总体趋向,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有利于认识经济过程的本质特征和演化规律。

##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贯穿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是生产力的现代化,即由传统生产力向现代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一条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即由传统生产关系向现代生产关系的转化过程。

中国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完整发展阶段,在生产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的情况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19世纪60、70年代以后,清政府举办了一系列现代军工民用企业,由此开始了我国生产力现代化的历程,但其进展却十分缓慢。1920年,机器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4.8%,加上工场手工业,也只占10.8%。到1949年,这两个数字也分别只有17%和23.2%。以个体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生产力,在旧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始终占居优势地位。

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逐渐达到70%以上。但是,整个说来,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领域仍未由以手工劳动为主转为以机器生产为主,即没有进入以大机器工业的技术装备、加工工艺和科学管理武装和改造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阶段。在建国以后的40多年时间里,中国仍处于由传统生产力向现代生产力过渡的阶段。生产力的现代化,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基本线索。

旧中国生产力现代化的步伐极为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传统生产关系来说,封建地主所有制的消极影响自不待言,即就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关系来说,外国在华资本所有制对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它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制所造成的影响,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与传统生产关系相比,中国的国家资本所有制和私人资本所有制,虽然都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但事实证明,国家资本所有制,并不能有效地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而它对私人资本所有制的排斥和侵夺,却延缓了生产力现代化的步伐;私人资本所有制由于自

身力量非常软弱，也不可能承担实现生产力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为实现生产力的现代化开辟广阔的前景。这条历史道路，也规定了1949年以后中国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转化。这种转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基本线索。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是什么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sup>①</sup>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sup>②</sup>实现生产力的现代化。因此，生产力的现代化，至少在1956年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 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分期

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过程中，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往往使经济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变化的重要表现，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分期的直接标准。

国内出版的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著作，就笔者已拜读过的几本来看，虽然大多没有直接论及分期问题，但基本上都是按不同时期分编(或分章)叙述，因而反映了各自的分期意见。概括起来，这些意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意见，可称之为“五段分期法”：（一）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二）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三）1958—1965年，“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四）1966—1976年，国民经济的“十年动乱”时期；（五）1976—1983年，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第二种意见的特点，是把第一种意见中的第三个时期，分为“大跃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两个独立的时期。这种意见，可称为“六段分期法”。第三种意见，是从建国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表现，即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这个标准出发，把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一）1949年10月—1956年，经济形态转变和生产由恢复走向发展时期；（二）1957—1966年，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也是第一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走什么道路，在探索中发生严重失误，引起生产大上天下，进行大调整时期；（三）1967—1976年，经济曲折、畸形发展的时期；（四）1977—1984年，经济建设走上新道路和起飞的时期。这三种意见，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变化发展过程，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化的重要表现这个角度来看，有几个问题似乎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是，把1949—1952年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时期，根据是国民经济在这段时期得到了恢复，到1952年底，中国经济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把这段时间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时期，亦未尝不可。但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依据则欠妥，1949年以后，中国继续改变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把旧中国的国家资本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封建地主所有制改变为个体农民所有制。这种变



革，到1952年底以前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这种重要变化，才是1949—1952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时期的根据。实际上，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

二是，把1953—1957年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其根据是这段时间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是否合理。因为与任何计划一样，“一五”计划也是人们思维活动的产物，属于主观范畴，它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阶段，并不一定相合。事实上，“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在1956年已提前完成，更重要的是，到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195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分明显，1956年与1957年之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界标。<sup>⑤</sup>但是，这种情况，在上面所说的“六段分期法”和“五段分期法”中，却没有得到什么反映。

三是，把1966或1967—1976年作为一个经济时期是否妥当。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但能否据此将这10年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时期，则有商讨的必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看，1966年以后，虽然有人鼓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断革命，特别是想在农村搞“穷过渡”，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并没有因而向更高的层次过渡。197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也没有出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总之，1966年以前已经形成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一二年内，也没有发生明显的转变。把1966—1976年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时期，从政治上看固然妥贴，但从经济史上看，似乎并不恰当。

上面几种分期意见，从不同的侧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和阶段性特征。这些尝试和努力，对于学科建设，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意见，大多又给人一种缺乏统一的分期标准或不能将分期标准贯彻始终的感觉。因此，本文试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化的重要表现这一标准出发，将1949—1989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重新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1949—1952年，改变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的时期。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改变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变旧中国的国家资本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第二，改变与传统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变封建地主所有制为个体农民所有制。这种变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1953—1956年，由多种所有制形式走向单一所有制形式的时期。1952年以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一度表现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其中既有建立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和个体手工业者所有制，又有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私人资本所有制和国家与私人合资的联合所有制，也有各种形式的合

作社经济。这段时期，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是在三个领域中展开的。在农业领域，通过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把个体农民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手工业领域，通过手工业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和步骤，把个体工业者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现代工商业领域，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三个步骤，逐步把私人资本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1956年底，多种所有制形式，基本上已经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勿庸讳言，这段时期建立起来的现代生产关系，相当部分还缺乏现代生产力方面的基础，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形式也过于单一。

(三) 1957—1978年，在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从经济管理体制，即生产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管理机构等方面的表现形式来看，这个时期可分为五个阶段：(1) 1957年，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阶段。“一五”时期形成的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在1956年以前，在很多方面尚有一定的灵活性，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公有制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这一年建立了起来。(2) 1958—1960年，经济管理权限下移到地方的阶段。中央所属企业和重要的管理权限，大量地下放给地方。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到严重挫折。(3) 1961—1965年，经济管理权限主要集中于中央的阶段。针对上一阶段出现的权限下放过多过急的情况，从体制上加强了计划、基建、财政、信贷、价格、物资、劳动等方面的集中统一。把下放过头的管理权限陆续收归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如企业自主权过小等，并没有得到解决。(4) 1966—1969年，经济管理体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一时期，已经建立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遭到否定和批判，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遭到破坏，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5) 1970—1973年，经济管理权主要掌握于地方的阶段。1970年，通过下放企业和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等办法，扩大了地方的管理权限。经济管理体制，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开始在指导思想上清除“左”的错误，但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在1977—1978年尚未发生变化。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挫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并不能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四) 1979—1989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这段时期，改变了过去主要在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上兜圈子的做法，从增强经济单位的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出发，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开始公有制经济内部推行多种经营方式。这个时期，可分为二个阶段：(1) 1979—1983年，重点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实行农户家庭经营。到1983年，全国已有99%的生产队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在此基础上，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城市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验。(2)1984—1989年，重点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开始推行承包、租赁等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同时，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经过改革，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到198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77.6%下降到56.8%；集体所有制由不足22.4%上升到33.7%；其他所有制形式由几乎为零发展到9.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54.6%下降为1988年的39.4%；集体所有制商业由43.3%下降为34.4%，其他为26.2%，其中个体所有制商业占17.8%。<sup>④</sup>由于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及在公有制内部探索和推行多种经营方式，再加上其他各种努力，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③ 见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分期》，《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④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

(上接第124页)

学对于各种文学史(国别的、各体的、断代的等)都有其普遍的指导意义。

---

① 见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原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49页。

② 西方将历史哲学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后者以如何研究历史为对象，与本书所言“文学史哲学”相似。

③ 《历史的观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④ 《人论》第261页、262页。

⑤ 《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⑥ H. Reader and B. Jessup, *Art and Human Value*, New Jersey 1976, P245.

⑦⑧ A. Hauser: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P150, 268, 5.

⑨ 可参见姚斯《走向接受美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第1页；

韦勒克：《The Fall of Literary History》，The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学院分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中国古代文化人心态探析

刘汉东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情况复杂，来自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所以具有多重的性格。他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的状况，使他们实际上处于政治依附之中，但又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执着地追求理想价值的实现。<sup>①</sup>因此，作为古代文化人，<sup>②</sup>他们的心态，既有依附的一面，又有强烈反映的一面。对此加以分析探讨，不仅是对古代阶级结构中某一阶层的认识问题，也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加深认识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人，其终极目标并不是要做一位著名的学问家，而是要做一名官僚或政客。因此，他们只能依附于政治权势，其心态必然处于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尊的矛盾之中。

文化人的依附心态，常常在无可奈何之中外现，其才学技艺、雄韬伟略，都要屈从于政治权势。司马相如文武全才，一生不过为汉武帝文学侍从。邹阳一代文辩之士，被西汉梁孝王下狱，其上书是很说明这种心态的。他自以为是“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不愿暗投，却遭此劫，“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只怨结而不见德。”他闪烁其词地说了一番穷士依附政治权势的话：“今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底之客，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sup>③</sup>可见布衣穷士效忠和尽绵薄之力，无非是觊颜献媚之态，也即文化人的依附心态。

因为，“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唐李商隐）。文化人不依附政治权势，空有一身绝艺，还是象虚设的玉梯，无处施展，最终如一对被隔绝的情人，象月缺不得团圆，只好又想望，又想休，矛盾丛丛。司马迁之才，二千年来盛赞不已，但一为李陵下狱，“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无奈为了完成先父夙愿，只好忍受“重为天下观笑”的屈辱，“茸以蚕室”，“就极刑而无愠色”，屈从于政治权势。

东汉以后风气，文化人追求做名士，以此邀誉，以买高官厚禄，而依附心态则更是“诡众虚伪”了。王符便说：“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sup>④</sup>所以当代史学家吕思勉说：“声誉可以虚造，况其人本能矫情伪饰者乎？”“故盛名之下，必无骨鲠之士”。<sup>⑤</sup>这显然点明了文化人的依附心态。

魏晋南北朝的清谈名士，也尽取虚名，以造声誉，自以为风度。南齐褚渊，“美仪貌，善客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送之”。<sup>⑥</sup>纪僧真也以风度受到称赞：“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sup>⑦</sup>他们取虚名造声誉，无非是博取政治权势的认可，以此取得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特权。所以，吕思勉说：“清谈之士，固多名利之徒”。<sup>⑧</sup>

隋唐科举取士，进士科尤其为人所重，文化人追求此科，趋之如鹜，趋炎附势，攀缘权贵，以求遂志。《旧唐书·钱徽传》载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尽是攀附而得。重新考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此题并不太偏，可是十四名进士竟都未知出于《周礼》的孤竹管祭天之乐，只有四人马马虎虎，“所试粗通”，三人及第，一人特赐及第，其余十人罢黜。

五代科场更有奇事，崔棣负责贡举取士，其中一举子名叫孔英，丑行内外都知，宰相桑维翰也知道，因而对崔棣说：“孔英来矣。”<sup>⑨</sup>崔棣不知桑维翰之意，认为将孔英相托，竟取之为进士。可见文化人在科举制度形式中，投附权贵，依附于政治权势，是十分普遍的。

宋以后，实行糊名方法，但并没有断绝科场作弊，文化人仍需曲膝于权贵面前，以求录用。如王钦若为主考官，考生任懿托其私交僧人惠秦赂以白金于其妻李氏，李氏派人入考院，将任懿姓名和白金数量写于手臂而告，因此得以取中进士。

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正式规定以八股文章取士，更使文化人只以空洞无物的死记章句和适应程式去猎取功名荣誉，追求官职，实际却什么也不懂，“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sup>⑩</sup>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一回便借王冕之口大加反对，并在书中点出“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人生世上，除了这事（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在其笔下，文化人依附心态和扭曲人格被披露得淋漓尽致和体无完肤。因为文化人读书在于求富贵、求权势、求家族发达，所以“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必要做的”（第十三回）。

中国古代文化人，由于其特殊的进身途径，只能依附于政治权势，其心态中的依附性也就比较明显和比较严重。

## 二

中国文化的特色是创设理想价值，使人们有一个永远的追求，得到精神的平衡和心理满足，以弥补缺乏宗教给人们以精神避风港的缺陷。

中国文化没有宗教，所以便以理想价值来替代，以起到宗教的作用，又正因为没有宗教，所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便交织在一起，在维护基本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追求理想价值。文化人利用理想价值系统批评政治权势和现实秩序时，又往往认为伦理的最高境界是超凡入圣的，是哲学的、精神的、宇宙观的、“道”的范畴，是以高度超脱的眼光所看到的事物本体，或者是以主体意识所感觉到的自然万物之“道”。最终归宿是

“道”，士应志于道。这就使古代文化人心态渗入了宗教的精神。

文化人追求理想价值，首先要守于道。孔子强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sup>⑩</sup> 否则，就有违于伦理型仁政观和道德型礼教观的价值系统，有悖于道。在道与人的关系上，人可为道牺牲一切利益，有一种宗教式的献身精神，“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sup>⑪</sup>

文化人追求理想价值，其次要淡泊于名利。“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不要以己之学而热中于名利，“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文化人首先应该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sup>⑫</sup> 以道以德为追求目的，而不是以名利为目的，文化人应追求伦理道德价值系统得以在人本体和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淡泊名利而追求理想价值，既是后世隐士逸民独行达志者思想观念之源，又是文化人审美情趣以静谧闲逸为主的思想观念之源。这在汉赋、唐诗、宋词、宋元山水画、明清山水画中，都体现了文化人追求幽远寂静境界，淡泊于尘俗虚名假誉和权势富贵身外之物的深层意境。

文化人追求理想价值，再其次要安于贫贱。忧德不忧贫，安贫乐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sup>⑬</sup> 文化人不能忍受贫穷，就谈不到志于道，所以孔子特别赞赏“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为贤人。<sup>⑭</sup> 另外一些则是不怕贫贱，伺机以取富贵。如郾食其，“好读书，家贫落魄，无衣食业。为里监门，然吏县中贤豪不敢役”。<sup>⑮</sup> 又如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sup>⑯</sup> 甚而成为有名的胯下之夫。但郾生一言而动汉高祖，韩信纵横捭阖于天下，所以孟子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sup>⑰</sup>

文化人追求理想价值，又其次应该不慕权势，以行道明德为根本。文化人若要成贤士，就应“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拒绝屈从于无道行为和不从道的王公权势。如《战国策·齐策四》所记载的“齐宣王见颜斶”的故事，颜斶认为“士贵耳，王者不贵”，尧舜禹汤之所以伟大，都在于“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

文化人追求理想价值，还在于达道不分先后，有殉道的宗教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切都是不重要的，只有道才是重要的，道之所在，必追求不已，道之所得，虽死不悔。以道而为圣人，“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sup>⑱</sup> 圣人为众人服务，从众人中来，到众人中去，“学于众人，斯为圣人”。这就是生殖伦理宇宙观下所提倡的人道主义，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本来就有人道之义，“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sup>⑲</sup> 其道之最根本意义，就在于男女阴阳相配生殖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人事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叠合是道，是理想价值的终极归宿。文化人理想的人格形象和心态表现，就是执意追求理想价值。

文化人追求理想价值尚有许多方面，其实现的途径也有不少创设。但真正作为实践的手段，作为可以操作的程序，却无法与现实相脱离，也就不可能真正摆脱依附性，使

文化人与政治权势相分离。只好在凄凉的境界中，自我封闭。文化人受结构规定，必然在追求理想境界时，又要受现实境界的束缚，依附于政治权势，外现出依附心态。因此，自我清高又是封闭不住的。

### 三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人对于理想价值的追求，虽然处于政治依附地位，仍然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没有参与政治过程作为手段，就不可能维护理想价值，就不可能有仁政、德政与礼教的实行。

文化人不要以名利富贵作为目的，要有淡泊观念，可也要具备参与的条件，以道为目的，以理想价值为归宿，“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sup>②</sup>表现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肩负历史使命的壮志雄心。

但是，他们又有抵制依附政治权势的一面，退尘俗而隐山林，蛰伏而遂心志，以求心理平衡。中国的隐士现象，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的重要心态表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归隐深居，自古以来便是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据蒋星煜统计，“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sup>③</sup>选择非参与态度的文化人不在少数。范晔《后汉书·逸民传》提出六种隐匿不出的文化人情况：求志、全道、镇躁、动槩、激情、全节。细究其情，都与现实政治有关，只愿重道义，不愿媚王公，归隐蛰伏。

隐士摒弃官品，绝尘富贵权势，被认为是体会了生之恒性，神之常道，不碌之于世俗之求，不迷惘于言色之感，闻道而安乐，达义而自得。他们“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寝巢而韬其耀，良画以符其志，绝机以虚其心。”<sup>④</sup>多么逍遥自在的自然之体、自然之形、自然之思，自然之存！安于天地之间，乐于宇宙之中，动于神人之际，得于无心之后，其志已遂，其心已明，既独善，又修道，至乐之余尚能修身养性。这简直使人觉得已经不是文化人的归隐之士，而是佛教、道家的善修之士！

隐士作为文化人心态的产物，实际上正类似于佛、道宗教文化下的心态。只是他们作为古代文化人，“君子之行殊途，显晦之谓也。出则允釐庶政，以道济时；处则振拔嚣埃，以卑自牧”。<sup>⑤</sup>有显、晦两途，也可分为两个品级，上品是“隐道”，下品是“隐身”。为道而隐者是真隐，为身而隐者就很难说是真隐了。“道隐故曰贤人”，“贤人之隐，义深于自晦”；而“身隐故称隐者”，“无可知之情，鸡黍宿宾，示高世之羹”。两个品级性质不同，“论迹既殊，原心亦异”。<sup>⑥</sup>

古代文化人心态中的归隐之思，人为之殊，事为之殊，兼济显晦，各有不同。要之有六：

其一是个人求得解脱。在社会和价值观念的各种矛盾冲突中，不少文化人被砚磨和揉搓，感觉到心力交瘁。无力继续在宦海和俗世与人争、与己良心争、与伦理道德争、

与奸狡巧伪争。因此，“冥心物表，介然离俗”，得到个人的解脱，超然出俗，“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以为束教之风”。<sup>②</sup>

其二是情系山林为感官之所衷。山林泉壑的美景，大自然的陶然之情使人心旷神怡，与之交相感应，陶醉在旖旎风光之中，“放情肆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之间”。<sup>③</sup>有着心之相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宁静和谧生活，又何必为五斗米折腰！以这种观念“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的隐士，都“欣欣于独善，而不求“汲汲于兼济”的。

其三是天性淡泊，无意于功名场中作精疲力尽的拚搏。他们遁迹而求怡然自得，“以恬淡为心，不矜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sup>④</sup>轻天下细万物，安心于艰难困苦，甘愿于穷困贫贱，虽然也是事出有因，情有所系，但其志之所适，“藏景（影）穷岩，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义，求形神于天壤”。随遇而安，知足而安，“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全身幽履”<sup>⑤</sup>与名利无涉。

其四是求超远高节的虚名。这是隐士中的一部分，“揭独往之高节，重去就之虚名”，<sup>⑥</sup>所以与世不同，标新立异，当时人便说他们“多云纯盗虚名，而无适用”，<sup>⑦</sup>并说：“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矣”。<sup>⑧</sup>虚名并无用处，高节超远也不过是效精卫填海，夸父追日。

其五是行峭性乖不容于世者。性情乖张险僻，有多种促成因素，不过如此一来，就为以儒学礼教、周孔学说和伦理道德价值系统为行为规范的社会所不能容忍。嵇康便说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因而为“世教所不容”。<sup>⑨</sup>一些“裸体佯狂，盲瘖绝世，弃礼乐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者，实际上明知于世难容，权以此“全身远害”而已。另一些“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者，则是以此作为与政治权势保持距离，以求保持一定人格，不致扭曲得那么严重。他们“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汎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怛然如不足”。<sup>⑩</sup>这样，便不致于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势，自己还存留了一点来去的自由。

其六是纯为欺世钓誉之徒。这些人似乎也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誉焉。”<sup>⑪</sup>以蒙蔽视听，且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的手段，使人不知自己是无法在官场有成就，所以才不得不“乐山林”。因而人们便一直以其风操高远而不敢有丝毫不敬的想法和言语。这一类，当时人实际已经洞察：“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故意与众不同，离群遁世，自号隐士，致取高名，“及考其实，不如所闻，”不过是“欺世钓誉者也”。<sup>⑫</sup>

隐士作为文化人的心态，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既重叠又矛盾的状况，并不是文化人产生了摆脱依附和批判现实政治制度的自觉意识，主动在批判、对立的高度上与官本位、与政治权势脱钩，以维护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社会良心”，从而维护人类基本价值。而正好相反，不论归隐者划属于那一个类别，其心态的深层构成，仍然是中国文化结构下文化人的依附性，求志全道是文化人强烈政治参与意



识的辅助。在此，文化人参与意识兜了一个圈，又叠合在一起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经过矛盾又综合了。

他们由于本身的阶层构成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必然地要依附于政治权势，从而必不可免表现依附心态。但是，追求士达于道，追求理想价值，又使中国古代文化人要完成自己在结构之中的职责。依附政治权势与追求理想价值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又是参与意识的分张，也即归隐心态。

概括言之，中国古代文化人，心态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一直处在积极参与、依附、抵制三条线的交织纠缠之中。当然，他们无法摆脱这种纠缠，只有具备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自觉，才能突破。

①参见拙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研究》，《江汉论坛》1989年4期。

②参见拙作：“《论儒之分化与士之游离——兼论文化人与古代知识分子之界说》，《探索与争鸣》1991年3期。

③见《汉书·邹阳传》。

④《潜夫论·实贡篇》。

⑤⑧《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汉末名士条”，丙帙“清淡三条”。

⑥《南齐书·褚渊传》。

⑦《南齐书·纪僧真传》。

⑨《旧五代史·崔暹传》。

⑩宋濂：《宋学士文集·壶坡后集》。

⑪⑭《论语·泰伯》。

⑫⑱《孟子·尽心上》。

⑬《墨子·修身》。

⑰《论语·里仁》。

⑯《汉书·酈食其传》。

⑰《汉书·韩信传》。

⑲《大戴礼记·目录》，清学者王聘珍解诂。

⑳《易·系辞》。

㉑《孟子·公孙丑下》。

㉒《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

㉓⑳《晋书·隐逸传·序》。

㉔《宋书·隐逸传》。

㉕⑳《魏书·逸士传》。

㉖《旧唐书·隐逸传》。

㉗《隋书·隐逸传》。

㉘⑳《南齐书·高逸传》。

㉙《梁书·处士传》。

㉚《与山巨源绝交书》。

㉛⑳《新唐书·隐逸传》。

㉜《元史·隐逸传》。

作者单位：广州师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 峰

# 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唐代政治

谢元鲁

以政治权力和权术的运用为核心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从问世至今的四个多世纪中，对政治学和历史学中颇有影响力，然而也是争议较大的问题，和这位十六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相比，唐王朝的政治家们面临的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相似，但又迥然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环境。正是这种相异和相似，使得两个不同的国家和时代的政治权力运行和政治思想发展的比较，能够给予人们新鲜的启示。

马基雅维里所生活的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的意大利，是一个政治上长期分裂割据的时代。由于从十一世纪起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在强大的城市国家之间，长时期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以谋求霸权，而罗马天主教会也直接控制了以罗马为中心的一大块世俗领土。长期争战和结盟的结果，到十五世纪后期，在意大利形成了五个大致势均力敌的强国，即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教皇国，此外还有若干小国。<sup>①</sup>

内部的分裂必然容易导致外族的入侵。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从而使意大利又陷入长期的战争和流血，仅1527年法军洗劫罗马城时，就有成千上万的无辜居民被杀，许多艺术品遭到劫掠和毁坏，意大利丧失了作为独立政治实体存在的条件。马基雅维里目睹了意大利各城邦国家被无情地置于各列强的附庸地位，使他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统一祖国。加之他长期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高级的政治和外交职务，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又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的策源地，政治实验和激烈的改革策源地，而且盖世无双地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sup>②</sup>因此，以《君主论》为代表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反观七一九世纪的唐王朝政治状况，则与

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形成鲜明的对比。唐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以强盛、统一著称于世，它有组织严密的、高效率的中央集权政府，有战斗力很强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和随后实行的募兵组成的军队，有庞大的、分工明确的官吏系统，因此，在唐王朝的前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威远播。安史之乱后，虽然国势削弱，但是仍然基本上维持了统一与稳定。这种政治局面的出现，是与唐代政治家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封建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唐代的社会变化情况加以调整改革后的治术分不开的。因此，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高峰的唐王朝的权力运用方式和政治指导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自然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唐王朝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思想文化领域，又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在各自的史册上，都被称为思想解放的时代。文艺复兴使人们开始摆脱中世纪的封建神学思想枷锁，他们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中找到了复兴文化的向导和反对天主教会思想武器，从而在复古的旗帜下创造出资本主义曙光时代新的文明。而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也被称为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传统儒家经学的崩溃，魏晋玄学成为社会思潮，建安文学的直面人生，佛、道、儒三教思想的激烈争论和互补，佛教禅宗思想的兴起，唐代诗歌的繁荣与中外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都可以显示出这一点。宗白华曾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sup>③</sup>唐王朝继承了这一思想解放的潮流，并在某种程度上更把其影响由思想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展：科举制的实行，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的垄断；民族大融合对汉族传统礼教的冲击，使中国历史上唯一女性登上皇位；从三省六部制、均田制、租庸调制与府兵制的建立和不断改革，显示了唐代统治集团富于变

革和否定传统的风气。而更为重要的，是唐王朝所表现出的那种“雍容华贵的风度，宏伟的气魄和昂扬向上的精神。”<sup>④</sup>

其次，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始把他们观察问题的中心由神转到人。他们以人的价值、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代替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以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代替了消极遁世，使人文主义成为历史的潮流。而唐代的知识分子则一方面通过科举制度积极参与政治，企图建功立业，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另一方面要求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和抨击时弊。门阀政治的否定和独立精神的发扬，实际上表现了人的价值和地位的上升。从唐代思想禁锢的松懈，到唐代诗歌中充满的对人生的追求歌颂以及鲜明的个性，都可以反映出人成为表现和歌颂的中心。正如葛承雍所指出，这是一个门阀制度衰落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尚未形成，而封建社会仍然还在局部更新和上升的历史间隙。<sup>⑤</sup>正是这些相异和相似，才使得中古时期的唐王朝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产生了既相同又相异的政治权力运用的方式和理论。

## 二

马克思曾经指出，十六世纪以来的许多西欧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sup>⑥</sup>马基雅维里正是这些思想家中的先驱者。他曾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垮台。我还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的，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sup>⑦</sup>在这里，君主不再是“受命于天”的至高无上统治者，而不过是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家。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伦理道德的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君权也不再是神授，而且还可能在必要时违反公认的德行而趋向邪恶。所以马克思又指出，马基雅维里以权力作为法的基础，“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sup>⑧</sup>马基雅维里天才思想的闪光，揭开了研究国家政治权力运行的序幕。

在另一方面，马基雅维里对权术和暴力的直言不讳与提倡，又使他蒙受恶名。他曾说，君主“如果没有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他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sup>⑨</sup>他

认为，君主在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应该背信弃义，由于中世纪的神权强有力，教皇对教会和世俗领土的统治权威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至于其余的世俗国家，不但难于凭借上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相反还往往由于教皇的干涉而互相分裂和敌对。因此，正如布克哈特所说，马基雅维里对于道德的蔑视及对权术的推崇，是意大利在“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点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sup>⑩</sup>

## 三

然而，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又为政治权力的残酷和权术暴力的运用揭开了另一块帷幕。这种现象，我们不仅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同样可以从唐代政治的发展中看到。

无疑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之一，恰恰是它的道德化。从孔子主张实行“德政”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再到东汉时期谶纬符命的盛行，政治权力道德化的过程一直在进行。这一情形与文艺复兴时期以前的西欧何其相似。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就已认为，君主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才能有希望达到自己意愿的目的。就是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也认为“君主遵循合理的行动的过程将总是道德的过程，他们竭力地为这个观点辩护，以致他们最后把‘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变成了一句格言。最后，他们还提出基督教的教义来说明权术和道德之间的一致。他们坚持说，即使我们在现世生活中以不义的手段获得利益，这种利益也只是表面的，在来世我们将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惩罚。”<sup>⑪</sup>

然而，由东汉末年开始的长期战乱和分裂，以及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局面，打断了政治权力道德化的这一进程，使与政治权力密切相连的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伦理学说崩溃。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道德化第一个高潮结束，第二个高潮尚未出现的间隙和传统封建道德由崩颓到重建的时期。隋王朝虽然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但由于帝祚短促，并未能政治道德的方向上有所作为。相反，隋炀帝的肆意欲为和倒行逆施，使“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更加剧了统治集团中道德权威的下降。因此，在唐王朝建立之初，也同样面临着这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种传统封建道德权威的下

降，是继承魏晋南北朝时代传统礼教崩溃的结果，是当时民族大融合刚刚结束，各少数民族对汉族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强有力冲击的结果，是以佛教为主的各宗教在中国日益广泛流传的结果，也是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对地主统治阶级沉重打击的结果。

同时，政治权力道德化削弱的结果，为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权术的频繁运用打开了方便之门。从魏晋到隋唐，无疑是中国古代史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最不稳定和最为血腥的时期之一。以唐王朝而论，其宫廷政变之多，统治集团内围绕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的自相残杀之频繁，确实是相当突出的。尤其是唐代前期从高祖到玄宗的一个半世纪里更为集中。在导致李世民登上帝位的玄武门之变中，建成、世民和元吉三人各树私党，施展阴谋，招降纳叛，终致喋血宫门。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丝一毫仁义孝弟的传统道德，只有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而唐太宗自己的弟弟和儿子，又都同样“要结群臣，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企图仿照先例发动政变。至于武则天，一方面以谋略夺取政权，一方面以权术和诛杀维持既得的地位。而中宗、睿宗朝政变的频繁和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稳，更是众所周知的史实。玄宗虽然开创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但他统治后期所信用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无一不是搞权术阴谋的好手，终于自己也在马嵬坡政变中被迫交出权力。这种情况与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所主张的，君主主要有利于实现目标，可以不择任何手段。要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不必恪守信义，应该懂得怎样运用阴谋诡计取胜，而且不要怕被人说是残酷和犯下罪行，只要它们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和福祉这样一些思想何其相似。

可以说，政治权力与伦理道德的背离，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砍断了君主宝座上的神圣光环，使天人感应，受命于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崩溃，从而使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也随之而动摇，为人们对于个性与人生的追求，以及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然而在另一方面，规范封建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崩溃和皇权神圣性的丧失，又导致了社会的统一与和谐局面的瓦解，社会经常面临动乱的威胁，从君主到平民都丧失了安全感。尤其严重的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道德的弱化，更导致内部尊卑秩序的破坏，使统治集团头上经常笼罩着政变和暴力的阴影，甚至面

临来自下层民众的揭竿起义。

#### 四

道德与政治的背离，不能超越历史的条件。唐王朝的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达到可以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当时的城市也主要是封建统治的中心，而不是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样，是独立的工商业城市，拥有众多的市民阶层。中国强大的专制主义皇权也不能容许道德的完全脱离控制。从魏晋到隋唐，传统儒学虽然已经衰落，然而它却顽强地在与玄学、佛教和道教的斗争中逐渐恢复元气，融合佛道二教，重新努力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因此，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到唐代继续存在的政治权力与道德的疏离倾向，并未如同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一样，发展成为以马基雅维里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政治学理论。相反，政治权力道德化的倾向在唐代重新抬头。

为了巩固政权，唐初君臣们经常对历史经验，尤其是隋王朝迅速崩溃的悲惨教训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武德、贞观时期，一方面全面继承行之有效的隋代各项制度，另一方面对这些制度作出适合唐代社会变化的改革。政事堂宰相会议决策机能的强化，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制度的重建，大力选拔资历较低而有才能的官员进入宰相行列，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得到重视，唐律的修订，纳谏和用人等等，无一不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但是，唐代君主们很快就认识到，仅仅依靠这些措施，并不能最后巩固政权，如果不重建政治权力的道德化，仍然难以致教化，难以有效地达到使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唐太宗本人通过玄武门之变而登帝位，但他在处理废太子承乾和另立太子的问题时，就非常慎重。他在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谕臣下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sup>⑩</sup>李泰极受太宗宠爱而终被弃，正说明了太宗对不择手段滥用权术后果的痛苦反思。他在登上帝位后，对记载玄武门之变实录的篡改，虽然是为了显示自己登上帝位的合法性，同时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恶行，以免为后世树立不道德的榜样。更富有意义的是，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说过：“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昏虐，灵祝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sup>⑪</sup>对于把政治权力道德化

还持否定态度。而到贞观六年(632年),却应群臣之请而准备封禅,甚至与反对此事的魏征当面争辩。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再次准备封禅颁布的诏令中说,“天眷彰于符瑞,人事表于隆平。”<sup>⑭</sup>以后又在贞观十五年和二十一年屡次准备封禅,虽因故而未能成行,其迫切之心可见。看来,唐太宗已经认识到,如果不在君主的头上加上一圈神圣的道德光环,那么权力仍然还有动摇的危险。

政治权力道德化的进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武则天到唐中宗时期,为争夺最高权力,登上皇位,宫廷中的杀戮,酷吏的横行,告密的提倡,对官吏的诛杀等等,似乎把权术和恶行推到极致。然而不如此,政权的转移和巩固就难以实现,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可是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sup>⑮</sup>但即使在这一时期,武则天对修筑明堂,献宝图符瑞,宣扬自己是弥勒佛下生等“天人感应”的君权神授说法同样感兴趣。到玄宗时期,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仍然继续。玄宗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取得开元之治的成就,他任用的宰相姚崇,对于太庙屋崩之类的人天感应征兆不屑一顾。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玄宗也开始乞灵于封禅、制礼、崇道等神化君主的措施了。

安史之乱后,随着宦官势力的上升和藩镇割据的发展,君主的权威再次下降。虽然贵为天子,废立之权却操于宦官之手,握有军队的跋扈藩镇,也经常发出“挟天子,令诸侯”之类的狂言。因此,使政治权力道德化的努力,更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宁的重要意义。不过这一努力的主体,开始由君主转向士大夫,韩愈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sup>⑯</sup>因而必须提高君主的威信,恢复封建秩序之“道”的权威。当然,政治权力重新道德化的过程,终唐之世并未结束。其最后完成,是在宋代二程和朱熹等人建立理学,把君主的统治作为永恒的、自然的“天理”之后。这正是与宋代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相一致的。

当然,权术与暴力,道德和天命,不过是维护君主统治的两个不同侧面,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马基雅维里说过,只有君主的行为方式适应时代的性质,他才能够保持和巩固自己的权

力。<sup>⑰</sup>这一思想是更深刻的。也就是说,当尊崇道德与神化君权对于君主维持自己的地位有利时,当然可以这样做。而当实行暴政与玩弄权术对君主有利时,自然这也是必要的,其间转换的关键取决于君主的判断及客观环境的需要。

## 五

唐宋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建,以及政治权力再次道德化的结果,对君主专制主义的强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之其它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措施,使从唐代中期开始的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与混战,到宋代终于得到了解脱,重新进入内部稳定的时期。然而,政治权力高度道德化的结果,使“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理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君主专制高度发展,又使社会的发展陷于长期停滞。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主义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与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运行与政治思想发展轨迹之间的巨大差异。马基雅维里在对古代罗马历史的评论中曾指出,“经验表明,城邦只有处在自由之中才能政通人和,国富民强。”因为“一旦暴政在一个自由的共同体里建立起来,由此带来的第一个恶果是,这些城市不再前进,她的力量和财富不再增长,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倒退没落。”<sup>⑱</sup>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自由作为一个国家达到强盛伟大的关键。他又指出,要维持政治自由,则需要使这个国家的公民遵守宗教信仰和制定完备的健全的法律。<sup>⑲</sup>这些思想初看与他提倡权术自相矛盾,但实际上马氏在《君主论》中早已指出,君主“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真所谓“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可以说,马基雅维里提倡使用权术和暴力,不过是为了统一分崩离析、战乱不息的意大利的一种手段,而意大利一旦统一,他认为就应该仿效罗马共和国的榜样,给予人民以政治自由。马氏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正是与唐王朝的政治家和士大夫们的儒家传统政治观及道德观的根本差别。

政治权力道德的程度越高,相应的人们对君主的道德期望也就同样越高。所谓君主“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sup>⑳</sup>魏征在上唐太宗奏疏中说,理想的君主,应该具有少欲求、不奢侈、谦虚、游乐有度、慎始慎终、纳谏、贬黜邪恶、慎赏赐、不滥刑等十种美德。<sup>㉑</sup>然而,这在封建专制王朝中,

始终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现实中的君主，却大多是纵欲奢侈，任情喜怒，这样，很容易把君主头上的道德灵光打得粉碎，使所有政治权力道德化的说教丧失现实的依据。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马基雅维里的看法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弱点，君主要拥有和保持所有的优良品质是不可能的。因此，两面性格对于君主是必要的，他必须“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然而在需要的时候，君主却必须随时准备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因而“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sup>②</sup>所以君主尽可以高高在上，以其虚假的道德欺骗民众。

然而唐王朝的政治家们却有与此不同的作法。唐太宗也认为，没有缺点，从不犯错误的君主是不存在的。他说，如果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那么“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至于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sup>③</sup>君主既然经常可能犯错误，那么在唐太宗看来，解决的办法就是求谏和纳谏，以人为镜，才可以明得失，唐太宗广开言路，倾听逆耳之言，对犯颜进谏的魏征等臣下十分宽容，这对于贞观之治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政治风气对于整个唐代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宪宗就曾对宰相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sup>④</sup>君主对自己的错误与过失，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关系到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隋炀帝刚愎拒谏而亡，唐太宗任人纳谏而治。这种态度与马基雅维里所主张者的差异，也

许就是这些政治家与思想家们生活在强盛统一的唐王朝，与分崩离析、战乱不休的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国家与时代而产生的吧。

- ①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第343—344页。
- ②⑩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篇第7章，第72、84页。
- ③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第177页。
- ④ 吴宗国《唐代的特性》、《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
- ⑤ 葛承雍《唐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变革》、《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
- ⑥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第3卷，第368页。
- ⑦⑨⑮⑰⑲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25章，第118页。第15章，第74—75页。第18章85—8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 ⑪⑱ 昆廷·斯金那《马基雅维里》第2章，第76页。第3章，第103—128页。工人出版社，1985年。
- ⑫⑬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七年。
- ⑭ 太宗《详定封禅仪诏》，《全唐文》卷六。
- ⑯ 韩愈《原道》，《全唐文》卷五五八。
- ⑰ 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历史”的前十书》第2卷，第329页。
- ⑲⑳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政体》。
- ㉑ 魏征《论时政第二疏》，《全唐文》卷一三九。
- ㉒ 《旧唐书》卷十四，《宪宗本纪上》。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上接第128页）

书名定为《审美中介论》更为恰当，真正从文化学角度去阐释美学中的审美中介问题，似仍不够突出；其二，著者对西方哲学、美学和审美理论的领悟和阐释比较娴熟，而比较缺少对中国哲学美学问题的分析。事实上，我国的艺术理论和创作，从古到今，都存在着大量的审美中介理论问题，有待研究。如果劳著能有关于这方面的分

析，就更为全面和丰满，也更具有中国特色。当然，要学贯中西，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我这是吹毛求疵之见了。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文学史哲学：性质、对象与意义

陶东风

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Windel Band)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工作的目标，都是把自己的特殊对象推到一个更广的范围里去，用一些更一般的观点来解决个别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论，哲学与其他科学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其他科学可以采取一种信任的态度，把这样一些原则看成确定的前提，对于它们的特殊研究来说，这样的信任也就够了；而哲学则不然，它的特点在于所要研究的对象恰恰就是原则本身，因此它不能从一个更一般的原则推出它的结论。而随时随地都必须对最一般的原则本身作出决定。”<sup>①</sup>

文德尔班所揭示的哲学与一般科学的差异论，也完全适合于文学史哲学与文学史的差异。文学史可以信奉一定的原则，一般表现为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本质的看法，如我国建国后的文学史著作（包括各种类型的）就是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决定文学的发展这一“原则”为前提的，它不必对这些原则本身提问。但文学史哲学则不然。文学史哲学所要提问的恰好是原则本身。文学史哲学是一种元文学史学。如果说一般文学史的对象是过去的文学史事实，以史料为依据重构这一事实的进程；那么，文学史哲学的对象就是人们用以重构、评价过去的文学事实的框架、依据、标准。它要询问：这些框架、模式、依据、标准是否合理？文学史是如何可能的？文学史思维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评价史实价值尺度的价值尺度？因此，文学史哲学的任务不是将过去的事件装进一个模式或框架中，而是对模式和框架进行反思，是解决应当如何写作文学史的问题。康德的批判哲学反思的是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知识；与此相似，文学史哲学反思的是文学史如何可能的问题。具体的文学史是对研究客体的考察，而文学史哲学则是对研究主体的考察，是与史学家对话而不是与史料对话。<sup>②</sup>文学史的主体正好是文学史哲学的客体。

当然，为了评判一种文学史模式是否合理，先须掌握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也要涉及客体与史料，但它使用史料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它串成“史”，而是用它来阐释文学发展的规律并进而审视各种文学史的建构模式是否合乎这一规律。

### 一、文学史哲学的地位与意义

那么，文学史哲学的意义是什么？它与文学史的关系如何？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须明了文学史的本质。

柯林伍德有一句名言：“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sup>③</sup>同样的意思被当代符号

学大师卡西尔(Ernst Casirer)表述为:“历史学和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sup>④</sup>历史是人类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的手段,也是这种反思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不同的基点上、通过不同的模式和标准反思着自己的过去。这样,如果离开了重构、反思的主体,也就没有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sup>⑤</sup>

这句话的偏激之处在于:历史学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他只能历史地“制造”历史,正如H·瑞德与B·杰塞普所深刻地指出的:“历史是历史的”(history is historical)。<sup>⑥</sup>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只能在历史的种种限制中“制造”历史。但如果我们将“制造”理解为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材料的建构,那么,这句话就深刻地道出了历史的本质。历史之不同于“史料”就因为它是主体从一定价值尺度出发建构而成的有意义的连续体。

在这一点上,文学史与其他历史具有相同的品格。正象作家在描写社会人生、展现人的生存状态或表达自己的审美体验时不可能不渗透进自己的主观态度一样,文学史家在整合材料、串连过去时代的文学事实时也不可能不从自己的价值尺度与研究方法出发,而价值与方法之引入即是建构活动的本质。因此我们只能审视某种研究所用的建构模式与评价尺度是否合理,而不能否认历史的建构性。

正是文学史的这种建构性本质决定了它对于文学史哲学的依赖性,决定了文学史哲学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因为,如果没有文学史哲学,我们又怎能知道某种文学史的建构模式是否合理?怎能知道它是否合乎文学发展的规律?是否具有人道的而不是非人道的特点?文学史不是史料的年代学编排,史料是未经史学家反思、评价的客观对象,而文学史则是历史研究的主体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建构的有意义的连续体。A·豪泽尔曾指出:历史学家所能有的关于过去的实际行为、感情、事件的任何知识都不是历史本身,都是第二手材料。即使象有自身意义和价值的艺术作品,也不是过去曾发生过的东西的直接证据,可以允许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不是直接地理解它们,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情感的范畴来理解它们。”<sup>⑦</sup>历史已成为过去,任何关于它们的记载都不是它本身,因此只有借助柯林伍德所说的“重演”,历史才能显示出来。这样,澄清人们用以重演历史的模式、范畴的本质,对之作批评性反思就是一切自觉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与核心。如果历史研究者的建构模式与价值尺度尚未得以反思与批判,尚未被明确地确立或意识,那么文学史的研究就失去了依据,至少是盲目的和肤浅的。历史的面貌之所以代代不同,主要原因不是史料有什么变化;历史因反思主体的变化而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如果结合我国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建立一种当代形态的文学史哲学,这不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也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新时期的文艺学界在经历了人的观念和文学观念的裂变后,开始重新反思文学



史。“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领域的变化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和延展。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原因之一恐怕是参加这场讨论的大多是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工作者），这场讨论的焦点与实绩似乎主要集中在对具体作家、作品、口号、论争或思潮的重新评价上，而不是集中在对历史观、建构模式、价值尺度等的整体反思与重建上（“整体”的意思是说，零星地也有一些探讨建构模式的文章）。人们对于哪位作家的地位有待调整、哪部作品的评价有待更正等问题谈得较多，而对原有文学史（主要是五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文学史教科书）的整体建构模式与价值尺度的反思批评相对少些。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场讨论的理论深度和整体建构力。

实际上，重写文学史的前提是重写文学史观。也就是说不是去检讨原有文学史对史料的处理是否确当，而是检讨原有文学史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史料？其模式是以何种文学观以至文化观、意识形态观为基础的？一句话，对于原有文学史的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应该在具体的重写之前。

## 二、传统文学史模式的理论反思

迄今为止，在文学史研究的跑道上，一直拥挤着最大量的研究人员；但同时，这门学科又是几乎所有文学学科中包袱最沉重、步履最艰难的一位“老大哥”。以下我们以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教科书为例，从几个方面分析从五十年代到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史模式的特点及问题。

（1）机械的决定论。建国后的文学史模式是与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尤其是文学发展观念完全一致的。一定的文学史研究总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支撑起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文学观、文学史观是不够辩证的，相对忽视文学自身规律的社会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把文学当成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状况）的变化被认为直接地、不经中介地决定了文学的变化。文学的所谓“相对独立”性实际上被淹没在绝对依存的信念中，从未得到认真的研究和探索。为了确立这种决定论的信条，我国流行的文学史一般都要以显要的位置安排一个“导言”，加以阐述；并在各章的开头千篇一律地概述某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用社会发展的分期模式来框架文学史的发展阶段与历史时期，这样的文学史虽然正确地贯彻了唯物立场，却并不辩证，因为文学史成了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的附庸。

这种决定论还支配了文学史对思潮、作家、作品、形式的考察和评价。在欧洲文学史上本有所谓“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风格和思潮上的术语，但当这些术语进入我们的文学史时，立即被社会学地作了重新规定：“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期；“古典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转折期；“浪漫主义”是反抗期；“现实主义”是变质期；而“现代主义”则是没落期。欧洲文学史就这样被译成了一部资产阶级的盛衰史。在文学史的价值评价方面，社会决定论原则以社会学的评价和尺度代替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审美的评价和尺度，或者说，以作品所反映的对象的价值取代文学的审美价值或将后者降到极次要的位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长恨歌〉的巨大

艺术魅力显然来自其优美的形式和人类永恒的爱情主题,但看了文学史教科书后,似乎使人感到其价值倒在社会主题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什么”这一尺度如果缺乏深邃的文化分析和人类学透视,即使作为思想价值的尺度也是不全面的。在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由于李白的作品被认为不如杜甫的作品那样反映了社会生活,因而总是屈居杜甫之后。但是李白作为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主观性很强的浪漫主义作家,从人的解放这一个角度来看,其意义远胜杜甫。不适当地把“反映了什么”局限于社会学范围,是文学史价值尺度失重的重要原因。那种认为李白描写人民疾苦、反映社会动荡的作品不如杜甫多就扬杜抑李的作法至少是片面的;那种为了抬高李白而从他的作品中牵强地、勉为其难地“拣挑”再现性强的作品的作法,更是荒谬可笑的。由此可见,尽管旧有文学史的编写者要努力把一部中国文学史写成社会思想史,但由于其对社会思想的研究方法和评判尺度都存在庸俗化、简单化倾向,也就不能准确地勾勒人类思想发展的真正轨迹。再以欧洲文学史为例,象波德莱尔、瓦莱里、梅特林克、卡夫卡、黑塞、劳伦斯等深刻揭示了人类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结构的大家居然评价甚低,稍提即止。大量的篇幅用来起劲地谈论象莫里斯、尼克索、威尔斯、特莱斯尔这样一些思想上平庸、艺术上匮乏的作家。与此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象沈从文、钱钟书等深刻揭示了人性内蕴、艺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被冷落一边、评价甚低。

总之,由于机械、庸俗的社会决定论的泛滥,使得文学史大大地偏离了其艺术的和审美的本质,同时在思想评价上也陷于混乱。

(2) 传统文化与治史模式在深刻地反思依附于社会史的文学模式时,我们发现:机械决定论模式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与意识理论的简单化理解以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外,也与中国传统的文论体系,治学方式相关。几乎从孔子开始,文学就被纳入了“载道”的轨道,文学形式基本上处于附属的工具地位。刘勰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和叶燮的“时有变而诗因之”,基本上都是社会决定论模式,将文学形式的变化依附于社会历史的变化之上。中国古代素有“文史不分”之说,落到实处是“史”吃掉了“文”,用治史的方法治文。史文的共同方法之一就是小学的训诂考证,这种方法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辅助手段是必要的,但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不在考证,而是揭示以文学语言的演变表现的人类审美心理和精神状态的演变,因而将考证当成目的就极大地违背了文学史的本质。小学的考证不是以揭示文学的特性为目的,它将文学语言当成一般的符号考证,而离开了审美特征,符号的考证对文学史又有多少意义呢?

(3) 自律性的失落。机械的社会学决定论必然是忽视文学自身特殊规律的。这不是说文学发展可以独立于社会环境,而是说文学发展除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有自身的形式因素。研究文学史至少要考虑的是:第一,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领域,自然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第二,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复杂的,因而需要多方位地展示这种不可避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领域看,文学不能直接地作为社会历史的翻版、镜子或受动者看待,并不是反映了社会生活就必然获得了自

身的价值。这里至少有一个如何反映的问题。在艺术形式这一层面，语言、文类、风格、结构、技巧都规定着文学表现与文学史的一定的自我肯定性，有一定的自身历史、原因、演变规律。这当然不是说形式因素与社会历史无关，但它们的关系至少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正如豪泽尔所指出的：“关键是要意识到：艺术对社会的依赖可能采取最多变的形式。”<sup>⑧</sup>

我国文学史界对文学形式的研究历来是轻视的，薄弱的。即使偶然提及，也存在下列缺陷：（A）用社会决定论强行解说，表现出鲜明的机械他律论倾向。象五言诗、七言诗、格律诗、词、曲、小说等文体的产生和衰落，一般都只从“社会生活变化了”、“旧形式反映不了新内容了”之类作极肤浅的解释，对于传统文体形式对新文体形式的内在作用很少关注。实际上，原有的文体是新文体产生的母胎，离开了这一母胎，外界作用再大也不可能导致新文体的产生。如七言诗就是由五言诗在结构上和句式上稍作调整而产生的；元杂剧形式则是传统词、讲唱文学等的综合体，（B）形式与内容的割裂。由于我国文学理论界长期流行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论以及这种二元论为基础的内容决定论，因此，对形式的分析常常是与对内容的分析割裂的，或作为附庸安排在内容分析之后。对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依赖性的揭示极薄弱甚至付诸缺如。作为物质符号形式的作品文本是作家内在精神状态与心理结构物态化的形式，它们之间有同形同构的紧密关系，因而不联系作家的精神结构就无法深入地剖析其作品结构和艺术风格。而作品的结构方式与形式规范又极大地规定着作品的思想特色和情感基调。内容分析如果不从对文本的精细解读中引发出来，就越出了文艺学的范围而成为非文学的研究；而脱离内容分析的形式分析则是没有血肉和生命的“尸体解剖”。对这种研究状况的超越有赖于建立新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论以及相应的新的研究模式。

（4）系统观念的失落与流变研究的贫乏。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呈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它是极度忽视作家个体性的，另一方面又缺乏整体与系统的眼光。

庸俗社会学和泛政治化倾向使得文学史呈现非人道的色彩，即无视作为文学活动主体的作家个人的生命特征、个性特征，将作家当成仅仅是某个阶级的一员，忘记了作家除了阶级属性、社会群体属性以外，还有为他所独有的个性特征。作家的介绍成了职业介绍和阶级划分，成了一张枯燥无味的履历表。文学史决不仅仅是遗留至今的死的材料。每一位作家在创造作品时，都积蓄了大量的生命体验，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痛苦、有欢乐、有思想、有欲望的存在，他们提供的作品是与他的整个生命过程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不以人的眼光审视作家，就无法洞明其真实的、隐秘的、幽深的内心世界，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地把握其作品的生命情调。

文学史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并不保证它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文学史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至少与两个系统相关。一是文学内部的形式系统，一是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系统。我们的文学史比较注重后一个系统，但由于社会方法的简单化、庸俗化，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多面性及其与文学内在系统的关系的复杂性一直没有受到注意。至

于文学内部的形式系统（如语言、技巧、文体等的流变延续）则更是少有问题。

与整体观、系统观的失落相伴的还有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贫乏。比较包括个别作家之间的比较、群体作家之间的比较、中外作家之间的比较等。没有一定的比较，作家作品的独特性和共同性都无法确定，文学史的整体性以及作家的地位也无法建立。阅读现有的文学史，作家作品的地位似乎只能从编写者所用的篇幅以及臧否的话语中来判断，让人觉得不可信。一本文学史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将所有的作家作品都进行比较，也不必都用“与某某相比”等表述方式。重要的是在头脑中建立比较的意识，树立比较的眼光，比较意识就是整体意识与系统意识的体现。

影响研究方面似乎是国内文学史的“长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某人影响了某人”，“某人受了某人影响”等字样。然而首先，这种所谓“影响”很少用于整体的思潮研究；其次，个别作家的影响研究也总被分割成思想倾向、语言、手法等孤立零碎的几个方面，而不是着眼于作家与作家之间整体的精神结构、艺术风格的影响。实际上，影响总是整体性的，很难想象，一个作家如果在思想倾向和思维方式上受了另一个作家的影响，会不在语言、技巧等形式方面体现出来。同样，语言、技巧方面的影响也不会找不到思想感情或人格心理上的根源。

（5）体例的僵化与研究主体性的失落。我国已有文学史不但在基本史观、文学观、研究方法上是大体雷同僵化的，而且其体例和编写模式也是如此。社会环境介绍、作家生平介绍、作品分析（思想分析加艺术分析）三者的机械贴拼排列成了文学史公用的编写模式（最近有少数著作例外），它差不多成了“文学史八股”。我认为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和模式、体例都应当是多元的、富有独特性的、个性鲜明的。可以抓住一个侧面来建构文学史，也可以运用一种理论来实验文学史。从风格演变、主题演变、体裁演变、形象演变等侧面，或从心理学、语言学、接受理论、文化学等角度，都可以写出特征鲜明的文学史。可考察的侧面和考察的角度都是无限多样的，更何况研究者的思维优势也各不相同。在西方艺术史家中，同样从精神方面进行研究，就有黑格尔式的、泰纳式的、温克尔曼式的、勃兰兑斯式的；同样从形式角度研究，也有伍尔夫林式的、冈布里奇式的、阿恩海姆式的等等。西方文学艺术史研究的多样性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史观、方法、体例的僵化与雷同，意味着文学史研究主体性的失落。真正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在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独到发现，即精神的主体性。实际上，任何研究都应当以研究者的个性特征以及对人生社会自然的和艺术的独特体验为基础，研究者应当带着他的个性和主观世界来写文学史，就连“尊重客观”本身也是一种主观看法。当然，真正的理论思维的个性和主体性并不是将自己的主观偏见强加于文学史，并不是乱贴标签，而是将文学史现象化作自己对历史的独特体验，从中取得一种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伏尔泰曾说过：“世界历史的第一性的要求就是体验，而主体在体验中同自己的环境处于积极的、生动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环境作用于主体，同时也受到主体的作用。”由于文学本身就是体验的产物，作品又是体验的对象，因而对文学史的认识就更易作体验式的思

辩。这并不是说现代式的语言分析、文本结构分析可以不要。不是的。对文本的体验与对文本结构的分析不但并不矛盾，而且相互依赖和推进。离开结构分析、符号读解的体验是不可信的，而排除了体验的文本结构分析是文字游戏和尸体解剖，它将因为人类的生存这一本体论问题而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天然敌人。

### 三、一点展望

一个不关心文学史哲学的文学史家是一个不合格的文学史家，因为他不懂得反思自己的研究，从而也就无法发现其研究存在的危机，使文学史只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或只能整理与发现一些新的材料，而没有理论与方法意义的突破。一个合格的文学史家必须同时是一个文学理论家——正如一个合格的哲学史家必须同时是一个哲学家，在自己的思维形式的基础上获得对文学的理解和体验，同时在反思自己的思维形式的基础上更新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和体验。只有这样的文学史家才不致成为平庸的材料收集者或他人理论的盲目搬用者。没有一种新的理论的指导，文学史的重建便只是一种空谈。

在我们的文学史观念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我以为新的文学史理论框架应更多地吸收西方现当代的文艺学成果。西方二十世纪文艺学成果卓著，尽管这些理论本身还不是完备的文学史理论<sup>⑥</sup>，但任何文艺学的基本理论中都含有对文学史的看法。另外还可以借鉴和吸收一般历史哲学的研究成果，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极为活跃，对传统史学观，如机械决定论、单线因果论、绝对必然论等都提出了严重挑战。由于传统的文学史受传统史学概论的影响相当大，因而批判地吸收现当代西方一般历史哲学成果，对于更新文学史观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当然，无论是一般文艺学的成果还是一般历史哲学的成果，在引入文学史哲学时，都有一个转化和融合的问题，文学史不是文学加历史，而是文学的历史，因而文学理论只有史化（引入历时的概念和方法）才能有助于文学史的研究；而一般历史哲学只有充分考虑到文学的特殊性，只有文学化，才能融合进文学史的体系建构之中，这是不能不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方法论问题。再者，文学史哲学作为对于诸种而不是一种文学史的批判性反思，并不以某个国家、时代或文体的文学史为对象。对象的特殊性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学史的格局，但更重要的制约因素却是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比如，在我国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外国文学史研究尽管对象不同，但所用的理论与方法却是相同的，结果是（众所周知地）这两种文学史都有相同的长处和局限。由此可知，文学史哲

（下转第106页）

# 劳承万的审美中介学研究

——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视向

刘伟林

劳承万教授的新著《审美的文化选择》，已在1991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联系他在1986年面世的《审美中介论》，二书近60万言，已基本完成了他对审美中介学的建构。笔者对《审美中介论》已有过评介（见《学术研究》1988年第3期），在此主要阐释其新著《审美的文化选择》（以下简称《选择》）。

近10年来，我国的美学研究经历了几番冷热，现正在思考向何处去和如何深入的问题。劳承万教授的两本美学专著特别是新著《选择》，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钻研、揭示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论，审视了比较广泛的人类审美现象，为我国当代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研究视向。就其审美中介学建构的内容和方法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哲学领域引入“中介”范畴，建构了比较完整的“审美中介学”框架，从而更新了美学科学的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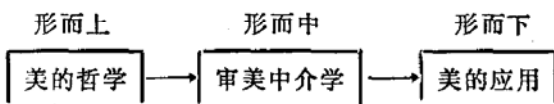
劳承万的审美中介学研究，其观点是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在《审美中介论》中，作者只是以康德作为“出发点”，以“审美表象”为核心，在主客体之间展示真正的审美过程和基本环节。这种研究基本上是浓缩与限制在审美认识论的维度上的。然而，正如著者所言，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远比上书的论述复杂得多。在世界哲学史上，长期被二范畴（感性——理性）认识论统治着。这也就是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批评过的所谓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S—R）。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

中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劳承万在《选择》中就是以此为立论基础，总结了从康德、黑格尔、维戈茨基、列维·斯特劳斯，到社会学家费孝通、文艺理论家滨田正秀、结构主义哲学家拉康，浪漫主义文论家亚柏拉姆斯、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康定斯基等对人的认识过程的考察，从而归纳出一个“空无的三一式结构”，或称“三角体中介结构”（见《选择》前言），并把这种“哲学中介”引入审美认识领域，建构了比较完整的“审美中介学”庞大构架。

如果说，劳承万在《审美中介论》中侧重于从审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审美过程的中介（观点是机能型存在），那么，《选择》第一章至第五章则是审美中介逻辑构架论，侧重于从理论背景和总体理论框架论述审美中介；第六章至第十二章则是审美中介基本环节论，侧重于从人类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述审美中介。其中包括对审美中介论是审美哲学论、唯物史观与审美中介论、美学史与审美中介论，以及审美心理结构、审美态度、审美感受、审美积淀、审美超越、审美外观和性审美等重要美学问题的阐释。而在阐释这些美学问题时，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经济学、哲学、美学，其间又有三一式结构（贯穿其间的最重要的中介是劳动），是劳承万美学研究的三大推导系统。其中用以推导的许多理论观点是发人深省的。比如：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成果是审美意识。人战胜自然界依靠两种力：体力和意识力。意识力作中介，构成人类“智力——文化”的巨系统；审美意识结构（作为审美的中介）的母结构是意识力。（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一个意识力系统，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果。）审美的本质，实际上是“审”人的“社会——历史”本质。人的意识越具有间接性，人的心理机能则越高级、

越精密。审美心理结构，是审美的综合性中介，是一个难以穷尽的心理系统。等等。这些论点不仅适用于审美学的个案研究，而且在审美学和艺术学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意义。

在西方美学派别中，存在着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自上而下”（形而上）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以费希纳为代表的实验美学的“自下而上”（形而下）的思维方式。在我国50、6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审美思维方式更趋机械，多纳入“存在决定意识”、“美决定美感”的框架，而那些重视美的主体因素和认为“美感就是发现”的论点却被简单地当成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这就比德国“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更为退化。因为康德和黑格尔虽然将哲学思辨引入美学研究，但是他们仍十分注重美和审美的主体性和辩证法，在思维方式上，劳承万却别开生面，既不是“形而上”，也不是“形而下”，而是采取了“中介”方式，也可称“形而中”。用图示之：



劳承万认为，目前西方美学，正处于美感经验描述和美感应用（如技术美学等）阶段，自从费希纳的自下而上的实验美学衰落以后，很少人愿意再回到美的本质论上去。但正因为缺乏美的本质论作指导，而使美感描述处于混乱、危机状态。我国的美学研究，时至80年代，美的本质论几乎绝迹，各种应用美学应运而生，其方法论不过是：“美学原理+例子=××美学”。国内外的美学研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一门审美中介理论，作为沟通美的本质论到审美应用的渠道。从方法论上说，审美中介理论（审美中介学）一方面既具有美的本质论的思辨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应用学科的实证性。它是应用美学联系哲学的得力手段和中介。这样，审美中介学和“形而中”方法论的建立，就更新了美学科学的思维方式，拓宽了美学研究领域。看来，更新思维方式是劳承万进行美学研究的根本动机。

第二，运用审美中介论，对许多美学难题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为当代美学研究指示了新的思维方法论。

马克思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才与世人见面。而《手稿》公开发表半

个世纪了，却似乎谁也没有吃透《手稿》的本质。《选择》鲜明地提出，《手稿》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是元理论。《手稿》研究、考察的是人类的整体性活动（劳动），而非某个专业性学科或艺术理论。《选择》分析了《手稿》中的多项三项式框架，指出：《手稿》中所说的“美的规律”，首先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大律，然后才是艺术生产的分律。“人——劳动——自然”这个三项式框架实际就是人类物质生产（含艺术生产）的基本框架，而体现于劳动中的“美的规律”便带有这个三项式框架的中介性质。人类的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人的潜力则以内在尺度为规范，过滤为深层中介（大脑结构、精神能力、潜意识等），在人类劳动中表现出来，而劳动则作为审美的情景，把审美中介的各种联系真实地、清晰地显示出来。《选择》又引马克思在《手稿》中的两段话：“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分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关系”。这似乎是矛盾的。但《选择》指出，在“音乐→音乐感”二项式中，其实存在着“能辨音律的耳朵”作中介，从而组成了音乐美感的三项式整体结构。审美关系不是二项式关系，而是带有过渡环节的三项式关系。具备中介环节的审美论，给美感定型（美感系统）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其余对“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对“工业的历史一人的心理学”的解释也颇精到。他揭示了《手稿》中审美关系即“对象化关系”的三项式结构，对于审美学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康德美学以高度思辨、晦涩难懂著称，对康德美学的评价，诸说不一。这也算是中外美学史上的一大难题。“康德美学与审美中介”一节，运用审美中介学分析康德美学，为解开这一难题给人以新的启示。他首先指出，康德美学并不是知觉说，而是联系知觉的表象论（现象论在美学中的表现）。而审美表象的基本能力是想象力（即运动性的定向情感）和悟性机能的结合。康德美学的最深刻之处及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一把抓住了审美能力——审美判断力，然后从哲学——美学的高度上，他这种人类特殊的审美机能作出了全新的解剖，弄清了审美能力绝不是人类认识机能中一种孤立、单一的能力，而是由心意统摄的复合结构体，由二元机能的对立生成，是自由性和合规律性的和谐运动。对康德的这种审美理论的贡献，能注意到的人是不多的。他还认为，

康德在审美四契机(美的分析)中,显然运用了二律背反(日常思维与审美思维的悖论)的思维方式,努力去捕捉审美中介。而实际上,综观康德审美四契机,各个契机都展示了审美中介的不同方面,不同的中介域。第一契机为审美质的契机,在这个契机中,无利害感(以A代之)而生愉快(以B代之),在AB之间存在着人类的高层次机能(以C代之),此即中介;第二契机为按量划定审美功能的契机,它从无概念过渡到普遍愉快,其中介域是人的审美理念;第三契机为“目的”与“关系”的契机,在这个契机中,康德揭示的审美中介域是形式与合目的性的对应关系(审美的历史尺度);第四契机是“情状”(样式)契机,展示的中介域是实践理性的本体论特征——人类心理结构的奥秘。由此分析可见,康德审美四契机的过渡性、中介性,显示了审美关系是客体、情感、感性和主体、理性、超感性,此二者的互相过渡和综合。劳著在这一节中最后指出,康德的美学,与其说是形式的美学,无宁说是透过形式关系而触及人的本质的人的美学,就是感性表现和理想观念相统一的美学。劳承万对康德美学的这种理解,是超越了黑格尔、克罗齐、席勒以及我国的朱光潜等美学史家的。

在我国席勒美学研究者不多。劳承万对席勒美学却十分重视,在《选择》中,另辟47页的专章加以阐释。指出,从康德美学出发,用“自然——审美——道德”三项式贯串整个美学体系,这便是席勒美学体系的构架特点。在席勒美学中,审美的人成为自然人与道德人的中间环节(过渡环节),道德成为目的,审美成为手段。这一立论别开生面。限于篇幅,不予展开了。

劳承万对西方美学半个多世纪以来流行的距离说、移情说、内幕仿说等审美态度理论约审美中介分析也十分精到。《选择》认为,距离说以心理距离为中介物,一方面联系于主体的审美无利害关系,另一方面联系于客体的有意味的形式,把无利害关系与对象形式之间的审美奥妙融合起来了,达到了主客体的审美统一。所谓移情说,也即审美主体经过心理转化而形成的空间意象说。空间意象说是抓住了审美结构的表层形式,同时区分了审美与非审美的两大机制,见到了审美过程中美感生成心理转化机制这一中介物。内幕仿说所指的内幕仿,就是一种审美节奏感(运动感、节律感)。内幕仿的节奏感,成为从生理

到心理、从情绪到意识的审美中介物。劳承万还指出了对审美态度理论评价的两种偏向:一种是把审美中介夸大为美的本体或美的本质,认为无所谓审美对象;一种是抹煞中介,把美感看成是对象的镜式映象。其实二者都没有中介概念,没有以上的三一式结构作为理论框架,结果导致根本理论的混乱。

从劳承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中,便可看出审美中介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用以分析美学问题,是多么应验和重要。

第三,审美中介论既是审美哲学论,也是审美心理学,劳承万运用心理学研究美学问题作出了示范。二书一再申明,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所存在的中介,其实是心理中介,亦即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就其新著《选择》来看,如果说前五章重点在建立和阐释审美中介的逻辑总体理论框架;那么后七章则重点从心理学角度阐述审美中介的基本环节,给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下面仅举二例。

关于人类审美的本质,著者运用了苏联神经心理学家鲁利亚对大脑整体结构分层、分级、分机能联合区的观点进行分析,指出人的大脑结构,就是人类理性积淀于感性的确证。不管理性怎样虚幻和难以捉摸,但总得依存于生物感性结构(大脑)上。从发生史角度看,理性总是感性的附着物,超感性以感性为根基,这是大脑结构皮质层次的构成规律。因此,从理性积淀于感性的观点看来,人类审美则远远不只是一种反映,一种认识,其功能也并非仅仅局限于第二机能联合区(即接受、加工和保持信息)。人类审美是以情为中心的知、情、意活动的统一体,是三个机能联合区的同质反应。因此,人类审美,又是人类理性在生物感性结构(大脑)上的特定反应和升华。这已经不只是认识论的问题了,而是从根本上涉及人类学本体论的问题了。理性积淀于感性的命题,它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感性与理性认识的关系,而是在于积淀的人类动力学性质,即历史唯物主义性质。这就比把人类的审美活动仅仅归结为认识论(知)问题的观点深刻得多。

《选择》中的“生理能转化为心理能的总契机——性审美”,是写得十分深刻而精到的一章。它运用了人类进化论、生理心理学、艺术生物学,研究了动物审美向人类审美过渡的生理心理机制。书中以恩格斯如下论述为立论基础:“人从



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么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从而得出从动物到人和人类审美起源和发展的三项式结构：动物结构——“动物——人”结构——人结构。他认定动物是能够审美的，动物性审美的本质是性选择。这是人类审美的久远伏根。“动物——人”结构中的动物和人都不是独立意义上的动物和人，而是二者的混合，是一种过渡性的有机体。人类性征存在着多级展示系统：第一性征是性生殖（生殖器）；第二性征是求偶情感表现；第三性征是从第二性征生发出来的一系列副现象，如服装、礼仪、举止风度等。而动物和“动物——人”的性审美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三种性征多级展示的，这说明了人的审美是由快感而逐步发展为美感的。审美快感有特定的神经通路和原型以及节律快感模式；人的审美感，不管如何复杂，总离不开快感的生理基础以及动物审美的原型结构（客体：颜色，声音，形状；主体：视、听器官）。说明了复杂美感是由性征快感在“历史——文化”中演化而来的。人与审美关系的循环，一方面，真正的审美（人性审美）是远离动物性的审美；另一方面，人类审美的始基又发源于动物性，人类正极方向的审美来自性征的文明展开，这是性审美的一种二律背反。这样从性审美的性征根源上去考察美感的发生，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揭示美的本质，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见解。

从动物审美过渡到人类审美，除了性征机制之外，劳承万在《选择》中还研究了另一机制，这就是大脑神经能量的宣泄、释放。在性审美中，性征系列是性审美发展的外在方面，它的多级展开，侧重于情感—心理；大脑神经能量的舒泄、释放，则是性审美的内在方面（性征机制的刺激可以内在、转化为对应性的神经能量），侧重于情感—生理。前者外化为“历史—文化”的网络面，后者内化为神经通路的模式与原型。这种对人类审美过程和本质的分析是细致入微的。此外，本章对节奏感在拓通生理能到心理能中的作用的分析也很有深度和新意。劳承万已对这个命题写成专著，题为《诗性智慧——节奏韵律论》，尚待出版。

由上述可见，在美学研究中，心理学美学或文艺心理学，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第四，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指导研究美学、文艺心理学，特别是正确地评价和吸取西方审美理论的科学成果方面，作了成功的探索。

研究美学和文艺心理学中的主体审美中介和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是一个颇有难度和比较敏感的问题，弄得不好便很容易滑到唯心主义道路中去。我在评论其《审美中介论》一书时说过，劳承万对审美中介论的研究，虽以康德为“出发点”，但在那里只发现了研究审美中介的重要意义，并不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和方法所干扰。事实上，全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理论和中介思维作指导的。而在《审美的文化选择》中，他更坚持了这个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并发展和扩大了这些研究成果。如书中明确指出，审美中介理论应该建立在人类生产的初始逻辑框架上，这是审美中介理论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总体观点是：“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因此，人的审美活动，归根到底都要从属于劳动。劳承万的审美中介理论就是放在马克思的“生产 $\Rightarrow$ 消费”这一生产劳动结构中去揭示的。在“生产 $\Rightarrow$ 消费”的循环系统中，是存在着“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这一“审美的主观形式”，也即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作中介项的（参见劳承万：《马克思美学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审美的主观形式》，《学术月刊》1991年9月号）。劳承万把审美中介理论还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 $\rightarrow$ 审美主观形式 $\rightarrow$ 消费”、“经济 $\rightarrow$ 心理结构 $\rightarrow$ 艺术”、“人—劳动—自然”、“主体—中介—客体”等序列中和理论框架中，然后以此为背景展开审美中介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直接成为劳承万审美中介理论的哲学基础，使他的审美理论（含中介理论）研究既摆脱唯心主义倾向，又摆脱庸俗唯物主义倾向。因此，劳承万在《审美中介论》和《审美的文化选择》中，不仅对于西方美学史家和美学流派及有关审美中介基本环节的分析研究比较精辟，而且对于唯物史观与审美中介理论关系的分析研究、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巴黎《手稿》的审美中介理论的分析研究，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劳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思想作指导去探讨美学和艺术问题方面，给了我们不少启发。

如果说劳承万教授的这一研究还有所不足的话，其一，《选择》其实是《审美中介论》的续编，

（下转第117页）

# 论我国古代诗歌意境观念 对戏曲理论的影响

阮国华

自《诗》、楚辞到唐诗、宋词，经过一两千年的积累、凝聚、升华，形成了中华民族以诗的观念为主体的审美模式。自兹而后，人们便侧重于以诗的观念来观照各种新兴的艺术样式，诗的观念广泛渗透于诸种文学创作和批评之中。本文试图就古代诗歌意境论对曲学的影响作一考查，希望借以加深对我国古代戏剧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并为当今的戏剧探索提供参照。

唐代伴随诗歌创作的成熟而明确呈现的意境观念主要是由王昌龄、皎然、司空图等人先后予以阐述的。特别是司空图，侧重从意境论的角度总结了唐诗的审美经验，并以“思与境偕”、“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等命题完成了我国诗歌意境论的基本建构。意境论将我国先秦时期形成的以主、客体平行映托为主的比兴结构扩展为强调主客体浑然交融的立体结构，并将创作与鉴赏作通体思考，形成一种在有限的意象组合中追求审美想象、审美体验的无限性的审美观念，这无疑是我国诗学深化和成熟的表现。继唐诗宋词而后，新兴的文艺样式戏曲对诗词表现了明显的承接关系，其中对词的承接尤为直接。徐渭论南戏曰“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南词叙录》）王世贞曰：“曲者，词之变……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曲藻》）臧懋循曰：“诗变而词，词变而曲，其源本出于一”。（《元曲选序二》）应该说，这些论述是大体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诗歌意境观念中“以情为地”、“情景交融”的观点渗透于曲学，从而形成了对戏曲体裁属性和内容要素的独特认识。

魏晋时期狭义的文学开始独立之后，“诗言志”这个诗学的开山纲领逐渐向“缘情”倾斜。唐代诗歌意境论的出现，则从一个角度为“缘情”说

找到了实践式途径。皎然所谓“诗情缘境发”（《秋日遥和卢使君》），所谓“缘境不尽曰情”（《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便正是对这种途径的概括。它不仅要求诗歌通过生动具体的境界来体现诗人特定的情，而且要求诗歌境界能使这特定的情在读者的审美想象、审美体验中得到多层次的补充和伸展。“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径”（《文镜秘府论·南卷》）正说明情是创造意象、构设意境的基础和出发点，或者说意境归根结底是诗人特定情感对象化的产物。这种“以情为地”来构造意境的思想便首先给了曲学以直接的影响。

在欧洲，发育较早的戏剧文学主要被看成一种“用动作来摹仿”的叙事性体裁，而我国明清以来的曲学家们却往往延用诗学中“以情为地”的观念，认为戏曲与诗一样，归根结底应以传情为使命。何良俊曰：“《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终始不出一‘情’字”。（《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不仅认为《西厢记》是写情之作，而且认为写情是当时戏剧作品的共同特色。汤显祖则从戏剧角度对“诗言志”这一古老的命题作了诠释：“志也者，情也”（《董解元西厢记题辞》《万有文库》第二集）将“志”明确地释为情，即诗言情，戏剧亦言情。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汤显祖集》卷四十七）。明清一代，这几乎成了公认的观点：如“夫曲者，谓其曲尽人情也”，（陈继儒《秋水庵花影集》叙）“盖才人韵士，其牢骚抑郁、啸号愤激之情，与夫慷慨流连、谈谐笑谑之态，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笔底，不能直写而曲摹之，不能庄语而戏喻之者也”。（程羽文《盛明杂剧·序》）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近代，戏曲理论家姚华即曰：“惟曲之成文，以情为主，小令、套数、杂剧、传奇，结构

虽殊，旨归则一”。（《曲海一勺·第四骈史》《新曲苑》册六）。

与此同时，意境论中的情、景二元构造观念也影响了对戏曲的内容要素的认识。李渔曰：“填词义理无穷，……予谓总其大纲则不出于情景二字，景出所睹，情发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闲情偶寄·词曲部·词采第二·戒浮泛》）孔尚任曰：“词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借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他们的话颇有代表性，剧作者们正是以写“胸中情”、“眼前景”作为构造戏剧的基本途径的。试观诸种戏剧评点，几乎大多是从这两个途径出发置论。比如陈继儒批评《玉簪记》时便写道“科套似散，而夫妇会合甚奇，母女相逢更奇。但传情不及《西厢》，妆景不及《拜月》，而传情、妆景又不离《西厢》、《拜月》”。（《陈眉公先生批评玉簪记》见《六合同春》）他评点《西厢记》时写道：“不妆病景，不极相思滋味”。（第九书《锦字传情》总批。《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六合同春》）可见，在他看来人物的性格、心理都是通过妆景、传情来刻划和体现的。这种认识广泛呈现于明清戏剧评论之中，其突出特点是：延用诗学的观点，在突出情感的前提下，宏观地把主观（情）与客观（景）视作戏剧内容的基本要素，而认为戏剧内容的诸组成部分均系这两大要素的派生物。这种思路必然导致对情、景间相互关系的重视和强调，因而也就必然走上重视意境之途。在对待情景关系的问题上，曲学也十分强调情的中心地位，吴仪一所谓“情中出景，景复含情”（《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急难》〔菊花新〕曲批语。清康熙梦园刻本）、“境由情生”（《长生殿》《密誓》〔山桃红〕曲眉批。郑振铎藏初刻原本影印本）便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认识，即特定的艺术境界是为特定的情而创造的，在特定的境界中情又对景起主宰作用。这种情景关系论指导着戏剧创作中人物刻划、环境描绘和结构敷设，从而形成了我国古典戏剧浓郁的抒情写意特色，铺垫了我国戏剧的诗化道路。

## 二、将诗歌意境的构造法则推衍于戏剧人物塑造，将曲词的意境塑造视作戏曲人物塑造的重要途径。

我国古代曲学对诗歌意境观念的吸收和伸展，突出地表现在力图将意境构造法则运用于人

物刻划之中，即通过在曲词中描绘情景交融、富于言外之意的境界来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在明代的戏剧评论中即表现了这种艺术追求。如王世贞评《西厢》所称“景中雅语”、“景中壮语”、“意中爽语”、“情中快语”、“情中冷语”、“情中悄语”、“情中紧语”实际上已涉及到了曲词的意境描写所显示的人物情态、性格差别（见《曲藻》），已体现了“体贴人情，委曲必尽”的戏剧要求与意境观念的融合。张琦所谓“曲也者，达其心而为言者也，思致贵于绵渺，辞语贵于迫切”，（《衡曲麈谭》）祁彪佳所提倡的“取境既近人，构词亦谐世”（《远山堂曲品》）也都体现了这种意向。到了清代，论者们进一步从理论上揭示曲词的意境描绘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渔比之前辈曲家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不仅强调了人物个性化的重要性，要求“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勿使浮泛”（《语求肖似》），而且明确地将诗歌的情景交融法则纳入了戏剧人物创造之中：

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文章头绪之最繁者，莫填词若矣。予请总其大纲，则不出情、景二字。景书所睹，情发欲言；情白中生，景由外得。……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如前所云《琵琶·赏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说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说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语犹不可挪移混用，况他人乎？

——《闲情偶寄·词曲部·戒浮泛》

李渔的贡献在于：更明确地将戏剧创作中的意境目的论推进为物性格目的论。这一跨越标志着戏剧美学逐渐脱离诗歌美学的母体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他延用诗学观念，仍将情、景视作曲词内容的构成要素，但他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情景之交融应服从于戏剧人物塑造的需要，即意境构设应为物性格服务；“所言者月，所寓者心”，情景交融的结果应能刻划出不同人物鲜明的性格、心理特征。这样，诗词中的诗人之情已转化为剧中人物之情，诗词之景已转化为体现剧中人物性格、心理的特定环境，于是，曲词的意境在戏剧文学中便兼有了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双重特征。从戏剧文学自身的要求出发，李渔又进一步提出了

### 处理情景关系的原则：

舍情言景，不过图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当从何处说起？咏花既愁遗鸟，赋月又想兼风。若使逐件铺张，则虑事多曲少；欲以数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长。展转推敲，已费心思几许。何如只就本人生发，自有欲为之事，自有待说之情。念不旁分，妙理自出。

——同上

前述“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是从曲词写景角度提出的要求。“景出所睹”——景是人物所置身于其中并通过感官感知的客观环境；“情发欲言”——情是人物内在的心理活动。“即景生情”即要求特定情感与特定环境合拍，从而形成具有个性特征的情景交融的境界。此外“何如只就本人生发”则是指戏剧传情状景的总体原则，即要求从人物特定性格、特定心理状态出发。有了这个前提和出发点，不仅能决定特定时空中的“待说之情”，而且也便于决定与情相应的景物的取舍，避免那“咏花既愁遗鸟，赋月又想兼风”的困惑，取景精当而且情感化，从而防止“舍情言景”、景物杂沓、流于形似、流于填砌的弊病。由此可见，李渔关于“即景生情”、“只就本人生发”的要求，是一种以情为主体的情景交融论。它不仅为曲词的意境构设与人物塑造的结合提供了途径，而且具体贯彻了诗画领域关于传神写照，意在言外的审美原则，对前代写意化的戏剧创作经验作了有价值的总结。

这种将曲词意境与戏剧人物个性化相融合的观念在清代的戏剧评点、赏析中也得到了体现。金圣叹评《西厢》、吴仪一评《牡丹亭》、《长生殿》是突出代表。金圣叹在评点中，已从诗歌中情、景关系的观照推展到了戏剧中境、人关系的观照。比如，他对《西厢记·赖简》中的《驻马听》一曲评道：“是好园亭，是好夜色，是好女儿；是境中人，是人中境，是境中情，写来色色都有，色色入妙！”很显然，金圣叹的审美鉴赏是从曲词提供的意境美入手的，他透过特定的情境着意于作者提供的象外之象——人物特定行为、神态、心境的把握，自境视人，境中求人，着重肯定“好园亭”、“好夜色”如何传神地刻划了境中人——“好女儿”。这种鉴赏目光和途径便体现了诗美观念与剧美观念的结合，或者说由诗美鉴赏跨入了剧美鉴赏。再看他对《西厢记·琴心》中〔越

调·斗鹤鹑〕一曲的评语：“只写云，只写月，只写红，只写阶，并不写双文，而双文已现”，“有时写人是人，有时写景是景；有时写人却是景，有时写景却是人。如此节四句十六字，字字写景，字字是人。伶父不知，必曰‘景也’”。金圣叹的这段评点与前述李渔的戏剧情景论体现了相近的思想，都是在诗意盎然的情景中强调对戏剧人物的揣摩和把握。在这“里”，诗中以抒情主人翁为核心的情景交融演化为戏剧中以人物为核心的人境交融，“景”成了人物的特定烘托和对象化，因而带有浓重的主体色彩；人的描写不是平面化的穷形尽相，而是外射为特定的情景氛围，从而达到人亦景、景亦人的境界，其目的在于剖划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同样，大约活动于康熙年间的吴仪一在对《牡丹亭》、《长生殿》等剧的评点中，也以“境从心生”、（《长生殿·夜怨》眉批《长生殿》郑振铎藏初刻原本影印本）“境由情生”（《长生殿·密誓》眉批·同上）的观点来对曲词进行观照，认识到剧中种种境界均为人物而设，均由人物而生，因此在审美鉴赏中便着重通过曲词中的意境来品味、把握人物的特定情感和心态。总之，他们是要求在戏剧创作中以人物为核心来展开意境，实现人物描写的意境化；要求在鉴赏过程中着重通过对意境的品味来把握人物，从人物身上感受到意境美。这便是诗歌意境观念渗入戏剧之后所具有的新态势，正是这种新态势促使我国古典戏曲人物塑造进一步走向意境化，人物性格往往总是在特定情景中展开，氛围浓，意蕴深，体现了诗美、剧美相统一的特色。

### 三、诗歌意境观念对曲学的渗透也促成了对戏曲结构意境化的追求。

本来，诗歌意境观念的形成主要是以律绝短章作基础的。到了词学中，强调了意境的曲婉，但最多也只是在慢词那二三百字中迂回。待到进入了曲学以后，一方面是延续诗学特点，重视一首首、一套套曲词意境的讲求，并逐步注意与人物塑造一体化；另一方面则将意境观念扩展到乐套的构造、折的构造乃至全剧的构造中去，从而形成了强调意境特色的戏剧结构观念。

在明清曲论中，“重结构”成为了重要内容。从比重来看，结构论几乎超过了人物论。在戏剧结构论中，一方面以“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命题表现了对戏剧结构的完整性、单纯

性的重视,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结构意境化的追求。明代的戏剧评论已明显地体现了这种意向。如汤显祖认为《红梅记》“依稀《西厢》、《牡丹亭》之季孟间”,而此剧的突出艺术成就正在于“境界纡回宛转,绝处逢生,极尽剧场之变”。(《玉茗堂批评〈红梅记〉卷首》《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此处所说的“境界”不等于诗词中的意境,而是指戏剧的情节、场面而言。但是,这种境界的“纡回宛转”却体现了戏剧结构意境化的要求,即要从情节、场面的宛曲中体现深远的情致,从“波澜”中得无尽之“意味”。同样,他肯定《异梦记》“关目交错,情致纡回”。(《玉茗堂批评〈异梦记〉卷首》《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之所以说他不是一般地追求戏剧情节的离奇曲折,而是在追求戏剧结构的意境化,那是因为他把这种“纡回宛曲”看作是传神寄意、获韵外之致、得无尽之审美“余趣”的有效途径。在评《种玉记》时,他便指出“晤此变中又变,错中又错,生出几许峦峰,弄出几许波澜,提放之巧若此”。并认为“机来神熟,作者亦不知其思之如流、气之如云、致之如环矣”(《玉茗堂批评〈种玉记〉》《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即戏剧中这种“峦峰”、“波澜”的造就并非刻意为之,故弄玄虚,而是作者的神来之笔,是作者的衷情和思致的最自然、最生动的表达,因而获得情思流动、气韵氤氲、远致纡回的审美效果。他往往从意境化的要求来观照戏剧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如评《种玉记》的《误醋》,便认为“无此一折,几乎水直波穷,便少余趣”;(同上)他特别重视转折在构造戏剧意境化层次中的意义,如评《董西厢》时便指出:“每读其转换处,如山穷水尽,别出一段轻波”。(《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卷一,《万有文库》二集)到了清代,论者们则更进一步强调戏剧结构的曲折跌宕的意境化特色。如清初丁跃亢在他的戏剧文学创作纲领“词有七要”中(见其《啸台偶著词例》),既要求“情景真”、“照应密”——意境与人物个性的统一和结构的完整性,同时又把“要曲折”放在“七要”之首:“一、要曲折。有全部中之曲,有一出中之曲,有一曲中之曲,有一句中之曲”。(《丁野鹤集》)“句中之曲”与“曲中之曲”是针对戏曲文学的基本单位——一首首曲词及具体词句的构造而言,相当于诗词意境的构造要求;而“一出中之曲”与“全部中之曲”则是诗词意境构造要求在戏剧文学中的放大,放大成为戏剧的结构观念,即

要求戏剧结构象诗词意境那样婉转摇曳,富于包孕性。一些强调戏剧文学的案头欣赏价值的论者,更是把这一点强调到了极致。金圣叹评点《西厢》时便强调“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金圣叹批本西厢记》·《赖笥》总批)这里,金圣叹实际上是采取诗歌意境的视角,侧重于从鉴赏角度对戏剧结构提出要求的,他认为戏剧曲折多姿,才能使鉴赏者在“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的过程中,通过驰骋想象和设身处地的体验,获得审美的“至乐”。

在诗歌意境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曲学中形成了一种重玲珑婉曲的结构风格论。袁宏道在评汤显祖的剧作时便阐述了这方面的见解:

词家最忌逐出填去,漫无结构,《紫钗》、《南柯》、《邯郸》都犯此,所以词虽峻洁,格欠玲珑,若《还魂》庶几无遗憾乎。

一部《紫钗》,都无关目,实实填词,呆呆度曲,有何波澜,有何趣味?

——沈际飞评点牡丹亭还魂记》

卷首:《集诸家评语》

他要求戏剧结构应有一种“玲珑”的风格,这种玲珑实际上正是诗词意境观念中关于清空、空灵的要求的移植。诗词意境之清空要求情态流动,构成情景交炼、婉曲多姿的意象组合,反对凝涩、板实、晦昧;移之于戏剧,则反对“实实填词,呆呆度曲”,而要象《牡丹亭》那样波澜起伏、意蕴深远,趣味无穷。这种结构风格观念在明清戏曲中几乎成了一条重要的艺术标准,人们常常运用它来进行褒贬。如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中便常以结构之欠空灵婉转来对某些剧作加以批评。如“此记局既散漫,且词不达意;意既蒙晦,而词遂如撞木钟,扣石鼓,虽填得畅满,亦何益哉?”(《远山堂曲品·玉丸》)又批评《三妙记》“写闺情而乏婉转之趣,盖作者能填词不能构局故也”。(同上,《三妙》)他这里所批评的正是袁宏道所说的那种“实实填词,呆呆度曲”,结构无波澜、无趣味的倾向。他认为仅仅曲词填得好亦不能保证剧作的成功,如结构缺乏空灵、婉转之趣,即缺乏意境美,同样不能成就好戏。为了体现这种清空、玲珑、婉曲的结构风格,使结构呈现意境美,明清时期作者和论者们每每积极致力于探求和总结意境化的结构手法。如金圣叹便通

过评点《西厢记》大发结构手法之论。他认为“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须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否则，“便一览已尽”。他要求“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如是更端数番”，让“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他所提倡的正是一种重烘托、重渲染、摇之曳之，引而不发，寓深意于迂曲回环之外，让欣赏者从积极的想象和体验中去领会作品的传神阿堵的意境化结构手法。他在评点《西厢记》中所说的“狮子滚绣球”、“烘云托月”、“移堂就树”、“月度回廊”等正是这种结构手法的种种表现形式。比如“月度回廊”法：“然而月之必由廊而栏、而阶、而窗，而后美人者，乃正是未照美人以前之无限如迤迤如，如隐如跃，别样妙境”。（《寺警》总批，同上）这正是一种通过特定环境的渲染、映托，迂回曲折、逐层推进地刻画人物的结构手法。这类手法既可用于一出之敷设，亦可用于全剧之构造，其基本要求则是通过迤迤曲折的情境构造去求得深远的言外之意。它实际上是情节的曲折性和结构的意境性的结合。后来，刘熙载借用《西京赋》“度曲未终，云起雪飞”来形容“曲中扬抑之道”（《艺概》），正是对这种意境化的结构观念的形象概括。

明清戏剧结构观念对意境观念的参照还突出地体现在对结尾的讲求上。李开先曰：“世称‘诗头曲尾’，又称‘豹尾’，必须急异响亮，含有余不尽之意”。（《词谑·四词尾》）汤显祖曰：“〔尾〕有煞尾，有度尾。煞尾如战马收缰，度尾如水穷云起。《董西厢》惯露此手段”。（《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卷一〔正宫调·尾〕曲眉批）后来，凌濛初则对尾声意境化的要求作了更具体的阐述：

尾声，元人尤加之意。而末句最紧要。北曲尚矣，南曲如《拜月》，可见一斑。大都以词意俱若不尽者为上，词尽而意不尽者次之。若词意俱尽，则平平耳……

#### ——《顾曲杂劄》

显然，他把尾声意境化看作了元以来南、北曲共有的优良传统。正因为如此，所以明清以来便常以“情不尽”、“意有余”、“余文”、“余音”等体现意境特色的语词来称呼戏曲之“尾声”。清代戏剧家黄图秘便正面对此作了总结：“‘情不断’者，尾声之别名也。又曰‘余音’、曰‘余文’，似文字之

大结束也，须包括全套，有广大清明之气象，出其渊衷静旨，欲吞而又吐者，诚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这样的尾声论和意境化的尾声术语在世界各国剧论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这种对结尾的要求由曲尾、出尾延伸为整部戏曲之尾时，就更富于结构美学意义了。如徐复祚便认为应以《惊梦》作《西厢》之结尾：

且《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

#### ——《三家村老委谈》

这里的“情尽而意无穷”既是意境观念在戏剧中的放大，同时又与那种反对大团圆的美学思想相融合，因而具有了更积极的理论意义。祁彪佳则更明确地立足于意境观念立论：“传情者，须在想象间，故别离之境，每多于合欢。实甫之以《惊梦》终《西厢》，不欲境之尽也”。（《远山堂曲品·崔氏春秋补传》）“不欲境之尽”，希望把更多的境外之境、境外之情留给鉴赏者的“想象间”，这正是在戏剧结构中具体地运用着意境论。后来，梁廷枬则从同样的审美角度肯定了《桃花扇》的结局：

《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

#### ——《藤花亭曲话》

他赞扬了《桃花扇》那突破大团圆俗套，伸展了历史悲凉惆怅的悲剧结构，肯定了它那“篇终接浑茫”、留给欣赏者无限旷渺的想象、领悟余地的意境化结尾。后来，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和《红楼梦评论》中则进一步从悲剧论的高度伸展了这种认识。

但是，由于历史的、思想的局限，在我国古代戏剧中，大团圆的结尾毕竟所在多有。于是在关于结尾的结构理论中便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融合：希望借助意境化的审美功能来增强大团圆结局的艺术趣味。李渔的“团圆之趣”论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对于戏剧的结尾，李渔也感到“骨肉团聚，不过欢笑一场，以此收锣罢鼓，有何趣味？”（《闲情偶记·词曲部·大收煞》）但他不是否定大团圆结构，而是希望为这种流行的结局谋求艺术风采。他提出的方案是：

水穷山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

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始为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所谓有团圆之趣者也……收场一出，即勾魂摄魄之具。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亏此出撒娇，作“临去秋波那一转”也。

——《闲情偶记·词曲部·大收煞》

即要求在大团圆的结局中继续设置悬念，精心构造情感波澜，努力留下余音远韵，从而获得“临去秋波那一转”的艺术效果。很显然，李渔是想借助意境化的手法来装点大团圆的结局，使之摆脱平庸和俗套。这似乎也是一种意境观念的运用，但这种运用方式比之“妙处不传”、“曲终人杳”来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无论怎样精心设置波谲云幻，那大团圆本身便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戏剧结局的平庸，纵设再多的“俊语”、“媚语”也是难以达到那“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的艺术效果的。

#### 四、总体反思。

在曲学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曾出现过重本色和重文采、重声律和重才情、重剧场和重案头等不同的倾向和反复的论争，但由于自明以来，元曲实际上被视作了戏曲中的经典，元曲从诗词承接过来的意境化倾向也自然在理论中获得了合法地位；又由于曲作家、曲论家多身兼诗人、词人、散曲家，他们看待戏曲往往难以超越诗学目光。因而，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曲学得以持续地接受诗学的哺育，戏曲中的诗化倾向、曲学中的意境观念便在历次论争中不断地得到肯定和发挥。比如明代较早地在曲论中标举“本色”论的何良俊，却激赏郑德辉的剧作那“蕴藉有趣”、“语不着色相、情意独到”的意境美（见《四友斋丛说·词曲》）；作为声律派代表人物并声称“宁协律而不工”的沈璟，在评价其好友吕天成的作品时却又深情赞美其“曲有情境”，“诸小剧各具景趣，数语含姿，片言生态，是称簇锦缀珠，令人彷徨追赏”，（《沈璟寄吕天成信》吕天成《曲品》清抄本）表现了对曲词意境美的赞赏。至于强调戏剧演出效果的李渔则一面批评《牡丹亭》某些意境句“欠明爽”，“只可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闲情偶记·词曲部·贵浅显》）但同时又从理论上精心探求在情景交融中刻画人物的道路。很显然，他不是反对戏曲的意境化，

而是反对采用那“曲而又曲”、不适于舞台演唱的戏曲语言。明清时期曲学领域在楷式元曲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艺术探讨，最后多以相互吸取、交融而告终。前后出现的“双美论”便是这种交融形态。自吕天成提出“合之双美”（《曲品》）以后，袁于令、孟称舜、祁彪佳等人均先后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种观点。于是重本色和重词华、重音律和重才情等不同倾向逐渐趋于调和，而重视戏剧作品的案头欣赏价值的倾向也在“可演之台上，亦可置之案头”（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的观点之下获得了理论上的认可。在曲学领域种种“双美”论的阐发中，意境观念也不断地得到确认和伸展。诗歌意境那出自衷情、情景交融、自然浑成、空灵流动、传神写照、意蕴深远、字精句炼等艺术特色甚至被融入了戏剧的本色观念之中，成为了反对时文化、道学化、短钉化的理论武器。比如明代不少关于戏剧意境观念的阐发就正是与对丘濬、邵璨等人的“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丘濬：《伍伦全备记·开场白》）的创作倾向的批判同步进行的。正因为这样，后来王国维便以“自然”、“有意境”作为元曲艺术特色的突出体现，作为元曲的“本色”、“当行”的具体内涵。（见其《宋元戏曲考》）总之，诗学对曲学的这种哺育和滋养，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推动了我国戏曲由粗而精、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历程。不仅为发展较晚的曲学提供了反对种种非艺术化倾向的理论武器，而且决定了我国戏曲文学浓郁的抒情化、意境化的艺术特色；推动了戏曲的舞美、化妆、道具、表演程式等各个方面的写意风貌的形成。并实际上也规定了我国现、当代戏曲和歌剧的发展轨迹。

戏曲意境化在情爱题材中结出了最美丽的艺术果实。《西厢记》、《梧桐雨》、《汉宫秋》、《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或主写情爱或以情爱为线的剧作都是高度意境化的精品。通过生动、优美、隽永的意境，性的觉醒、情的追求、爱的执着和痴迷被渲染得那样回肠荡气、那样余味无穷。它们以其绚丽的色彩，蕴藉、优美的美学品格，不仅在舞台上久演不衰，而且跻入了案头欣赏的正宗地位，与唐诗宋词并肩斗艳，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越了其人物和情节的时代规定性而让人常温常新，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然而，由于戏曲毕竟是有别于诗词的艺术样式，由于诗歌意境观念本身也有其历史的、艺术

的局限性。因此，诗美观念对剧美观念的渗透也必然出现利弊兼俱的情况：

诗学的羽翼作用固然促进了曲学的形成，但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曲学自身概念体系的发育和完备。以情景为主要审美视角这固然有利于加强戏剧的写意特色，有助于使戏剧场景和情节结构渗透葱茏的诗意，但这种侧重却又一定程度影响了曲学对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丰富性和戏剧冲突的多样性、尖锐性的注意，从而导致了古典曲学中戏剧性观念的薄弱。有些戏曲作者在情景关系的处理中，不是从人物特定的性格、心理特征出发，而是象诗歌一样偏重于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因而导致某些戏剧的情节不是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的发展史，而只是作者主观情感递次地借景宣发，甚至成了某些传统诗境的组合，从而失去了戏剧的灵魂。有些曲论者偏重于案头欣赏价值，因而又造成某些戏曲作品虽具有诗词一般的案头欣赏价值，但却又因为对舞台效果考虑不足，虽然意境婉妙却难以诉诸场上，失去了作为综合艺术的意义。

此外，诗词意境的品格也影响了戏曲意境的品格。由于诗歌意境论最初主要是由闲幽淡远的山林田园诗总结而来，作为曲学意境观念直接源头的词学更是偏重婉约，这种审美意向便对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导致了我国戏曲重于婉丽而轻于悲壮、崇高的倾向。尽管元曲中的意境格调曾较之诗词来有所拓展，但由于意境自身

的审美传统即侧重于表现婉曲、优美的情思，因而元曲的这种拓展是有限的。延至明清，重婉约仍是戏曲意境的主调，以至于重本色的权威曲论家王骥德也认为“曲以婉丽俊俏为上”（《曲律·杂论》）。这种观念导致了以优美为主体的戏曲品格，着意于追求一种和谐的情景交融、一种空灵的含蓄、一种脉脉的情韵，因而也就对激扬的呐喊、奔放的激情有着限制作用，并一定程度妨碍了悲剧观念的伸展。以至于当近、现代新的社会浪潮席卷起来，需要艺术来抒发悲壮、昂扬之声时，戏曲那原来偏重婉约、优美的艺术品格便显得缺乏适应性。相反，作为舶来品的话剧反倒及时地适应了时代需求在戏剧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后来，待到戏剧工作者从时代的要求出发，从民间戏曲、歌谣中吸取了刚健和昂扬，铸造了新的意境品格，于是便有了民族化的新戏曲、新歌剧。近数十年的经验证明，意境化程度的高低往往对这些民族化新戏剧的审美价值和生命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如何既发扬深深植根于民族艺术土壤之中并取得了卓越审美效果的戏剧意境化经验，又努力适应新的时代精神、生活节奏的需要，拓展、铸造新的意境品格，这便成为当今戏剧探索中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了。

作者单位：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上接第143页）

跟上面提到的“入内贴起一幅画”里的“起”，就完全清楚两个“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前者是介词，后者是时态助词。

“起”作介词时等于普通话的介词“在”，广州话的介词“喺”。

#### 五、作语气词

莞城话的“起”还可以作语气词用，“起”作语气词时，一般出现在句子的末尾。

(1) 麻口有人畀汽车撞起。[ma<sup>21</sup> hau<sup>35</sup> zau<sup>13</sup> zən<sup>21</sup> pɛi<sup>35</sup> hɛi<sup>32</sup> ts'ɸ<sup>21</sup> tsɔŋ<sup>32</sup> hɛi<sup>35</sup>]

（外面有人被汽车撞着了）

(2) 嗰个细蚊仔畀蛇咬起。[kɔ<sup>35</sup> kɔ<sup>32</sup> sɔi<sup>32</sup> mən<sup>21</sup> tsɔi<sup>35</sup> pɛi<sup>35</sup> sɸ<sup>21</sup> ŋau<sup>35</sup> hɛi<sup>35</sup>]（那个小孩被蛇咬了）

这类出现在句子末尾的“起”，除了表示陈述语气外，同时也表示发生了变化，即“已然”的意味。不过，在莞城话里它可以用“着[tsɸk<sup>22</sup>]”代替，例如，把例(2)说成“畀个细蚊仔畀蛇咬着”，丝毫不妨碍意义的表达。具备这种作用的“起”译成普通话时，写成“了”或“着了”都行。

总而言之，莞城话“起”这个词身跨虚实两大类，语法意义丰富，它与其他词语有多种组合，在句子里的位置可中间，可最后面，因为组合不同，位置不同，词性不一样，所起的句法功能也就不一样。我们应该从它与其他词语的不同组合，及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去分辨它的不同词性，区别它所起的各种作用。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石成



# 车王府曲本子弟书评述

刘烈茂 郭精锐

“车王府曲本”指的是清代北京车王府内收藏的一批曲本，包括戏曲、杂曲、鼓词、子弟书等。

“车王”全称车登巴咱尔王，清代喀尔喀蒙古赛因诺颜部人，成吉思汗直系子孙。

明清之际，我国西北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车臣汗、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同时称三汗”，都属于漠北喀尔喀蒙古。雍正三年（1725年），从土谢图汗部西境分出赛因诺颜部，自此喀尔喀共有四部。

赛因诺颜部牧地约当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巴彦洪戈尔等省和前杭爱、扎布汗、南戈壁等省各一部分。“车王”车登巴咱尔即为赛因诺颜部人。其祖策稜因军功封王，是“车王府”之源。

自策稜因军功封王，历代都袭封王爵，至车登巴咱尔王已历时五代。今天，我们所说的“车王府”即北京“那王府”。这座王府因车登巴咱尔而称车王府，因达尔玛而称达王府，因那彦图而称那王府。王府“座落在安定门内宝钞胡同，南面是高公庵，西面是一个窄狭的小胡同。府四面建有群墙，共占地三十八亩。”（《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318页）

“车王府曲本”即指曾收藏于车王府内的一批曲本。

目前，国内收藏“车王府曲本”的有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三家。车王府曲本的数量，目前未有精确的统计。据冯秉文先生“首都图书馆《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前言”介绍，约4400余册；又据《学林漫录》第九辑雷梦水先生《书林琐记·车王府钞藏曲本的发现和收获》介绍，共5131册。卷帙繁多，不易清点，意见不一，在所难免。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这批曲本约近5000册。

曲本主要分为戏曲与说唱两大部分。戏曲部分以京剧为主体，次为昆曲，还有高腔、弋阳腔、吹腔、西腔、秦腔、传奇、木偶戏、皮影戏等。说唱部分包括鼓词、子弟书、杂曲三类。这一集子整理校点的即为其中的子弟书，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作为底本。

子弟书是鼓词中的一支，也称单鼓词，它是满汉曲艺结合的产物。一般认为，它起于乾隆年间，演唱至光绪年间，历时近二百年。据清光绪年间震钧《尺咫偶闻》一书所载：“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

城调之分。”

西城调近于昆曲，东城调近于弋腔。清顾玉琳《书词绪论》说：“其西派未尝不善，惟嫌阴腔太多，近于昆曲，不若东派正大浑涵，有古歌遗响。”由此看来，子弟书又是在戏剧中吸取养分而形成不同的风格的。

子弟书既创始于八旗子弟，流行于北京与东北地区，并有用“满汉兼”文体写作的，当有满汉文化作根基，因而，它实际上是满汉文化合璧的产物。

子弟书的创始人今已无法考查，但在其流行中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罗松窗与韩小窗。顾玉琳《书词绪论》又说：“书之派起自国朝，创始之人不可考。后自罗松窗出而谱之，书遂大盛。”韩是西派代表人物，罗是东派扛鼎者。罗、韩均是子弟书大手笔。西派流丽宛曲，东派慷慨激昂。

就车王府曲本子弟书所留下的作者署名，如陋巷、优孟、渔村、竹轩、鹤侣氏、葛堂氏、符斋氏等，既俗又雅，亦儒亦道，说明这种文艺形式在其时是雅俗共赏的。“无论播绅先生，乐此不疲，即庸夫俗子，亦喜撮口而效”（《书词绪论》）。子弟书《评昆论》中描述石玉昆演唱时，惊动公卿流传市井，令听众“一句一夸一字一赞，众心同悦众口同音”。这除了说明石玉昆的演唱技巧之外，也显示了这种文艺形式是深受欢迎的。

我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但叙事诗历来发育不全，尤其是长篇叙事诗更是为数不多。其间除有属于民间性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与文人创作的《三吏》、《三别》、《长恨歌》、《琵琶行》一类诗作之外，在众星灿烂的诗的世界，叙事诗毕竟寥若晨星。“车王府曲本”所包含的这批子弟书，无论从诗歌的角度，还是从可供演唱的“歌诗”来看，均有其特殊而不可忽略的意义。最早发现它的特殊艺术价值的是郑振铎先生，他于1935年主编《世界文库》时，以独特的眼光列入《东调选》和《西调选》共十一篇。随后他撰写的《中国俗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都列有专题介绍子弟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满族前身属“女真”，从族源上属于北方草原地区细石器文化系统与胡民族系统，从体质人类学来说，她与中华大地各族均属亚洲蒙古种，其创始神话与先秦殷人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但在“清”这一特定背景下毕竟是小邦入主大国，其后进的文化必然为相对先进的汉文化所消融。清人入关，一方面实行高压以防政乱，另一方面又推行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顺治的《御注孝经》，康熙的《孝经衍义》，雍正的《孝经集注》，体现了满人之适应汉文化。在婚姻上，清统治者采取从汉俗的政策，为防止满人强夺汉女为姬妾，满人娶汉女需呈报申请，汉人娶满女则不必。还规定满女不得恃势欺压汉人丈夫，这些无疑都值得肯定。曲本《百花亭》、《查关》，“你在番邦我在汉，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对于融合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民间艺人对于历史的评判，可以作为史学研究的参考。

满人入关虽然逐渐从汉俗，但其固有的婚姻状态却与汉人有许多不同。寡妇再嫁是正常的事，“兄终弟及”的叔嫂婚也是其习尚。顺治皇帝就曾为其生母皇太后下嫁皇叔多

尔袭而诏示天下。其体察亲心是建立在满族固有的叔嫂婚的基础上的。就人类的婚姻状态而言，汉族的婚姻状态要比满族进步，但在理性高照的地方，人性也必然受到严重的摧残。所谓“烈女不嫁二夫”正是在封建理性观念之下形成的陋俗。满族入主中原，其固有的婚姻观念必然在这块封建观念因袭沉重的中原大地起到一定的冲击作用。《烧灵改嫁》中的少妇因夫死儿小，生活无着，守孝期间，邻人亡妻，托其替为提亲。少妇于是自荐，烧灵改嫁。这类曲本读来令人肃然起敬，对于传统的“理学”无疑是一种冲击。《连理枝》、《戏姨》以北人刚健有力的笔调歌咏人的情性。《巧姻缘》抨击的是冲喜婚；《下河南》鞭挞的是没有感情的婚姻。《思凡》、《僧尼会》歌咏的是人性的回归，主角尼姑、和尚无法忍受佛门清规戒律，终于逃出沙门，“男既有心女有意，怕什么水涌山高隔路途。”这类曲本展示了人性与理性的对垒。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从曲本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殷实的经济与闭关锁国的矛盾。经济的殷实必然产生对文化的强烈需求，闭关锁国与文字狱则逼使文人情愿耽于朴学训诂。就在文人个性创作相对冷落的背景下，民众对文艺的强烈渴求，使子弟书作者不断地挖掘题材，他们将史实诗化，散文诗化，戏曲诗化，小说诗化。在他们苦心经营下，庄周梦蝶、范蠡归湖、赤壁鏖战、木兰从军、林冲夜奔、游园惊梦、鹊桥盟誓、黛玉葬花等古代文学的精采篇章，一一被改编为可供演唱和欣赏的优美诗篇。孔明、李逵、武松、莺莺、红娘、宝玉、黛玉、孙悟空、猪八戒等戏曲、小说人物皆被化为诗的形象。八戒撞天婚的谐趣、和靖赏梅的飘逸、绿衣女偷情的幽怨、湘云醉酒的豪放、草诏敲牙的剑拔弩张和全扫秦的嬉笑怒骂等均跃然纸上。任何曲艺均担负有歌唱历史、传播文化精华的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子弟书作者将历史故事、戏曲故事、小说故事诗化之时，虽然并非每篇都有创造性与超越原著水平，但其中确有不少篇章，或对原著的结构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或在原有故事框架里注入作者的现实感受和理想追求，或由原著数言片语，一点因缘生发开去。《叹武侯》不是《三国演义》里孔明形象的再现，而是诗人用血泪笔墨谱写的一首孔明颂歌。《凤仪亭》、《十问十答》里的貂蝉，诗人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与理想，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更感人的灵魂。《西厢记》中“拷红”一小折，在子弟书中被扩大为八大回，红娘这个热心为人、聪明机敏、勇于斗争的婢女形象，被塑造得更为丰满动人。

文治武功的清帝国，随着康乾盛世一过，好景不长，“变风”、“变雅”作矣。体现在曲本中的《长随叹》、《司官叹》、《穷鬼自叹》、《假老斗叹》、《女侍卫叹》、《官衙叹》、《老斗叹》、《奎仪卫叹》、《老侍卫叹》、《厨子叹》等一系列曲目，或叹没钱贿赂上司，不得升迁；或叹设帐教书操心费力，束脩不过四五百钱；或叹连年旱涝，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或叹老侍卫生活艰辛，老妻竟要到坟场乞食。《须子论》、《侍卫论》，愤论公子哥儿娇生惯养、花天酒地，抨击胎里红出身豪门贵公子，靠祖上福荫，叹天道怎么把一群“济世英雄”都聚在王宫大门。这类曲本怨刺形诸笔墨，愤慨发乎歌唱，所谓“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正义》）诚足以“观风俗，知厚薄”，让人感受到封建末世的重重危机。

作为一种歌唱文艺，当它发端小道未登大雅之时，先是为衣食而唱，为爱情而歌；随着它在发展中愈来愈沛然之时，必然承继几千年文艺的优秀传统，“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的笔触也由身边的风俗画卷伸向了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二酉氏创作的《碧玉将军》便是其中的名篇。据有关专家考证，碧玉将军即清代道光皇帝的侄儿奕经（1791—1855）。当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侵占浙东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后，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调集内地数省军队，前往浙江应战。（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398页）这位扬威将军竟把这次关系国家安危的授命看成玩乐、搜刮的好机会。侵吞珠宝无数，翡翠堆积如山，因此获得翡翠（碧玉）将军的雅号。他畏敌如虎，等到朝廷下了战令之时，不禁胆战心惊。同样荒唐的是，当朝廷的老元戎得到碧玉将军“官兵大胜”的谎报时，他“明知道此事虚无，实难为信”，却也“乐得乎将计就计，飞奏天庭”。《碧玉将军》的深刻，正在于通过清廷内部的腐朽，让人看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子弟书不仅在内容上有可观者，在一个诗的国度，又能达到雅俗共赏，“众心同悦众口同音”这样高度的艺术境界。

子弟书自有其内在的创作规律与严格的艺术标准。它在发展中立有书社，“社规不可不严，……如此整肃，庶社中人可以有益身心，即社外人观之，亦不失为雅道。”“不来者不招，勿令攒眉而出；来之者不拒，任其倾耳相参。”（顾玉琳《书词绪论·立社·附书社引》）书社通过“相参”，自然能使一种起于“小道”的说唱文艺得到提高而通向“雅道”，并产生有关的“文艺评论”。保留在“车王府曲本”中的《柳敬亭》、《评昆论》、《郭栋儿》、《随缘乐》、《栗把儿上台》、《集锦书目》、《拐棒楼》、《风流词客》、《灯谜会》便是一批可贵的资料，它通过包括子弟书在内的不同文艺形式的批评，对于提高子弟书的创作质量与演唱水平，自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关子弟书的创作及演唱，《书词绪论》：“骤听之，其音袅袅，惟知说之者之技神；细按之，书中字字之头尾腰韵，无不毕具”。表面看来，似乎是说书者的“技神”，实则包含了创作时的大量心血。子弟书的作者既依据诗歌的创作规律，又能依据子弟书自身的实际而不拘泥于常规。同书载：“‘梧桐常引凤来仪’之句，‘梧桐常’三字，俱属平声。”为何出现有违格律的三平调？“情事比于天时，板眼格局比于地势”，“天时地势之使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内容服从于形式，才能达到“脱俗”的境界。

所谓“脱俗”，《书词绪论》强调，有人认为不顺乎传统世故便是脱俗，实际“正种一俗根而不能拔去矣。”倘不按照传统世故，既唐突古人，又安能为国民所接受？只要一读子弟书，便可知道其高度的成就是渊源有自的。《诗经》以降，二千年诗歌创作的丰富经验正是其沃土。

子弟书作者大多具有丰厚的文化素养，他们熟读唐诗宋词，深谙典故。“没有人从旁问之，某一句作何讲解？用何典故？而茫然莫对，未免贻识者羞。”基于熟读与深谙，故能信手拈来，自然成文。子弟书《花木兰》：“月落乌啼征马嘶，霜华满地晚风凄。炊烟

缕缕遥村隐，芦雪漫漫野成迷。满目荒凉无伴侣，一身孤苦有谁依？”书中词汇，多有出处。一句话，唐诗宋词所锤炼出来的字句，便是子弟书创作丰富的词汇库。

词汇既丰，表情状物便能铺张扬厉而又得心应手。《思凡》篇铺张扬厉，敷陈出一个清幽的境界来烘托色空尼枯寂的心境。先是连用“当当”“清清”十个叠字，继又连用“一回”八个叠句排比。古人早有“诗用叠字最难”之说。诗用叠字固难，用叠句更难。但这十叠字八叠句绝无累赘之感，正是在这“响当当”、“闹嚷嚷”的环境中，反衬出“冷清清”、“昏惨惨”不合情性的空寂，这就难怪色空尼要“恨”要“思”要“叹”了。而这八个叠句分别冠以恨、思、叹、滴、立、掩、展、数等八个动词，也能曲尽色空尼姑在这一典型环境下的哀怨无聊。更为令人叹绝的是作者遂又连用十个“为什么”、九个“那里有”，在“骂”、“嫌”、“气”、“恼”中又推出一连串的“见几个”、“学甚么”，层层推进，不断反诘、质问与控诉，情感愈演愈烈。

子弟书既贵铺张扬厉，其铺张扬厉又能脱汉赋弄繁斗巧的俗套而走向通俗化。通俗化不仅体现在语言运用上大多如秀才讲家常语，词汇多为人们熟习的诗词语，也体现为地方方言与“旗语”的引进。子弟书与鼓词均为清代齐驱并驾的说唱文艺，它们与京剧共同形成一套可以互相为用的“水语”，如“马能行”、“地流平”一类词汇。在句式上，子弟书虽每句七字，但它继承小曲小令传统，可以衬字，这就使句子更灵活多变。值得提起的还有，其创作还“搀以方音”而依据北人语音变化的实际。如其时的格律诗歌创作仍依传统诗韵并讲求入声，但子弟书中的国、俗、佛、熟、索、割、足、磕等已多用为平声并不同于传统的诗韵。子弟书创作因其方言方音的引进搀合，在北人中显得亲切，与传统的诗词创作及南人的“南词”创作相比，又显出它的特色。

车王府子弟书从版本与资料来说，也真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将清代别墅堂抄本《七夕密誓》与“车王府曲本”子弟书《鹊桥盟誓》相比较，这二种本子的优劣可明显地体现出来。

《七夕密誓》是子弟书中的名篇，又题《鹊桥盟誓》，简称《鹊桥》。取材洪升《长生殿》传奇。作者罗松窗。“车王府曲本”《鹊桥盟誓》与《七夕密誓》系同作异题。情节梗概：七夕之夜，唐明皇与杨玉环在长生殿设宴乞巧。明皇心旷神怡，笑牛郎织女一年一会，不如人间夫妻相傍相依。玉环恐人情难相久，将来难免恋新忘旧。于是二人对天盟誓，愿今后世世为夫妻永不分离。

别墅堂抄本《七夕密誓》与“车王府曲本”《鹊桥盟誓》同是二回，一百六十句。二书自开篇至第四十八句，除开篇二句稍异之外，其余相同。但自第四十九句起，即有明显差异。前四十八句中叙说唐明皇李三郎与杨玉环面对河汉星辰发出感慨。《鹊桥盟誓》中，始而是唐明皇面对耿耿星河，感慨牛郎织女不如人间夫妻相偎相傍。但唐明皇的一番情意，未能使杨玉环以为然，相反，正由人心易变引发杨玉环人老珠黄，将来难免有长门掩泪啼的感叹。杨玉环的一番话，则使唐明皇听罢陡然变色，恨玉环疑他薄幸，遂有后面的剖心盟誓。层次井井，条理有序，于情于理均能浅水引舟，渐入深流而切入“盟

誓”之题目。

《七夕密誓》则不同，它自第四十九句以下突兀地把《鹊桥盟誓》中六十五句以后的一大段插入。在《鹊桥盟誓》中本是唐明皇恨玉环疑他薄幸，有此“因”才引来盟誓之“果”。而在《七夕密誓》中成了杨玉环恨明皇疑她薄幸。既然是玉环担心明皇疑她薄幸，便得由玉环来解释自己并非“无情之辈”，却又由明皇来“剖胆明心”解释此疑。这样便发生了层次与情理上的混乱。《七夕密誓》在层次上的混乱，疑是子弟书在传抄时发生倒错做成的。

由此可见，“车王府曲本”子弟书从版本来说，不仅在于它保存有已佚名作，还在于它的本子有优于现时刊行的曲本之处。更重要的是，它所保存的这批资料，绝大部分是现时仍未刊行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斯翰

---

（上接第149页）

①转引自章俊弟《幽默与风度》第144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鲁迅全集》5卷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王朝闻《幽默与洞察》，见《美学文摘》5辑第136页，重庆出版社1936年版。

④林语堂《论幽默》第26—27页，上海时代书局1949年版。

⑤黑格尔《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原则》，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6辑第109、1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⑥秦牧《一朵永不凋谢的智慧之花——幽默》，《光明日报》1983年9月1日。

⑦潘智彪《喜剧心理学》第309页，三环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广东东莞莞城话的“起”

陈晓锦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起”是个含趋向意义的动词，例如：“起床、起立、起来”。

粤方言的代表广州话里的“起”则除了是表示动作趋向的趋向动词，例如：“起身（起床）、起立、起嘍（起来）”外，还包含“完成”的意思，例如：“功课做起喇（功课做完了）”，“信写起咯（信写好了）”。

在属于粤方言的广东东莞莞城话里，也有这个“起”。“起”，莞音[hɛi<sup>35</sup>]，读阴上调。相比之下，莞城的这个词不仅出现的频率高，而且使用的方法和表达的意义都比普通话的“起”复杂得多，就连广州话的“起”也远不及它。概括起来，莞城话的“起”大致有这么些用法：第一，作趋向动词。第二，作时态助词。第三，作结构助词。第四，作介词。第五，作语气词。本文举例谈谈“起”的这几种用法，并尝试分析不同意义的“起”出现的条件。

## 一、作趋向动词

莞城的“起”作趋向动词时，同普通话和广州话一样，既可以在句子中单独作谓语，也可以附在句子的主要动词后面表示趋向。

### 1. 单独充当谓语

(1) 日日起早摸黑。[zɛk<sup>22</sup>zɛk<sup>22</sup>hɛi<sup>35</sup>tsɔu<sup>35</sup>mɔ<sup>213</sup>hak<sup>44</sup>](天天起早摸黑)

(2) 天皓喇，重唔起身？[t'in<sup>213</sup>hau<sup>32</sup>ŋa<sup>32</sup>, tsuŋ<sup>32</sup>ɲ<sup>21</sup>hɛi<sup>35</sup>sɛŋ<sup>213</sup>](天亮了，还不起床？)

(3) 起屋。[hɛi<sup>35</sup>ŋuk<sup>44</sup>](建房子)

以上三例的“起”，在句子中都是独立运用的。

### 2. 附在句子的主要动词后面表示趋向

(1) 哗，落起倾盆大雨！[va<sup>32</sup>ŋɔk<sup>22</sup>hɛi<sup>35</sup>k'əŋ<sup>213</sup>pún<sup>21</sup>tai<sup>32</sup>zy<sup>13</sup>](哟，下起倾盆大雨！)

(2) 讲起就好笑。[kɔŋ<sup>35</sup>hɛi<sup>35</sup>tsau<sup>32</sup>hɔu<sup>35</sup>siu<sup>32</sup>](说起来就好笑)

(3) 睇起总系唔凑够。[t'ɔi<sup>35</sup>hɛi<sup>35</sup>tsuŋ<sup>35</sup>hɔi<sup>32</sup>ɲ<sup>21</sup>t'sau<sup>32</sup>kau<sup>32</sup>](看起来总是〈觉得〉不顺眼)

上面三个例子中的“起”，分别跟在句子里的主要动词“落、讲、睇”的后面表示趋向，这几句话假如光有“起”，没有主要动词，则不能成立。

“起”作趋向动词时意义简单明了，对译成普通话一般说成“起”或“起来”，在莞城话里，凡表示趋向意义都需要它。

## 二、作时态助词

作时态助词的“起”有两个用法，一是表示完成态，二是表示持续态。

### 1. 表示完成态

(1) 嗰只鸡嬲生起好多鸡春。[kɔ<sup>35</sup>tsɔ<sup>35</sup>kɔi<sup>213</sup>na<sup>35</sup>sɛŋ<sup>213</sup>hɛi<sup>35</sup>hɔu<sup>35</sup>tɔ<sup>213</sup>kɔi<sup>213</sup>ts'əŋ<sup>213</sup>](那只母鸡生了很多鸡蛋)

(2) 拗起一碌蔗。[ŋau<sup>35</sup>hɛi<sup>35</sup>zɛk<sup>44</sup>ŋuk<sup>44</sup>tsɔ<sup>32</sup>](折了一截甘蔗)

(3) 佢用头将个波顶起上嚟。[k'ui<sup>13</sup>zuŋ<sup>32</sup>t'au<sup>21</sup>tsɔŋ<sup>213</sup>kɔ<sup>32</sup>pɔ<sup>213</sup>təŋ<sup>35</sup>hɛi<sup>35</sup>sɔŋ<sup>13</sup>ŋɛi<sup>21</sup>](他用头把〈那〉个球顶了起来)

(4) 讲她哋，佢哭起上嚟。[kɔŋ<sup>35</sup>tɛi<sup>35</sup>tɛi<sup>35</sup>, k'ui<sup>13</sup>huk<sup>44</sup>hɛi<sup>35</sup>sɔŋ<sup>13</sup>ŋɛi<sup>21</sup>](说着说着，她哭了起来)

这四个例子中的“起”，跟在每句话的主要动词“生、拗、顶、哭”之后，表示这些动作均已完成，可翻译成普通话的“了”。其中例(3)、例(4)“佢用头将个波顶起上嚟”和“讲她哋，佢哭起上嚟”两句的“起”后头都有“上嚟”这个含趋向意义、表示开始体的词尾，这就更清楚地显示了“起”在这里的作用是表时态，而不是表示趋向。

### 2. 表示持续态

(1) 大佬一手扯起细佬嚟头毛。[tai<sup>32</sup>ŋɔu<sup>35</sup>zɛk<sup>44</sup>sau<sup>35</sup>ts'ɔ<sup>35</sup>hɛi<sup>35</sup>sɔi<sup>32</sup>ŋɔu<sup>35</sup>kɔ<sup>32</sup>

t'au<sup>21</sup>mɔu<sup>21</sup>] (哥哥一手扯着弟弟的头发)

(2) 用张纸包起本书。[zuŋ<sup>32</sup>tsɕŋ<sup>213</sup>tsi<sup>35</sup>pau<sup>213</sup>hei<sup>35</sup>pun<sup>35</sup>sy<sup>213</sup>] (用<一>张纸包着<那>本书)

在以上二个例子里，“起”分别在各句的动词“扯、包”后面表示动作的持续，相当于普通话表持续态的助词“着”，广州话表持续态的“住”。

值得注意的是，表示动作完成态和持续态的“起”有时会混淆。“入内贴起一幅画[zɔk<sup>22</sup>nui<sup>35</sup>t'i<sup>22</sup>hei<sup>35</sup>zɛk<sup>44</sup>fuk<sup>44</sup>va<sup>35</sup>]”，“着起好多衫[tsɕ<sup>32</sup>hei<sup>35</sup>hɔu<sup>35</sup>tɔ<sup>213</sup>saŋ<sup>213</sup>]”，这两句里的“起”对译成普通话的“着”，或者对译成“了”全说得过去：“里面贴了(着)一幅画”，“穿了(着)很多衣服”。碰到这种情况，是理解成完成态还是持续态，就只能依具体语言环境判断了。

另外，莞城的“起”无论是表示完成态，抑或是表示持续态，在句子中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莞城话表示动词的完成态还可以采用在动词后加词尾“敲[hau<sup>213</sup>]”的方式，在这点上，“起”和“敲”有时能够互换而不影响意义的表达，但本文暂不准备谈“敲”)，缺少了它，句子的意思恐怕就不一样了。例如：“煮起一煲饭(煮了一锅饭)”和“煮一煲饭(煮一锅饭)”，第一句“煮”的动作已明显完成，第二句的“煮”却可能是尚未做的动作或正在做的动作。同样，“争起食(争着吃)”和“争食(争吃)”的意思也大有差别。

### 三、作结构助词

作结构助词用时，“起”既可以当补语的标志，也能够当定语的标志。

#### 1. 作补语的标志

(1) 痛起周身唔得嘢。[tún<sup>32</sup>hei<sup>35</sup>tsau<sup>213</sup>sɛŋ<sup>213</sup>m<sup>21</sup>tɛt<sup>44</sup>tin<sup>32</sup>] (痛得全身不自在)

(2) 嚟啲嘢烂起霉胎胎。[kɔ<sup>35</sup>ti<sup>213</sup>zɕ<sup>13</sup>ŋɛŋ<sup>32</sup>hei<sup>35</sup>mui<sup>21</sup>tú<sup>213</sup>t'ui<sup>213</sup>] (那些东西烂得一塌糊涂)

(3) 树叶落起通地都喺。[sy<sup>32</sup>zit<sup>22</sup>ŋɔk<sup>22</sup>hei<sup>35</sup>t'un<sup>213</sup>tɛi<sup>32</sup>tɔu<sup>213</sup>hɔi<sup>32</sup>] (树叶落得满地都是)

(4) 匹捶捶，病起迷迷懵懵！[p'ɛt<sup>44</sup>ts'ui<sup>21</sup>ŋui<sup>21</sup>pɕŋ<sup>32</sup>hei<sup>35</sup>mɔi<sup>21</sup>mɔi<sup>21</sup>mun<sup>35</sup>mun<sup>35</sup>] (吓，病得迷迷懵懵！)

(5) 吓起周身出冷汗。[hɛ<sup>224</sup>hei<sup>35</sup>tsau<sup>213</sup>

sɛŋ<sup>213</sup>ts'ɛk<sup>44</sup>ŋɛŋ<sup>13</sup>fun<sup>32</sup>] (吓得全身出冷汗)

上面例(1)、例(2)的“起”附在形容词谓语句后充当补语的标志，其余三例的“起”附在动词谓语句后面充当补语的标志。在这些句子里，“起”不能省略，没有了“起”，这些句子就都不通顺了。这种情况的“起”与普通话的结构助词“得”相当。

#### 2. 作定语的标志

(1) 龛树生起啲果又大又甜。[p'ɔ<sup>213</sup>sy<sup>32</sup>sɛŋ<sup>213</sup>hei<sup>35</sup>ti<sup>213</sup>kwɔ<sup>35</sup>zau<sup>32</sup>tai<sup>32</sup>zau<sup>32</sup>t'i<sup>n<sup>21</sup></sup>] (<这>棵树结的<那>些果子又大又甜)

(2) 佢整起啲煲好好味。[k'ui<sup>13</sup>tsɛŋ<sup>35</sup>hei<sup>35</sup>ti<sup>213</sup>suŋ<sup>32</sup>hɔu<sup>35</sup>hɔu<sup>35</sup>mɛi<sup>32</sup>] (她做的<那>些菜味道很好)

(3) 阿女洗起啲衫唔干净。[a<sup>32</sup>nui<sup>13</sup>sɔi<sup>35</sup>hei<sup>35</sup>ti<sup>213</sup>saŋ<sup>213</sup>m<sup>21</sup>kun<sup>213</sup>tsɕŋ<sup>32</sup>] (女儿洗的<那>些衣服不干净)

这三个例子中的“起”都出现在名词性的偏正词组前，表示在它之前的是修饰名词性偏正词组的定语，这些“起”明显等同于普通话的结构助词“的”，在这种情况下，“起”可以看作是定语的标志。

#### 四、作介词

“起”在莞城话里也可以作介词，作介词时同句子中的名词或名词性的词组组成介词词组充当句子的补语：

(1) 搵起手头软脰脰。[nɛk<sup>44</sup>hei<sup>35</sup>sau<sup>35</sup>t'au<sup>21</sup>zɕŋ<sup>21</sup>ŋɛm<sup>21</sup>ŋɛm<sup>21</sup>] (拿在手上软绵绵)

(2) 件褛着起身度暖郁郁。[kin<sup>32</sup>ŋau<sup>213</sup>tsɕ<sup>32</sup>hei<sup>35</sup>sɛŋ<sup>213</sup>tɔu<sup>32</sup>ŋɕŋ<sup>13</sup>va<sup>44</sup>va<sup>44</sup>] (<这>件大衣穿在身上暖洋洋)

(3) 唔该你将幅画贴起墙上。[m<sup>21</sup>kui<sup>213</sup>nɛi<sup>13</sup>tsɕŋ<sup>213</sup>fuk<sup>44</sup>va<sup>35</sup>t'it<sup>22</sup>hei<sup>35</sup>ts'ɕŋ<sup>21</sup>sɕŋ<sup>32</sup>] (劳驾你把<这>幅画贴在墙上)

例(1)的“起”与“手头”组成介词词组，充当动词“搵”的补语；例(2)“起”与“身度”组成介词词组，充当动词“着”的补语，例(3)的“起”则与“墙上”组成介词词组，充当动词“贴”的补语。这些句子中的“起”绝不能没有，比较一下例(3)的“起”

(下转第135页)



# 试论幽默的教学功能

周国雄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基地，对于教师如何教，学生怎样学的“教学”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和探索的焦点。不过，从目前的教学现状看，从小学到大学，尤其是中小学，“旧八股”虽然没有了，但机械呆板、因循守旧的现象依然存在。“寓教于乐”虽然提倡多年，但能真正做到的极少。这大概是我们民族受“不苟言笑”和“君子不重则不威”的影响太深的缘故。本文试图引入幽默以为疗救，探讨它在教学领域中的特殊功能，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应用。

## 唤醒“沉睡”的大脑细胞

何谓幽默？中外理论家们曾有多种多样的解说，但不管观点如何多种多样，幽默不外可分为性格幽默和艺术幽默两大类。在性格幽默中，可分为幽默意识和幽默风度两种；在艺术幽默中，可分为幽默作品和幽默情境（形态）两种。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幽默，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幽默“都是一种情感活动、一种智慧活动、一种创造活动、一种审美活动。”<sup>①</sup>由于这种活动与人类的智慧发挥和乐感心态紧密相连，幽默被宠为“人类最完美的力量。”在以开发智力和造就人才为最终目标的教学领域，更有它驰骋飞翔的天地。

马克思曾经引用黑格尔的话认为：“实际上，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sup>②</sup>解放后，我国的教育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教学方法上，仍较普遍使用“满堂灌”和“理性激情”的手段。这对开发智力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是以教师或教案为中心，而不是以启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为中心。如课堂上的慷慨激情，尽管可以使听者精神高度集中，但如果“激情”成为惯性，很快就会使学生的大脑皮层困乏，产生抑制型的神经效应，而幽默教学法却能使学生在开怀爽朗的笑声中或心旷神怡的氛围中接收知识，思考问题。这种心境和氛围的产生，不仅有益于美好的心理品格的培养，而且对激活大脑深层的思维细胞有其它教学手段不可比拟的功效。美国近年兴起的“笑学研究”证明，人在大笑的时候，生理机能会发生多种变化，如脑垂体释放某种欣快物质以减轻痛苦和烦恼，给人以兴奋的感觉；动脉在收缩后变得松弛；肺部受压力增加，心跳力加强以吸进大量的氧气；内分泌系统分泌出新的激素等等。<sup>③</sup>难怪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医学家西尔瓦诺·阿瑞提完全赞成这样的结论：“笑与幽默由于有益于身体而应受到欢迎。它们能恢复平衡、稳定血压、为血液补充氧、按摩维持生命的器官、刺激循环、促进消化、放松肌体，发生良好的感受。”<sup>④</sup>幽默的这种生理功能正是唤醒学生沉睡的大脑细胞，高效地启动学生积极思维能力的动力

源泉。

从人类生理解剖学的研究成果知道：人的大脑拥有100亿到150亿个神经细胞，而每一个神经细胞又与1万多其它身体细胞相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神经细胞的网络系统。一个富有天才的人，他的大脑神经细胞的激活程度和数量要比常人多得多。平常所说“这个人脑灵活”，实际上就是指他大脑神经细胞的使用效率和激活率比一般人高得多，反之，就是指大脑神经细胞经常处于沉睡状态。美国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布鲁纳认为：人（尤其是儿童）的智慧潜力是巨大的，但绝大部分，甚至说百分之九十没有被开发而被浪费掉，<sup>⑥</sup>由此可见，如何唤醒学生的潜在智力，使其被浪费掉的部分尽量地发挥作用是学校教育工作，尤其是课堂教学中的一项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工程。多少年来，那种只重视主观传授，而不重视调动或者不知如何调动学生思维神经的教学方法，之所以“事倍功半”，原因就在这里。

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大脑神经细胞的生命力，使其成为生机勃勃的思维机器和记忆肌体？方法当然不可划一。不过，从大脑神经细胞的生命源泉看，使其拥有足够的血液流量和氧的供给是首要的条件。这个条件首先来自于身体各个肌能的正常协调的运动。可是，在传授知识的教室里，学生处于被动静坐的状态，是不利于使躯体内的各种生命器官协调地运动起来，从而生产足够的大脑用血和氧的。而大量的现象和研究成果证明，“笑”是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教师如果能根据教材的内容需要适心应时地使用幽默教学法，使学生在被动静坐的状态中笑出声来，这是诸种唤醒大脑神经，激活思维能力的最好手段。

从生理学上说，笑是大量的原发神经力量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阻碍而突然停止流动，“这份过剩的神经力量必须使自己朝着另外一个方面排除出去，所以结果就发生了一种从运动神经而达到各种肌肉的急流”，<sup>⑦</sup>在这种“急流”的冲击下，空气猛烈地从肺部呼出，致使声带发出声音和脸肌肉发生运动而生成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笑的突然迸发，可以使横隔膜、胸腔、心脏、肝肺都受到锻炼。人在大笑时，激活了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流入头部和大脑的血液量，使内分泌系统恢复协调活动能力，消除对健康有害的神经紧张感。这不正是唤醒和激活大脑神经细胞所必需的动力条件吗？

当然，从生理学上说，哭也能导致血液流量加速。但哭是精神压抑过度的表现，它所带来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紧张感”，与笑所带来的“轻松感”截然相反。大脑格外轻松而又突然增加新的生命诱发力，这时的神经思维细胞不比原先活跃得多那才怪呢。

#### 激发主动的创造智力

“机器”启动后，并不等于就能够生产出优良产品。要想培养优秀人才，学校的教育必须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作为整个教学过程的最终目标，因为“创造力”是检验学生智慧高低和学校教学质量的最好尺度，也是实现“四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所迫切需要的主体力量。放眼世界，哪一项高难技术，哪一项发明创造，不是“创造精灵”大显身手的结果。

所谓创造力，就是创新的能力，也就是从无到有地创造有新的价值的事物或思想的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他“不服膺既有的成规，即使是对严谨的科学理念的阐释和发挥，也不必收敛浪漫的想象，也无须束缚灵智的高翔。”<sup>⑦</sup>“想象”是创造力高扬的翅膀，“灵智”是创造力显现的眼睛。这两者又恰恰与幽默精灵得以飞翔的“动力”同出一辙。我国在幽默理论研究方面成果显著的陈孝英先生认为：幽默“内庄外谐”，必须通过咀嚼、揣摩、联想、玩味的思维过程来领会幽默家的用意。幽默在表现方法上的这一特点，从创作主体——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是运用‘暗示’的、‘含蓄’的手法予以表现；从欣赏主体——观赏者的角度来讲，则是采取‘意会’的、‘联想’的方法进行领悟。”<sup>⑧</sup>或者如鲁迅先生所译介的日本作家鹤见佑辅所言，“幽默者，和十八岁的姑娘看见筷子跌倒，便笑成一团的不同。那可笑味，是从理智底事发生的。”“幽默既然是诉于我们的理性的可笑味，则在可笑味所由来之处，必有理由在。那是大抵从‘理性的倒错感’而生”<sup>⑨</sup>的“诉于理性的可笑味”，就是调动欣赏主体积极的思维能力，在“意会”和“联想”中所产生的可笑性；“理性倒错”，运用“暗示”、“含蓄”的手法，使之与观赏者的“理性”相悖。可见，幽默创作和欣赏的主要特征：一是“含蓄”，一是“联想”。两者正是培养学生主动创造智力的“金钥匙”。

从世界上许多发明创造可以证明，“科学是从幻想开始的，幻想是科学的准备阶段，是科学的第一步。”<sup>⑩</sup>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他童年时幻想人能跟着光线跑开始的；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从人们幻想造出飞鸟的翅膀开始的；世界上的第一艘潜艇，起于人们梦幻有鱼翔海底的能耐……事实证明：“创新智慧卓越者，大多是想象力无限膨胀、无限张扬、无限浪漫乃至无限疯狂的人。”<sup>⑪</sup>至于幽默价值的最终显示，它必须凭借“联想”，没有“联想”就悟不出幽默家的含蓄之味。当然，“联想”不同于幻想，但“联想是幻想的初级形态，……由想起一事物联想到另一事物，并把他们巧妙地组织起来，成为幻想。”<sup>⑫</sup>可见，没有联想就没有幻想，不善于开动自己的联想机器的人，要幻想出闪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要造就一批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不努力开发学生的想象力（联想和幻想的能力），这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再从具体的教学效果看，由于幽默教学方法是一种运用含蓄的手段去传授思想和知识的方法，学生不可能被动直观地认识其中的奥秘，必须调动各种思维能力，随着教师所暗示的方向不断揣摩、思考和想象，直至把“谜底”悟出为止。幽默的这种欣赏过程，实际上就是全身心总动员去进行思考和想象的过程。“笑”是思考想象过程中的“顿悟火花”。尽管“顿悟”的时间是短促的，但促使顿悟的契机，就是想象中的突然发现。由于潜藏在含蓄之中的“谜底”被智力的高扬突然发现，幽默观赏者才感到无比的优越与自豪，智力的生命力量在此得到了迅猛的升腾，爆发出深沉强烈的笑声。总之，“幽默不仅把我们带到了想象的世界，而且它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对世界的哲理认识。”<sup>⑬</sup>既然幽默具有动员全身心去思考问题和想象问题的特殊功能，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不时地使用幽默的教学手段，这对锻炼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去接受知识，无疑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就这样认为：“没有一种精神机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对象，这是伟大的潜水者。”<sup>⑭</sup> 爱因斯坦也断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sup>⑮</sup> 可见，运用幽默的教学手段去锻炼和培养学生的敏慧的想象力，实际上就是在学校，尤其是中小学这个特定的教学环境中，激发学生主动的创造智力。

### 造就美好的心理品格

什么样的心理够得上美好？什么样的品格令人羡慕？在复杂的人类世界中，各家有各家的主张，实在难以划一。但生活得“体面”而又“欢乐”，这是人类的共同愿望，美好的人生心理和人生品格就在这共同的愿望和追求中诞生、升华。

然而，在五光十色，曲折繁复的现实生活中，实现真正的“体面”而又“欢乐”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月有阴明圆缺，人有喜怒哀乐。不过，在阴明圆缺、喜怒哀乐之中，有一个可以使你自由驾驭的“法宝”，这就是人类一种崇尚的人生态度——幽默。只要你能够拥有它，逆境中你会不觉困苦，顺境时你会更加清醒；只要你真正拥有它，不管你走到哪里，人们总是投以崇敬的目光，并积极分享你的幽默才能所创造的笑与乐；只要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人懂得幽默，并具有真正的幽默心理和幽默品格，一切会显得更加和谐。原因就在于：“幽默是智慧的结晶，是健全的理性和深厚的修养的产物，也是一种感知和发掘世界一切可笑对象的能力，一种理解和创造笑的艺术的才具；更是一种达观而敏锐、超拔而挚诚、真率而又坦然的人生态度。”<sup>⑯</sup> 我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他一生之所以如此富有光辉，并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集中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品质于一身的同时，在各种不同的人群和场合中，又经常显示出独特的幽默风格。例如，在一次招待东欧使节的宴会上，一道传统中国菜上的“卍”图案，无意中被弄成法西斯的标志“卍”。外宾见后大吃一惊，忙向周总理请教。总理风趣地说：“这不是法西斯标志，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图案，名叫‘如万’，象征着‘福寿绵长’，这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更加幽默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关系嘛，我们一起来看看把它消灭掉！”客人听后哈哈大笑，这道菜被吃个精光。<sup>⑰</sup> 如果没有敏捷的思维和幽默的哲学，这种场面出错就令人难堪了。象这种见出坦然心胸和幽默才能的例子，在周总理一生中屡见不鲜。但只有心灵练达、品格高尚、修养深厚的人才能洞悉人世中种种可笑的对象并拥有幽默。那种心怀狭窄、品格卑劣的人，永远不会跟幽默沾边，顶多只会弄点滑稽罢了。既然幽默对人生的心理素质和品格风尚的建树有如此美妙重要的功能，作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社会主义学校，幽默的研究和使用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那种“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sup>⑱</sup> 的面貌应尽快改变。

此外从目前大中小學生的心态发展看，随着我国考试招生制度和择优分配制度的改革，不管是哪一层次的学生，他们所承受的升学或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那批成绩较好的学生，家庭、学校、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不同一般，因此精神负担更重。有的同学曾这样叹惜：“美好的中学时代，对我来说就象戴上镣铐的翅膀一样。”而在这种身负

重荷的竞争中，个人主义思想不是削弱，而是有所加重；为了升学而不顾一切的不道德的行为近年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究竟如何才能使在校学生成为既奋发向上，又心胸宽广，既积极参加竞争，又品格高尚的朝气蓬勃的新一代？在不断深入地进行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同时，从小就在他们的心中播下幽默的种子，逐渐培养他们的幽默心境和幽默气质也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王朝闻先生就这样认为：“只有不断创造着精神文明的建设者，精神文明的建设才有它那胜任的创造者。而幽默的才能，就是建设、创造精神文明的一种动力。”<sup>⑧</sup>林语堂先生更尖锐地指出：“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sup>⑨</sup>两位幽默的创导者都从不同的方面道出了幽默对克服人性的弱点，造就美好的心理与品格，建设文明社会的特殊功效和意义。

#### 深化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

在学校一切教学工作中，教师是决定性的设计师和施工员。要培养具有创造性能力的新型人才，教师自身必须具有广博厚实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要使幽默的力量在学生身上产生良好的效果，关键也在于教师自身要具有一定的幽默素质和驾驭幽默的实际技能。幽默教学方法的推广和使用，对深化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幽默是融人文科学多种要素于一炉的智力创作，一种成功的幽默教学艺术的设计和使用，它本身就显示出十分丰富、巧妙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

从哲学上看，幽默一旦用于教学并产生强烈的喜剧性效果，它就不是一种单一的静止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由教师直接创作，学生积极参与的动态多维的矛盾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既有创作主体（教师）与接收主体（学生）之间由于幽默的“谜团”所构成的矛盾，也有接收主体与幽默实体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幽默实体自身在本质与现象或目的与手段或动机与效果等方面的矛盾以及接收主体在认识、想象、思维中所产生的矛盾。黑格尔曾告诫性地指出：“喜剧性不仅首先来自目的本身的矛盾对比，而且来自与主观性和外在环境的偶然性相对立的内容的矛盾的对比。”<sup>⑩</sup>象前面所列举的周总理宴会上的幽默，当周总理的解说出现之后，这件事所生发的矛盾就多了：其中有周总理的解说与法西斯标志明明存在的矛盾，有周总理的意图与客人的认识的矛盾，有客人的前认知与后感觉的矛盾等。然而，经周总理的巧妙处理，这些矛盾统统成了引人发笑的源泉。一件小小的幽默就有着如此多维的哲学内因，如果要得心应手地驾驭幽默，成为一位受学生敬佩的幽默型教师，不具备丰富的哲学知识和灵巧的哲理技能，显然是难以胜任的。

从心理学上看，幽默作为美学范畴“喜剧”中的主要成员，它的种种功能与价值，最后都是通过审美效应——“喜”来显示的。而“喜”属于心理学概念，是接收主体心理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情绪外化。不管是课堂教学还是艺术表演，要创造成功的幽默情境，不研究幽默心理学，不从根本上把握笑的特性、笑的因由、笑的机制、笑的种类，幽默的创

作能力和技巧就失去应有的根底。一个爱笑和懂得如何使人笑的幽默型教师，他的心理学知识和经验一定非同一般，那种只会用噱头逗笑的除外。

从社会学和教育学上看，“幽默是一种智慧的火花，它伴随着笑声来‘惩罚不良的社会风尚’，净化人们的灵魂。因此，幽默的运用，就是一种生活和斗争的艺术，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活动。”<sup>②</sup>要想使学生在笑声中既学到知识，又得到“净化”，教师必须细心地观察社会，洞察人生各种各样的复杂现象，从而选取对各种不同层次的学生有用的和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幽默感的素材。一个不关心社会，不了解社会和不熟悉自己教育对象的教师，很难创造出令人趣味无穷的幽默性的笑，因为“笑的背后，体现着社会对个人行为方式的态度，体现着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sup>③</sup>如果不对自己的教育对象所面对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人生态度等问题了如指掌，即使智力再发达，也幽默不起来。所以说，幽默形态之中，又包涵着社会学和教育学中的许多奥秘。

通过以上对幽默本体要素的部分考察，足以见出它所涉及的学科知识何等丰富，何等讲究。幽默教学方法的推广和使用，势必会大大地丰富和深化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这对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无疑会产生“全方位优化”的效果。

---

①徐侗《说话幽默》第12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5卷第58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③《笑的科学》，见《卫生与生活》1989年9月25日第4版。

④《创造的秘密》第15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见吕渭源《课堂教学与智力培养》第2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⑥英国十九世纪哲学家斯宾塞的观点，见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第127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⑦金马《创新智慧论》序第8、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⑧《幽默的奥秘》第9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

⑨《鲁迅全集》13卷第5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⑩⑪商继宗、钱颖《创造性学习心理学》第1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⑫金马《创新智慧论》第20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⑬〔法〕伊沃纳·杜布莱西斯《超现实主义幽默》语，见《喜剧理论在当代世界》第11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⑭转引自金马《创新智慧论》第20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⑮《爱因斯坦文集》1卷第28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⑯陈侗晶《中国幽默小说选》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下转第141页）

## 浅谈市场经济与国营物资企业的改革

袁中越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物资流通与其它行业一样，已由以计划为主的物资产品经济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物资商品经济转轨。改革开放13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转轨是改革的必由之路，是解放流通企业的生产力，适应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唯一选择。作为物资流通的主渠道的国营物资企业，如何适应这种经济转换，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的改革，促进经营机制的转变，是一个严峻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

在产品经济条件下，物资流通领域历来是计划性最强的领域。物资企业基本上是国营企业，物资经营也基本上是一种物资产品的计划调拨，从上至下“一张表、一口价”，国营物资企业实际就是政府的一个物资调拨部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体制格局的形成，使物资流通领域也开始由单一的国营经营变为国营、集体、个体物资企业一齐上的格局。实际上近年来，国营物资企业虽然仍是主体，仍发挥着“主渠道”的功能，但其市场覆盖面已开始逐年下降，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已开始受到动摇。其次，就国营物资企业来说，随着生产资料价格体制的改革，以及指令性计划的削减，国家指令性计划价格分配的物资的品种、数量都已大幅度减少。前几年，实行价格双轨制，国营物资企业仍可以在双轨之间的价差之中寻找短暂的“活力”与“效益”，但近年来，双轨价差逐步缩小，并必将最终并轨。在走向完全的市场价格的趋势下，国营物资企业的原有的垄断性优势已大大弱化。其三，随着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产业政策经过几年的倾斜，生产资料物资的供求矛盾开始略有缓和，并必然进一步向供求均衡化发展，因此，生产资料物资流通中长期稳固的卖方市场已出现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迹象；尽管卖方市场的状况仍可能再持续一个时期，但毕竟已经不是一种绝对的态势，因此，作为国营物资企业的经营机制也不能不逐步转换。其四，生产资料物资流通市场的新格局的形成，经营主体已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化，流通渠道价格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物资市场的竞争也不断加剧。具体说，就是已形成了“四足鼎立”：一是由专业化社会分工发展起来的国营物资部门的主渠道；二是借与物资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紧密联系的，又与政府主管部门有血缘纽带的，

具有一定优势的工业部门的物资供销企业；三是由扩大生产企业自主权之后，生产企业多元化经营而派生或壮大起来的企业自身物质供销机构；四是作为国有经济补充但具有独特的灵活机制的集体、个体或多种所有制联营的物资经营单位。1990年的统计表明，上述四个不同类型的物资流通部门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国营物资系统22%，工业部门20%、生产企业所属的供销部门56%、集体个体及其它单位2%。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近年来物资生产企业的集团化或横向经济联合正方兴未艾，产供销一体化、一条龙的趋势已愈来愈强，这对专业物资企业无疑是严重的挑战。上述表明，国营专业物资企业无论在外环境还是内部机制上，已处于一个不变也得变的境地。随着经济的全面市场化，国营物资企业只有抓紧自身的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大步迈向市场，投入竞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 二

面对挑战，如何改革？

首先是观念更新。观念更新的重点是破除产品经济思想，树立商品经济的市场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生产资料的流通主要应通过市场来实现，不讲价值规律的产品计划调拨必须废止，计划性只能建立并融合在市场机制之中。只有从根本上确立市场经济思想，物资企业才能从“吃计划饭”、“靠行政垄断权换取利润”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作为市场中平等的一员，参与竞争。否则，现存的“优势”实际上反而成为改革障碍，现存的弊端也始终难以得到正视。

其次，要在企业体制改革上下功夫。近十余年来，国营物资企业已经迈开了改革的步伐，采取“承包经营”、“放权留利”、“利税分流”等各种改革措施，也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不能不正视的是，1989年至1990年的全国性经济滑坡、市场疲软，一个大浪，多数国营企业就被打入低谷，表现出应付市场变化的能力十分脆弱；换言之，就是我们已经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仍未能真正达到市场经济的要求，关键性的问题并未解决。

什么是关键性问题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个现象。在前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个被有关学者称之为“斯米克”的现象。斯米克现象的原型是指上海拉丝模厂与英资斯米克公司合资经营，合资之后，同样的员工、同样的厂房设备、生产同样的产品，但立即转亏为盈，所谓“一合就生”。斯米克现象后来成了一种泛指，指原来经营不景气的国营企业，一经与外资或集体、个人合资、联营后，很快出现生机的独特现象，或叫“合资效应”。这种现象，同人们所看到的所谓“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似乎也有类似的含义。其实，斯米克现象，并不奥秘，它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国营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企业基本体制。从国营变为合资，从深层的企业体制上看，一是所有制形式变了；二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了，然后才是其它方面的改变。一旦国营企业从原来过度地从属于政府转为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的独立经济单位，它的改革的真正迈步也



才有了前提。今天，已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国营企业的改革，首先在于它与政府关系的改革，要把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刀斩断，彻底还权于企业，让企业真正独立自主地在市场上竞争，形成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这“一还（权）四自”便是斯米克效应，而产生这种效应的重要前提就是告别政府，走向市场。我们不是叫了多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吗？老叫个不停，就意味着还没有真正搞活。为什么老搞不活？思路不对头。其实，政府那天放手不过多干预，让企业自己去搞，你看活不活？这正如人们叫了多年向“企业放权让利”，但企业一点不感到解放了一样，所谓“一个项目一百个公章”，“企业各种负担加重”的呐喊，不就说明所谓“放权让利”的提法并不科学，思路也倒了；应该是“还权企业”、“不向企业争利”。

上述一般国营企业的改革路子，对国营物资企业同样适用。国营物资企业改革的关键，也应该是改革它同政府间的关系，逐步把它从充当政府物资计划分配调拨部门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变为物资流通市场中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在此前提下实行体制、职能、机制的转换，激发出竞争的活力。

当然，国营物资企业要实行上述改革，难度比之一般工业企业往往更大。在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重要生产资料的社会分配还不可能一步到位全面放开；物资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并存状况仍须维持一个时期，逐步并轨；短缺物资资源的生产调控和分配调控也离不开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预及借助一定的行政手段；特别是国民经济全局平衡协调所要求的主要生产资料的蓄、供职能，仍一定程度上要由国营物资企业来承担。所以，短期内国营物资企业将维持一种“双重角色”，肩负“双重职能”，即一方面它应该是不从属政府的独立自主的企业，只有这样，它才有商品经营者的活力；另一方面，它同时还要兼负政府的部分物资分配的管理、调控的职能，充当政府在调控重要生产资料或短缺物资资源的“蓄水池”，代行着部分政府的行政职能。尽管这是现实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尴尬境况，但从长远的改革取向来看，仍是影响国营物资企业经营体制、机制转换的制约因素。

改革要朝着政企彻底分开的方向推进。首先，可以从国营物资企业目前的“双重角色”、“双重职能”的分离入手，所谓左手右手各抓一把，不要掺和。国营物资企业代行政府指令性计划分配物资，发挥吞吐调节功能应该与企业自身独立经营的部分在资金、帐目、盈亏效益上分开。只能这样，才能看得出企业的真正经营绩效，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才能培育起不吃计划饭，靠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力占领市场的真本领；才能为国营物资企业最终向完全单一的商品经营者身份转换创造条件。

其次，继续推进利税分流的改革，减轻国营物资企业的赋税。应该承认，所谓国营不如集体、个体，也有客观原因。原因之一就是赋税不均，国营企业负重参赛，削弱了竞争力。现在大部分部、省属物资企业，利前税高达总收入的10%，利后税一般为60—70%，最高的甚至达85%，使这些企业基本失去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1991年

9月，财政部已批准物资部15家直属企业实行利税分流试点，实行33%所得税率，免交部分“两金”，这无疑大大减轻国营物资企业负担，增强其市场竞争实力的重大措施。但其它同类物资企业，是否如此？是否可以参照实施？

第三，改革国营物资企业的基本体制，大力推行企业间的经营联合、参股制、兼并等，发展物资企业集团，优化物资企业组织结构。同时，仍可进一步推行承包经营，包括允许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参股或承包经营国营企业，引进活力。

第四，进一步改革生产资料价格体制，以促进生产资料物资市场的发育成熟。尤其是在实行双轨价格并轨的过程中，要警惕“错位并轨”，即回归到国家定价的原位。必须遵循市场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明确定价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行政部门，是供求买卖的双方而不是其它。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调控只能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例如，可以采用参考价格、批量价差幅度、批零价差幅度等办法，同时完善市场交易规则。总之，还是那句话，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搞市场经济，非此莫属。

作者单位：广东省建设物资公司

责任编辑：林有能

---

（上接第159页）

管理以人为主”的指导思想，把人的管理放在首位来抓。在建立健全严格的制度的同时，还坚持开展政策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厂规厂纪教育，经常开展多种多样的谈心活动，做到了七个必谈（即新工人进厂必谈；发现错误苗头必谈；发现不团结必谈；发现异常情绪必谈；职工受处分必谈；布置新任务必谈；职工得到荣誉奖励必谈）七个“必访”（职工重病在家必访；职工家有不幸事故必访；职工家庭产生纠纷必访；职工有特殊困难必访；职工无故三天不上班必访；重大节假日对退休、住院职工必访；对长期在外工作职工的家属必访）。做到了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从而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全厂形成了一个奋发向上、充满活力的整体。

作者单位：佛山市变压器厂

责任编辑：石 成

# 以集团化推进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化

——广东明珠球阀集团公司的实践及启示

李桂崇

广东明珠球阀集团公司是以全国先进阀门生产厂家、国家二级企业广东省球阀厂为主体，联合生产球阀和生产驱动执行装置、精铸件、配件的兴宁铸造厂、汽车配件厂等省内44个企业和科研单位组建而成的经济实体，是全国第一个研究、制造球阀的球阀行业生产专业化集团公司。该公司的酝酿、实践和组建、发展过程是显示和发挥群体优势的过程。事实表明，专业化大协作是发展球阀生产之路；企业集团化是企业改革全面深化的广阔道路。

## 一、配套协作，发展球阀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

专业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具体表现和客观要求。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工业结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不断变革，并且培育和产生了新的企业管理的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即配套协作——横向联合——专业化、集团化。明珠球阀的生产实践和集团公司的组建、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科学规律。

广东省球阀厂的前身是兴宁县阀门厂，始建于1971年，由于受“小而全”的封闭式和自然经济等旧观念的束缚，生产的铸铁阀门产值低、效益差，企业连年亏损。然而，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市场的竞争，优胜劣汰。该厂领导认识到，市场竞争就是产品竞争，而产品竞争说到底又是科技竞争，要改变企业的被动局面只有开发先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1981年底，该厂决策引进西德KH型内螺纹球阀产品。该产品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技术工艺要求高，而单靠阀门厂的设备、技术力量是难于完成引进和生产任务的。因此，他们着力组织技术攻关，配套协作，联合生产，作出了艰巨的努力和实践。

1. 合力攻下设计关。KH型产品的引进，是由西德商人提供样机和图纸由我们制造。对样机的解剖分析和图纸核对鉴别，需要很强的技术力量才能完成。因此，该厂联合县内球阀、机械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攻关。修正了原图纸近百处错漏，并根据国际标准设计出新图纸，并得到外商的认可和赞许，从而闯过了图纸设计关。

2. 协作生产，形成新生产力。根据引进协议规定，制造KH型球阀不仅工艺要求高，而且首批产品交货时间紧，为保证依时按质交货，该厂组织18个厂协作奋战，终于

依时按质完成了首批球阀出口任务。实现了KH型项目引进、消化、吸收，创造了现代化高科技的球阀新产品。事实证明，以阀门厂为主体，发挥兴宁机械工业的整体优势，联合球阀生产技术力量，开发了新一代球阀产品——明珠牌KH型球阀，是球阀生产专业化实践的成果，它给困境中的阀门厂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

## 二、上批量、创效益、专业化、横向经济联合，为组建企业集团创造了条件。

“明珠”牌球阀试制成功后，有效地占领了国内市场，并打进了国际市场。仅1983年就出口6500台，创汇40多万美元，过去人们戏称的“求活厂”而今喜称为“求发厂”。找上门订货的用户纷至沓来，产品供不应求。市场信息启动了改革者的信心，球阀厂领导进而组织开展了专业化协作，保质量、上批量，开拓球阀市场专业化的大协作，其形式是：由球阀厂提供图纸、资料、原材料以及技术指导，各协作厂按图加工球阀零部件，球阀厂按质验收，组装成品。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企业之间为发展生产和取得更大的效益而产生的新型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关系，必将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新的推动力。而平等、互惠、分工、协作之中所焕发出来的新的利益机制与利益格局，又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他们的协作关系。明珠球阀集团吸引了20多家国营、集体企业参加球阀生产专业化生产协作，推动了球阀生产的发展，产品大批量推向市场，球阀厂经济效益剧增，1986年盈利160万元，成为兴宁县创税大户。协作厂也从中得到了好处，机械设备和技术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解决了大家“吃不饱”的问题，加工技术不断提高，企业收入增加。

在专业生产、配套协作中，广东省球阀厂制订实施以“拳头”产品为龙头，以技术改造、革新为配套的治厂方针。做到产品开发以优取胜，以快取胜，实现以科技为先导、产品创优质，达高标、上档次，企业创效益。主导产品“明珠牌”KH型内螺纹球阀采用国际技术标准证书，1985年获省优、部优产品称号，产品远销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和地区，国内销往27个省市，被用户誉为“万次阀”（即可启闭万次以上）、“免检阀”（购买不用检测）、“功臣阀”（用户实现无泄漏工厂的功臣球阀）。协作厂从为主体厂加工零配件发展到共同或单独开发球阀新产品，从而推动了球阀生产的规模发展。

由此可见，球阀生产专业化，增强了企业之间的配套协作能力，密切了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为社会化大生产及企业集团化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从工业经济的理论看，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有利于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组合，开展专业化协作，有利于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重点技术开发，提高企业市场应变能力，有利于企业转换和完善经营机制，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发展山区经济要有现代化工业意识，形成振兴山区球阀工业的气候和魄力，创造更大规模的专业化协作。其根本途径在于组建企业集团，而广东省球阀厂生产专业化的实践，孕育和催生了广东明珠球阀集团公司，以广东省球阀厂为核心，联合兴宁汽车配件厂、兴宁县铸造厂等企业组建的广东明珠球阀集团公司实现了专业化生产、经营、科研、技改全方位的大协作。时仅一年多即显示出企业的群体优势，

进一步扩大了专业化大协作的领域，促进了企业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产、销、税、利同步增长。公司1991年年产值达2500万元，税利为360多万元，预计通过“八五”前三年技改，年产值将达到一亿元，比1991年将更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展现出远大的前景。

广东明珠球阀集团公司经济实体向生产规模化、产品系列化、服务社会化、资产经营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该集团公司实行产、销、供、人、财、物统一管理的同时，又“分灶吃饭”，各厂独立核算，在经济关系上，集团公司实行“一口”对上承包，直属厂向公司承包，实行公司、企业两级核算。“公司”一口统一对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发生关系，公司与各厂之间的财务往来，实行内部银行管理，在生产销售方面实行“三统一”即由集团公司统一对外征订销售合同，统一经销球阀产品，统一安排球阀生产，并按销售额提成作公司管理费用。在机构设置方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办法，即集团公司与主体厂广东省球阀厂合设一套机构，即“一所二部二室三公司”，即阀门研究所、企业管理部、生产发展部、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产品销售公司、物资供应公司、劳动服务公司。

实践证明，这种既管集团公司又管球阀厂的管理体制有利于突出主体厂的中心地位，有利于转换和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理顺集团公司与主体厂的关系，全面落实经理承包责任制，从而加快集团公司发展，显示了专业化、集团化社会大生产的群体优势。

### 三、思考和启示。

广东明珠球阀公司的成功实践开辟了梅州山区工业发展之路，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集团的特点。这就是以骨干企业为主体和依托，围绕名优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发展企业联合，实行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他们在联合中坚持“四有利”，即对国家、地方、参与企业和主体厂都有利；采取多种方式，既有紧密型又有松散型，做到保证集团成员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企业对自己经营活动具有决策和实践的权力和能力。实践表明以广东省球阀厂为核心，团结一批国营、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球阀集团公司已有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活力，它以国内市场为后盾，国际市场为目标，发挥了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创造了产品优势、市场优势、“双引”优势和具有规模效益的球阀优势，它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 （一）集结技术力量，创造产品优势。

球阀集团公司领导具有强烈的科技开发意识，一年多来，以集团公司产品开发部为中心，汇集各厂技术力量联合攻关，成功地开发了250、300毫米口径球阀、220、350毫米缸径气动装置、三通球阀、高压球阀、中温球阀、卡通式球阀、电动球阀、锅杆传动球阀等适销对路的新品种，形成了球阀产品系列。最近该公司研制的对分式法兰球阀和QGH型气动执行装置系列新产品通过了省级鉴定，两个产品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可替代进口产品，其中QGH型气动执行装置系列属国内首创，填补了空白。然而，开发新产品与提高产品质量都是创造产品优势的关键，公司领导把产品的质量视为企业的

生命，始终把质量管理当作重点来抓，制订质量要求和质量考核制度，组织质检技术队伍，层层落实，专人负责质量考核、检测、抽查，保证产品质量。据1992年的一次突击检查表明，产品出厂合格率100%，一等品率72%，主项主件合格率98%，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二级企业标准而获得赞誉。

### （二）集结营销力量，创造市场优势。

当今，市场竞争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营销竞争。球阀集团十分重视公司营销队伍建设，努力提高营销人员思想素质和营销艺术，争取最佳的营销效果。在集中、调整、优化营销队伍的同时采取四条措施：一是重新规划销售区域、分工负责，做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无一空白；二是立足长远，点面结合，在各大、中城市设立销售点，形成全国性营销网络；三是由领导、技术、营销人员组成“营销别动队”上门专访用户，联系发展业务；四是办好一年一度的全国订货会。此外还加强产品宣传，沟通营销动态，掌握市场信息，努力巩固老用户，开发新用户，创造国内市场优势。

“明珠牌”KH内螺纹球阀试制成功，一投放市场即赢得国内外用户的一片赞誉，首批产品很快打入国际市场。此后该产品还获得国际技术标准证书，获得部优、省优产品称号，远销东南亚、欧美各国。美国基沃尔阀门公司董事长来厂考察后说：“你们的管理现代化是中国几十家阀门厂的第一，KH型球阀在美国有很高的声誉。”如今的“明珠牌”球阀已成为国家机械出口公司、广东省公司及省市外贸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

### （三）发挥集团公司的企业信誉，创规模效益，形成“双引”优势。

资金缺少是困扰山区工业经济发展的难题。球阀集团公司发挥企业集团的社会信誉，采取“借船出海”、“上岸还船”的办法，解决了技术改造，完善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困难。他们通过银行发行短期融资债券，争取深圳市的贷款。同时利用金融部门对公司的支持和主体厂的经济实力，实行内部资金融通，全面实施和完成技改项目，完善配套，新上生产线，形成球阀生产专业化规模生产。从而又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实力，扩大了“明珠牌”球阀的国内外声誉，创造了“双引”优势。在引进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取得了新的成效。吸引了台湾易诚股份有限公司与企业合资兴办精铸厂。它将球阀生产改棒料加工为铸件加工，从而降低了成本，实现上规模、创效益，促进集团公司再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单位：广东明珠球阀集团公司

责任编辑：林有能

# 依靠科技进步是振兴企业的必由之路

——佛山市变压器厂发展的启示

齐建中

佛山市变压器厂是一家只有400多名职工的国营中型企业，该厂在国内同行业400多家企业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走依靠科技振兴企业的道路，坚持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调整产品结构，推行科学管理，全面提高企业素质，使企业迅速跻身于全国变压器制造行业的先进行列，成为我省产量最大的变压器厂之一。1989年被评为全省同行业唯一的一家国家二级企业，人均创税利、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能耗、人均产量均居全省之首、全国同行业前5名之内。去年各项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大幅度增长，销售和利润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8.2%和49.8%。

## 一、坚持技术改造，强化竞争手段

技术进步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和主体动力。1987年，佛山市变压器厂新的领导班子面对企业技术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无法适应竞争的局面，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企业进行全面技术改造，抢占科技制高点。

首先，是站在技术的高起点上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该厂针对关键工序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从西德乔格公司引进了具有8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波纹油箱生产线和硅钢片斜剪生产线，使斜接缝铁芯片和波纹油箱实现自动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确保产品质量，使全厂设备技术水平跃上新的台阶。

其次，抓好引进设备的消化吸收。为此成立了由高级工程师等四人组成技术消化吸收的班子，专门对引进设备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努力，科技人员全部掌握了引进设备电气、机械等方面的性能、构造原理和技术处理手段，使设备的零部件和易损件国产化率达100%。不但每年节约了近20万元，而且随时可维修，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引进设备不完善部分大胆进行改造，如针对斜剪设备速度慢的问题，改革了设备，效率提高了近10倍，此项改革在全国变压器行业中推广。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进行消化吸收，变压器厂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以简单机械为特征的落后生产方式，使企业站在以先进技术装备为支撑，以发展新优产品为目标的高起点上，为企业生产经营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二、依靠科技力量，大力调整产品结构

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开发新产品，是工业企业经受风浪，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开发新产品，关键是善于集才、培才、用才。前几年，该厂只有7个技术人员，根

本无力进行产品开发。为此，厂领导把引进人才和培养技术骨干作为重要任务来抓。近年来，先后调进专业技术人员36人，选送到大专院校脱产培训11人，选送参加短期培训168人。目前，全厂已有专业技术人员80多人，占全厂职工的19%，其中有高级工程师9人，形成了较雄厚的科技开发力量。

技术进步加快了产品结构的调整和质量提高。一是改革工艺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该厂注重采用先进的技术，改善产品的性能，改进部分产品设计，节约原材料消耗。如改进了10KV级630—1000/10产品绝缘结构，节约材料15%；改革硅钢片四斜两直铁芯结构，节约材料7%；对油箱处理工艺由原来的“四合一”除锈磷化改为快速除锈钝化工艺，节约开支75%等等，使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下降。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发新、特、优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近几年先后开发出环氧模铸干式变压器，全密封电力变压器、110KV级高电压大容量变压器等20多种设计新颖、性能优良的新产品，去年，新产品产值率达38%。产品打进了大亚湾核电站、深圳机场、北京等地，还开拓了孟加拉、非洲、东南亚等国际市场。三是坚持技术储备，保持企业发展后劲。厂里组成了有20多人的新产品设计开发队伍，使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形成了生产一代、研制一代、设计一代的良性循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应变能力。

### 三、推行科学管理，全面提高企业素质

佛山变压器厂意识到，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技术作后盾，也不可能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该厂把推行科学管理作为企业一项重大的任务，积极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工厂实际的高效率管理体系：

1. 推行目标管理。根据厂长任期目标，采用目标管理和分层法。首先从机构上进行合理调整，建立起厂部、管理办公室、车间、班组四级管理机构，然后把企业的总目标，分解成16个子目标，35个小目标，层层分解下达，在全厂建立起纵横交错的目标控制网络和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加的目标管理体系，并将各自的经济责任制与奖惩挂钩，这样，使干部工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明确自己工作在企业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从而自觉做好本职工作，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2. 广泛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把质量管理作为基础管理的中心内容，建立起质量管理网络。工厂设立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由厂长担任主任，车间、班组组建了共有17人的质量检验队伍，从原材料、外协件、组件进厂到零件、半成品、部件生产装配到成品出厂均有专人把关。同时，按高要求制订产品标准。100%的产品质量要求都比国家或部标准高一个档次，全部产品均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去年全国同行业抽查，佛山变压器厂三个产品都是一等品。目前，全厂有36个产品是部优或省优产品，1991年优质品率达47.2%。

3. 坚持行为科学管理。佛山变压器厂大胆借鉴西方行为科学，坚持“人是兴厂之本，

(下转第153页)



## “广东省社科联系统学术理论刊物首次工作座谈会”纪要

由广东省社科联委托《学术研究》杂志社召集的“广东省社科联系统学术理论刊物首次工作座谈会”于1992年5月6日至7日在广州举行，省社科联领导梁钊、梁渭雄、张绰等出席了会议。广州、佛山、江门、中山、湛江、肇庆、韶关、汕头、茂名等市社科联的刊物负责人聚集一堂，交流改革开放以来各自办刊的体会和经验，探索加快学术理论刊物发展，提高学术理论刊物质量的路子。

会上，省社科联副主席梁渭雄讲话指出：当前，广东省社会科学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思想再解放一点，改革步子再大一点”，广东力争20年时间在综合经济指标上赶上亚洲“四小龙”，广东是排头兵，我们理论界，要将总结广东、研究广东摆在首要位置，很多东西可通过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来探讨全国性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理论界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社科联刊物一直坚持了正确的办刊方针，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

梁渭雄同志还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包括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概念、原理、学说、设计方案、管理方针等的特殊生产部门。它的成果不仅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社会物质生产的设计、过程和效果等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改造作用。在生产力发展中所体现的科学力量里，不仅有自然科学所造成的技术进步力量，而且有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所提供的决策、运筹力量。比如我省经济学界向省政府提交的《市场价格调节基金专题研究报告》被采纳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每年为国家节省各种补贴数十亿元。当然，不同学科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方式和作用周期有所不同，有的直接些，有的间接些；有的可以量化，有的难以量化，有的主要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有的主要作用于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大科学观，在广

东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也推上新的台阶，我省社科理论刊物要适应改革的大潮，办成有特色的、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

会议结束前，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学术研究》杂志主编梁钊同志谈了在新形势下，刊物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刊物是一个地方的一面旗帜、门面，办好刊物，对搞好我们的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指示，是我们办好刊物的指导思想。当前，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解放思想，抓紧落实。赶上“四小龙”，不要喊空话，关键是要鼓实劲。作为刊物，在这方面应尽可能提供一些可读性强的，有指导、参考意义的文章。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都很有利，我们要把握时机，不要去纠缠诸如姓“资”还是姓“社”等空洞的概念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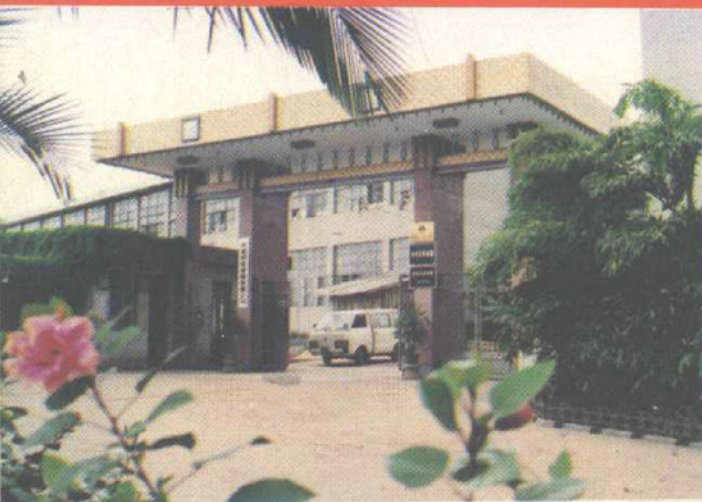
梁钊同志提出，我们的刊物一定要紧紧抓住质量不放，提高刊物的质量与提高商品的质量同样重要。要提高刊物的质量，要在文章的深度、新意上面下功夫。学术理论刊物办得有吸引力，有凝聚力，必须要有新颖的、深刻的观点，要有探索创新精神，要通俗易懂，要寓意深刻，充满哲理。

梁钊同志认为，社科联系统的刊物当前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1. 要注意总结广东13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这是探索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要求。2. 理论刊物要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造舆论，为发展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赶上“四小龙”献计献策，提供有价值的、操作性强的、可供参考的、给人以启迪的文章，从而指导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3. 基础理论研究也要抓紧，要冲破旧观念，敢于打破禁区，实践证明行不通的，过时的，就要不断清理扬弃。4. 要立足我们的优长学科和地方特色，做文章要立足本地，面向世界。

(下转第11页)

# 全球閥工業的“明珠”

## 廣東明珠球閥集團公司



廣東明珠球閥集團公司是以國家二級企業、中國閥門工業協會成員廠——廣東省球閥廠為核心的實體性企業。公司技術力量堅實，擁有電腦數控機床和現代檢測裝配等先進設備。

“明珠”牌系列球閥產品，是引進先進球閥技術，集國外各專業廠家之長精心設計製造而成。產品質量優異，內螺紋球閥八五年先後榮獲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和廣東省優質產品證書，曾多次參加國際博覽，頗受各界贊譽。

各類球閥的設計、製造以及檢驗標準符合國際標準和國家標準。“明珠”牌球閥暢銷國內28個省、市、自治區，還遠銷歐美、東南亞、非洲、港澳等國家和地區。廣泛適用於石油、化工、冶金、電力、輕工、食品、製藥、紡織、民用設施等行業。

地址：廣東省興寧縣城

電話：332706、332741

電掛：01273796

郵編：514500

總經理：李桂崇

